

THE

INVISIBLE IN AMERICA

DAVID K. SHIPLEY

WORKING

POOR

「努力致富」的社會，貧窮成為一種原罪，
為了富裕，我們就該承受痛苦、加倍工作

g poor, have only my dreams;
read my dreams under your feet;
ly because you tread on my dreams.



窮忙

們這樣的世代

獎得主 大衛·K·謝普勒——著

貧窮離我們並不遙遠！

「在諸多世代不公、階級不平等的感嘆中，或許我們都該讀一讀這本剖解當代美國社會——其實也是解剖我們自己的書。」
《介入的旁觀者》作者阿潑 盛讚推薦

- 一名收入微薄的單親媽媽，為了多陪伴在孩子身邊，選擇只領社會救助金過日子。
- 一對養育三名孩子的年輕夫妻，龐大的生活開銷讓他們存不了錢。
- 一名幼保人員，薪資低微到無法將孩子送去自己工作的幼兒園照顧。
- 一名勤奮工作的中年婦女，每年都看著年輕漂亮的女孩升職，自己持續領著最低工資。
- 一位太太罹癌的丈夫，既要養育家庭又要籌措醫藥費，生活捉襟見肘。

這些是美國社會的縮影，也是在貧富差距破百倍的台灣，可能發生於你我身上的故事。普立茲獎得主大衛·K·謝普勒，繼描寫以巴衝突的《受傷的靈魂》、美國種族歧視的《陌生人的國度》後，花費數年時光、採訪十多個家庭，生動地記錄了窮忙族的故事。數十年的記者資歷，讓謝普勒在描寫貧窮問題時，能夠一針見血地指出政策與體制的弊病之處，以及窮忙者的個人困境。他對窮忙族充滿關懷，寫下「任何辛勤工作的人都不應該是貧窮的，」為了理解貧窮，他深入勞動世界，勾勒出窮忙族背後教育、醫療、家庭、心理、薪資結構、居住品質的失能，以及社會體制對於貧窮者的不友善。

與市面上其他描述貧窮的書相較，《窮忙》並不單記述貧窮者的困境，為了充分理解貧窮的每個成因，謝普勒同時採訪了企業家、經營者、教育體系中的老師，以及與窮忙族共處的醫生，解開貧窮既有個人因素也有社會因素的真相。本書以紀實角度勾勒出窮忙族的故事，書中沒有任何虛假人物，我們因而能透過一篇篇故事貫穿窮忙族的困境與心靈，突破對貧窮的單一想像。

在人們普遍相信「努力致富」的現在，《窮忙》打破了「美國夢」，讓大眾直視社會黑暗，理解到只有當我們願意正視貧窮問題，看清環節，才能真正迎向脫貧的時代。



作者說明	0
序	0
	5

前言 ▶ Foreword	
在貧窮邊緣	0
	9

第一章 ▶ chapter1	
金錢與金錢的背面	0
	2
	1

第二章 ▶ chapter2	
努力工作是不通的	0
	5
	3

第三章 ▶ chapter3	
將第三世界引進美國	0
	9
	7

第四章 ▶ chapter4	
充滿恥辱的收割季	1
	1
	9

第五章 ▶ chapter5	
令人畏懼的工作場所	1
	4
	9

第六章 ▶ chapter6	
父的罪行	1
	7
	3

第七章 ▶ chapter7	
親情	2
	1
	1

第八章 ▶ chapter8	
身體與心靈	2
	4
	5

第九章 ▶ chapter9	
懷抱夢想	2
	8
	1

第十章 ▶ chapter10	
工作行得通	3
	0
	9

第十一章 ▶ chapter11	
能力與決心	3
	4
	7

後記	3
	6
	5

註釋	3
	7
	5

作者說明

書中最重要的統計數據，在這一版裡都已經更新了。這些數據顯示出，除了生活變得更加艱辛之外，貧窮的基本現象沒有重大的改變。最富有與最貧窮之間的淨值差距變得更大，富裕學區與其他學區的資源差距也變大了，有更多孩子因為氣喘而缺課、更多美國人沒有健保、更多人體驗到飢餓、更多人遭受牢獄之災；加入工會的工人變少了，從事基礎工作的非法移民變多了，這些移工當中有更多人從墨西哥穿越邊境後葬身沙漠。

儘管國會和很多州的立法機構都已經調漲了最低工資，不過大部分的單一收入家庭所得還是落在貧窮線（貧窮門檻）¹以下，在接受調查的成年人當中，無法應付日常閱讀、算數和理解文件需求者占了驚人的比例，這使得他們在全球市場上毫無競爭力可言。次級貸款現象始於對低收入家庭的剝削，延伸到中產階級，最後危及整個金融市場網絡，這說明了我們不可能隔絕窮人與瀕臨貧窮者的問題。沒有避難所，只能尋求補救之道。

大衛·K·謝普勒 二〇一二年五月

1 譯註：貧窮線（poverty line）指的能滿足生活標準所需的最低收入，大約類似台灣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序

對於大部分在這本書裡面寫到的人來說，憤怒是一種奢侈。他們精疲力竭、苦苦掙扎，薪資無法讓他們遠離貧窮，改善生活，而生活也反過來困住了他們，常被用來描述他們的詞彙「窮忙」，根本是矛盾的，在美國，任何辛勤工作的人都不應該是貧窮的。一九九七年，這個國家的景氣蓬勃發展，我開始著手找出那些被拋在後面的勞動人口。我在華盛頓特區的黑人社區裡、在新罕布夏州的白人城鎮裡、在克里夫蘭和芝加哥的工廠跟就業培訓中心裡、在阿克倫和洛杉磯的住宅計畫裡、在波士頓和巴爾的摩的營養不良門診裡、在加州的血汗工廠裡、在北卡羅萊納州的農地裡，找到他們。我的目的是要在他們允許的範圍內，盡可能徹底地檢視他們的生活，理解導致他們不同困境的錯綜複雜的原因。有些人我只見過一、兩次，有些到目前為止已追蹤了五、六年，我一次次地聯絡他們，隨著景氣的崩潰與衰退，他們經歷了升職與破產、結婚又離婚，家裡多了新生兒，也有人去世。

國家經濟的起伏，對這些人沒有太多的影響，不管景氣是多是壞，他們都過得很辛苦。有些人身陷令人麻木的抑鬱中，逆來順受、無助失意，用卡爾·桑德堡（Carl Sandburg）的話來說，他們「疲於希望，毫無夢想」。不過其他人則自豪地以夢想與決心為動力，相信工作能帶來的力量。他們很少對自己的處境感到憤怒，但當怒氣浮現時，往往不當地發洩在自己的配偶、小孩或是同事身上；他們通常不會怪老闆、政府、國家，或是富裕階層，儘管他們大可合情合理地這麼做，但他們通常會

責怪自己。有時候，這麼做確實也沒錯。

我花費了幾年訪談十二次、十五次、二十次甚至是更多，因此我得喜歡這些人才行。我支持他們，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我得試著清晰地、不帶意識型態地看待他們。事實上，堅定的保守派與激切的自由派都會因書中所述的種種貧窮而有所觸動，至少我希望能夠如此。因為我所發現的事實，並不符合任何人提出的政治議題，所以我想要挑戰此議題，並且瓦解經年累月在光譜兩端的假設。

這個主題非常牽動情緒，直抵美國人自我信仰的核心，因此我懇求你們，即使看見了沉重的事實，也請繼續讀下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矛盾，化為更寬廣的見解。如果想在這些問題上有所進展的話，我們就必須要超越黨派政治。其實，透過探討那些勉強活在聯邦政府官方貧窮線的人來檢視貧窮，似乎有點奇怪：這些家庭大部分都是如此，他們隸屬於更模糊的地帶，以現有的定義難以界定；但正因為這樣，他們很顯眼，因為企圖逃離困境時，我們能夠清楚看見他們必須跨越的障礙；從貧窮的邊緣，我們可以清楚地望見貧窮的最深處。

「貧窮」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詞彙，因為貧窮不只是一個類別，不能光用政府的年收入限額來描述。在現實生活中，那是一個沿途逐漸寬闊而無標記邊界的區域，這片艱困區比社會上的一般認知更為廣大。事實上，因貧窮相關的煩惱而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人，比官方認定的「窮人」人數更多，因此，我使用「窮人」這個詞，並不像統計學家那樣有精確定義，我盡可能以應有的、不精確的方式來使用這個詞，指的是經濟能力在最底層，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問題。

要充分討論窮忙族，就一定得談到他們的雇主，所以企業家和經營者也會出現在書裡，他們從廉價的勞動力中獲利，或是奮力經營著自己的生意；除此之外，這趟旅程中也遇見了教師、醫生等專業人士，大家都試圖有所改變。

雖然我沒有想過人口統計上的代表性的問題，但書中大部分的窮忙族都是女性，就像全國大部分的勞動人口一樣，未婚單親，她們通常背負著低收入和扶養青少年的高需求。我描寫的大部分人都不是美國公民，但是也有一些合法或非法的移民，這些勞動力對於國家成長與安適至關重要。這裡有黑人、白人、亞裔、西裔。貧窮在美國不分民族，不受種族界線的局限。大多數非裔美國人就讀的是次級的公立學校，許多人都居住在破敗的社區。在那裡，他們的生活更容易受到阻礙，尤其是在他們試圖擺脫體力勞動工作、爭取管理職位時，他們仍舊得忍受刻板印象和種族歧視。奴隸制度的遺毒尚未消散，美國長久以來的種族偏見，仍使得黑人在低收入戶中占較高的比例。然而貧窮還包括許多眾人共同的困境，折磨著所有種族的人。勞動世界底層的白人，儘管不必經歷黑人所承受的全部困難，卻也遭受不少阻礙。我的上一本書《陌生人的國度》(A Country of Strangers)裡提及黑白種族的分歧，現在我要將視角轉到貧窮是如何跨越種族界線，廣泛存在。

本書沒有虛擬的人物，我完全拒絕這種做法，每個人物都是真實的。如果有人要求不透露全名，我就不指名道姓，在第一次提到的時候用化名，或是用隨機挑選的姓氏的第一個字母代替。至於那些願意透露真名的人，我要感謝他們。

我太太黛比，以她身為教師與社工的能力，為我開拓眼界、釐清複雜的教養問題。她為我增修手稿，豐富了我的報導，在我採訪回來以後，幫助我了解這些故事，敦促我反覆思考所見所聞；我的兩個孩子蘿拉與麥可，都是文采優美的作家，也是敏銳的觀察者，他們的建議大大提升了這本書的水準。因為有他們，這本書變得更好；我的大兒子強納森讀了潤飾過的版本，提出許多有幫助的看法。

前言 在貧窮邊緣

Foreword

疲於希望，毫無夢想。

——卡爾·桑德堡 Carl Sandburg

很多人花時間幫我，書中沒提到或是沒能好好致謝的人包括了：大衛·埃里森，他是我的朋友，也是前新罕布夏州的議員，他為我介紹了該州的反貧窮工作者，也對手稿提出了建議；羅貝卡·根特、司徒南西、鮑伯·奧爾科特，他們向新英格蘭的窮人伸出援手；洪羅伊與維多·納羅帶領著他們有效率的組織，幫助在洛杉磯的韓裔及拉美裔工人；我的表姐瑪麗亞·沃契柯夫斯基是服裝設計師兼製造商，她為我敞開大門，帶我了解這個行業的情況；洛杉磯就業服務中心的莫霓卡·戴維斯、羅笛斯·卡斯楚和理查·凱因斯；華盛頓首岩浸信教堂（First Rock Baptist Church）的牧師李察·柯賓；「人人有飯吃」就業培訓中心（SOME Center for Employment Training，SOME）的主任詹姆士·貝奎斯；還有聰明敬業的年輕小兒科醫生約書亞·沙弗斯，對本書手稿提供了意見，也讓我有可能能採訪波士頓醫療中心的臨床及研究人員；波士頓醫療中心的黛博拉·法蘭克醫生以及巴瑞·祖克曼醫生；巴爾的摩成長與營養診療中心的主任莫林·布萊克；德拉瓦大學的關·布朗；阿克倫基督教女青年會日間照顧中心的主任南希·賴斯；克里夫蘭就業培訓中心的主管瑪莉·拉波特；堪薩斯市地方投資委員會的布蘭特·宣德梅爾；阿克倫的校長安東尼·馬拉諾與華盛頓特區的校長西奧多·辛頓，這兩位都有很敏銳的洞察力；還有我在洛杉磯訪問韓國移民時，擔任口譯的朱麗雅·宋。我的經紀人艾斯特·紐伯格從計畫一開始就熱切地鼓勵我，我的編輯喬納森·西格熱情地接受了我的成果，並且給予最有益的建議，他們是我最感謝的兩個人。如果說這是一本短篇故事集，那麼裡面有角色、有情節，甚至還有些家庭悲劇與孤寂的英雄主義，但是這裡沒有高潮，故事也沒有結局，生活就這麼繼續下去、無解。

大衛·K·謝普勒 二〇〇三年七月

洗車工沒有自己的車子；負責整理已兌現支票的銀行職員，戶頭裡只有不到三美元；編輯醫學教科書的女性，已經十年沒有看過牙醫了。

這是被遺忘的美國，在勞動世界的底層，數以百萬計的人活在繁榮的陰影之下。在貧窮與安樂的暮光中，無論你是富是貧，還是中產階級，每天都會遇到他們：他們為你送上下大麥克漢堡；在沃爾瑪超市（Wal-Mart）幫你找到商品；為你收成食糧；替你打掃辦公室；幫你縫製衣服；在加州的工廠裡，他們包裝燈泡，那之後會裝在你小孩的腳踏車上；在新罕布夏州的工廠裡，他們組裝壁紙的樣本，讓你在裝潢時可以參考。

他們各自面臨的困境形塑了他們的模樣，有些人正要擺脫社會救助金、吸毒成癮、無家可歸；有些人則一輩子都身陷低薪工作中；有些人的孩子營養不良；有些遭到性侵犯；有些人住在搖搖欲墜的房子裡，使孩子罹患氣喘，並因此缺課；有些青少年甚至需要眼鏡卻無法擁有，連黑板都看不清楚。

這本書就是關於他們其中一些人的故事，他們的家人、他們的夢想、他們個人的失敗，還有比他們更失敗的國家。儘管美國享受著前所未有的富裕，低收入的事實卻考驗著美國式的、宣稱勤奮致富的信仰。有些人覺得工作行得通，有些人卻發現這行不通；在高要求、低薪水的工作之間來去，許多人只能勉強搆到官方貧窮線上方，處於岌岌可危的貧窮邊緣。那些對富裕家庭來說可能只是有點不方便的事情——車子出了點小問題、身體微恙、孩子沒人照顧——對窮人來說卻是危機，因為這有可能讓他們的飯碗不保。他們耗盡一切，卻毫無存款，總是積欠帳單，銀行戶頭少得可憐，或是根本一無所有；因此比起那些生活較為安穩的人，他們得付出更多的費用和更高的利息。就算經濟穩定，許多人還是在邊緣掙扎，永遠脫離不了現況；而經濟衰退的時候，他們便向後倒滑，往絕境跌去。

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因為聯邦福利改革提出的時間限制和工作要求，因而被推入困境。改革在一九九六年經濟蓬勃發展之際實行，許多接受社會福利的人都大加肯定，認為此舉可以幫助他們擺脫仰賴他人的沉悶世界，踏入活躍的職場文化，生活充滿挑戰與希望。有些人說他們有了自信，得到孩子的敬重，那些夠幸運或是有天賦的人，踏上職業之梯，職位越來越高，收入越來越好；但是有更多的人，收入仍舊微薄，生活水準依然沒有改善，他們還是存不了錢，沒有像樣的醫療保險，不能搬去好一點的社區，也不能把孩子送去保證前途看好的學校就讀。這些人是被遺忘的美國人，只有從社會福利名單上被除名的時候，才會有人注意到他們的存在；在工作中苦苦掙扎時，他們就從國家的雷達上消失了。

擺脫貧窮、遠離貧窮，似乎需要完美的陣容以及天時地利的條件，先決條件包括了全副的技術、好的起薪、有升遷機會的工作，而且還需要目標明確、勇敢與自尊、沒有欠下大筆債務、沒生病也沒毒癮、家庭功能健全、朋友誠實正直，還有私人或政府機構必要的協助。這一系列條件要是出現任何缺口，麻煩就會接踵而來，因為你窮，就表示你沒辦法保護自己。不如這樣比喻，假如你打四分衛，但是不戴頭盔、不要墊肩、沒訓練、沒經驗，前方是一排體重只有四十五公斤左右的隊友，弱不禁風，沒有金錢幫襯，沒受過更廣大世界的訓練，對於腐敗社會的威脅誘惑毫無防備，貧窮的男男女女就這麼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解雇——挨了揍，鼻青臉腫，連連慘敗。要是這種周而復始的失敗中出現了某次例外，那就會被稱做是美國夢實現了。

在文化上，美國不太確定貧窮的成因，因此也不知道該如何解決。美國神話仍然認為即使出身貧寒，人人還是都有機會獲得幸福。我們希望那是真的，無論真假，都很欣慰看到那些美夢成真的例

子。十九世紀作家霍瑞修·愛爾傑 (Horatio Alger) 的作品我們已經不再讀了，不過他的名字卻成了白手起家的同義詞：他筆下的角色都能透過勤懇工作致富，這樣經典的移民故事依然能夠觸動美國人的心，儘管這個國家長久以來一直嫌惡著那些來到「金色大門」之外的「不幸渣滓」^[1]，就像自由女神像下方所銘刻的文字所述。即使厭惡大量湧入的移民，我們仍舊陶醉於這種崇高的說法：只要努力不懈地工作、謹慎節儉，就能從貧困的難民脫胎換骨，成為成功的企業家。小布希總統也親口說出了這個神話，他在即將上任的政府首次高層任命時，安排了兩名黑人、一名西裔跟兩名女性，被問到這樣安排是否想傳達某些訊息時，「當然，」這位總統當選人回答道：「在美國，只要努力工作，在人生中做出正確的決定，任何人都可以實現目標。」^[2]

這種神話有其價值，它替這個國家以及每位居民設定了嚴苛的標準，國家必須努力，成為傳說中的機運之地；居民也必須奮鬥，好好利用這些機會。這樣的理想激發了民權運動、向貧窮宣戰，還有持續不斷尋找脫貧方法的追尋。但是美國神話也提供了怪罪的藉口，在清教徒的傳統中，努力工作不只是實際需要，也是道德要求，不努力就是道德敗壞。嚴苛的邏輯推導出冷酷的判斷：如果一個人勤奮工作能夠帶來成功、如果工作是一種美德、如果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可以藉由工作致富，那麼失敗的人，就是不夠努力。市場是公平的終極裁判，某種程度上來說，低薪是工人的錯，因為那只不過是反映出他的勞動價值低。在美國這樣的氛圍之下，貧窮總像是一種原罪。二〇〇〇年三月，CNN 主持人茱蒂·伍德拉夫 (Judy Woodruff) 在主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辯論時，問艾倫·凱斯 (Alan Keyes) 為何認為社會道德每況愈下，因為某些道德指標分明有所進步。她指出：犯罪率下降、未婚生子減少、依靠社會福利救助的人數也變少了。顯然社會福利是道德敗壞程度的指標之一。

還有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美國反神話，認為社會必須要為個人的貧窮負起大部分的責任，種族歧視和富裕階級造成貧困社區的種種問題：學校不好、選擇有限，貧窮的孩子被迫犯罪、吸毒，只能從事收入微薄、沒什麼未來可言的工作，個人淪為龐大力量下的受害者，身不由己，而那些貪婪追求利潤的企業，都只會剝削勞動力。

一九六二年，邁克爾·哈靈頓 (Michael Harrington) 在他的《另一個美國》(The Other America) 書中，生動地描述了這種美國反神話，喚醒了當時被富裕蒙蔽了雙眼的美國，在「隱形之地」上的窮人眾生相，一經揭露就令人感到震驚不已。這本書催生了詹森 (Lyndon B. Johnson) 「向貧窮宣戰」的行動，不過詹森的宣戰從來沒能真正讓這個國家動起來，也算不上什麼勝利。

五十年後，我們在經濟發展上有了成就，但是貧富之間的差距卻拉大了。收入前百分之十的人，資產淨值平均為一百五十八萬九千美元，而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則是負四千九百美元，也就是說，他們的負債還比收入多。^[3] 和日本、香港、以色列、加拿大，以及所有西歐的主要國家相比，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比較低，嬰兒死亡率也比較高。^[4] 然而把這一切形諸文字加以討論後，事情卻沒有解決，大家漸漸不再感到驚訝，也不再憤怒了，變得無動於衷，因此更難有所行動。

事實上，我們並沒有辦法輕易把人們用美國神話或是反神話來歸納，這本書裡的每一個人，既非無助也非萬能，而是介於個人與社會責任的兩極之間，落在光譜上的各種不同位置。每個人的生活都是複合的產物，做錯決定、運氣不佳、無法選擇的前途，或者因為出身和境遇等意外斷絕前路。很難說一個人的貧困跟他自身的不智之舉沒有絲毫關係——輟學、未婚生子、嗑藥、工作總是遲到；也很難說一個人的行為跟他們與生俱來的條件沒有絲毫關係——父母教養不當、教育程度不佳、居住環境

糟糕，觸目所及看不見任何未來的可能性。

該如何定義個人在自身貧困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成為社會福利及其他社會政策爭論的議題，但很少有人能夠給出答案，即使再具體的個案也一樣。比起富人，窮人比較無法掌握私人的決定，更難自外於冷酷的政府機器。面對這個充滿科技與競爭的瘋狂世界裡，窮人比較沒有辦法敏捷地避開重重危機，他們個人的錯誤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個人成就卻只會得到少許的回報。個人與公眾之間的互動如此錯綜複雜，諸如就業培訓這類協助要想奏效，就必須針對個人需求量身打造才行。內容不只要包括使用電腦與操作車床這類「硬技能」，還得包括與同事互動、樂意服從等「軟技能」，要能夠處理個人多年逆境所累積的怒氣。就業培訓人員發現，屢經失敗的人——無論是在學校裡、戀情中，還是工作上的失敗——要等到明白自己有能力追求成功時，才有可能成功。要擺脫貧困，他們就必須學會純熟地控制自己的情緒與雙手。

遠離貧窮不是拿出護照、跨越邊境這麼簡單的事情，赤貧與安適之間有著廣大且具爭議性的領土，而通過這片領土的距離，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安穩的生活就是可以用一份薪水付清房租——不用存兩個星期的錢才付得起一個月的房租，」泰隆·皮克斯利說道。他是個年約五十歲的瘦削男人，住在華盛頓特區，生活困苦，白天打零工，還吸食海洛因。他的要求特別低，「我不想靠打零工籌錢，」他直截了當地說道：「我想住得舒服點，就算只是一間十英尺平方大小的房間也好。在一個月內，我可以用薪水付清所有的帳單，不用靠存錢。對我來說，要過得舒服不一定要戶頭有存款才行。」

在這樣富裕的國家裡，大部分人的胃口都比泰隆·皮克斯利來得大。廣告無所不在，電視幾乎永遠開著，許多美國人學會了「把想」要變成「需要」。「當你住在社會住宅裡，你媽領著社會救助金，如果有五、六個或者七、八個小孩一起長大，你這輩子就會老是『想要』什麼，但是卻什麼也沒有。」法蘭克·狄可森解釋著。他是一名工友，靠著販毒在華盛頓獲得他過去沒能得到的東西。「你有小孩，他們想要漂亮的球鞋跟外套，但是帶著六、七個孩子，靠社會救助金過活的媽媽可沒辦法買得起，他們要怎麼樣才能得到這些東西呢？隨著年紀越來越大，他們越來越想要得到好東西，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找上毒品。沒錯，你只要出門、交易，就可以得到你需要的東西：車子、公寓、衣服。」法蘭克·狄可森在監獄裡待了三年，不過他跟妻子也在馬里蘭郊區買了一棟房子，用的是他販毒賺來的錢。

因此，貧窮並沒有通用的簡單定義，貧窮可能是絕對的貧窮——買不起基本生活必需品；也可能是相對的貧窮——負擔不起普及的生活方式。貧窮能以通用的標準來衡量，也可以用不同的指標來看待，就連字典也沒有共識。「缺少或匱乏維持生計的方法。」其中一本字典如此斷然定義。^[5]「缺少維持物質需求或安穩生活的方法。」另一本字典說道。^[6]「一個人缺少普遍或社會可接受的金錢數量或財產，」第三本字典如是說。^[7]（粗體為本書作者所加）

以全球或歷史的標準來看，許多美國人認定的貧窮都是奢侈的。住在鄉村的俄國人就買不起車子，家裡沒有中央空調，也不會被認為很窮，但是住在鄉村的美國人會如此認為；越南的農夫就算只用水牛犁田、徒手灌溉，住在茅草屋裡，也不會被認為很窮，但是北卡羅萊納州的農夫會，因為他得赤手空拳採收黃瓜，一箱才賺一美元，這樣只能住在破爛的拖車裡。這世界上大部分的窮人，都會被環繞在美國窮人周圍的公寓、電話、電視機、自來水、衣服，還有其他種種便利設施給弄得眼花撩

亂，但是這並不代表窮人不窮，也不代表處於貧困邊緣的人，並不是真的站在懸崖邊上。

「美國的窮人在香港或是十六世紀也許不算窮，但在此時此地的美國，他們是窮人。」麥可·哈寧頓 (Michael Harrington) 在香港經濟起飛之前寫道：「他們得不到這個國家的其他人享有的一切，然而社會只要有決心，是可以供給他們這些東西的。他們活在邊緣，像個圈外人。他們看著富裕美國的電影，讀著富裕美國的雜誌，這些全都告訴他們，他們是自己國家裡的放逐者……當你有一碗飯可吃，而社會上的其他人只能吃到半碗，這可能代表了你的成就與才智，也能夠激勵人採取行動，實現自我潛能；但當社會上的其他人都有精緻均衡的飲食，而你總共只有五碗飯可吃，這就是悲劇了。」^[8]

的確，在富有的國家當一名窮人，要比在貧窮的國家當一名窮人難受多了，因為在貧窮中求生的技能，在美國幾乎已經消失了。去河內的貧民窟看一看，你會發現孩子們用瓶棍和生鏽的腳踏車內圈發明了很多遊戲；然而去洛杉磯的貧民窟看一看，你會發現孩子們都很依賴塑膠玩具跟電子遊樂器。住在柬埔寨的時候，我兒子麥可對於家裡原本要扔掉的東西修一修就好了這樣的匠心巧手驚嘆不已：當我們在金邊時，他的電視遙控器壞了，只花了一美金就在街角找人修好了。

在美國，聯邦政府對貧窮的定義很簡單：二〇一一年，有一名成人與三名孩子的家庭，年收入若是低於兩萬兩千一百一十三美元，就算貧窮。這個數字相當於一個人每年工作滿五十二周，每周四十個小時，時薪十美元又六十三分，或是比聯邦政府的最低工資多三美元又三十八分。^[9]一九九〇年代之際，經濟發展、收入提高，官方貧窮率降低，十年之內，從一九九三年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點一，降低到百分之十一點三，接著在後續的經濟衰退中微幅上升，二〇〇三年達到百分之十二點五，二〇〇六年百分之十二點三，二〇一一年百分之十五點二。

不過這些數字會產生誤導，聯邦政府所界定的貧窮線，其標準遠遠低於像樣的生活所需，因為人口統計局採用的仍然是一九六四年時由社會安全局所設計的基本公式，之後的幾年間只經過四次略為修改。貧窮線所設定的貧窮，大約是「基本溫飽」(thirty food basket) 所需的三倍，這樣的計算方式來自於一九五五年的消費模式，當時一般家庭約有三分之一的收入用在購買食物；但時至今日，情況早已不同，一般家庭花在食物上的預算大約只占十分之一，但政府還是繼續把「基本溫飽」所需乘以三，只根據通貨膨脹調整數據，無視於將近半個世紀以來生活型態的急遽變化。^[10]

這樣的結果粉飾了現實，低估了那些照理該被歸類為貧窮的人口數量。人口統計局和國家科學院正在測試更精準的公式，會將食、衣、住以及水電費等等的實際成本都考慮進來，按照這樣的計算方法，收入會包括現行沒有計算在內的福利，像是食物券、住宅補貼、燃料補助、學校營養午餐，生活成本則包括了現在忽略的費用，例如照顧孩童、醫療支出、健保費、社會安全保險金。這些五花八門的公式在一九九八年開始加入計算後，貧窮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三，官方數據從三千四百五十萬人增加到四千兩百四十萬人。^[11]依據二〇一一年公布的《補充貧窮衡量標準》(The 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貧窮率從百分之十五點二上升至百分之十六^[12]，這樣的改變據推測能讓更多家庭有資格申請與他們貧窮程度相關的福利，其中某些項目，包括兒童健康保險在內，已經涵蓋了貧窮線內百分之一百五十或百分之兩百的家庭。

就算採用了這些修正過的方法來計算貧窮，還是只能反映出一個家庭短時間內狀況的剪影，在這幀快照裡，動態的起伏不見了，只衡量本年度的收支，不考慮資產與負債。這些公式忽略了過去，而

過去往往是現在的沉重負擔：很多人換了工作，衝出貧窮線，卻發現學貸、車貸，還有以前信用卡驚人高利息，把他們的錢全都吃掉了，他們並沒有過得比從前好。

窮人或近乎貧窮的人被問到貧窮的定義時，他們講的不只是皮夾裡有多少錢，而是腦子裡或心裡想些什麼。「絕望。」新罕布夏州一名十五歲的女孩說。

「不是絕望，而是無助。」洛杉磯的一個男人說道：「我幹嘛要起床呢？永遠沒人會雇用我，你看看我的穿著，事實上，我連高中都沒唸完，無論我是黑人、棕人還是黃種人都一樣，因為我是在拖車裡長大的。」

「那是一種心境。」華盛頓特區的一個男人說：「我相信精神狀態比物質重要很多。」

「我很富有。」一個女人說，她剛找到一份影印的工作，讓她擺脫了貧窮。「不只是物質上的東西，而是因為我知道我是誰，現在要往哪裡去。」

另一名女人原本在中產階級家庭中長大，之後落入貧窮，她慶幸自己擁有「文化資本」，這指的是她對書本、音樂、理念的愛好，還有她與孩子之間的親密關係。「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一點也不窮，我們擁有許多財富。」她說道：「我們不覺得自己窮，只有在沒錢看醫生或修車的時候才會感覺到貧窮。」

對每個家庭來說，貧窮的組成都是部分經濟因素、部分心理因素、部分個人因素、部分社會因素；部分過去影響、部分現在狀況。每個問題都會擴大其他的問題，環環緊密相扣。一個逆轉就會造成連鎖反應，導致結果與初衷大相逕庭。破舊的公寓可能會加重孩子的氣喘，導致需要叫救護車，產生一張付不起的醫療帳單，於是毀了個人的信用紀錄，讓汽車貸款利率飆升，逼得他們只好買一台不可靠的二手車。做母親的因此無法準時上工，升遷與賺錢的能力受限，她只好繼續窩在破爛的房子裡。在第一章，你就會看到這樣的一名女性，如果她或是其他貧窮的勞工父母把他們的個別問題加在一塊兒，那麼這些問題構成的整體，會比拼湊部分的問題還要來得更嚴重。

因此，多數窮忙者所面臨的問題會在本書的章節中不斷出現，而每一章則會分別著重在貧窮的某一層面。在關於工作的那一章裡面，你會看到為人父母的故事；在討論到健康議題的時候，你會看到住宅的問題；如果把個別問題獨立出來，像在實驗室裡抽取毒素那樣，就既不真實也沒有意義。這些問題大多相倚並存，彼此之間的化學反應讓整體更為惡化。

如果問題環環相扣，那麼解決方法一定也是如此。只有工作是不夠的，只有醫療保險是不夠的，只有良好的住宅是不夠的；可靠的交通運輸、謹慎的家庭收支預算、有效的養育方法、有效的學校教育，單獨達成上述任何一項都是不夠的，沒有哪項改變能夠幫助勞工脫離貧窮，只有全面兼顧，國家才能履行其承諾。

第一步是要看見問題，而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我們對這些人視若無睹。那些有工作卻仍然過著貧窮生活的人，融入我們熟悉的景色當中，因而受到忽視。他們構成了隱形而沉默的美國，分析師一個不留意就忽略掉了。「我們現在都住在郊區，不住市中心了。」科羅拉多大學的教授麥可·高登斯坦 (Michael Goldstein) 宣稱。他在美國公共電視台上解釋，為何沃爾沃斯超市 (Woolworth's) 在道瓊工業平均指數上，取代了沃爾瑪超市。^[13]

美國公共廣播電台的提姆·布魯克 (Tim Brooks)，曾經針對電影院裡定價過高的爆米花發表一篇措辭諷刺的言論，他氣不過一小袋爆米花竟然要價五美元，於是調查了實際的成本。據他計算，他

一章 金錢與金錢的背面

apter1

你知道嗎？當窮人是很貴的。

桑迪·布拉許，十二歲

拿到的那袋五又四分之一盎司的爆米花，在超市裡賣二十三點七一八七五美分，不過電影院經理買一整袋五十磅重只要十六點五美分。他慷慨地把爆米花的電費算五美分、紙袋一美分，總成本等於二十二點五美分。扣掉營業稅，利潤是四點零七五美元，或者是百分之一千八百一十一。^[14]

顯然這家電影院很有概念，他們不請任何員工，因為布魯克完全沒有提到櫃台後面的人，他們微不足道的薪水不會影響這份暴利，因此也不在他的計算範圍之內。那些製作爆米花的人、那些把爆米花裝袋再遞給他然後收錢的人，一定是穿了隱形斗篷。就連公共廣播電台的編輯，似乎也沒有注意到他們。

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他們被看見。

窮人社區的納稅季節不是四月，是一月，所得稅不是支出，而是收入。W-2 所得稅扣繳憑單一到，勞工就急切地等著國稅局寄來的支票，好趕緊去找報稅員。自從國會在一九九六年通過了福利時間限制¹之後，報稅行業便蒸蒸日上，榨乾了貧窮的勞工。來自華盛頓的支票不止包含了預扣所得稅的退稅，還有一筆額外款項，也就是所謂的薪資所得稅抵減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目的是用來補貼低收入的家庭。理論上，退稅和補貼會被存到銀行裡，準備買車子、買房子、付學費，但這些錢往往另有急用，得拿來支付過期的帳單，或是購買零散工資買不起的大型商品。

克里斯蒂是一名在阿克倫工作的幼保從業人員，賺的很少，因此她不但沒欠稅，每年還可以領到一千七百美元的薪資所得稅抵減。她因此不必去二手家具店買東西，還能夠買一套全新、舒適的黑色長沙發跟雙人座椅，擺在她公共住宅的客廳裡。

卡洛琳·佩恩的支票則用來支付她在新罕布夏州的房屋頭期款。「我用我的所得稅付了一千美元的頭期款。」她驕傲地說道。五年半後，她賣了這間房子，女兒借錢給她租車搬家，她打算「等拿到稅金」就還女兒錢。

「我在等我的所得稅，好拿來付我的房地產稅。」湯姆·金說道。他是一名單親爸爸，也是個伐木工，住在自有地上的一輛拖車裡。

黛博拉·霍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克里夫蘭的一家麵包廠，她遞交了她的第一份報稅單之後就滿懷期待：「我會拿回三千零七十九美元！這筆錢要拿來做什麼才好？付清全部的帳單。」她宣布道：「家裡沒有半樣東西是新的，所以這筆錢當然得好好利用，先拿來付帳單，然後稍微修一下車子，為了信用評等，我得把所有的債務都還清。我會好好利用這筆錢的。」

薪資所得稅抵減是少數能夠同時吸引自由黨人跟保守黨人的反貧窮計畫，它能兼顧政府援助與自助的優點。除非你有賺錢，否則你得不到這項福利；並且因為這筆款項與報稅相關，所以沒報稅就拿不到。但是如此一來，低收入工人就被排除在外了——尤其是非法移民——他們領的都是台面上的現金，覺得最好不要被國稅局知道。不過，透過報稅，他們將能夠取得優勢，因為他們可以留住賺到的每一分錢，除此之外還能領到一筆錢。福利發放的標準很高，比如說，二〇一二年時，扶養一個以上小孩的工作者，年收入不得超過四萬一千九百五十二美元。對於低薪階層的人來說，薪資所得稅抵減等於是替他們每小時加薪一至二美元。

這項計畫在一九七五年通過，之後在雷根、小布希，和柯林頓的任內擴大，二〇一一年時，針對兩千六百萬戶家庭發放了超過五百八十億美元。財政部的官員擔心，無論是有心或無意造假而申報錯誤的案件數，有可能從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七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二²；另一方面，符合條件的申報人當中，據估計有百分之十到十五沒有提出申請。³有部分是原因是雇主和工會往往不會告訴勞工有這件事，比如華盛頓特區的兩個工會主席，一個是工友代表，一個是停車場的泊車員代表，在我提及之前，這兩人從來沒有聽說過薪資所得稅抵減。而我還沒有遇過任何一個工人或老闆，知道有一種叫做 W-5 (低收入退稅優惠預付證明) 的簡單表格。只要雇主提出申請，低收入員工就可以在該年度預先拿到部分款項。我跟黛博拉·霍爾提到 W-5，她去麵包廠裡問了，負責薪資的女人不耐煩

1 譯註：美國在一九九六年通過法案，規定領取福利時間超過一定時限以後，聯邦政府將不再提供援助。

地朝她揮手，說她什麼也不知道。後來，報稅員跟黛博拉說，她最好等到報完稅再一次領回整筆錢比較好。

如果你是報稅員的話，這樣當然比較好——報稅員（運用詭詐的創意）想出種種辦法，盡可能讓低收入工人拿不到他們的退稅和薪資所得稅抵減。他們將電子申報與快速直接入帳，偽裝成「快捷退稅」的高利貸，向缺錢的家庭保證可以立刻得到一筆金錢挹注。麻煩的是，要拿到錢，你得先花錢。報稅員工作的地點有藏污納垢的支票兌現點，也有體面的企業在大街上的分行，他們的所做所為是為了可觀的費用；而他們的客戶原本可以不費分文便自己做到，只要有勇氣處理1040表格²，運用數學技能，或是有台電腦與銀行帳戶，就能快速申報和收款。但是，大部分低收入勞工不懂數學，缺乏勇氣也沒有電腦，很多人甚至連銀行帳戶都沒有。他們如此迫切地需要那張支票，甚至願意付出寶貴的一百多美元，只為了盡快辦妥一切。「你怕都怕死了。」黛博拉·霍爾說道。結束了二十一年來領社會救助金的生活之後，她花了九十五美元請人替她填妥簡單的報稅單。「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這麼害怕，但是我寧願一次搞定。」

她的做法可能是明智的，貧窮還有一個壞處，就是從一九九九年，窮人被國稅局查帳的機率更高。那一年，年收入在兩萬五千美元以下的納稅人，有百分之一點三六受到審計，而收入在十萬美元以上的納稅人，則只有百分之一點一五受到審核。如此詳細的審查，是由共和黨的國會領導人所主導發起的，他們擔心薪資所得稅抵減遭到濫用。面對這樣的負面宣傳，國稅局調整了比重：在二〇〇〇年時，收入在兩萬五千美元以下的審核比例為百分之零點六；收入在十萬美元以上的審核率為百分之一。此後審核率上下波動，在二〇〇一年分別是百分之零點八六與百分之零點六九，二〇〇二年為百分之零點六四與零點七五。³換句話說，隨著國稅局的執法人員人數減少，針對高收入納稅人的詳細審核比例也大幅度降低，而過去這個族群的報稅單審核率曾經高達百分之十。事實上，審核高收入族群能夠拿回更多錢，彌補稅收的損失。

自從國稅局向依凡·瓊森收了兩千零七十二美元的稅金、罰款和利息之後，她再也不敢自己報稅了。她剛從宏都拉斯來到美國，每天早上從五點開始為波士頓一家清潔公司工作，該公司從來沒有替她預扣所得稅，也沒有發給她W-2表格，她也不知道他們應該要這麼做。「我自己報稅，自己填表，沒問題啊。」她說。不過顯然不是沒問題，「大概三年還是四年後吧，國稅局找我，說我欠他們差不多兩千零七十二美元。『我為什麼欠你們錢？』他們說是因為我沒有申報所得稅。我說我有啊，但他們說我沒有……我寄了一封信給他們，說我寄了差不多一千零七十二美元給他們，因為我那時候沒錢，我會慢慢分期付款把剩下的錢還清。你知道他們怎麼處理嗎？我有一個銀行戶頭，他們把戶頭裡的錢全拿走了，一毛錢都不剩。」從那之後，她每年都心甘情願地付一百美金給報稅員，只求買個心安。「我不想要國稅局再來找我。」她解釋道：「他報稅，他簽名，他處理一切，所以要是沒錯，他就得去處理。」

二月底時，位於華盛頓第十四街冷清地段的布洛克稅務公司（H&R Block's）臨時辦事處，看起來就像大選日過後人去樓空的競選總部，大部分的電腦螢幕都是一片漆黑，四周寂靜空蕩，除了一張桌

子外，其餘桌子都空著。克勞蒂雅·李維拉在那張桌子前面，她以前在維吉尼亞州的某個圖書館裡免費替人報稅，她和經理卡爾·卡頓現在沒什麼事情好做，申報高峰期已經過了，所以他們很樂意在鍵盤前坐下，為我說明。

納稅人需要的每一份表格都要收費：代填一份1040表格花費四十一美元、薪資所得稅抵減表格十美元、W-2表格一美元，諸如此類，電子申報另外再加二十五美元。所以光是用電子申報兩份W-2表格，就得花七十八美元。不僅如此，布洛克稅務公司有一整套、五花八門，專門針對邊緣人的服務，如果你沒有銀行帳戶，你的退稅就會加值到一張自動櫃員機提款卡裡，每次提款收費兩美元；或者你也可以開設一個臨時帳戶，國稅局可以把款項存進去，收費二十四點九五美元；如果你受到布洛克稅務公司的「快捷退稅」吸引，想在一、兩天之內就拿到支票，那麼你得再多付給他們五十到九十美元不等，視你的退稅金額而定。在第十四街的辦事處，退兩百美元要付五十美元；兩千美元以上則高達九十美元。^[4]

這種收費形同貸款，而且是期限很短的貸款。根據國稅局規定，電子申報可以讓你在兩周半之內拿到支票；如果直接存入銀行帳戶的話，可以提早五天。那麼此種申報後一、兩天內就撥下來的「快捷退稅」，貸款期最長大約十五天。兩千美元的款項需要九十美元的費用，相當於年利率百分之一百零八，但因貸款期限最短是四天，因此兩千美元款項的年利率因此推升至百分之四百一十；兩百美元款項的年利率則高達百分之兩千兩百八十一（如果時間算得剛好，就能產生最高的利率；趕在國稅局每周四中午休息之前提出申報，貸款支票等到周五銀行關門後才會發出，報稅人得等到周一才能將支票存進戶頭，而國稅局動作要夠快，以趕在下周五直接把退稅存在貸款銀行）。^[5]

因此發生接連的訴訟之後，諾福克一名聯邦法官下令布洛克稅務公司停止使用「快捷退稅」這種具誤導性的字眼來宣傳他們的貸款方案，但是布洛克稅務公司還是繼續打廣告，把「快捷退稅」重新定義為專為電子申報所設。該公司將他們的貸款方案稱為「預期退稅貸款」，對許多鋌而走險踏入布洛克稅務公司的低收入工作者來說，這種說法跟之前其實沒有差別，他們只求能夠快速退稅。二〇〇〇年時，有四百八十萬名納稅人選擇這個方案。

在我採訪的勞工當中，曾經使用過這種貸款服務的，沒有一個了解詳情。海克特·狄加多與瑪麗貝·狄加多在北卡羅萊納州從事採摘包裝蔬菜的工作，一年賺兩萬八千美元，他們兩人目瞪口呆地坐在他們的拖車裡，看著我檢查他們的報稅單，向他們解釋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付了一百零九美元讓布洛克稅務公司幫他們用電子申報來報稅，拿到一筆國稅局的預付款，總計一千三百零七點零五美元，他們簽署的表格上註明該收費的年利率為百分之六十九點八八八，但是他們並不了解那是什麼意思。就算布洛克稅務公司出示了印得密密麻麻的合約，他們訓練有素的員工也會避免使用「貸款」這樣的字眼，改說是「兩日退稅」，馬里蘭州一名法官在審理貸款業務的訴訟時發現了這種情形。而退稅貸款的利潤可觀，甚至占布洛克稅務公司（一九九九年）年度總利潤的百分之八，主要是因為布洛克的子公司家庭銀行（Household Bank），擁有這些高達百分之四十九點九九的貸款利息。

狄加多夫婦提供關於布洛克稅務公司的非法事件還不只這一樁，雖然他們在一月就提出電子申報，那時候國稅局承諾幾周內就會發放支票，但「我們被告知要等六到八周，」瑪麗貝說道。這分明是欺詐。「我們需要這些錢來付帳單。」她解釋著：「一部分寄去墨西哥，另一部分留下來。我們通常每兩周寄一百美元回去墨西哥，我們有一大家子要養。」

布洛克稅務公司被控誤導貸款業務，二〇〇〇年，在長達十年的集體訴訟之後，該公司同意以兩千五百萬美元達成和解，但是並不承認他們的行為有任何不當之處。據一名女性發言人表示，該公司做法上唯一的改變，就是在剛開始辦理貸款時，提出聯邦政府要求出示的誠信貸款法。公司員工至少會口頭解釋這些條款吧？「要視顧客提出的問題而定，」她說：「如果他們提問，報稅員就應該要回答。」但很多顧客根本不知道該問什麼問題。

貧窮就像一道滴血的傷口，削弱了防備、降低了抵禦，引來掠奪者。放高利貸的人不只在酒吧和街角營業，也能躲在防彈玻璃後，大方地合法經營。他們的告示貼在全國各地一萬多個地點：「發薪日貸款」、「方便錢」、「低利貸款」，在窮人及勞工階級居住的社區，在支票兌現點和大街上的辦事處，都能看到這些廣告，他們組織了至少十幾間的全國連鎖店，收取的費用超過年利率百分之五百。

他們也提供一項應急的服務，假設你缺錢，帳單堆積如山，收到一些斷話斷訊通知，而發薪日還要等兩周，那時候你的電話跟電力早就被切斷了；當地的便利商店裡有個傢伙，負責管理支票兌現點，他給你一條路線，如果你現在需要一百美元，你就開一張一百二十美元的支票給他，日期壓在兩周後生效，當天他就給你一百美元現金，並保留你的支票，等到你的工資存入銀行帳戶裡，他再去兌現；或者你可以等領到工資，付他一百二十美元現金，他就會把支票還給你。無論是哪種方式，兩周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就相當於日息百分之一點四二八，或者是年息百分之五百二十一。

要是你在發薪日後手頭還是很緊，或是你的薪水入不敷出，又或者是你的一百二十美元支票跳票了，沒問題，防彈玻璃後的人很樂意讓你延後還款（稱為「展期」）——再加二十美元即可。這種模式在利諾伊州很盛行，比如說，負責抽檢的州檢查員發現，展期貸款占全部發薪日貸款交易的百分之七十七，平均每名客戶會展期十次，這表示得支付的費用總額高達借款的兩倍^[6]；到最後，你可能得跟另一個發薪日貸款商借錢，才能還錢給第一個貸款機構，如此這般，無限循環。

此外，從技術層面來說，這些貸款在某些州並不算貸款，因為用的是支票。如果跳票了，罰金比沒付貸款更重。比如為了借三百美金，印第安納州一名婦女付了三十美元的費用，開出一張三百三十美元的支票，如果跳票了，銀行跟發薪日貸款機構就會收她八十美元的費用，接著放款人會告上法庭，贏得三倍的賠償金，也就是九百九十美元，加上律師費一百五十美元、訴訟費六十美元，三百美元貸款的費用總共是：一千三百一十美元。^[7]

行騙高手也會用虛假的承諾吸引窮忙族，他們謊稱某些基金會能無條件提供補助金，這些信件承諾，你只要花十九點九五到四十九點九五美元買一份基金會的名稱和住址清單，然後寫一封信給他們就行了，「事實上，有數以百計的私人基金會，都急著想透過信件捐款，幫助那些真正需要用錢的人，」一封教唆詐騙信上面寫道，「很多基金會不關心你要怎麼用這些錢，只要用途合法即可……付清帳單、度假、應急，或是隨便買什麼你需要的東西。」這種荒唐的說法，讓許多大大小小的基金會收到雪片般飛來的懇求信件，拜託他們資助修繕房屋、支付醫療費用、償還債務。二〇〇一年，俄亥俄州一名法官判決一名行騙者五年徒刑，此人至少用這種方法詐騙了五十萬美元。據檢察官指稱，紐澤西有名男子一周可以搜刮到三萬美元。^[8]

另一個奇妙的詐騙地點是工作場所。洛杉磯的韓國餐廳受到仔細的稽查，因為他們不斷翻新花樣，詐騙服務生跟廚師，受害的大多是韓國人或拉丁裔人。韓國移工扶助會的負責人洪羅伊表示，很多人都是每個月領固定工資，這在南韓很常見。他們一天得工作十二個小時，一周六天，這違反了

國家工資法，聯邦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是每小時七點二五美元，加州規定的最低工資是八美元。法規也適用於服務生，所以很多餐廳做假帳，偽造出勤打卡紀錄，讓員工的工時看起來少一點。

有些餐廳也會在 W-2 表格上對員工拿到的的小費灌水，用這種方法把稅收負擔從店家轉移到員工身上。比如說，顧客如果以信用卡支付二十美元的餐費，並且加上兩美元的小費，雇主會給員工兩美元小費，不過會告訴國稅局說，小費是三美元，餐費是十九美元（但店家就跟個人一樣，如果收入低於兩萬五千美元，就會比較常被查帳）。

為韓國工人奔走的過程中，該協會發現這些行業的惡性伎倆。在洛杉磯的韓國夫妻檔清潔工作承包人，為初來乍到的同胞提供了誘人的交易，而這些新移民急於就業、不諳英文，又害怕自己的非法身分曝光，以為自己可以成為分包商，負責打掃牙醫、醫師、律師和高階主管所在的商業大樓，一個月賺進超過一千元。承包人解釋道，他們要做的只是拿出兩個半月的工資當作承包費用。很多來到美國的韓國人都有龐大的家族支持，可以籌錢度過經濟困難，所以預付款通常可以湊得到。「他們把自己存的最後一丁點錢拿出來，希望他們也能合夥開一家清潔公司。」洪羅伊指出，這些移民通常在夜裡工作，打掃辦公室，前幾個月一切都順利，不過再來承包商可能會拖欠工資，說他們還沒有收到大樓管委會的錢。「接下來你就會發現，他們欠了你好幾千塊，你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羅伊解釋道。到最後，「三、四個月後，」他說：「承包商出現了，『你給我滾，鑰匙還我。』」

「我做了什麼？」

「投訴你的人太多了。」

接著又換下一個「分包商」獲得誘人的交易，只要他能湊得出兩個半月的工資。

在體面的外表下，某些大型機構也有對付窮人的手段。很少有銀行願意接受帳戶餘額不多的存款人，所以在那些法律沒有相關規定的州，銀行訂定了很高的最低存款額，並且收取令人望之卻步的費用。很多貧窮的社區連一間分行都沒有，這迫使低收入家庭不得不使用昂貴的支票兌現服務，而支票兌現專營點遍布全國各地。

就算某些州的法律規定，必須為窮人開立「生命線」帳戶，也很少看到宣傳廣告，因為這些帳戶往往會讓銀行賠錢，分行職員通常不知道有這類帳戶，大部分的潛在存款戶也不會知道。紐約最大的金融祕密就是，州政府規定銀行最低的開戶金額是二十五美元，最低餘額是一分錢，每個月可以花三美元免費提領八次。大部分存款戶都不知道這些條款，各大銀行都宣稱沒什麼人要開這種帳戶。^[9]

原因可能是因為許多勞工喜歡私下賺錢，不讓自己的財務狀況留下紀錄，有些人則相信那些有關銀行的缺德傳說。「我們自有方法儲蓄。」溫蒂·韋斯勒說道。她是一名單親媽媽，剛剛停止領社會救助金，正要開始工作，「我打算弄個保險箱，雖然不會生利息，但如果銀行破產，我的錢還在！我很清楚銀行是怎麼搞金錢交易的，錢是你的，卻被別人借走了，那是一種他們做生意的方法，所以你要去那邊說我要把全部的錢領出來，也無法馬上拿到，得等幾天，讓他們把錢拿回來。這是我聽到的，就是錢的轉手交易什麼的。」

溫蒂說要等幾天是錯的，不過可以理解她的懷疑，在私人企業與政府同流合污的年代，美國社會想出無數方法，讓窮忙族跟他們微薄的一丁點錢兩地分離。國家彩券在窮人區生意興隆，大家祈禱著能夠中獎，讓他們脫離苦海，大大小小的企業用的全是美國消費文化的通用騙術：動聽的字改得超級大，內容卻跟小字的條款不盡相同；每件事情嚴格來說都是合法的，不過你在簽字前得聽清楚、看仔細。

細，你得要對商業世界運作的方式略有所知。在黛博拉·霍爾的例子中，誘因是她替才剛二十歲出頭的女兒弄到手機，因為手機便宜得不可思議。「很容易弄到。」她回想道：「我沒有信用紀錄，不過他們還是把手機給我了。她把合約填好，給我簽名，我沒有花時間去讀……那個小姐把事情講得很好聽，一個月九美元，結果都是編的。」黛博拉不知怎麼地，少看了一位數。「真相是一個月八十九美元，我被騙簽了三年的合約。他們給你大概兩千分鐘的通話時間吧。周末通話本來應該是免費的，結果不是，還是要付費。我說分兩次付給他們，他們就打電話給我，恐嚇說要去法院告我，不過他們接受讓我分期付款。我跟那個人說，我覺得我被搶了。」

相比之下，安·布拉許確實讀了合約。在她接手一台切諾基吉普車 (Jeep Cherokee) 的租約時，她知道條款對她不利，但是她被迫做了決定。十年前，離婚讓她跟兩個孩子陷入貧窮，暫時無家可歸。孩子的撫養費加上特約文字編輯的微薄薪水，她一年大約可以賺到一萬美元。後來她找到一份全職的編輯工作，年薪兩萬三千美元，但她需要一台可靠的代步工具，讓她能在新罕布夏州的大雪中工作。

「我有一台豐田汽車，」她說：「起動機有點問題，有塊前門板也生鏽得差不多了，我覺得這台車子沒有辦法通過車檢……我知道煞車得換了。」她沒有存款、沒有信貸，沒錢可以修車；她的兩名孩子桑迪和莎莉大約十多歲，表示願意放棄自己的駕照，中止一年以減少強制險保費，希望她能用這些省下來的錢換車。

接著，「天上就掉了一台車子下來，」她說。「普蘭菲爾德有個好心的年輕人不再租他的吉普車了。他結了婚，開銷很大。他已經付了大半的頭期款，但租約還有十五個月。(汽車經銷商的) 負責人打電話給我說：『妳要接手他的租約嗎？不用頭期款什麼的。』所以我就這麼做了。上周辦的，開

這麼一台耗油的雅痞大車似乎有點蠢。」

租金是每個月兩百九十三美元，她勉強還能應付，但是租約最後有個潛藏的危機：如果租約到期後她想留住車子，她就得拿出一萬七千美元購買，不然的話，她就得為她分配到的三萬六千英哩，每一英哩付出十五分錢；或者是為里程表上將近五萬三千英哩的里程數，付出兩千五百美元。「所以我如果我當下拿不出兩千五百美元，最後我就得買下那玩意兒，」她說道。「我的信用紀錄很糟。」她曾經拖欠一萬八千美元的就學貸款和一萬兩千元的信用卡費，唯一能取得汽車貸款的方法，就是請教堂裡一對夫妻替她當擔保人，但即使如此，利息還是高達百分之二十四。如果這對夫妻中的先生同意掛名當車主，利息就會降到百分之十九。每個月要付三百九十四點四五美元，可能得一直付到這台吉普車變成一堆破銅爛鐵為止。

對低收入的工作者來說，高利息是無所不在的陷阱。已婚的安曾經是中產階級，享有能輕鬆貸款的所有好處，離婚後她的生活迅速下墜，一眨眼的工夫，她與赤貧之間唯一的障礙就剩下四張薄薄的塑膠信用卡：一張發現卡、一張花旗卡、兩張西爾斯卡。隨著欠款越來越多，她限制自己只能將卡片用在必需品上，像是修車，或者是買些她認為對孩子身心健康有益的東西：一組越野滑板、一台給桑迪的電腦。後來桑迪得到了達特茅斯學院的全額助學金。「信用卡得拿來買腳踏車之類的，」她堅持道：「不能買洋芋片或是芭比娃娃，要買書這類的，讓他們能更傑出、與眾不同，對他們的成長有幫助的東西。」

現況總是會跟不確定的未來起摩擦，「聖誕節總會有一筆龐大的送禮開銷，」她坦承，「因為我覺得明年可能沒辦法再這樣了。」

「妳每年都說我們不能再這樣了。」桑迪一邊在客廳打開他的筆記型電腦一邊補充道。

安的親戚對她有諸多批評，「如果我們決定揮霍一下，在冬天買盒覆盆子，這簡直不可原諒，因為我們沒錢這麼做，我們不該有那些選擇。」她說：「我常常聽到別人說：『瞧瞧他們，我想他們是領社會救助金的吧，他們領食物券，這樣的人為什還要電視？』但我從充滿折磨的日常生活中學到的是，你永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而你需要找方法紓解那種壓力和痛苦。我們可以用健康的方式做到，例如以信用卡買一組越野滑板——這不太負責任，不過很健康。」她笑了，但不是開心的笑。

真正的代價反映在如雪球般越滾越大的欠款帳單上。因為她的信用等级不完全是AAA，她得支付百分之二十三點九九九的利息；除此之外，雖然她幾乎每個月都如實支付最低應繳金額，但她並不總是能及時領到薪水，趕上付款期限。結果慢慢地，她發現，信用卡公司把滯納金加到本金上，然後以不斷增加的本金來收取高得離譜的利息，即使在她停止使用這些信用卡很久以後，積欠款項仍然不斷增加。

這已經成為遍及全國的長期問題，放款人搜尋信用紀錄有輕微缺失的人，把他們標記為「次級貸款」，如果你屬於這個類別，你就會被收取比較高的費用和利息，但是你可能完全不知情，因為沒有幾個州要求放款人必須披露消費者的信用評等，就算借款人看到自己的信用報告也一樣。信用評等分數介於三百七十五的低分到九百的高分之間，根據五項因素來評定：付款準時度、欠款額度、信用紀錄長短（越長越好）、申請過多少新信貸（越少越好），以及借款人是否使用組合信貸（房貸跟車貸優於信用卡貸款）。放款人常會扭曲事實，當然這對他們有利。根據《消費者報告》（Consumer

Reports），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九年間，次級貸款從三百七十億增加到三千七百億美元，主要銀行也是罪魁禍首，放款人替二〇〇七年到二〇一〇年之間的一波喪失贖回權³準備好了舞台。「放寬了舊的放款標準，誘騙消費者進入滅頂的債務深淵之中，卻沒有放寬償還貸款的嚴格標準，結果就是：輕鬆把錢借出去的放款人，指著他們一手創造出來的次級貸款階級，用超高的利率和費用來懲罰這些借款人。現在就連大學生，甚至是十六歲的青少年，都成了次級貸款的放款目標。」^[10]

桑迪還只是一名身無分文的常春藤盟校學生，「但他每天至少會收到一封貸款邀請。」安說道。一名財務顧問告訴安，因為積極的招攬和寬鬆的信貸，導致連青少年都在宣告破產。她很厭惡破產的概念，有天她坐在餐桌旁，在她月租四百美元的破舊公寓裡，雙手托著頭，一邊算著那些零頭數字準備報稅，一邊想著她的錢都花到哪兒去了。在一本有橫線的白色筆記本上，她列出很多數字，這些數字都不大。「我不曉得，」她說：「我覺得一點希望也沒有，沒有任何脫身的辦法，我連試都不想試。」我說，很多人都用宣告破產來脫身。「這聽起來就像是領社會救助金，我不想這麼做。」她反駁道：「我只是想還清我欠的錢。」她的音調提高了，充滿焦慮和憂鬱，「但是我沒辦法照這種利息來還錢，我知道我每年得多花幾千元在孩子身上，他們正在成長，但是我就是找不到解決辦法，所以我這麼做了，而且我知道我得付出代價。唉，就這樣吧。」

某方面來說，安就像我採訪過的典型低收入勞工，他們遍布全國各地——在新罕布夏州的城市

3 譯註：指貸款人失去贖回抵押物品的權利。

裡，在北卡羅萊納州的田地裡，在洛杉磯的公營社會住宅裡；他們有白人有黑人，有拉美裔也有亞裔，有土生土長的，也有剛抵達美國的。他們都沒有被憤怒攔住，安沒有指責任何人，沒有大肆批評這個社會。「是我讓自己落到這個地步的，是我做的選擇。」她坦白說道：「雖然信用卡公司利用我們，他們收取這樣的利息實在太糟糕了，但是是我自己選擇要用的。我已經好幾年沒用信用卡了，而且現在我也不敢接電話了。」她不接電話是因為不想聽到收帳員的聲音。「他們的聲調五花八門。」她說。他們會在答錄機上留下警告訊息，比如「馬上撥這支電話」。

說出像這樣的話的時候，她總是會為自己「發牢騷」而道歉，儘管我覺得她的牢騷都是我挑起的，因為我一直在問問題。這是什麼感覺？妳有什麼想法？對於在中產階級舒適環境下長大的人來說，處在貧窮邊緣的感覺有多陌生？「沒人真的想知道『兩美元是筆大數目』的感覺，二十五美元就更是鉅款了。」她說著，彷彿這種事情還是令她感到驚訝。「請告訴我一般人不是這樣認為的。普通人也會這樣嗎？我是指那些過正常生活的人。」她絕望地笑了，「我想不起生活變成這樣以前的狀況了。每天每夜，在我試圖要睡著的時候，心裡總是有牽掛：沒有好好保養的車子還撐得下去嗎？我要怎麼做才能有錢保養車子？我知道我該去保養了，但我要如何搞定一切？我要如何才能付清這些帳單？要是再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怎麼辦……我想不起這種日子之前的生活。」

到了五月，離她車子的租約到期還有三個月，她前夫一周一百美元的小孩扶養費就要停止給付，因為莎莉即將滿十八歲了，這算是某種最後期限。安終於讓步，願意考慮宣告破產，這違反了她的個性，但是她沒有其他選擇。接著她發現，她窮得連宣告破產都沒辦法。她需要付律師七百美元，還需要兩百美元的申請費，於是她只好去找理財顧問。

這位顧問經常跟信用卡公司打交道，如果可以如約分期還清本金的話，有辦法把利息降到零，但結果安太窮了，連這一點也做不到。看到她的低收入、高支出，又完全沒有任何資產，顧問告訴她，她沒有能力還款，所以他建議停止支付信用卡帳單，先付房租跟電費，存錢準備宣告破產，一存夠就申請。她咬緊牙關，照她講的「把道德問題擺到一邊」，從三月開始停止支付信用卡帳單，挪出伙食費，存了七個月，最後終於在十月湊足了申請所需的九百美元。這沒什麼好慶祝的。「我每兩周大約可以拿八百六十美元回家。」她解釋道：「這張雙周支票有一半要付房租，另一半用在車子上，還有水電費跟上下班的交通費。我連內衣褲都沒辦法換新的，我們今年也沒辦法過聖誕節了，不過我們還是要想辦法吃一頓。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要發牢騷的。」

從表面上看來，依據公寓的屋況來決定利率似乎有點奇怪，但屋況不佳會導致疾病和醫療支出，接著又可能轉化為不良的信用評等，限制了所能購買的車輛的品質，因而危及上班的準時度，升遷與賺錢的能力，一家人只好繼續窩在破爛的公寓裡。這就是貧窮的連鎖赤字，環環相扣、不斷加劇，直到築起一整個貧窮的架構。這就是麗莎·布魯克身處的牢籠。

她才二十四歲，但是年輕的臉龐有著疲憊的神色，因為壓力大疏於打理，一頭金髮都乾枯打結了。她辛勤工作，在精神病患的中途之家擔任看護。她對病人很好，親切又可靠，但是她一小時的工資只有八點二一美元，這讓她跟四個孩子處於年收入比貧窮線還低了幾千美元的境地。

她住在罕布夏州紐波特一個貧困的街區。近年的研究顯示，屋況不佳會引發並加劇孩童的氣喘，麗莎從來沒有發現過任何黴菌、蟻蟲、老鼠屎、蟑螂等跟氣喘有關的東西，不過她卻注意到她九

歲大的兒子尼可拉斯，在他們搬進樺樹街上一間潮濕、透風的老舊木造房屋之後，狀況越來越糟。

尼可拉斯跟失明的祖母待在家裡，有兩次突然呼吸困難。她打電話叫救護車，每一回救護車都飛快地把他送進醫院，一次送到克萊蒙特，一次送到新倫敦；每次在急診室，都以氧氣和類固醇來治療他。儘管麗莎每兩周要付九十七美元。但是這家人的健康保險卻拒絕支付救護車的費用，兩次分別是兩百四十美元跟兩百五十美元。保險公司主張醫生沒有獲得合理的授權，麗莎又不了解保險規則和程序，也不知道該如何提出申訴。「我跟醫生辦公室還有保險公司都吵過，」她抱怨道：「他們還是說無論如何，我都得付這筆錢。」

她沒辦法馬上付錢，也沒辦法一次付清，因為她瀕臨破產邊緣，所以這幾筆帳就到了她的信用報告上。她想搬到好一點的房子裡，但當她想貸款買一間活動拖車式房屋的時候，她遭到了拒絕，因為她的信用紀錄顯示出逾期未繳的救護車帳單。她想買一台比較可靠的車子來通勤，也遭到拒絕，所以當她那台一九八九年的道奇凱領 (Dodge Caravan) 出現嚴重電路問題時，她別無選擇，只能去那些不查信用紀錄的二手車廠，以百分之十五點七四七的利息，花了五千八百美元買一台一九九五年的普利茅斯霓虹 (Plymouth Neon)。那台車里程數有八萬兩千英哩，發電機很糟，每個月得花一百到兩百美元維修。

麗莎跟我說她的高利率貸款的那天，我剛好收到一封不請自來的貸款邀請，我的保險公司提供了利率百分之七點五的汽車貸款，不到她的利率的一半。我不需要貸款，這就是為什麼我的利率這麼低的緣故。在自由市場經濟中，人如同發行債券的企業：一個人的財務越不穩健，借貸的時候就得付出越多的利息。

窮人跟投資銀行家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花很多精力想著錢的問題，他們得盡力同時應付許多事情，預測、計畫，而且每個決定都舉足輕重。「如果你快餓死了，那麼你就會對食物產生興趣；如果你為了付帳單而焦頭爛額，那麼金錢就會超乎想像的重要。」賽巴斯欽·鍾格 (Sebastian Junger) 觀察道。在他因為《超完美風暴》(The Perfect Storm) 一書暢銷而成為百萬富翁以前，他也有過那樣的經驗。^[1]許多視錢如命的人，都會非常謹慎地做決定，搜尋報紙上的拍賣消息、剪下折價券，精明地在二手商店裡找便宜貨；但是有些人則任由自己的錢大失血，從來不知道存錢的益處，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足夠的錢可以拿去存。

他們陷在美式享樂主義與美式的格言之間，認為窮人就該犧牲、承受痛苦，絕對不該花錢給自己找樂子，因此安·布拉許買覆盆子會引人側目，其他還有許多人因為看有線電視節目之類的嗜好而遭到批評。有線電視的月租費引來某些從事反貧窮工作的人的酸言酸語，而且最尖銳的批評似乎也來自那些曾經窮困過的人。

如果你跟一群致力於幫助貧窮家庭的男男女女坐在一塊兒，你經常會發現，他們當中有一、兩個彷彿得到授權，會義正詞嚴地批評他們的服務對象揮霍無度，這些吹毛求疵者總會舉出自己的資歷：靠社會救助金度過童年、未婚懷孕、不快樂的親密關係、無望的教養。他們確實窮過，因此需要尊重；如今他們找到出路，擺脫了困境。他們受不了看見那些落在後頭的人正在白白浪費機會，會讓他們想到自己。

所以在新罕布夏州克萊蒙特的谷區醫院，司徒南西大聲地站出來說話。南西是一名熟悉市井生活的專案經理，在「健康夥伴」診所工作。這家診所提供診療計畫，服務那些被倒閉的紡織廠和製鞋工

廠遺棄的貧窮白人。她從小生長在麻薩諸塞州南霍利約克的公營社會住宅裡，知道所有謀生的招數，該怎麼賣食物券、從曬衣繩上偷衣服、一邊「購物」一邊迅速吃掉超市貨架上的食物。她聽她同事講了幾分鐘關於醫療問題跟服務的客套分析，接著單刀直入，跳過這些細節。

「如果他們想從州政府手上拿到錢，他們就得接受預算諮詢。」她宣布，「我看到很多人花一百五十美元付電話帳單，而且所有人都花九十美元看有線電視。」

「還有他們全都使用插播服務。」另一名專案社工補充說道。南西激動的態度讓她也鬆口了。其他人紛紛插嘴，講出許多事情和抱怨，有個小學校長說自己曾經試著打電話給一名生病的小女孩，卻發現她家的電話打不通。「那個女孩說：『對啊，我們沒辦法同時繳有線電視費跟電話費。』」校長告訴小組裡的人，其他人心照不宣地點點頭。

「他們沒有牛奶喝，但是卻不缺有線電視頻道，」布蘭達·聖羅倫斯說道。她是一名負責高風險年輕媽媽的家訪員，她的服務對象似乎都很喜歡她刀子嘴豆腐心的風格，把這視為真情流露的表現，帶給她們先前不曾有過的感受。布蘭達以自己的經歷當作示範，她來自工人階級，父母全靠自力更生及自我犧牲儲蓄，自豪於撿別人的舊衣服和自己縫製衣服穿，拒絕接受社會救助金或食物券，她的生存之道就是做對的選擇加上辛勤工作。「我們要以我們的價值觀來影響他們的優先事項，」她直言不諱地說著，她的服務對象不肯買健康保險，因為費用似乎太高了。但是他們卻願意花兩百美元買錄影機和電視機，她抱怨道。

「那是一種即時的滿足，可以讓人逃避一下現實。」她有個同事評論道。

是啊，為什麼不行呢？有些人會這麼問。有很多比看電視更糟糕的逃避方式，為什麼窮人就不能分享一點美國電視節目所創造出來的娛樂？有件值得記住的事情是，不到幾十年前，領取社會福利的人擁有電話，是不被允許的奢侈行為。這種禁令最後屈服在電話找工作較方便的論點之下，何況電話在孩子生病或受傷時還能用來求救。

很多出身中產階級的反貧窮工作者，認為自己沒有權利強行規定窮人不讓他們購買中產階級的娛樂；某些提供援助的人，覺得這麼做只會表現出階級差異的優越感，有時候甚至是文化或種族的差異。但這種感覺在曾經窮過的人身上比較少見，如今他們轉而為窮人提供協助，常能找出很充分的理由來事後批評服務對象的消費習慣——指責這些人都被集團或個別的詐欺高手給敲詐了，而且也常不經過充分思考就亂買東西，比如他們都見識過在戒癮中的毒蟲和酒鬼揮霍金錢。有些戒毒和戒酒方案會要求有工作的人交出薪水，存在第三方託管的帳戶裡。

布蘭達沒辦法讓她負責的那些年輕媽媽照做，不過她盡力勸導她們。「我叫她們去雜貨店之前先列清單，」她解釋道。這完全是令人沮喪的徒勞。「存下來要付帳單的錢拿去買了汽水和香菸，而且她們全都有養寵物。」

相形之下，她欣賞的是那些校長能常見到的家庭：有工作的貧窮家長，自尊心強得不願意讓孩子接受他們明明有資格領的免費午餐。「他們會替孩子準備營養豐富的午餐，不會讓他們帶奶油夾心餅。」校長說：「他們會準備三明治和一片水果。」

這類有概念的舉動總是不如誇張的行徑來得人難忘，所以桌邊談論的這些軼聞也許有代表性，也許沒有。南西對那些揮霍的人印象深刻，她記得有個男人請她幫忙支付處方藥的費用，因為藥廠願意捐出即將過期的藥品。她像往常一樣超時工作，處理所需的複雜文書資料，以因應特殊需求的案

例，但是當她得知這個男人簽了全部電視頻道的合約，讓他可以在客廳裡舒服地看電視時，她火大了，「我告訴他，如果他打算每月花九十元看有線電視的話，我可不打算花時間替他解決四十美元的醫藥費問題。」

南西應該會喜歡麗達·巴特勒，她已經當了祖母，就坐在她公寓後面的混凝土陽台上吹風抽菸。這裡是本寧台，華盛頓特區的一個貧窮的區域，居民大多是黑人。不久前的七月某天半夜，她女兒黛安在育樂中心外被歹徒飛車射殺，留下三名孫子，分別是四歲、八歲和十六歲。這種情況逼得她成為存錢高手，她成為街坊間的諮商處，鄰居都會主動來請教。如果要找人舉辦這個主題的研討會（他們應該有資格受邀），麗達·巴特勒絕對是最值得敬重的教授。

因為她有社會保險，所以她領的社會救助金比她女兒少——她每個月領三百七十九美元，她女兒領五百美元；她女兒還有四百美元的食物券，麗達的則是一百八十美元。她和如今已經過世的先生當過管理員，後來她在樂園餐廳當廚師，她沒有退休金。

「我過得不拮据，因為我是鄉下老太婆，知道怎麼省。」她用文法不太順的句子說著。表面上她也許是個鄉下老太婆，因為她四十年前來自密西西比，但是她有著戰地指揮官的精明，面對孫兒的需求跟願望時，她知道何時該虛晃一招、何時該進攻、何時該撤退。「他們沒缺什麼。」她自豪地說道。她不准他們去追穿梭在大街小巷裡的誘人冰淇淋車，因為家裡的冰淇淋、餅乾、糖果便宜多了。她密切留意特價消息，能背出喜互惠超市（Safeway）、巨人超市（Giant）和購物者倉庫超市（Savers Warehouse）的番茄醬跟可樂的價格。「每星期三拿到傳單後，我就拿本子寫下來。可樂一箱一點八九元，當特價六十九分的時候，我就買兩、三箱；凱馬特超市（Kmart）的番茄醬和芥末醬，一瓶六十

九分，在喜互惠最少也要一點二三美元。」烤牛肉特價的時候，她會買很多。「我把烤牛肉切成丁來燉，或者做胡椒牛排。特賣時我會買一堆。我沒車子，不過搭公車就好了。」如果買太多提不動，她就付五美元請人載她回家。

「星期天我去了二手商店，買了四組床單和枕頭套、四件被套、八個咖啡杯、一張單人床，全部差不多四十三美元吧。從前我的鄰居每天都去一般商店買東西，我說：『你只是在浪費錢。』」麗達·巴特勒會告訴大家該怎麼做，只要你願意聽的話。

反貧窮工作者常常希望學校能夠提供必修課程，教導他們如何安排預算，但有時候卻事與願違。華盛頓特區有一所學校，為來自貧窮家庭的四年級學生準備史丹佛成就測驗，他們使用的練習本裡有這麼一道習題：

維克多把錢看得比什麼都重要，他沒什麼朋友，從來不花錢玩樂，從來不把錢捐給需要的人，他只是不停地工作存錢。不用說，維克多常常感到不快樂。

多利安完全不同，他喜歡玩樂，喜歡看電影跟戲劇，他努力工作，不過金錢對他來說不是很重要。無論何時，只要有人找他借錢，他都很樂意伸出援手。

這道習題混淆了節儉跟吝嗇，還有努力工作與悲慘生活、揮霍無度與慷慨幸福，並要學生選出關於維克多跟多利安之間差異的最佳描述。正確答案是：「D、多利安幫助他人，而維克多沒有。」^[12]然而，教導孩子慈善的觀念也不用貶低努力和儲蓄習慣，就像你不必吹捧金錢的價值才能讓這

些孩子覺得需要錢，來自這種家庭的孩子早就知道了。而且如果你身無分文，那麼錢確實有一定的重要性。

以物易物常常是解決缺錢的辦法，有時候看起來只是舉手之勞，像是麗達的鄰居瑪奎塔·巴恩斯，就找當技工的朋友替自己以最低價修車，或者是把車子借給另外一個朋友，因為那個朋友有時候會替她買東西。她和另一個女人會互相替對方照顧孩子，不用付錢給彼此。在其他的情況下，交換就更為明確了，司徒南西曾在醫院工作，以交換她的子宮切除手術；琳恩是一名中年圖書館員，一直保有以物易物的習慣，那是在田納西州的貧窮童年時期所養成的習慣；她的先生是學校教師，來自貧困的東歐，他也有以物易物的習慣。

「我有個朋友比我會做裁縫，」琳恩說道。「如果她幫我縫東西，我就幫她打掃房子。」她丈夫用業餘木工的技能做些碗櫃、書架之類的，材料是從一間家具木工行後面撿來的木頭碎片。他用一個廚房碗櫃換到一個藍莓派，那個藍莓派是「世界上最會做藍莓派的女人」做的。琳恩說：「有時候我們也會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修車子。」此外，她姪子替他們組裝了一台電腦，交換一個他在辦公室裡用的書櫃。

琳恩感嘆這種能夠用來交易的家庭技藝正在消逝。「事實上，有幾年我所有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她說。「我自己種菜裝罐，我先生自己蓋或是改造我們的房子，我從來沒找人修過任何家電之類的東西。」後來他們做了些許調整，讓自己像是新興的中產階級。「現在我們已經快六十歲了，才會過得稍微奢侈一點。」她說道。能否舉例？「像是我們在聖誕節花了八美元買一瓶酒，兩個人分著喝，現在都一月了，還剩下一點。我昨天晚上也喝了一小杯。」她的節儉令她自豪，雖然那是出於對

貧窮的恐懼。「你賺多少錢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麼花錢。」她宣稱：「這個國家從百萬富翁到最窮困的人都有一樣的問題，我認為這就是美國的問題……廣告跟你說，你得有這個，你得有最新、最棒、最好的東西——我覺得這就是美國的問題。」

超支花費絕對不是窮人的專利，湯姆·沃爾夫 (Tom Wolfe) 捕捉到霍瑞修·愛爾傑沒提到的美國的另一面，巧妙地描繪出富人的怪癖。「一年賺一百萬美元我就要破產了！」《虛榮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 裡那名證券交易員自顧自地大吼著：

駭人的數字出現在他腦海中，去年他的收入是九十八萬美元，但是因為他借了一百八十萬美元買公寓，因此一個月得付兩萬一千美元的貸款。一個月兩萬一千美元對年收入一百萬的人來說算什麼呢？當時他就是這麼想的。但事實上，那是讓人粉身碎骨的沉重負擔——那是他的全部！一年要付二十五萬兩千美元……再加上税金，他得從收入中拿出四十二萬來支付這二十五萬兩千元。而去年剩下的五十六萬美元收入中，有四萬四千元得用在公寓每個月的維修保養上，還有十一萬六千元得用在南安普敦老德洛佛慕陵路那棟房子上（八萬四千元是分期付款加利息，一萬八千元是暖氣、水電費、保險、維修金，六千元是整修草皮和籬笆，八千元是税金），在家裡跟餐廳招待客人花費共計三萬七千元，跟其他人花的錢比起來，這還算小數目。像是坎伯在南安普敦辦的生日宴會，只搞了一次狂歡樂園（當然還要加上必不可少的小馬跟魔術師），就花了將近四千元。托利弗學校的學費加上校車費，一年總共要九千四百美元，家具跟衣服的特付帳單總共約是六萬五千美元……傭人（波尼塔、里昂小姐、清潔女工露西亞，還

有南安普敦的雜工霍比）一年總共要六萬兩千美元，這樣就只剩下二十二萬六千兩百美元了，或者說是一個月一萬八千八百五十美元。加上額外的稅跟有的沒的……兩輛車的車庫租金（每個月八百四十美元）、家裡的食物（每個月一千五百美元）、俱樂部會費（每個月約兩百五十美元），去年他已經花了超過九十八萬美元，事實還真是糟糕透頂。好吧，顯然他可以東省一點、西省一點——但萬一發生什麼意外的話，這遠遠不夠！^[13]

在現實生活中，韋里·古德爾和莎拉·古德爾的開銷數字比較低，不過模式很類似。他們才剛滿二十歲沒多久，已有三個孩子，還有自己錯過的童年要彌補。兩個人都從父母的教養方式中繼承了破壞性的行為——他酗酒、她有暴力傾向——剛成年的他們不斷重覆上演這些場面。

他們住在莎拉祖母破舊的房屋的樓上，這棟建築物飽經風霜，其存在似乎毫無意義，只能衰落塌陷，悲哀地矗立在新罕布夏州克萊蒙特市街上緊密縱橫交錯的老屋群中。祖母沒錢整修，所以淋浴間、洗衣機、烘衣機、廚房水槽……沒什麼東西是能用的，窗戶是破的，客廳裡沒有地毯，只有一塊光禿禿的油布。但是牆邊堆著很多玩具，還有一堆CD高高疊著，一個陳列櫃點綴其間，上面擺著立體聲音響跟一台大電視。最大的兩個孩子，一個三歲、一個十八個月大，兩個孩子都沒穿衣服，只包著尿布。

就像許多新英格蘭的工業城鎮，克萊蒙特的古雅風情只存在於那些好聽的名字裡：糖河，還有名叫夏日街、宜人街、珍珠街的那些街道。大部分磨坊跟工廠裡的正常工作都已經消失了，只剩下奮力掙扎才能糊口的工作。韋里和莎拉住在珍珠街上，比大多數人幸運，因為韋里透過莎拉的繼父，找

到一份安裝金屬板屋頂的工作，主要服務麻薩諸塞州的那些糖果廠和製藥廠。雖然每天來回都要花上兩個半小時，但他一小時能賺十三到二十美元，一年最多可以賺三萬一千元。麻煩的是，他們把錢全部花掉了，他們享受每一丁點的樂趣，無止盡地購物：每周光是香菸就要花五十美元，還有衣服、鞋子、CD，有的沒的。幾乎餐餐都吃麥當勞、必勝客、塔可鐘。他們也沒有銀行帳戶。

韋里個子高瘦、性情溫和，戴著眼鏡，一頭淺棕色頭髮亂蓬蓬的，臉上常帶著淺淺的微笑，看起來有些迷惘，好像他剛醒來發現自己置身一團神祕的混亂之中。他的小孩都很調皮搗蛋，科弟才三歲大，眼中已經有了狂野的怒火，已學會憤怒的叫喊，聽起來就像男人的聲音一樣深沉。他會打妹妹，於是妹妹就打小嬰兒。科弟長得比較像韋里的好哥兒們，果然不出所料，科弟其實是他好哥兒們的兒子，不過韋里是個可敬的男人，他接納了妻子的第一個孩子。

莎拉有一頭尖尖刺刺的紅色短髮，右耳戴著耳環，右眉上也穿著一個環。她的臉色蒼白，經常悶悶不樂。蒼白的膚色透露出她寧願待在室內，通常是待在床上，也不願意帶她那幾個好動的孩子去陽光下跑跑跳跳消耗他們的精力。她講話的語氣鬱悶而絕望，幾乎像是哀鳴。

「我小時候被性騷擾過兩次，」我們第一次談話時她告訴我。「我媽跟我爸分手以後，我爸就搬出去了。我媽決定她要重新當小孩，因為她十八歲就生下我。那時候我九歲，她經常去酒吧，我只能自己待在家裡，真的很辛苦。我住過寄養家庭、待過兒童之家，被一個叔叔跟一個家人的朋友性騷擾過。因為過去的經歷，我有很多心理健康問題，所以沒辦法工作。我有嚴重的焦慮症、恐慌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各種不同的問題，也有嚴重的藥物恐懼症。我去看過諮商師，不過我沒辦法服用任何藥物。」她用打火機點燃一根萬寶路，尼古丁是一種她不會害怕的藥物。

莎拉也很常去酒吧，因為她也需要當小孩。到了二十一歲的時候，她跟韋里的婚姻快垮了，她即將有第四個孩子，而這四個孩子的父親是三個不同的人。她餵小孩吃垃圾食物，情緒老是反覆無常，這一刻放任他們四處亂跑，下一刻又因為同樣的舉動而氣憤地責備他們，並以懲罰來威脅他們——不准去玩或是不能租電影看，只准躺在床上——但這就像風吹落葉一樣來來去去，產生不了作用。

家訪員布蘭達很擔心這種危險的情況，他們夫妻還在在一起的時候，我也看過這些情況。有天科弟打開電扇，把手指頭伸到葉片旁邊，只稍微被罵了幾句；他爬上沒裝窗戶的窗台，韋里很堅持地說：「從窗台上下來。」科弟不理他，也沒有受到懲罰；布蘭達有次去他們家，莎拉在睡覺，十八個月大的凱拉嚼著一根香菸，還把一個比克打火機放在嘴裡；她在骯髒的廁所裡玩耍，而科弟搬了張椅子到爐子邊，爐火還開著；我看見凱拉用運動鞋打嬰兒的臉，還拿起一張塑膠椅，準備砸到嬰兒的頭上，科弟尖叫起來，韋里阻止了她。可是比較沒那麼嚴重的行為似乎反而招來更嚴厲的責罵；凱拉獲准可以在客廳裡邊走邊吃起司，接著卻被狠狠罵了一頓，因為起司很自然地掉得滿客廳都是。無論是韋里、莎拉或孩子，似乎沒人知道該怎麼玩，面對少數幾樣昂貴的玩具，他們大多也只是在房子裡吵雜地拖著走。韋里想要的周六快樂出遊，在因為酒駕被吊銷駕照之後，變成了帶小孩一起走去沃爾瑪超市。布蘭達所屬的機構跟國家保護服務，都試圖要請法官讓孩子離開這個家，但卻沒有成功。

他們的婚姻在還維繫著時簡直是狂風暴雨，莎拉說，她在成長過程中眼看著她媽媽毆打繼父，於是她對韋里如法炮製。「我拚命揍他，他一年大概要換四付眼鏡吧。」既然她能退一步看清楚自己的所作所為，我問她，不能改一改嗎？她小聲回答道：「我覺得自己完全無能為力。」

為了避免她暴力相向，韋里用錢收買她。「我知道我可以把錢存在銀行，」他說道。「但是說真的，存錢和家庭和樂，你告訴我哪個比較容易？」他帶著有氣無力的笑容望向莎拉。他們聽從我的建議，才記了一個月的帳，兩人都認為他們可以試著省下很多花費。「六百美元，」韋里估計著。這對他們的生活會有什麼影響？「會很糟糕，」他說道：「妳告訴他吧，」他對沉默不語的莎拉說。「她沒辦法——你知道的，她有那些問題跟毛病，就是長期鬱悶，不花錢就不開心。」

不過買幾張CD並不能讓她開心很久。「能開心一天吧。」她說。

「開心到她走出那間店為止。」他反駁道。

他們的日常生活開銷並不過分，包括每個月給莎拉的祖母三百美元房租、一百美元使用她的電話費用，電費跟有線電視都不用錢。但是韋里需要開長途車上下班，除非他搭同事的便車，否則每個月的油錢就要好幾百元。而在駕照被吊銷之後，他也不得不這麼做了。這對夫妻每個月付兩百二十美元的車貸，但是他們連汽車保險也負擔不起；每個月花兩百美元洗衣服，因為他們的家電不能用；每個月花兩百美元外食，因為在他們付清四百美元的逾期帳單以前，瓦斯公司不肯供氣，而且莎拉很少有煮飯的好興致。韋里一整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之後，往往也已經累壞了。

除此之外，他們喜歡偶爾放縱一下自己。「我們都很年輕，因為我們倆小時候都沒真正擁有過什麼，」韋里解釋著。「我想我們有時候的確有點過火，像是過生日或聖誕節那類的。」

他們從四月中到五月中所記的帳，顯示出他們在房租、汽車貸款和其他定期帳單之外，還有太多的支出，幾乎把韋里賺的兩千五百美元都花光了。

雜貨（包括尿布和香菸）\$467.19

租電影 \$53.93

外食 \$214.45

其他 \$785.09

雜貨包括一些很貴的東西，像是一天三點九九美元的方便午餐盒⁴。科弟只有吃了這個才不會在幼兒園裡亂扔東西。「其他」則總共有五十二個項目，一個月之前列出來的明細，不管是莎拉還是韋里都不記得內容了。一些馬上就會被拋到腦後的東西，有介於兩美元到五美元之間，還有一百六十一美元的演唱會門票（去聽奧茲·奧斯朋的演唱會）、五十二美元參加婚禮的治裝費、介於四十五到五十美元之間的各種生日、婚禮禮物，以及製造商巧妙發明出來的場合：母親節。

節約開支主要從韋里的花費下手，他不再抽他最愛的駱駝牌香菸，改抽一盒便宜四美元的萬寶路，要他完全不抽菸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能被犧牲的還有上館子、吃調理食品和垃圾零食，莎拉憤怒地唾棄家訪員布蘭達提出的建議，「她的預定計畫是：你一整週禮拜都要吃漢堡跟馬鈴薯泥那種東西，」莎拉嗤之以鼻，「我才不要過這種日子，我要吃我愛吃的東西。」

就算莎拉跟韋里成為節儉模範，他們的生活還是得背負過往沉重的債務。在韋里開始鋪屋頂的工作以前，曾欠下七百美元的電話費、五千美元的抵債車費，還有一萬美元的醫療費。他沒辦法申請到電話，不過莎拉可以，但那只是因為她欠的電話費是在十八歲以前欠下的，當時她還不用負法律責任。到最後，在這種情況之下，她很可能得學某些父母的主意：用小孩的名字和社會保險號碼去申請電話號碼。

韋里的醫療費是那種沒有健康保險的工人典型的狀況，他沒錢去看牙醫，牙齒都蛀光了。每次腫發作，他就去最近的急診室拿止痛藥和抗生素。法律規定，無論有沒有保險，急診室必須治療所有的人。但是他們可以開帳單，而且通常都會是漫天開價，遠遠超過韋里能夠負擔的範圍，就這樣毀了他的信用評等。

「很糟。」莎拉如此描述他們的社經地位，然後咯咯地笑了，笑聲尖銳而緊繃。

「是我們自己把生活搞砸了，」韋里附和道：「如果我們是聰明人，我們可以過得很好。有時候我一星期可以賺七百元回來，那是可以過得不錯的數目。但你知道，我們兩個都沒辦法坐在家裡說服自己『就這樣就好』。」他黯然笑著。「如果口袋裡有十美元，我們生了病又不想坐在家裡，就會出門去把那十美元花掉，買冰淇淋跟晚餐。我覺得花點錢讓日子好過一點比較容易做到。」

莎拉說出了她對貧窮的定義，「我們沒有任何存款，沒有一個真正能夠稱作自己家的地方。」
「這是我們自己的錯。」韋里說道：「我不怪別人。」

韋里靠鋪金屬板賺來的錢，足夠讓他的家人脫離聯邦政府定義的貧窮線，但生活水準還是很低。這能讓他們領到一些福利補助，像孩子符合領取 SCHIP 的資格，也就是由聯邦政府資助的美國國家兒童健康保險計畫；莎拉可以從 WIC 領到一些牛奶、穀片、花生醬、嬰兒配方奶粉和其他的食物，那是一項針對婦女、嬰兒和孩童的營養補給計畫。有幾年，他們申報所得稅後，不只收到預扣稅款的

4 譯註：方便午餐盒 (lunchable) 是美國的一種午餐便當，內容物包含餅乾、乳酪、火腿，方便小孩攜帶進食。

第二章 努力工作是行不通的

Chapter2

寒門子弟難翻身。

——尤維納 Juvenal，《諷刺詩》(Satires)

退稅，還拿到額外的薪資所得租稅抵減。

有一年，他們花一部分國稅局寄來的支票去刺青，「就像我們自己還是小孩一樣。」莎拉說道：「所以我們要表現得像小孩。」韋里在手臂上刺了一個巫師，莎拉掀起上衣，露出背上的刺青：那是一顆荊棘圍繞而成的心。

克里斯蒂的工作是這個缺乏勞動力的國家不可或缺的那種，每天早上，她開著她那台一九八六年出廠的破爛福斯汽車，從公共住宅的公寓去俄亥俄州阿克倫的基督教女青年會托兒所，在那裡全天候照看小孩，好讓他們的父母能去工作。如果沒有她跟全國各地成千上萬幼保人員，這個國家就會少掉很多勞動力，導致美國的繁榮無以為繼；少了她的耐心與熱情，孩子們也會蒙受損害，因為她不只是保母，還提供了孩子們一個情感上的安全之地。她教導他們，像母親一樣照顧他們，有時候甚至把他們從家庭虐待中給拯救出來。

她每兩周會收到一張大約三百三十美元的支票，而這樣的薪資無法讓她將自己的兩個小孩都送去她工作的托兒所。

克里斯蒂是個壯碩的女人，儘管生活困難重重，她還是笑口常開。她壓力太大，患有高血壓；沒有銀行帳戶，因為她沒辦法把錢存在裡面太久。雖然盡量謹慎購物，但她總是被帳單追著跑，還得加上付不完的滯納金。她的低收入讓她有資格可以領取食物券和租金補貼，但每當她的薪水稍微多了一點，政府機構就會減少她可領取的福利，這讓她覺得自己因為工作而受到懲罰。她受困在福利改革的迴圈中，必須依據一九九六年實施的《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調解法》(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6) 來過生活。毫無疑問地，該法案的名稱透露出國會和白宮怎麼看待貧窮的原因與解答。

一開始，新法令適逢經濟繁榮，讓領取社會救助金的案件數目直線下降，各州能夠靈活調度，自行管理施行的時間限制與工作要求，有些結合了政府、業界與慈善單位的創新聯盟，能夠引導大家有效地工作培訓與就業。不過，大部分缺人的工作都有三項令人不快的特點：低工資、沒福利、沒

前景。「很多人真的找到工作了，但卻失去其他原本的補助，比如食物券或健康保險。」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 在二〇〇二年的份報告中總結：「他們的生活情況並沒有變好，有時候甚至比他們沒有工作時更糟。」[2]

克里斯蒂認為自己的情況就是如此。她的皮夾裡唯一一張像信用卡的東西，是一張藍綠色的塑膠卡片，上面標有「俄亥俄州」字樣，畫著燈塔圖案，朝黑夜投射出一道光芒，「俄」字上方有一塊彩色方塊(電腦晶片)。每個月的第二個工作天，她會把這張卡片插入一台特殊的機器裡，在沃爾格林連鎖藥妝店(Walgreen's)、省很大超市(Save-A-Lot)、蘋果商店(Apple's) 都有這種機器，輸入識別號碼，一百三十六美元就會加值到她的晶片中。這就是現行的「食物券」發放形式——比較不會被偷，也不容易轉賣；在結帳隊伍中不那麼顯眼，不會丟臉。

這張卡片裡面包含了她每個月最早的一筆收入，讓她能有第一筆消費，只能用來買食物，不能買熟食或者是寵物飼料。這是她給我看的資產負債表紀錄上的第一行，記錄期間是某個尋常的十月。

「第二筆完全花完一百三十六美元，」她寫道。所以福利金在領到的當天就全部花完了，三天後，她得想辦法另外弄到二十五美元現金來買雜貨。十月十日又有五十四美元開銷，十月十二日再十五美元。貧窮家庭的食物券通常只夠支付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雜貨開銷。

但是隨著克里斯蒂的薪資微幅上升，就連這張卡片裡一開始的金額也被蠶食掉了。根據收入來發放福利補助是有道理的：你需要的越少，你得到的就越少。這是從經濟層面來看。可是在心理層面，卻讓受益人有如面臨地獄。每三個月，克里斯蒂就得請半天假(損失半天的工資)，帶著一個信封去找社工，裡面裝滿薪資單、水電帳單、房租收據，負責她案子的社工脾氣不好，一把奪過信封，用國

家規定的公式算出她的食物券配額，以及她的小孩是否符合健康保險申請資格。克里斯蒂完成培訓課程後，每小時的工資多了十分錢，而她的食物券配額則每個月少了十美元。

這讓她每個月只多了六美元可用，不能說都沒有增加，但感覺上就是那樣。許多原來接受社會福利補助的人，去工作時只覺得終於擺脫了官僚機構，不必再領食物券、醫療津貼和住宅補助；但是有些人搞錯了，以為自己不依靠社會福利，就沒有資格領取救濟；有些人則寧願放棄自己的權利，也不願意冒著麻煩與羞辱去抗爭。不過默默投降可不符合克里斯蒂的個性，她既聰明又執著，這正是想在體制下談判所需具備的特質。她從不退縮，敢向上級提出投訴。有一次，她忘了把水電帳單放進那一疊單據裡，負責個案的社工扣住了她的食物券，「我第二天就寄去給她，」克里斯蒂說道。兩個星期過去了，卡片的儲值還是空的，於是克里斯蒂打電話給那名社工。「她有夠討人厭的，」克里斯蒂回憶道：「喔，我不是跟妳說應該要補寄一些文件來嗎？」我就問：「妳看信了嗎？」結果那個社工一堆信都沒看。「她只說：『喔，我這裡還有人等上兩、三個月的呢。』」然後就沒回覆我了，我只好去找她的上司。」那些福利後來就補齊了。

如果你一腳剛踏入職場，另一腳卻深陷在繁文縟節之中，要經營與老闆之間的關係、找到可靠的托兒所，還要應付一團亂、沒繳清的帳單，很容易會失去平衡。這些對一個沒多少經驗的單親媽媽來說夠嚇人了，此外還要再加上官僚體系的監視。政府不像供給者，反而比較像是檢察官，況且你還要想像跟克里斯蒂一樣患有高血壓。

她引用體制的規定，拿到自己應得的份，但是她也曾詐欺——或者說她以為自己在詐欺。她的男友凱文偷偷跟她住在一起。凱文是她兒子的父親，她很確定如果房屋管理委員會得知此事，她就會被

趕出去，原因是凱文是個判刑確認的重罪犯（人身攻擊，刑期兩年），而且他有謀生的能力。雖然凱文賺不了多少，卻會讓她喪失領取福利的資格。政府援助與全然赤貧之間只有一線之隔，小小的謊言在尋找生存空間時意義重大。

凱文看起來就像個友善的神燈精靈——兩百八十磅的結實體重，剃個光頭，右耳上有個小耳環。他的收入不穩定，天氣好的時候，他幫一個景觀設計師工作，一小時可以賺七點四美元。感恩節這一季工作結束的時候，這名設計師會送他一隻火雞——然後就把他扔在一旁，讓他整個冬天都失業。他想去開卡車或切肉，因為他在監獄裡參加過培訓課程，領有一張肉販屠宰證書；但是當他把這張監獄發的證明給雇主看的時候，他們可不會急著把刀子交給他。

克里斯蒂的生活加總起來充滿了緊繃的壓力，很難從她的開支清單中找到樂趣或奢侈品。每個月五號，她從凱文那裡拿到孩子每周的扶養費三十七點六八美元（她並未從她女兒的父親那裡拿到任何費用，那人因為攻擊行為，被判長期監禁），同一天，她的車子加了五美元的油。隔天，她自掏腰包，花了六美元帶托兒所的小孩去動物園。發薪日第八天，她三百三十美元的支票一瞬間就全沒了。首先是她稱為「税金」的支票兌現費用三美元，這還只是匯票所需諸多費用的其中一項（等於是沒有銀行帳戶的罰金）；很快地一百七十二美元繳了房租；其中包括十美元的滯納金，她總是得交這筆費用，因為她從來沒有足夠的錢可以在每個月的一號交房租；接下來，因為已經十月了，她得開始準備聖誕節。她在一間店裡付了三十一點四七美元，以分期預付的方式買禮物；另外十美元買汽油，四十美元給兩個小孩買鞋子，然後用五美元在一家二手商店買了一件燈芯絨長褲、五美元買一件上衣、十美元買一件喇叭褲；最後還有兩周交一次，四十七美元的汽車保險。三百三十美元就這樣沒了，她的

電視、衣物、家具和家裡其他的東西，全都沒有保險。

水電費和其他的帳單要用接近月底時領到的第二張支票來付，她的電話費通常是每個月四十三美元。公寓的瓦斯燃料費三十四美元、電費四十六美元，還有處方藥大約八到十五美元。每个月的汽車貸款要一百五十美元、醫療保險七十二美元、有線電視頻道費四十三美元。如今有線電視已經不是低收入家庭所認定的奢侈品，不需要縮衣節食就能擁有，許多現代美國文化都透過電視傳遞，少了電視所能提供的視野，貧窮的人會更加邊緣化，而且電視算是相對便宜的娛樂。「我只有最基本的，」克里斯蒂解釋著，「我有一根天線，但沒有訊號，所以什麼也看不到。」她希望收訊能夠好一點，因為她跟凱文都喜歡看摔跤。

克里斯蒂預算吃緊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她買了很多高價、廣告強力推銷的零食、垃圾食物和調理包。這些東西提供了工作繁忙的職業婦女、還有那些沒學過該怎麼料理的人一條輕鬆的退路。除了漢堡和雞肉這些主食以外，「我還買了香腸，買了冷凍餐。」克里斯蒂說道：「因為有幾天我可能很累。而這只要把東西丟進烤箱就完成了——像是索爾斯伯利牛排或是火雞肉那一類的。孩子們愛吃比薩，所以我也買冷凍比薩。我幫孩子買了很多早餐，因為我們很早就起床出門。你也知道那些穀物棒之類的東西有夠貴！就是果漿吐司餅乾、穀物棒、穀麥等等的。」最便宜的早餐是熱麥片，但只有在周末她有空時才會吃。「他們會吃熱麥片，但是周間我們很忙，所以我給他們帶穀物棒。我兒子喜歡吃乾麥片，所以我在午餐袋裡給他準備了一些乾麥片、可可泡芙球。」她笑了。「他們有可可球、幸運符圈圈穀片，他不挑嘴，我女兒就很挑。」這些糖果般的穀片很花錢，在我家附近的超市，幸運符穀片非常貴：一盒十四盎司要價四點三九美元，和份量三倍多的燕麥片價格幾乎一樣，燕麥片還只

要四點二九美元。

克里斯蒂和凱文的娛樂主要是吃吃喝喝，她十一歲大的女兒帶著表現不錯的成績單回家時，他們就會獎勵她，想辦法湊點錢，晚上到一家還可以的餐廳去吃飯。可能是墨西哥餐廳，或者星期三的話，就去街上那家萊恩餐館。星期三萊恩餐館的牛排之夜，這是一家大型餐廳，可以闔家吃到飽，就位於他們居住的黑人社區邊緣。自助餐台上堆滿了熱騰騰的馬鈴薯和青豆，還有一塊塊的厚切牛肉，周圍滿是愉快的各色人種，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小孩子推來擠去，友善地跟彼此道歉，端走一盤又一盤足夠吃到撐的食物，一個人只要九美元。

偶爾克里斯蒂跟凱文也會犒賞自己，邀請朋友過來，在鐵桶裡點燃木炭。他們在她一樓的公寓，把這個鐵桶當作烤肉架，享用烤雞肉和肋排，痛飲美樂啤酒。他們是想要喝醉嗎？

「呃……」凱文沉吟著回答。「嗯……」克里斯蒂說：「孩子不在身邊的時候，我會去夜總會喝酒，然後回家睡覺。」她開心地笑了。她喜歡的酒包括布恩農場 (Boone's Farm wine)、馬尼舍維茨 (Manischewitz Cream) 和保羅梅森白蘭地 (Paul Mason brandy)，這解釋了她寫給我的紀錄裡，十月十二日為何花了十五美元買一瓶。但她不是酒鬼，她跟凱文都發誓他們不碰毒品，儘管社區裡到處都有慫恿他們嘗試的毒販。

「克里斯蒂喜歡找樂子。」她的母親葛萊蒂絲尖酸地說著，葛萊蒂絲高中就輟學了，領了好幾年社會救助金，她熱切期盼著三個孩子都能上大學，這樣的理想推動了其中兩個孩子：克里斯蒂的兄弟成了一名會計師，姐妹則是一名信貸從業人員。但是克里斯蒂從來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她情願地上到了阿克倫大學，住在家裡，最後終於受不了沒錢，大二的第二學期，她開始工作，不再讀書。這個決

定對當時的她來說並沒有那麼嚴重，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她看待事情老是不認真。」葛萊蒂絲抱怨道：「現在她知道事情有多嚴重了。」不過事情有多嚴重，取決於她想做的是什麼。她喜歡跟孩子待在一起，可是現在卻發現，沒有大學學歷，她很難在學前先鋒教育計畫（Head Start preschool program）中取得負責人的職位，這差不多相當於正規學校裡的教師。因此，她只能待在基督教女青年會的托兒所，而這裡的財務狀況岌岌可危，因為這個托兒所裡的小孩有百分之九十五來自低收入家庭，費用由俄亥俄州的民政部（也是該中心的收入來源）所制訂。全日的托兒服務每周收取九十九到一百一十四美元。由於中心的花費龐大，這些費用只夠支付教師一小時五點三到五點九美元。

克里斯蒂之前的工作也在最低工資邊緣，她在假日酒店做過服務生兼收銀員，也在凱馬特超市當過收銀員，在酒吧當過服務生，還在很多餐廳裡當過廚師、服務生跟收銀員。她已經是各種職業培訓課程的半調子資深學員，訓練她成為零售業售貨員、公車司機、獄警，但是這些課程從來沒能讓她跟她的同學通過考試，找到工作。她用兩個字解釋自己為何再也沒有回去唸大學：「懶惰。」

她覺得自己懶惰，這很離奇，因為她的工作很辛苦，工資又低，需要付出許多努力才能維持生活。快要被帳單淹沒的時候，她解釋道：「我這個月繳這份帳單，下個月就先繳另一份。我常常輪流繳費。但你收到電話帳單了，就得每個月都繳；要是你漏繳，不得了，下個月變兩倍，再下個月變三倍，接下來你就被斷話了。我的生活就是一堆停話通知，每個月都繳帳單，但是每個月都會收到通知，因為每個人都希望你每個月一號就繳錢。我又不是當天就能領錢，沒辦法在第一天付錢給十個人。我收到停話通知，會打電話去安排付錢的事情，通常我是這樣講的：『嘿，拜託行行好，先不要

拒絕我，我會送點東西給你。』你知道的。我也許不會把一百五十美元全部都拿去給那個賣車子的人，但是我會帶點東西給他。他們滿有意思的，人也很好，會說：『哎，小姐，妳今天又帶什麼來給我們啦？』有次那個人說：『我發現妳每個月都會帶點東西來。』我的確每個月都是這樣。」

她的日程安排緊湊，繳不起多餘的費用和罰款，這包括了她得停止孩子的暑期課程，因為她負擔不起每個月一百零四美元的費用，不能把小孩送去青年會的托兒所，而是由她母親在小孩放學後照顧他們。夏天的時候，他們參加了男孩女孩俱樂部（Boys and Girls Club），那裡象徵性地每個人收七美元，不過俱樂部的接送時間規定很嚴格——除了每周五是下午一點之外，其餘每天都是下午三點。某個星期五，她母親忘記接送的時間提早了，他們也沒有打電話給在上班的克里斯蒂，而是開始計時罰款。前五分鐘每人十美元，接下來的費率比較低，直到她母親終於現身，那時候已經晚了一小時，遲接孩子的罰款累積到了八十美元。克里斯蒂不可能負擔得起這筆錢，所以她的小孩不能繼續待在這裡了。在她的人生中，每個小失誤都會造成重大的影響。

克里斯蒂似乎註定要做低收入的工作，無論她的工作對促進國家福祉有多重要，都沒有明確的升遷機會。依照她原本的生活，一切本該完美地與舒適的人生接軌，但是她在剛成年的時候走錯路了，現在的她需要高等教育來推她一把，或者找到合適的職業訓練。總之，光靠努力工作是不通的。讓努力工作這個值得尊敬的美德受到玷污，可不是我們想要學到的教訓，但是除非雇主能夠、並且願意為這個社會的基本勞動力付出更多，否則那些在貧窮邊緣工作的人，就只能留在原地，美國讚美作者的詩篇聽起來也只是更刺耳而已。

工作對黛博拉·霍爾來說也行不通，就像許多領取社會救助金的媽媽一樣，在被福利救助除名後進入勞動市場，發現除了物質照舊之外，生活中的一切幾乎都變了。她必須買輛車子才能去上班，天還沒亮就得起床，拚命學習新技能，在職場的種族矛盾之間穿梭前進；她的開支變得更加複雜，但沒有盈餘。主要收穫則是情緒上的——她現在自我感覺比較良好——總而言之，目前她還算樂在工作。

黛博拉算幸運了，可以住在一棟雙併屋的樓下。房子是她母親的，位於克里夫蘭一個如今不再平靜的社區。原本以她微薄的工資只能在市場上找到屋況很糟的公寓。這間屋子需要重新粉刷，屋頂也需要加鋪瓦片，不過房間很寬敞，街上的治安也沒那麼糟。兩名年輕女子坐在隔壁的階梯上抽起了大麻煙，使黛博拉的門廊前飄蕩著一股大麻煙的甜香味，她於是拉上了大大的前窗窗簾。

日正當中，但客廳卻是一片漆黑。結束凌晨三點半到早上十一點半的麵包廠輪班工作後，她一直在沙發上睡覺。她還穿著白色的制服，右邊口袋上方縫著「黛博拉」的名牌。她的黑髮變直了，始終掛著的微笑照亮了她略寬的臉龐，卻不時露出一絲悲傷的神情，彷彿一邊訴說著艱辛的故事，一邊苦笑著。

電視機開著，直立式吸塵器擺在客廳中間的地板上，茶几上放著她兩名孩子的照片：小兒子患有唐氏症，女兒則在銀行工作，一步步從基層做起。「感謝上帝，她不用領社會救助金。」黛博拉用低沉的嗓音說道。

黛博拉十八歲的時候生下女兒，之後展開了為期二十一年的社會救助金生活，還有她所說的「台面下的那類工作」，包括管家和酒吧接待，付給她的都是沒有記錄的現金。他們的普遍的作法是，一邊做著不申報的工作，一邊領取社會救助金。這表示福利政策設想的「以工代賑」事實上應該叫

做「只剩工作」，因為這削減了實際的收入。「我已經習慣不停工作了，要多賺點錢。」黛博拉解釋道：「我一星期可以賺差不多一百二十美元，因為他們一個晚上會給三十美元，加上小費……所以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制度，困在那裡，然後忘了外面的世界。」

負責她個案的社工寄了一封信給她，提醒了她真實世界的模樣。三十九歲的黛博拉談不上有任何一技之長，她從社區大學退學了——「我沒有放任何心思在上面，」她坦承。她說自己「很懶」，從來沒想過要好好學一門手藝，她一直靠著領福利金過日子，加上她的非法收入，還有社會保險給她需要受特殊教育的兒子的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但福利改革現在追上她了，一九九六年實施的法案，讓各州在發放補助的同時，可以對補助對象增加時間限制與工作要求，俄亥俄州有權要求黛博拉去找工作或參加就業培訓。

於是她來到克里夫蘭的就業培訓中心，那裡的董事會成員都是地方產業的高階主管，他們需要機械師、焊接工和其他的勞工。黛博拉喜歡穿牛仔褲跟運動鞋，不喜歡特意打扮，所以她選擇了倉庫的工作——行話叫做「收發貨」。作為現實生活中培訓的一部分，該中心在一個小工業園區裡替各家公司分送UPS的包裹，黛博拉因此學會了打字、學會怎麼操作UPS的電腦系統、怎麼記錄庫存、怎麼開堆高機。這個課程「讓我定下來，想學點東西，想做些什麼好去就業。」她說這是她這輩子第一次覺得受到激勵，讓她覺得「以工代賑」這個主意不賴，「大家會想要更多，」她預測著，「這樣也就能教導自己的孩子，讓他們長大之後也有更多追求……如果他們安排我們去這些培訓中心，讓我們知道自己能夠做得到，我們就可以讓我們的孩子也知道這一點。」

這是黛博拉還是培訓學員時期的看法，一旦她開始工作，情況就沒有那麼樂觀了。首先，為了去

上班而不得不買車子（這樣就不會花超久的時間搭公車），但車子既不宜也不穩定；然後是UPS沒有職缺，所以她帶著她的堆高機駕駛證書、以及精心準備的簡歷和剛學會的面試技巧，來到了奧蘭多麵包廠，她準備好要精彩地回答所有的問題，但是卻沒有機會開口，一個男人很快地帶她在工廠裡轉了一圈，接著問：「妳可以七點開始上班嗎？」

她呆住了。「我練習了所有可能的應答，他卻只問我可不可以七點開始上班。」她苦笑了一下。「我以為他們是雇用我去開堆高機。」她繼續說道：「我想開堆高機，因為他們以此來收發貨，貨車就在碼頭。不過做這個工作的全部都是男人！」她嚷道。上班第一天，她就被安排到裝配線上作業。「不好意思喔，」她跟一名主管說：「你們剛雇用的女人會開堆高機噢。」

「喔，可是我們不缺開堆高機的。」

麵包工廠的在職訓練可以用一句命令總結：跟著你旁邊的工人做。黛博拉仔細看著，開始在可怕的大蒜生產線上翻動麵包。這條輸送帶需要員工每天早上七點開始工作，直到一整天的產品都包裝完畢，通常是下午五點左右，有時候也會拖到六點。「那裡每個人都受不了了。」她說：「大蒜麵包、麵包棍、大蒜麵包棍、大蒜麵包捲——他們一看到不同種類的麵包，就想要統統做成大蒜口味的。」麵包通過切片機以後，「你得把麵包分開、平放，接著麵包旁邊的兩個人要確保麵包是平放的，不要兩片一起掉下去。然後會經過像噴泉一樣湧出的奶油機，過去之後，再經過冷凍，接著由四個人把麵包堆起來，還會有一個人站在那裡確保東西順利過去，最後封裝起來。」

工人有工會，但是工作條件卻沒有簽下這個合約的價值。薪資是一小時七美元，包括一小時的支薪午餐時間、九小時工作之後的十五分鐘休息時間，員工要做滿六個月以後才能享有福利。工作不算累人，但是卻相當挑戰黛博拉的精神和身體靈活度。「我第一天在那裡工作的時候……簡直就是，我不想做這個，這太可怕了。」她又笑了，「噢，天啊，我全身酸痛，就這樣看著輸送帶，因為東西一直從我面前經過……我都快哭了，覺得自己沒辦法做這個。」

過沒多久，她得到一個求之不得的能夠離開大蒜生產線的機會，即使那表示她得凌晨兩點起床去輪班，但她可以做壓力沒那麼大的工作：把麵包裝袋裝箱。不過從壓力中喘口氣的時間很短暫，學會包裝後沒多久，黛博拉又再度陷入恐慌。主管突然指派她去操作一台機器，她從來沒有學過該怎麼用。「我連那台機器叫什麼都不知道，」她說道：「我只是剛好聽到他們說：『你是二號。』我當時想：『你們在講什麼啊？』結果二號就是那台機器的名字，那是一台很大的設備，需要有人去『扳動開關』。」黛博拉解釋道：「你得把袋子放進去，確保裝麵包的密封袋開口是打開的，而且要用一定的方式設定機器——不同種類的麵包像是漢堡包、熱狗包，得知道要切多厚，才能設定切片機。」

她開始作惡夢。「我還是暈頭轉向，沒辦法思考。因為這台機器的關係，我覺得我好像一直在漂著……甚至夢到主管因為我做錯了而嘮叨。你懂我的意思嗎？我把工作的氣氛帶回家了……就為了區區七美元，一點意義也沒有。」幾個月以後，她的工資變成七點九美元。

身為黑人，黛博拉覺得自己在微妙的種族問題上站錯邊了。「他們對講西班牙文的人都太仁慈了。」她肯定地說道：「我旁邊就有一個明顯跟不上工作的人，麵包都堆成堆了。她把麵包放進盒子裡，但是麵包都被她壓扁了，主管就走過來大吼大叫。」但她假裝聽不懂英語，所以黛博拉成了抱怨的目標。「等等！」她抗議了，「她的英語程度跟我差不多，不要因為她跟不上，你就來逼我！我裝三盒她才裝一盒！但是她劈哩啪啦講起西班牙文，還有另一個講西班牙文的跟她一夥，他們就這樣講

啊講啊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嗎？沒錯，這種事情可多了，很多很多。」

黛博拉對自己能夠升職加薪沒有信心，每次她問主管他們這個級別的薪水應該是多少，他們的回答都很模糊：「看情況。」她得不到具體的數字，所以也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應該定在哪裡，她似乎註定得重演家族命運，無法擺脫低工資了。她幾乎不認識她父親，也不記得他做什麼工作；她母親替人打掃房子，領取社會救助金度日。她有兩名兄弟遭槍擊死亡，一個是因為在酒吧裡打架，另一個則在車子裡被擊斃。第三個兄弟因為竊盜入獄，第四個是卡車司機，第五個則在退休安養中心當維修工。她有一個姐妹在工廠工作，另一個在酒吧，第三個在照顧孫子。黛博拉的女兒稍有進展，從銀行櫃檯出納員成了一名推銷業務，不過黛博拉最高興的是她沒有懷孕。「我運氣不錯。大概因為我很常對她說教吧，」黛博拉說：「我的確逃過了早早當外婆的命運。」

黛博拉的現金流動貧弱，比起她的花費來說，她幾乎沒什麼銀行存款。麵包廠的工資會直接存到戶頭裡去，不過一入帳就花掉了。「每周我的戶頭裡大概有八美元。」她說道：「但提款機不能領十美元以下的錢，所以如果我有五美元，我是拿不到那五塊錢的。」如果她臨櫃領錢，銀行會收三美元的費用。某年一月她的心情很差，因為她得付十五美元的費用，於是她去街上的發薪日貸款那裡先借一百美元，期限兩周。

麵包廠裡的其他工人都陷在憂愁之中，那裡沒有任何事物能夠鼓舞她。她剛開始工作的時候，那裡的員工一個接一個地警告她，「妳不會想在這裡工作的。」她甚至從一名副主管那裡聽到警告，這人以前是她的高中同學。

「黛博拉，我知道妳不會想在這裡工作的。」她記得她的同學這麼說。

「你在這裡做多久了？」黛博拉問道。

「我在這裡做十二年了。」她朋友回答。

「我什麼話也沒說。」黛博拉告訴我，「但是我在心裡嘀咕『那你在這裡待這麼久幹嘛？』」

隨著千禧年的到來，美國的富裕逐漸到達巔峰，國家沉溺於奢侈當中，處處充斥科技產品，用過即丟的行為橫行全球，所有的東西都變大了：房子、車子、投資組合、預期壽命，人類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多人過著如此安適的生活。

但卡洛琳·佩恩不是那其中之一。新年過後幾周，她坐在餐桌旁回想自己的過去。她的三個目標有兩個已經達成了：她得到了大學文憑，儘管那只是兩年制的副學士學位；她也從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搬進了自己的房子裡，雖然這間房子大部分是銀行所有的，第三個目標是她所說的「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而這難倒她了。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她在佛蒙特州一個製造塑膠打火機和吉列刮鬍刀盒的工廠裡工作，每小時賺六美元；二〇〇〇年，她在新罕布夏州一家大型沃爾瑪超市裡做上架和收銀的工作，每小時賺六點八美元。

「這很可悲。」她宣稱，「我前幾天還在想，我賺的錢才比二十年前多八十分而已。」或者更少——如果把逐年變高的生活費用考慮進去的話，她賺的相當於三點七美元——而且她還不知道接下來會變得更可悲。

卡洛琳的遭遇是繁榮美國中被遺忘的故事，世紀之交的經濟發展就這麼漠不關心她與她擦身而過，她被遺忘的原因並不明確，但是卻在不知不覺中越演越烈。她不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她是白

人，也不懶惰——還會挖苦那些真正懶惰的同事和親戚。她很守時，很少請病假，願意輪夜班，工作兢兢業業。沃爾瑪超市的經理馬克·布朗說她是個「好女人」，幹勁十足。「她能自我激勵，」他觀察道：「她總是願意學習，讓自己變得更好；她有潛力，她一定能夠往上爬。」

但是她沒有往上爬，從來就沒有。長久以來，無法升職已經不再令她驚訝，即使她換了一份又一份的工作。反倒是馬克·布朗的讚許令她吃驚。「我很驚訝，」我把他的話轉述給她聽時，她這麼說。當時她正在把空白的錄影帶擺上架子，「我沒想過這裡有人會喜歡我，大家通常不會說我的好話。」

在這條沒有盡頭的軌道上，許多美國人放棄了夢想。他們陷了下去，重新靠社會救助金過日子，或者不再想像自己能夠當上領班，成為部門主管或辦公室經理。卡洛琳五十歲了，失望了這麼多年，有時候感到絕望似乎也很合理。她偶爾會去接受憂鬱症治療，還曾經試圖以吞服大量的阿斯匹靈自殺。她還是不停的努力，她的電子郵件自稱是「幸運女郎」，她在答錄機上的留言是「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她對於企業利潤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看法，對於社會不公也沒什麼黑暗的評斷，她只是想享有基本的財務安全；但是她的鏗而不捨是如此的不協調，像是走調的旋律，伴隨著停滯不前的單調工作內容。她一次又一次地申請這個或那個銷售部門的管理工作，卻也一次次地被略過，因為男性比較吃香——又或者像她的觀察指出，比她年輕苗條的女人比較吃香。

「抱歉我講話比較直，但我忙得連屁都沒時間放。」她尖銳地說著。「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工作，但是他們不在乎這個。」她值夜班每小時多一美元，這根本不值得她犧牲自己的彈性時間，讓店裡能二十四小時營業。為了能出人頭地，她總是願意換班跟代班，就算是晚上得讓她十四歲大的女兒

安柏獨自在家也行。卡洛琳沒有車，上下班都得走二十分鐘的路，來回奔波，不論晝夜、晴雨無阻。某個寒冷的二月天裡，她小心翼翼地走在結冰的路上，免得背傷復發。她從家裡跋涉出發，和平常一樣在早上十點到了店裡，卻被告知下午一點再來輪班。所以她又走回家，然後再回到店裡：三趟路花了一小時，才賺到當天的第一毛錢；但她心甘情願——即使店裡雇用了一個她認識的男人，工資還比她高。「他晚上在電子產品部門工作，但是你去那裡看看，他就閒閒地站在那邊看電視，做他自己的事情。」她帶點抱怨地說道：「他不會讓自己忙碌，就算他什麼都不做，他們也不會說什麼。我投訴過，但他們叫我管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她也比不過那些苗條的女人，襄理會跟她們打情罵俏。「你會發現有很多年輕女孩得到這些職位。」卡洛琳宣稱，「我看起來年紀太大了，還有人以為我是安柏的祖母。我過得太苦了。」

那些升職的人有卡洛琳沒有的東西，他們有牙齒，卡洛琳沒有。如果她有牙齒的話，就不會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了十歲。但是她的牙齒敗給了貧窮，敗給了那些她沒錢看牙醫的日子，絕大部分都蛀掉，膿腫發炎了。住在佛羅里達州領社會救助金的時候，她把牙齒全拔光了。折磨人的療程歷時兩個小時，她看起來鼻青臉腫，像被揍了一頓。按照她的理解，醫療補助規定只有在她一顆牙齒都沒有的情況下，才會補助她一副假牙；雖然還有幾顆牙齒能用，但她卻沒辦法負擔全口拔牙以外的治療費用。到最後，很不幸地，醫療補助買來的假牙不合她的嘴型，所以她也沒辦法戴上那副假牙。而調整假牙需要兩百五十美元，她拿不出這筆錢。

沒有雇主會承認，她遭到忽視是因為她少了光芒四射、滿口貝齒的笑容。美國人從小就被教導笑容跟投票權同等重要，卡洛琳也學會了讓整張臉堆滿笑容，學會擺出甜美而又不露出牙齦的表情，

但是那卻給人一種惆悵的感覺，跟美國文化要求的那種熱力四射的友善喜悅還有一段距離。露齒是工作內容中不成文的一部分，而她並不擅長。克萊蒙特儲蓄銀行拒絕讓她擔任銀行櫃台出納員，他們後來雇用她做些文件歸檔的工作，最後又開除了她。沃爾瑪超市考慮過讓她擔任客服經理，最後又升了別人，別的有牙齒的人。

卡洛琳是窮忙族的代表，貧困導致的缺陷在他們身上留下標記，比大部分的殘疾都更明顯，而兩者其實沒有差別。跟那些不那麼明顯的缺陷一樣，這都反映出他們的貧窮，讓赤貧的生活狀況雪上加霜。如果她沒那麼窮，她就不會失去牙齒，如果她沒失去牙齒；也許她就不會一直這麼窮。貧窮是種奇怪、在暗中危害人的東西：原因導致許多後果，而後果又反過來加強原因；或者是後果的成因就是後果本身所造成的，就看你從哪裡開始分析這個循環。就像大部分被遺忘的美國人一樣，卡洛琳本身就是是一大串事情的原因和後果。

憂鬱症經常伴隨貧窮而來，一陣陣令人麻痺的自我忽視折磨著卡洛琳。布蘭達是這些年來幫助卡洛琳的個案社工兼家訪員，據她說：「很多時候，即使她需要，但她都沒有用止汗體香劑。她也不洗澡，頭髮一團亂。」布蘭達還說道：「她的菸癮很重，有時候衣服上面都是煙味。」在五年來的採訪之中，我從來沒有見過卡洛琳這副模樣。不過布蘭達的出身跟她的服務對象一樣，很容易就能融入他們的生活。布蘭達並非出身富裕，也不是有碩士學位的專業人士，她只有高中文憑和勞工階級的背景。她並非紆尊降貴，但她確實帶有指責之意；不過她夠有感情，讓那些她想幫助的人覺得溫暖。對於卡洛琳，她是了解多於責怪。「人要是憂鬱症，」布蘭達觀察道：「就提不起勁來。」

就像許多身陷低潮的勞工一樣，卡洛琳是許多因素的受害者：她的外表固然有問題，但是還有種種沉重的負擔來自童年、婚姻，還有學習上的障礙，包括閱讀和書寫困難。她所有的缺陷中都有自由市場的不公與無情相互交織的身影。有時候，個人必須面對的試煉讓她心神不寧，無法專心工作，因此儘管這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向前猛衝，她卻困在落後的渦流當中，工資停滯、眼界受限。繁榮之後到來的經濟衰退，對她的卑微地位沒有造成什麼改變，她繼續在外邊移動，換著不起眼的工作，從商店到工廠再到商店，她的生活模式是全國各地低收入單親父母的寫照，這群人的就業率跟時薪，在經濟衰退時期幾乎沒有改變。^[2]

卡洛琳的父親曾經當過學校工友，她母親則是偶爾在工廠做臨時工。「我們沒能得到小孩子需要的愛跟安全感。」她回憶道。物質上也不寬裕，「我小時候擁有的東西一直不多。」早年的匱乏已經過了這麼久，她還是這麼窮。「我總是想要得到各種東西，」她承認，「有時候我會花太多錢，做得太過火。」就算快五十歲了，她還是像個青少年一樣，渴望即時的滿足感。布蘭達說，她和卡洛琳一起安排預算，想要控制她的開銷。「她喜歡她的信用卡。」布蘭達說：「她說這些東西都是她應得的，說她努力工作，想在死前擁有些好東西，這是當然的了。」布蘭達補充：「我來自一個八口之家，所以知道只能買必需品，食物最重要，房租第二，還有電燈跟暖氣。」

卡洛琳買了房子之後，布蘭達看到她變得成熟了，不過要打破童年開始養成的模式很難，過去積欠的債務也不會輕易消失。卡洛琳的家人連連搬家，她的教育一直被中斷，她的一、二年級是在新罕布夏州梅里登一個只有四間房間的校舍裡唸的，接著因為閱讀障礙，又重讀了二年級。「我讀東西很慢。」她坦承道：「我得靜靜地一個字接一個字地讀，這讓我覺得很難為情。」她不記得她的母親或父親有唸過書給她聽，「對我們小孩來說，她不像真正的母親。」三年級的時候，她跟家人住在麻薩

諸塞州萊明斯特市中心一家鞋店的樓上，警報聲加上汽車成天轟隆隆，沒有地方可以玩耍，隔年他們搬到新罕布夏州基恩的一個拖車停車場，她在那裡度過四年級到六年級。

六年級時的某天，她從操場上走回家，聽到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她妹妹有個朋友以同情的語氣說，聽到卡洛琳的爸爸要離開，她覺得很難過，而卡洛琳對此完全不知情。「接著我一路跑回家。」她回憶道：「我記得我打開拖車的門，就這麼看著他，接著我跑上拖車的二樓，一直哭個不停。」不信任的種子就這麼播下了。

「在那個家裡，完全沒有溝通。後來爸爸上樓來，想跟我說話，想把事情跟我說，他說他很驚訝我會這麼困擾，因為我以前總是像是個男生一樣。但是我想，我心裡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快樂過，我總是帶著微笑是為了要讓別人認為我很快樂，儘管事實上根本沒有。」

從那時候起，她在大學時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她覺得自己只不過是「一件被推來推去的家具」。無根的飄零讓她的友誼總是不長久，她在七、八年級時回到梅里登，跟姑姑住在一起，兄弟姐妹則寄養在其他的家庭，她的母親再婚了。「我的繼父喝很多酒。」她說道：「他對我毛手毛腳的，我很害怕，從來都沒跟我媽講過。到最後，我打了他。」

後來因為卡洛琳不想跟繼父住在一起，她高中的每一年都在不同的地方度過。第一年，她住在罕布夏州萊巴嫩那裡的一個女人家裡，替她帶小孩；第二年大部分的時間她回到基恩，跟她父親住在一起；第三年先是在佛蒙特州的胡士托；第四年在麻塞諸薩州的諾斯菲爾德。她在那裡畢業了，為此她很自豪。「我是家裡三個小孩中唯一高中有畢業的，」她誇口道：「我弟弟最後去服兵役了，我妹妹十五歲就結婚了。不是我吹牛，但是我覺得自己很棒，因為我爸媽也沒有高中畢業。我多花了一年時間，因為我第二年又重讀。」

一九六九年，畢業典禮後兩個月，卡洛琳結婚了。「有時候我會希望自己沒有結婚，」她表明，「當時我很年輕，我想是因為我需要安全感，所以才認為自己很愛那個男人，確信結婚就一定行得通。我有很強烈的傳統觀念，而且很容易依賴對方，因為我缺乏愛跟安全感，還有溝通之類的能力，如果有個傢伙對我有意思，我就會立刻抓住第一個出現的人。這樣不好，這些年來我學到了，這真的不行。」

這段婚姻帶來三個孩子，維持了十四年，最後陷在懷疑先生不忠的沼澤裡。她在工廠上夜班，讓他唸完工程學校；她照顧孩子跟他們養的寵物，最後卻抓到他整夜跟其他女人在外面鬼混。這段關係受到不信任的侵蝕，終究瓦解了。

因為她請不起律師，只想擺脫這場婚姻，最後她只拿到每個月四百美元的扶養費，房子沒她的份。「那是個好地方，是我們一手建造的小木屋。」她難過地說著。「那時候我在懷孕中，我們還蓋了自己的橋。我一直想要一座有遮蔽的木橋，但從來沒蓋起來，當時我已經繳不出稅和那些錢了。」她沉浸在回憶裡，靜靜地啜泣起來。

卡洛琳既驕傲又愚蠢地拒絕了前夫父母親的提議，他們想在他們的土地上，替她跟孩子擺一台拖車。卡洛琳覺得照顧她不是他們的責任，所以她找了一間小公寓，在社會救助金跟前途無光的工作之間反反覆覆，還撿空罐來補貼收入。「我們去學校看球賽時，我就拿袋子去，把袋子塞在我的錢包裡面。」她回憶道：「球賽結束之後，我就四處走走，仔細從丟掉的罐子裡找出值五分錢的。」她的大女兒會騎腳踏車跑得遠遠的，免得讓人發現她們有關係。「我認為那幾分錢可以買牛奶麵包，對我們

的生活有幫助，但是她覺得丟臉，越長大越討厭。」

孤單害怕的卡洛琳再婚了，這一次更糟糕。維農·佩恩侮辱她、揍她，動不動就暴怒、妒火中燒——只要他看到她在工作的老人安養院外跟年輕男人講話，而那個「男人」，其實是一個短髮的女人。這段婚姻維持了兩年。「有時候我真恨男人，」她說：「男人不好，只會說謊，你別跟我說他們之間有什麼差別。」少數幾次去投票，她只投給女人，藉此表達她的立場。

不過她還是很渴望生活中能有個男人，因此再度重覆原來的模式。這在單親媽媽身上很常見，她們身上都帶著男人造成的創傷。經濟能力有限的女性渴望充滿愛的伴侶關係，但是卻無法創造出這樣的關係，這在貧窮階級當中很普遍，因為她們不只是單親媽媽，還是家中唯一賺錢的人。

安柏是卡洛琳的第四個孩子，在她困難重重的第二段婚姻中誕生。除了一隻腳患有馬蹄內翻足以外，這名個頭嬌小的黑髮女孩似乎很健康。只不過麻煩的蛛絲馬跡慢慢顯露出來。她很晚才學會走路，跟卡洛琳其他的孩子比起來，也比較晚學會使用馬桶。她母親覺得這只不過是孩子之間的正常差異。「她會看電視，記得很多她看過的东西。」卡洛琳回想道。接著學前教育方案中的測驗，發現安柏有些學習遲緩。

她離婚以後，安柏每隔兩周的周末跟她父親維農在一起，還有暑假有一、兩周也是。有一次她回來的時候，手指上有燒傷，而且有人向佛蒙特州的兒童保護服務局投訴。「他們直接到我工作的地方，把我帶到一個房間裡，威脅說他們要把安柏帶走，甚至不會等我下班回家。」卡洛琳說道。後來事實證明，當局判錯罪也抓錯人了，但因為一直有人匿名舉報，所以他們還是有疑慮。卡洛琳懷疑是自己的母親幹的。「她會在背後捅你一刀，」卡洛琳是這樣說的。「就算我只是抓住安柏，像這樣抓

住她的手臂，她都會說：『哎唷，不要傷到那個孩子呀！』」州政府追查此事，卡洛琳發現自己得爭取女兒，「我得上法院，得去上家長教養課程才能保住安柏。」

家裡的風波很少能不影響到工作，員工若是身懷絕技或位高權重，價值足夠，公司能忍受一段難熬的時間，但是卡洛琳的資本少得可憐，她沒辦法要雇主對她個人的苦難付出耐心。她的家庭生活壓力重重，職場生活也變得岌岌可危，那意味著表現不佳、沒有進步，在短暫的工作之間換來換去，無法累積資歷。

「整個人神經緊繃，壓力很大，不知道別人下一秒要丟什麼事情給你。」她說道。即使是在工廠裡上大夜班，她也會哭個不停。「這樣人家就知道事情不對勁了。」

在掙扎之中，卡洛琳想辦法去上了辦公室技能訓練課程，不再領取社會救助金，找了一份體面的工作，擔任一家保險公司的櫃台總機小姐（當時她還有牙齒）。她接電話、分類郵件，繕打保險政策的初稿。「那是很不錯的經驗，」她說道。原本可以就這麼繼續做下去的，但來自安柏的壓力危及了她的工作。「他們警告我，說我做不好，」她說道：「我覺得這些問題讓我很沮喪。」她顯然快被開除了，所以她辭職了——她的說法是「了結這份工作」。

她繼續尋找好的文書工作，一個個去應徵，卻全都石沉大海。她一次次打電話去問原因，人家告訴她其他應徵者有大學學歷，所以她決定要取得大學學歷，註冊了佛蒙特州的強森州立大學（Johnson State College）。她取得助學貸款，開始就讀商務與會計課程。

接著她注意到快五歲大的安柏在手淫。「小孩子反正都會實驗看看，但是她做得太過頭了，越來越明顯。」卡洛琳說道：「我幫她洗澡時，她會摸自己。有這些小徵兆，但是很難證明什麼，因為她

還不夠大，沒辦法明確告訴我，這會變成我講我的，他們講他們的。不過我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通常跟她父親還有父親的現任太太過完周末以後，「她會很快跑向我。我會說：『親一下爸爸。』她就有點向後退的樣子。」

所以某天她父親帶她回來的時候，卡洛琳把她帶進浴室。「我注意到她全身通紅，這可不對勁。」卡洛琳擔心起來，她要一個在大學裡的朋友蒂納單獨跟安柏聊聊，看她能不能發現什麼。「蒂納說：『妳不會相信她告訴我的事情。』」她們把小女孩帶去醫院，醫生證實了她已非處女，他們報了警，也找來負責卡洛琳個案的社工。蒂納和社工詢問安柏，卡洛琳跟一名警官從一面單向鏡後面看著、聽她們講話，小女孩重複了她告訴蒂納的話。維農·佩恩被下達禁制令，為了逃離這一切，卡洛琳跟安柏搬去佛羅里達州，自由自在的地過了幾年。卡洛琳因此中斷了學業，安柏也是。

將近十年之後，有天卡洛琳告訴安柏，她的父親已經死了。這名十四歲的女孩突然如釋重負地說：「好，很好。」

安柏的「遲緩」在佛羅里達州變得更加明顯，就讀一年級時，進一步的測試顯示她的智商是五十九，屬於輕度心智障礙的低能範圍，這種殘缺在低收入戶中格外普遍，但是她卻沒有受到持續的特殊教育，沒能得到幫助，因為卡洛琳重演了她父母的漂泊不定，四處為家：小公寓、跟女性朋友共住拖車、自己的骯髒拖車、跟男性朋友同住、又一輛拖車——全都位於佛羅里達州的新里奇港——然後搬去溫特黑文的某個表親家裡，再搬回新里奇港。三年之內，安柏唸了三、四間不同的學校；接著卡洛琳北上到新罕布夏州，在不同學區之間搬了幾次。總之，據她估計，安柏唸過七到八間學校。「她大概就像個小碎布娃娃，被人帶過來帶過去。」負責她個案的社工布蘭達說，她逼著卡洛琳安頓下來，

克制想要搬家的衝動。布蘭達告訴她，不這麼做的話，老師跟諮商師就沒辦法好好了解安柏，不能提供有效的幫助。這番說詞在擁有房子之後打動了卡洛琳，直到不幸和不測再度打擊她們。「她對安柏很好。」布蘭達當時說道：「我幫助過很多家庭，有時候我希望能有另一個卡洛琳。」

沒有明確的證據顯示，穩定的教育對這個女孩能有多大的幫助，她的中學校長說她的狀況是「語言導致的學習障礙」，她幾乎無法讀寫，沒辦法輕鬆地用手算出時鐘上的時間，也不能理解如果拿十美元給商店老闆買四美元的東西，能夠找回多少錢。不過，如果她母親幫她把每個音符都標上字母的話，她就能夠吹長笛。她也會去舞蹈學校上體操課，卡洛琳用每周打掃學校的練習室來抵學費。舉個例子，安柏能清楚地描述學校去蒙特婁的旅行，聽她講話，你不會懷疑她有心智障礙。她貼心有禮，在家裡熱心地幫媽媽做家事，也能自己用微波爐煮飯。但她患有癲癇，可能會突然發作，因此醫生建議不要讓她獨自待在家裡。在時常換班的工作中，安排照顧安柏的調度迷宮常會令卡洛琳糾結且焦慮。社會保險提供安柏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那是一筆按月發放的殘障給付，但是這沒辦法讓卡洛琳負擔那些富裕父母能找的昂貴家教和療程，卡洛琳也沒有相關的技巧和知識，不能像校方所敦促的，在家裡多多幫忙孩子。「他們直接來找我，在某次會議中跟我說，教我女兒閱讀是我的工作。」卡洛琳抱怨道。「我說：『等一下，我是個單親媽媽，我把女兒扶養長大……我做好了我的工作……我的稅都有繳清，你們也要做好你們的工作。』他們擺臭臉給我看，什麼話都沒有說。」

她的個案社工布蘭達也同樣碰壁。「我跟卡洛琳說過：『晚上的時候，請坐下來唸書給妳女兒聽，就算只有十分鐘或十五分鐘也好。』」她會說：『那不是我的工作，那是學校老師的工作。』」所以安柏只在資金微薄的克萊蒙特公立學校上過幾堂特教課程。該市的財政吃緊，但有幾個社區

在新罕布夏州的最高法院上大獲全勝，為貧困學區贏得了州政府補助，不過，法院的判決並沒能有效執行，克萊蒙特在新罕布夏州兩百五十九個自治區之中，每人平均所得排行第兩百三十六名，這個區域的教師薪資仍舊嚴重過低。安柏覺得自己停滯不前，為此非常沮喪。尤其是在她進入高中之後，被分配到職業技能部，教的是烹飪、開支票和其他獨立生活的基本技能——但是鮮少，甚至不教閱讀。

她的能力是否會因為花錢受訓練就得以拓展，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難道富有的生活對安柏會有什麼不同嗎？小兒科醫生史蒂芬·布萊爾從她九歲起就開始為她治療，他沉吟了好一會兒，思考著他的答案，「差別很小，」最後他說：「沒有實質上的差異。」另一方面，心智障礙專家通常都主張要「替孩子提供個別化的治療和教育服務，而且家庭必須配合給予支持。」傑克·修恩科夫 (Jack Shonkoff) 在基礎小兒科教科書裡如是說，「這類服務要發揮最佳效果，就必須著重在把家庭視為一個動態系統，注重孩子與家庭相互依存，並且與生活環境相互影響。」^[3]在卡洛琳的案例中，這種建議的實際程度，差不多等於建議她們去巴黎度假。

為了和安柏一起逃離佛蒙特州，卡洛琳必須中斷學業。之後她在佛羅里達州的韋伯斯特學院 (Webster College) 繼續讀辦公室科技與資訊處理，兩年後完成了副學士學位，同時也欠下了一萬七千美元的助學貸款，而拖欠還款則累積到兩萬美元。有別於一般認為教育是項好投資，卡洛琳的學位成了龐大的金錢浪費。她從來沒找到過相關領域的工作，也從來沒做過需要高中以上學歷的工作。當然如果她有大學學歷會有點幫助，但事實證明，副學士學位沒用，它只是一紙證書而已。

從佛羅里達州搬回北方的新罕布夏州之後，她跟姑姑一起住了兩個星期，後來申請社會救助金，

跟荒謬的政府機構起了典型的衝突。公務員告訴她，獲得社會救助金和住宅補貼的最好方法，就是搬到收容中心去，於是她照辦了。這使得她的案子成為急件，三周之內，她就以比住在美國大城市快上一百倍的速度擁有了一張第八類房屋條款補助券，能夠支付私人出租公寓的租金。接著她開始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屋。

一周七天，她做兩份兼職工作——一份在店裡的時薪是五點二五美元，另一份時薪四塊多，在當地麋鹿忠誠會 (Loyal Order of Moose) 的旅館接聽電話，做一些雜務，她同時也是該會的會員。兩年之內，卡洛琳付清了積欠的帳單，她開始能認真考慮買房子了。

當時的她已經湊齊了某些基本特質，開啟了通往貸款的大門 (儘管她沒有意識到)：包括勤奮工作的紀錄、跟有影響力的人士往來——這些都是無形的效益。此外，她每個月還有一張收入穩定的支票，是安柏的社會保險金。很少有低薪勞工不用靠別人幫忙，自己就能從政府那裡取得穩定的收入。卡洛琳的貴人就是店裡的老闆，同時也是一名房地產仲介，剛好跟糖河儲蓄銀行的總經理是好朋友。這位銀行家跟卡洛琳碰了面，對她印象深刻。「她看起來像是那種就算餓肚子也要付清帳單的女人。」他這樣告訴卡洛琳的老闆。不過不全然是如此，她還得處理兩、三筆帳單，才能洗刷她的信用紀錄。因此她花了一年來處理，而她想要的那間房子也還沒有售出，房子還降價了，最後銀行批准了她的貸款。

安柏的社會保險每個月有五百一十四美元，直接匯入糖河儲蓄銀行，分期付款會從那裡自動扣款，這沒什麼不好 (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在安柏的父親死後，增加到七百三十六美元)。卡洛琳的推斷是，這筆錢用來支付貸款是合法的，因為安柏終究會繼承這棟房子——這個假設最後因為這個家庭

的貧窮而破滅了。而且可怕的實情是，如果安柏沒有殘疾，可能就拿不到這筆貸款了。

這間舒適的灰色隔板屋興建於一八九一年，跟其他房子一起座落在冰冷的街道上。房屋馬上就要進行修繕了，聯邦政府有項計畫，幫忙更換牆板、重修粉刷邊框、移除屋內的含鉛塗料——這一點證明了卡洛琳爭取政府補助的技巧不凡。那些窗戶現在被釘在窗框上的塑膠布隔了開來，側門上掛著「聖誕快樂」的旗幟。如果在不同地區的不同地點，這棟房子會被認為既古樸又具吸引力，應該值很多錢，但是位在新英格蘭某市鎮中心附近的悲涼老舊社區中，只顯示了它的落後。一九九七年卡洛琳找到這棟房子的時候，它只值三萬七千美元，她用所得稅的一千美元退稅支付了過戶費用，跟糖河儲蓄銀行一起成為房屋的所有人。

滿足的感受是無價的，她驕傲地帶我們瀏覽屋內：客廳有兩張米色沙發、印花壁紙、黃色床簾、舊電視和錄放影機、貓咪澎澎戴著紅色頸圈跟鈴鐺、廚房後面有食物儲藏室和倉庫、以及她那成年的兒子獵鹿用的十字弓，地下室裡有洗衣機、乾衣機和煤油爐，樓上擺著她親手鉤的彩色阿富汗編織毯子，摺疊妥當等著聖誕節送給安柏的老師、校車司機和校長。

卡洛琳從前在成衣廠縫製衣服，時薪六美元，後來她被開除了。之後她每周在以前住過的收容中心工作幾個小時，幫人申請燃料保暖補助，冬天一過，她也失業了。所以她去丹碧絲棉條工廠 (Tambards) 工作，時薪六點五美元，每次都要坐上好幾個小時。她的腿開始劇痛，最後不得不去急診室報到，原來疼痛是她的背引起的。「所以醫生說：『妳要休息一晚，盡量休息，腳掌不要動，腿也不要動。』」她打電話去隸屬於寶僑公司 (Procter & Gamble) 的丹碧絲工廠，告訴他們她星期天沒辦法去上班，因為她背痛，結果星期一早上電話就響了：她不用再去上班了。於是她又回到成衣廠，

後來又被開除過兩、三次。在貧窮邊緣工作，意味著面對美國企業最冷酷的一面。

克萊蒙特儲蓄銀行拒絕讓她申請櫃台出納員的職位，不過打電話邀她去做文件歸檔的工作。她一周工作二十五個小時，時薪七美元，以後有機會升到十或十一美元，幸運的是，這份工作沒那麼吃力，因為她或坐或站皆可，主要的工作是四處走動，把文件盒裡已兌現的支票拿到一個開放式的大抽屜裡，裡面有已經分類完畢的客戶帳戶，每個帳戶都有一張簽名印鑑卡，卡洛琳與其他做同樣工作的人，就負責確認每張支票上的簽名，然後把支票歸檔。

她喜歡這個工作，從她家到銀行只要走一小段路。她買了合適的衣服，願意學習其他工作，她的戶頭裡有二點零二美元。她母親快死了，她與母親之間互相折磨的關係就要結束了——當然，永遠不會真的結束，只會冰封起來，潛藏在多年來產生的某些情緒之中。母親死後，卡洛琳不知不覺地陷入憂鬱之中，她去諮商的時候聽到憂鬱症的診斷。「我沒發現我有憂鬱症，我根本不知道好嗎？」

銀行的人開始注意到有錯誤。「平均來說，一年會接到客戶的電話約三、四次，說他們收到錯誤的支票。」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銀行職員說：「但是那時在八周之內，我們就接到三、四通電話。我們開始觀察，找人員複查，把問題獨立出來，找出錯誤的來源。」

卡洛琳被叫去談話。「他們說我學得不夠快。」她承認她也許犯了錯，但是也有其他人負責文件歸檔，她指出，「我受到指責，但是我覺得不能都怪我，你知道我的意思嗎？當時我還在處理我媽進進出出醫院的事情，他們說她快不行了，但是又不知道會是什麼時候。」

那名銀行職員堅持支票要搞混很難，因為支票的顏色不一樣。職員猜測也許卡洛琳恍神了。「她很難學會我們要她做的事情，還有其他要她學習的工作，但是我們沒辦法一直只讓她做那些，我們還

需要她蒐集要寄給客戶的帳單，研究其中的錯誤……她甚至連微縮攝影都不會；以系統化的方法拍攝、微縮攝影然後歸檔，她學做這些真的有困難，所以我們不讓她做這些。她只負責歸檔，但是做的也不好……她完全不能接受她會犯錯的事實。老實說，我很驚訝她做不來，因為我以為她可以的。不過說句公道話，雖然大家都對新人關懷備至，但她來的時候前人才剛走，我想每個人都累了，沒有精力花時間帶她。」八周後，卡洛琳被開除了。

她的背痛得要命，透過社會保險申請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她一邊找另一份工作，一邊等政府通過，但是又擔心這樣會降低她申請的成功率，於是她又回頭領取社會救助金。等了又等，她成了典型的低收入勞工，患有背痛、申請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好幾月不工作，盼著政府批准。卡洛琳等了六個月，最後遭到拒絕，她在沃爾瑪超市找到工作。

現在她遇到另一種問題。多虧醫療補助支付脊骨神經治療師，卡洛琳的背好多了，但是接著她被福利法規狠狠的教訓了一頓，「我剛發現我已經沒有醫療保險了。」某天她絕望地說道。她生病了，看了醫生、開了處方，然後去藥局拿藥，才發現她的醫療補助已經過期，因為她有了工作（安柏還有，因為她是殘障人士）。「我不知道這回事，」卡洛琳宣稱。她必須支付十一美元的藥費，還得取消隔天的眼科檢查預約。更緊急的是，「現在我得停止去看脊骨神經治療師，」她說：「這就是為什麼我持續工作，因為我現在付不起了，我已經欠他一百五十美元了。」

沃爾瑪超市提供健康保險，但是她覺得保險費太貴了，此外她也負擔不起兩百五十美元的年度扣除額，因此她成了四千五百萬沒有保險的美國人之一。這其中有許多低薪勞工，放棄了雇主提供的保險，他們做了短期的打算，讓每周的薪水看起來多一點，但是卻沒有考慮到大筆醫療帳單的長期花費。這是一場賭博，而卡洛琳還算幸運，接下來的這一年，她的背痛緩和許多，讓她能夠繼續工作。她隨波逐流，沒有保險，從不定期檢查，也沒有生重病。

沿著一〇三號公路繞沃爾瑪超市外圍一圈，得走上一英里。卡洛琳說道。這個地方很大，什麼都賣，從除草機到牛絞肉都有，價格遠低於市中心那些苟延殘喘的小型商店。有三百到三百三十名季節性流動的員工，穿著沃爾瑪的藍色制服，帶著友善的微笑，受訓要為客戶提供令人驚豔的服務。

經理馬克·布朗承認，他們不用提高商品的價格，也能幫員工調漲一點工資。他坐在店裡點心吧的桌子旁，看著目光所及的貨品區，聽著廣播系統找人去櫃台幫忙，雙眼快速掃過他所負責的領地，就像個等著下一場災難發生的校長。他三十一歲，但是看起來就像是個年輕的大學生，說話帶著密蘇里東南部的鼻音。他是從喬治亞州另一家店調過來的，正在新罕布夏州這裡學滑雪。

他的員工起薪是每小時六點二五美元，夜班多一美元。如果「到前方去」，也就是負責二十四小時收銀櫃台，會再多二十五分錢。如果他把起薪改成一小時八美元，而非六點二五美元，那會對店裡的經濟情況造成什麼改變？「唔，我覺得應該不會有任何改變。」他不用提高商品的價格嗎？「不用，我們有企業定價規定。我們的營運方式是每個星期都出去考察競爭對手，本店每個部門的經理每周都會出去一次，看看對手，據此決定價格。我們有核心價格架構，根據地區來制定，這裡的定價很可能比阿肯色州的定價高，因為那邊的物價比較低。但雖然這裡的定價高，不過仍然在這一區的標準值內。他們把定價告訴我們，然後我們出去查看競爭對手的狀況，如果我們被打敗了，我們就會降價。」

所以利潤其實是夠的，能夠負擔得了從六點二五美元增加到八美元的時薪吧？「應該可以，因為如果我們提高工資，那其他商店一定也得跟進；如果我們確保我們的商品價格夠低，對手的客戶就會

來我們這裡消費。」加薪究竟會造成什麼影響？「我們就得節約開銷，比如不能在店裡掛滿漂亮的氣球，非必需品都要拿掉。」

三天後，沃爾瑪超市宣布一九九九年的淨利為五十五億八千萬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

卡洛琳從一個部門換到另一個部門，一次又一次地換班，但是她的薪資始終停留在一個狹窄的範圍內，從起薪六點二五美元，升到六點八美元，上夜班的話有時候會到七點五美元。她的工時非常不固定，沒辦法再兼第二份工作，不然她就能多點現金花用。她一直在申請更高的職位，但也一直聽到別人說，她的經驗還不夠多。

「我當選了十一月份最佳收銀員。」她興高采烈地告訴我，「我在華盛頓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老兵紀念碑募款的活動中，籌措到超過一千五百美元，所以我成了當月最佳收銀員。」她也說服了跟她結帳的客戶，讓他們總共購買了七十二張波士頓棕熊隊比賽的門票來為克萊蒙特的消防隊募款。這替她贏得了百事可樂公司提供的周末之旅，她可以帶三個人一起去萬豪酒店 (Marriott) 的任一分店住一夜。「不過該怎麼去那裡呢？」她說。這是道難題，所以必須在附近、在有人願意載她去的地方，她從來沒有考慮過去夏威夷，甚至連紐約都沒想過，她只考慮新罕布夏州以內的地方。「我記得萊巴嫩城這裡就有一家。」她說：「安柏喜歡逛購物中心，我也從來沒有去過曼徹斯特，如果我可以找人帶我去，就去看一看。」最後卡洛琳、安柏、卡洛琳的朋友跟朋友的小孩一起開車北上，住在新罕布夏州伯利恆市的旅館裡，去了北康威一家小型購物中心。

「我買了這個。」安柏說：「這是一個燈，是那種會繞圈圈的兔子燈。我還買了一件運動服，帶著去旅行。」

「我的外套已經穿了兩年，邊邊都破了。」卡洛琳說：「我在購物中心的某間店裡替自己買了這件冬天的外套，原價要一百美元的外套耶，現在降價到七十九點九九，還有大特價，所以我只用三十一點九九就買到了，還不錯。」

沃爾瑪超市的人員流動率很高，馬克·布朗不想講明到底有多高，但是他很清楚景氣好的時候為什麼會這樣。「主要原因就是景氣不錯。你可以去鎮上任何地方看看，或是出了市區也一樣，都可以看到『徵才中』的廣告。我的意思是，如果員工沒有被妥善對待，他們只要從大門走出去就行了，這很競爭啊，非常競爭。」所以沃爾瑪超市試圖挽留員工，做法是分出一部分公司的利潤給他們，百分之八十用股票，剩下的用現金，撥入到職一年後公司開立的帳戶，七年後就可以全部領回。

不過這誘惑不了卡洛琳，她已經借了一萬九千美元的二胎房貸，用來更換屋頂跟門窗，她現在就需要錢。「看看他們是怎麼安排我的上班時間，」她說：「有時候是十點到七點，有時候是九點到四點，有時候是七點到四點，有時候你晚上會工作到很晚。你永遠不會休同樣的兩天，像我上週日本來應該休假，因為安柏有演奏會，我要求休假，結果呢，晚上回家後電話裡有則留言：『妳可不可以來支援一下？』我就去了。那可是加班，我從來沒有拒絕過他們，但是他們為什麼就不能行行好，多給我一點錢呢？」

景氣好的時候，這就是這家店對待「同事」的方式；在營運狀況比較不好的地區或是經濟蕭條的時候，沃爾瑪有些經理遭到指控，說他們強迫員工在打卡前或是打卡後工作，以避免支付法律要求的加班費。「沃爾瑪的管理階層並不正直誠實，卻期望低薪員工能夠做到。」芭芭拉·艾倫瑞克

(Barbara Ehrenreich) 寫道，她在明尼蘇達州一家沃爾瑪超市工作過，進行《我在底層的生活》(Nickel and Dime) 一書所需的研究。「二〇〇〇年春天，我申請沃爾瑪超市的工作，因為在測驗中犯了某些『錯誤』而遭到訓斥：對於『所有的規定都必須時時刻刻徹底遵守』這個項目，我勾選了『同意』，但正確答案是『完全同意』。另外，顯然在沃爾瑪，不必盲從聯邦政府的《公平勞動標準法》。法律規定如果員工一周工作超過四十小時，店家就必須支付一倍半的工資。」公司警告員工不要當「偷時間的賊」，意思就是說，「在上班時間不能做工作以外的事情，任何事情都不行。」她描述道：「偷我們的時間倒是無所謂。」^[4]

卡洛琳在新罕布夏州的店裡從來沒有遇過加班時間的問題，但是南方六個州的員工提起了集體訴訟，控告公司命令他們在工時將近四十個小時以後，轉為不計時加班。律師計算出該公司從中獲得的利益：如果單店每名「同事」一周不支薪加班一小時就好，工作時數總共就有兩百五十個小時。一個月一千小時、一年一萬兩千小時——全德州有超過三百家沃爾瑪超市，光是該州就能省下三千萬美元，這些錢原本都該付給員工的。^[5]

在卡洛琳看來，她並沒有遭受非法的對待，不過她的職業生涯毫無進展；欣賞她的經理馬克·布朗被調到賓夕法尼亞州去了，她的升遷前景黯淡，因此在沃爾瑪待了一年半以後，她跟一家短期工中介簽了約，他們替她找到一份時薪七點五美元的工作，從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白天班，負責裝訂壁紙的樣本。她高興地告訴沃爾瑪的襄理，她要跳槽去做薪水比較高的工作了。

「我只希望他們有一天會後悔。」卡洛琳說。

「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錯過了誰。」安柏補充道：「她是一個超好的媽媽，也很酷。」

一個月後，仲介慫恿卡洛琳回丹碧絲工廠工作，時薪十美元，是她領過最高的薪資。她接受了，不過有個問題：寶僑的工廠實施輪班制，這一週她清晨五點半離開家，隔天下午兩點半回到家裡；下一週她下午一點半離開家，晚上十點半回到家裡；第三週她晚上九點半離開家，早上六點半回來。姑且不論睡眠和體力的問題，還有規律生活的基本需求，他們所謂的「小夜班」嚴重破壞了卡洛琳對安柏的安排。她偶爾會把房間租給寄宿者，或是收留無家可歸的家庭，這樣安柏才不會獨自一人在家，不過這些情況總不長久，卡洛琳發現有些人很煩，蠻橫不講理或是不老實。

有一家人在她上小夜班的時候住在她家，但人卻非常難搞，她就將他們趕走了。「這些人算是無家可歸。」她說：「你也知道我為人心地善良，所以我收留了他們。他們有三個小孩，而那男人在緩刑期，好像是車禍之類的……他們一周付我一百美元，但最近兩個星期都沒給，還說要在我家過冬。我只打算讓他們待一陣子，但那些小孩把我家裡的壁紙跟其他東西都弄壞了……最重要的是，後來我才發現，他讓另一個女孩懷孕，又有了一個小嬰兒。」此外，他們領取社會救助金的支票，還有WIC營養補給計畫的食物，他又有自己的鋪地板跟地毯生意。「他們賺了很多錢，」卡洛琳憤恨不平地說著：「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有沒有申報，他們沒結婚。有人就是會這樣利用制度。逍遙法外。」

但是沒有寄宿者，就沒有人可以照顧安柏了，所以值小夜班跟大夜班的時候，她只好勉強把她獨自留在家裡。卡洛琳一邊操作機器把棉條裝進盒子裡，一邊擔心著安柏，她這麼煩惱情有可原。「我認為她不應該自己一個人在家，」安柏的小兒科醫生史蒂芬·布萊爾說道。他擔心她的癲癇和認知問題。「她很容易遇到麻煩。」他認為她可以獨自「一段時間」待在家裡，「但是我不會讓她連續好幾個小時自己一個人。」

安柏湊巧跟老師提過，天黑後自己在家有多可怕，於是老師有了警覺。「她沒辦法照顧自己。」克萊蒙特中學的校長唐納·哈特說道。「她十四歲了，我們正是擔心這一點：年輕女孩、中學生，晚上都不應該獨自在家，她會害怕有人敲門。就算是正常的十四歲孩子，我們也會有一樣的擔心。看看統計數字，孩子惹上毒品、酒精、性等麻煩事，都是放學在家的時候。」所以學校幫了什麼忙？卡洛琳過去的惡夢又再度浮現：老師威脅要舉發她疏於照顧。「如果發現疏於照顧的情形，我們有法律義務要舉報。」哈特說道：「當我們懷疑家長有疏於照顧、虐待或是類似的情形卻不舉報，就是犯法。」

二〇〇〇年十月底，總統選舉競選活動正如火如荼的時候，舉國上下都陷入政治狂熱之中，但是卡洛琳沒有。她的聲音因為憤怒和恐懼而發抖，她發狂似地想找出方法保住她的工作和女兒。著名的新罕布夏州初選早已經過去了，但卻沒給卡洛琳留下什麼印象。她沒去留意在州內大街小巷穿梭的候選人，回想起來，她甚至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去投票。「我記不得了。」她坦言，「我大概在工作吧，我不記得我有去投票。」即使現在小布希跟高爾在她客廳的電視裡激烈地爭辯，發表各種宣言和承諾，卡洛琳也沒有多餘的心思去管這兩個人的事。「我沒有認真聽過他們在講什麼，那是我現在最不關心的事情。」她說道：「他們可以說都是騙子，跟大家講他們會做這個、做那個。我不需要柯林頓，因為他跟那個女孩子胡搞，沒有做好榜樣，我覺得他老婆太笨了，還跟他在一起。」

當然，柯林頓沒有參選，也不是他要選，不過她覺得高爾應該負共同責任。「他是副總統，一定很清楚裡頭有什麼問題；他是第二順位的人，為什麼不介入做點事情，把一切搞定呢？」因為如此，她比較喜歡小布希，但顯然她不清楚他是個有錢人。「我希望是個像我一樣上進的人，經歷過這些事情，知道現在是什麼情形，但這永遠不會發生。如果要讓我投票，我會投給正直的女人。我希望有女

人當總統，不想看到有錢人在那個位子上；我想看到夠有概念的人，能幫助那些需要幫忙的人。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制度需要改一改才行，要有更多資源幫助那些想要自力更生的人。」十一月七日到來了又過去了，她沒有去投票。

面對被舉報至州立兒童保護機構的威脅，卡洛琳停掉了工作，開始下功夫打電話、瀏覽網路，想要找到人來照顧安柏。不同於美國大部分的低收入勞工，卡洛琳有一台電腦，是用西爾斯信用卡分期付款買來的，她多半是拿來打電動跟寄電子郵件，甚至是在網上找男人，不過現在這台機器成了救命任務的執行工具，她找到一家又一家機構的網站，打電話過去，卻都一無所獲：州長的殘障事務辦公室、家長互助會、社會保險部門、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門、家庭援助部門、家長資訊中心。「他們都試著要找到援助，但是似乎沒有援助可用。」她說道。她被告知安柏年紀太大，不能領取兒童照護補助；但是安柏也不能領取社會保險補助，因為她的年紀又太小了。

她真正需要的是一個月的時間，因為她認識一對住在麻薩諸塞州的年輕夫妻，他們打算搬過來工作，並住在她家裡，他們可以在傍晚跟夜裡陪著安柏。但是卡洛琳打電話給工廠老闆時，他告訴她說，他不能讓那個職位整個月都空在那裡，所以他已經要短期工仲介找別人了，他需要工人。

在學校裡，校長唐納·哈特向他的「全方位團隊」提出這個問題。這個團隊包括了一名校內心理師、一名當地諮詢機構代表、一名青少年保護社工和一名輔導員。「我問過他們，有沒有什麼服務可以提供給安柏，讓她母親可以去工作？」他回報說：「就是沒有任何辦法。」

「而我也沒有多餘的錢可以雇用任何人了，」卡洛琳補充道：「我盡力想付清那些小額帳單，但是現在我沒工作，得去申請社會救助金了。你想努力自立自強，卻有人要來打倒你。如果我不工作，

那也是疏於照顧，因為那等同不給我的小孩吃穿。」

也許這道混雜難解的謎題中，最奇怪也最讓人感到不安的一面，就是沒有人去嘗試最顯而易見的方法：如果工廠讓卡洛琳上白天班，她就不會遇到這些問題了。她要求過，卻被草草打發掉，沒有下文。但是其他人——學校校長、醫生、她聯絡過的無數機構——沒有任何一個以提供協助為業的專業人士，想過要拿起電話，向工廠經理、領班或是任何當權者申訴。

的確，這種隆重對待資方的態度，似乎瀰漫在美國努力反貧窮的文化之中。我們將雇主視為遙不可及、不可侵犯、難以說服的領域（除非他們違反法律），就連最具社會意識者如醫生和心理師，負責治療營養不良的兒童，他們會大力倡導政府機構提供食物券、健保、住屋等等，但被問到他們是否曾經敦促那些父母的雇主提高工資，好讓他們有足夠的錢購買營養食物，這些醫生卻對這種想法表示驚訝。首先，他們從來沒想過這回事；再來，感覺似乎希望渺茫。面對這樣的提議他們只是聳聳肩，工資是由市場決定的，你不能指望市場寬宏大量，在這最終的仲裁者面前，沒得商量。

也許他們是對的。得到卡洛琳的允許之後，我打電話給她在工廠的主管，只是想問問他們為什麼會有小夜班。我以為是因為很難找到願意只在傍晚或夜裡上班的人，所以輪班可以擴大勞力供給，但那名主管一直沒回我電話。留言好幾次之後，我終於接到一通人資經理的回電，一個名叫黛博拉·賈瑞提的女人，講話簡短而無禮。賈瑞提說，因為卡洛琳是透過仲介雇用的臨時工，工廠對她沒有責任，所以對她的工作時間不予置評。無論如何，接下來這一週輪到卡洛琳上日班，短期工仲介還沒有找到能替代她的人，所以她回去工作了，學校也還沒有舉報她疏於照顧，不過這種可能性仍然籠罩著她。

公司採用輪班制的確有其理由，後來我從新罕布夏州和緬因州的丹碧絲工廠人資主管凱文·派勒戴那裡得知，「輪班可以讓員工接觸到整體業務。」他解釋道。永遠上夜班的人往往看不到全局，比較不清楚工廠的任務，會給接下來的一班留下問題，他稱之為「文化立足點的疏離」。夜班員工也比較不容易獲得升遷，因為晚上他們跟管理階層沒有接觸。但這些合理的論點對卡洛琳沒什麼用。

後來發生了一個小小的奇蹟，一個曾經跟卡洛琳一起在收容中心工作的女人，碰巧認識教堂有朋友願意在需要的時候帶安柏去她在市區外的農場，所以卡洛琳的工作保住了。之後，前文提到的那對年輕夫妻也可以提早從麻塞諸薩州搬過來，所以安柏也不用去農場了。但最後那對夫妻被卡洛琳趕走，因為她覺得他們凡事都愛八卦。她在附近找到一個女人，願意以每周五十美元的代價照顧安柏。卡洛琳的時薪等於降低了一點二五美元，不過她的經濟狀況還是有起色。

「上帝工作的方式不可思議。」她宣稱：「我有一個守護天使。」即使有了天使的幫助，她也並不期望財富會滾滾而來，「我不想要那樣。」她回答道：「我想要平平凡凡地過。我覺得有錢人也有很多問題，我想要有正常的生活。」

不過在被遺忘的國度中，她過的才是正常的生活。在這樣的生活裡，小確幸如微光巧妙閃爍，然後消失無蹤。好幾個月以來，卡洛琳一直期待能在丹碧絲工廠申請固定的工作，起初她被告知，臨時工作要做滿五百小時才可以提出申請，接著又變成一千小時，然後她得知有個年輕人才做了一個月臨時工，就被雇用為固定員工了。她對程序提出質疑，一名主管咆哮道：「我們想雇用誰就雇用誰！」此外，為了申請她還得參加筆試，而應試時間不計酬。她早上日班的請求也遭到拒絕，即使其他某些人的工作時間已經固定下來了。

因此她離開了寶僑，回到製作壁紙樣本的工廠，上班時間是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七點半到下午四點。雖然時薪從十美元降為七點五美元，但她盡量往好的方面想，她省下了每周五十美元的安親費用，女兒也比較滿足；此外，她的收入大減，所以她的資格申請燃料補助了，當時是三月，政府的計畫補助暖氣煤油費用。

隨著景氣開始衰退，寶僑關閉了丹碧絲工廠，這讓卡洛琳覺得自己辭職是明智之舉。除此之外，她並沒有注意到經濟不景氣。「我看不出來有什麼差別，」她說：「我一直在奮鬥，現在也還是在奮鬥。」她繼續換著同樣水準的工作，某次爭執之後，她覺得自己能夠毫無顧慮地走出壁紙工廠了。然後她再到另一家相簿製造廠工作，時薪七美元；接著又在坎伯蘭農場（Cumberland Farms）的便利店和加油站當收銀員，時薪七點五美元。「唯一討厭的就是有人會開溜，」司機加滿油就加速離去，沒有付錢。「如果油錢損失超過五塊錢又太常發生的話，我會因此丟掉飯碗的。」多少次才算太常發生，她不知道。不過老闆也從來不肯透露，好讓員工無所適從。

她依然生活在貧窮邊緣，或許一次開溜就會讓她失業，無法繼續償還債務。生活似乎既充滿壓迫又危險，剛賺進來的每一塊錢馬上就又轉手花出去，而她還欠了大約一萬兩千美元的信用卡費、兩萬美元的助學貸款，以及房屋的兩筆貸款五萬四千元。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她的職位有辦法獲得晉升，讓她得以擺脫全部債務的重擔，她就這樣受困在無法逃脫的工作地獄中。無止境的停滯逐漸侵入，她終於接受了還款不可能有進展的事實，開始思考之前連想都不敢想的事：宣告破產。按照法律規定，她的助學貸款無法免除，想保住她的房子，貸款也無法免除，不過信用卡債可以，這樣就能減輕她的負擔。

問題是，卡洛琳覺得道德上來說，走這一步是不對的。她最近剛用分期付款在當地商店裡買了一些新電器，布蘭達告訴她，宣告破產是一種偷竊行為。「她來跟我說這些話，讓我覺得很受傷。」卡洛琳承認。但這番話也讓她產生了共鳴，她的消費一直無所節制，雖然她以為自己已經有所改善了。她需要重新出發，於是大費周章地存了八百美元的申請費和律師費，展開行動。「很困難，而且我真的很沮喪。」她說道：「我的生活曾經是我的驕傲，我不希望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安柏則對於在學校受到的限制感到煩躁，她渴望閱讀，但是高中每星期只提供一小時的輔導。她想學更多的數學，她嚮往待在學校的普通科，而不是技職分部，那裡的學生都被污名化了。人們說他們太蠢，很多人似乎都比她還不如。社區中心的輔導員貝絲在到學校訪談後做出結論，「這個學區裡沒有安柏需要跟渴望的東西，她需要更多參與主流的機會，但這不被允許，太可惜了，因為她其實可以做出很多貢獻。」安柏也需要「持續、密集的閱讀指導」，貝絲觀察道。但是學校教的都是她已經知道的：烹飪、購物、洗衣服。校方人員收到了輔導員的請願，她之前曾經擔任過專業人員助理，在附近某個市鎮幫助情緒障礙的孩子。「結果他們竟然嘲笑我，」貝絲驚訝地說道。如果卡洛琳夠有錢，請得起心理醫生或是律師來為她的案例作證，施加壓力，就像有錢人常常做的那樣，也許他們就不會笑了。

安柏能不能加入普通班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學校的心理諮商師在去年做過一系列測試，證實安柏的智力障礙介於輕微到中度之間，從算術到書面表達等各個領域的智商介於四十三到五十七之間。「安柏不知道她的生日是哪一天，」報告裡說明，「識字對她而言有困難，在數學技巧上，她還必須依賴用手指來做加減法。」

無論最好的辦法是什麼，卡洛琳都漸漸失去了對克萊蒙特體系的信心，認為他們沒有能力提供好的教育。她沒有錢讓孩子上私立學校，不過卻有個媳婦住在印第安納州的曼西，願意在丈夫服役期間暫時照顧安柏，而那裡的公立學校聽起來很有希望。「我跟主管辦公室談過了，」貝絲說：「他們告訴我學校是如何運作的，我也跟那裡的特教老師談過，她很幫忙。我清楚解釋了安柏的需求，她說：『我們這裡有各種計畫，我會跟大家一起上高中，可以盡量做她能力所及之事。』」

到了九月，安柏去了印第安納州，興奮地上學去。她註冊了成人識字班，預定開始一周三堂的閱讀數學輔導課。而後她很快地進展到高階特教課程，預計在春季參加測驗。她覺得自己有進步了，她在電話裡高昂的情緒讓她母親也變得振奮起來，不過這些進步要付出昂貴的代價。

卡洛琳聽說曼西有很多工作機會，所以她準備跟著女兒一起過去，但是要離開這裡，她就得賣掉她珍貴的房子，因為她不敢隔著這麼遠把房子租給別人，房客可能會弄壞房子，她也沒有錢來來回回監工修繕。她花了幾個月才找到一個買家，願意在這個艱困的市鎮投資，卡洛琳只好同意了一個不賺也不賠的價格：七萬九千美元。這個價碼原本應該為她帶來不錯的利潤，因為她花三萬七千美元買下這棟房子的，但是她什麼也沒賺到，一分錢也沒有，事實上，她難過地說：「我幾乎是把它送出去了。」

她身為有責任感的屋主，提升了房屋的價值，但是諷刺的是，這卻也偷走了她的資產。長期以來，她把房子維護得很好，她還積欠大約三萬四千美元的一胎房貸，一萬九千美元的二胎房貸則有罰款，這迫使她花了兩萬多美元才得以擺脫。聯邦政府補助一萬七千元清除含鉛塗料和更新牆板，但是如果房屋分別在五年和十年內出售的話，就必須按不同的比例償還，所以她必須償還將近一萬六千美

元。她總共欠了將近七萬美元，再加上房仲費、稅金和其他的過戶費用，她最後還少三百美元。仲介好心地吸收了一些，降低了她的仲介費。而她背了五年半的貸款和利息，什麼也沒得到，她的夢想之一也就這麼煙消雲散了。

新罕布夏州的冬天在十二月初到來，卡洛琳口袋幾乎空空如也地離開了，她甚至連搬家卡車都租不起。她的大女兒在威訊通信 (Verizon) 有份不錯的工作，借了七百美元給她；還有幾個朋友冒著紐約州北部的暴風雪，犧牲假期替卡洛琳開卡車去印第安納州。卡洛琳又開始漂泊了，就像她小時候那樣。她很高興能夠稍微看看這個國家，但是曼西並不平靜。「我想念我的房子，想念我的朋友。」卡洛琳感嘆道：「但是我的開銷太大了，我很高興能擺脫那一切。」跟媳婦一起住了六周之後，她在市鎮上一個不太平靜地區的公共住宅找到一間小公寓。「那一區不算是最好的社區，」她委婉地發表自己的觀察。這裡充斥著毒販和妓女，一場槍擊案才剛發生在她工作的便利商店兩個街區以外，她發現「工作在這裡什麼也負擔不起」。她的時薪是五點四五美元，沒有福利。這表示工資有下滑的趨勢，二十幾年前佛蒙特州的塑膠工廠，時薪是六美元。「我就是沒辦法出人頭地。」她說。

六個月後，卡洛琳搜尋政府補助的技巧，為她帶來了兩個重要的發現。首先，她獲得許可，可搬進以比較安全的社區的公共住宅。「這真的很好，」她說。第二，她設法獲得了醫療補助，會拿到四百美金讓她買一副新假牙，只要她能夠籌到三百二十二美元來補足款項。她那一貧如洗的銀行帳戶拿不出這筆錢，所以她的大女兒借錢給她。有牙齒給了她信心，「牙齒很合，我還要花點時間適應一下，」卡洛琳滿懷希望地告訴我，一旦適應之後，她打算試著戴著假牙去應徵幾份工作。後來她找到在便利商店裡的工作，時薪七美元，正在受訓準備成為襄理。

第三章 將第三世界引進美國

Chapter3

將你的睏倦貧窮交給我，
蜷縮著渴望自由呼吸的大眾，
擁擠海灘上的不幸渣滓。

——艾瑪·拉撒路 Emma Lazarus

這些是她資產負債表上的光明面。不過負債情況很嚴重，她也開始沒那麼肯定搬到曼西是好事。「我覺得在這裡比較難交到朋友。」她觀察道：「我不常出門。」經濟狀況則變得更加困難。她很訝異在印第安納州要收所得稅（在新罕布夏州不用），加上市政府稅跟郡政府稅，她的低工資明顯跟不上支出。「我破產了，」她直截了當地說道。除此以外，搬家的原因——安柏的生活前景，現在似乎也不那麼肯定了，她學到的東西比較多，不過夏洛琳已經負擔不起每個月一百四十美元的閱讀輔導費。而且夏洛琳提到，「學校跟我說，我是在浪費錢。」安柏永遠也學不會閱讀。

金錢也許不是萬能，但是卻常常能夠隔絕問題環環相扣帶來的麻煩。有能力的父母可以處理安柏的困難，不需要舉家遷徙、拋家棄產，他們可以花錢買服務，用自己的技能來承擔一切，築牆保護自己的家園、工作和生活方式來免於苦難的侵擾；但是貧窮人家的牆壁單薄脆弱，麻煩只會一樁接一樁地滲透進來。

奢侈是由不起眼的雙手所製造出來的，不僅是在「開發中」國家的骯髒血汗工廠裡，在美國的國土也是貧富交織。移民來此尋求豐衣足食的生活，也帶來了他們的貧困，為了微不足道的工資，他們在蓬勃的繁榮中成了一座座艱困的島嶼。儘管收入遠遠比在家鄉時來得高，但他們想要的是如美國人般吃飽穿暖、生活安適。

在馬鈴薯田裡是這樣，在縫紉工坊裡也是，在乾洗店、餐廳，郊區有錢人修剪整齊的花園裡都是。第五大道跟威爾夏大道上獲利豐厚的服飾，是由在洛杉磯春天街跟第八街之間的破落街區打拚的墨西哥人、泰國人、宏都拉斯人跟韓國人縫製的。等到這些優雅的洋裝和高雅的上衣熨燙過後，穿在閃閃發光的櫥窗模特兒身上，所有的苦難斑跡早已被抹滅得一乾二淨。

紐約客如果漫步在寬廣的洛杉磯街頭，可能找不到城市究竟在哪裡。一大片低矮的房屋跟倉庫、寬闊的高速公路跟分散的工廠，隨意沿著太平洋往東延伸，彷彿土地是用之不竭的資源。製衣區卻是例外，這裡有一種緊張的城市氛圍，建築物高高地在街道上投下陰影，街上人種膚色混雜、語言各異，就算不靠近混亂擁擠、生氣蓬勃的曼哈頓製衣區，這附近也可以讓紐約客有回家的感覺。手推車掛滿衣服，穿梭在卡車車流之間，一旁的建築物因為過度使用而顯得年久失修；到了午餐時間，嘎吱作響的電梯從十三樓、十二樓、十樓降下，勤勞的、取巧的、可敬的、墮落的——總而言之，來自全球的人口就這麼湧出來。大部分的面孔都是亞洲人跟拉美裔，也有少數幾個黑人跟白人；有幾台墨西哥塔可餅車占據了小巷裡的有利位置，或是沿著停車場邊停靠。工人跟老闆飛快地吃著午餐，接著回到擠滿縫紉機跟一卷卷布匹的閣樓。

坎德拉里亞從墨西哥來到這裡已經九年了，她在這裡工作，從這份縫紉工作換到下一份，因為小公司就像風中的汗珠一樣，瞬間出現又蒸發不見。她的動作很快，而且她最好要動作快，因為她是按件計酬的：每車縫一件牛仔褲的前襠開口，她可以拿到零點七五美分，這筆數再簡單不過。「我必須車一百件才能賺七十五分錢，」她說。要賺到加州的最低工資（當時是五點七五美元），一小時總共要車七百六十七個前襠開口，平均一個只有不到五秒可以縫。「我做得很快。」她誇口道，比這個行業的新手快很多，「我一天可以做四落，一落有一千兩百件到一千六百件。」最高紀錄是一天八小時，一小時大概賺六美元。

不過這裡有個陷阱，她的上司是個名叫映的越南女人，她會記錄坎德拉里亞按件計酬所賺的錢跟最低工資之間的差距，如果某天她沒賺到最低工資，映還是會付給她最低工資，但是坎德拉里亞就欠她差額；如果她賺的高於最低工資，她就得拿去償還欠映的金額。就算這樣替她的工資設了上限，但這還是比很多製衣工人按件計酬，領低於最低工資來得划算。而那些維持不了速度的人則會被開除。

坎德拉里亞早上七點開始工作，不過要等到九點映才讓她打卡，以確保她的工時紀錄看起來少幾個小時。坎德拉里亞的手迅速而靈巧，映卻指控她捏造紀錄，誇大了自己的產量。這項指控引起爭論，坎德拉里亞還曾經拿出自己的筆記本，上面記錄了她的工時。「老闆想從我這裡拿走筆記本，」她回憶道：「他們想讓我簽一個東西，承認自己捏造紀錄。」常見的詐欺詭計讓縫紉工坊布滿不確定感，沒有合理工資，勞動者也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坎德拉里亞沒有移民文件，沒有權利合法待在美國，也不能販賣美國經濟市場所需要的東西：生產線最底層的廉價勞動力，所以她在這間血汗工廠裡只待了一年又八個月。她有沒有機會找到更好的工作呢？她嘲笑我的蠢問題，有好幾個跟她坐在一起的男人也笑了，他們在好幾間不同的成衣公司工作。

「我幫褲子縫上標籤，一件賺四分錢。」胡安說道，這就是他九年的製衣區經驗。「製作一件褲子的全部人工費用，總共是兩美元。」

「我做的是腰帶環。」黑索斯說道。「一件褲子賺九分錢。大部分的工廠都沒有給到最低工資，但是像胡安這樣的人，有辦法達到那樣的標準。新來的人做不了那麼多。」沒經驗的、操作縫紉機沒那麼靈巧的，據他說一小時只能賺三美元。

付這麼少錢對老闆來說似乎是個福音，不過老闆並不是很開心。計件工資低反映出生產力低，而成衣工廠要如期交件，因此胡安的雇主「希望工人產量足夠，可以達到最低工資，」他解釋道。一直達不到的人就會被開除。州政府提高最低工資的時候，雇主通常會要求提高生產速度，但是計件的報酬卻維持不變。爭取勞動權益者指出，這是在規避政府頒布的法律。更有效力的則是經濟法則，全球的製造業情勢讓位於洛杉磯的五千家成衣工廠必須面對嚴酷的競爭，跟那些在宏都拉斯、柬埔寨等生活水準跟勞力成本極低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工廠一較長短。墨西哥人在工廠工作一天大概賺四美元，柬埔寨的教師一個月賺十五到二十五美元，而柬埔寨籍的製衣工人一個月賺三十到四十五美元，或者是一小時十六到二十三分鐘。解決之道，就是把第三世界的某些特徵引進美國。

示威反對全球化和世界貿易組織的美國人中，似乎很少有人意識到，如果他們想要抗議血汗工廠，不必到貧窮國家尋找剝削案例，只要沿著洛杉磯的第八街走就能找得到，在那裡負面宣傳肯定能夠更快達到效果。抗議全球化就像是抗議雨季來臨，有什麼意義呢？反正肯定會下雨，帶來壞處的同時也帶來好處——具破壞性的洪水也同時帶來足夠的水量；要讓稻米生長。最好的方法就是疏導、控制，避免毫無防備的人遭到淹沒。

這就是加州好幾個組織在做的事情，他們成立了一個聯盟，叫做「血汗工廠監督聯盟」(Sweatshop Watch) [1]，代表製衣工人遊說並提起訴訟。這個組織已經說服某些勞工克服被驅逐出境的恐懼，揭發他們的雇主——小型縫紉工坊、以及大型品牌設計師和製造商——那些知名品牌通常雇用剝削勞工的縫紉承包商來做骯髒事，苛扣工人來縫製服裝。二〇〇〇年時，一對時薪只有三美元的拉美裔夫婦和他們的女兒，贏了三個製造商共十三萬四千美元的和解金，包括JPR (John Paul Richard)、法蘭辛·布勞納 (Francine Browner) 和BCBG (BCBG Max Azria)。製造公司雇用了私人公司來監控縫紉承包商的情形，但是卻沒有在監控者回報有異時採取任何行動。

迄今最為惡名昭彰的例子始於一九八〇年代晚期的泰國農村。泰國的騙子招募貧困的年輕人，大部分是女人，承諾他們在美國有高薪的縫紉工作可做。一到美國，工人就開始做牛做馬，在一棟位於洛杉磯東邊的艾爾蒙地的兩層樓公寓裡吃飯、睡覺、工作，而且全都在鐵絲網和合板遮蔽的窗戶之後進行，一天工作十七或十八個小時，被迫為美國製造商縫紉、拼接衣服。這些主要製造商包括了番茄牌 (Tomato)、珂莉奧 (Clío)、BUM、高山牌 (High Sierra)、Ayle、獵豹牌 (Cheetah)、藍錨 (Anchor Blue) 和 Airtime。出售這些服飾的地點則包括了西爾斯百貨、塔吉特百貨 (Target)、五月百貨 (Mays)、諾德斯特龍百貨 (Nordstrom)、梅文百貨 (Mervyn's)、米樂百貨 (Millers) 和蒙哥馬利伍德百貨 (Montgomery Ward) [2]。工人的工資一小時不到一美元，而泰國的組織以高於市價四、五倍的價格，從中扣除了日用品等費用。這些勞工沒有醫療資源，罹患各種疾病，其中有個人因為牙周病無法治療，不得不一口氣拔掉八顆牙齒。

「他們被告知，如果想要抵抗或逃跑，他們在泰國的家就會被燒毀、家人會被謀殺，他們也會

被打。」身為他們的律師之一的蘇萊莉寫道。^[3]他們看過一個企圖逃跑的男人的照片，那男人被毒打
到簡直不成人形。如果他們想投訴，對方也會搬出可怕的美國移民暨歸化局來威脅他們——在某方面
來說，威脅成真了。一九九五年，這種強迫勞動開始七年之後，也就是移民暨歸化局接到第一份關於
這個問題的報告三年之後，聯邦探員與州警總算突襲了這個地方，「解救」了七十一名不幸的工人，
只不過又把他們關進聯邦監獄，等待遣送出境。移民暨歸化局受到法律約束，必須拘留並遣送非法移
民，因此增強了雇主常用的恐嚇力道，反而強迫工人保持沉默。官方的強硬手段「只會阻止工人舉
發濫用勞動法、公民權和人權的行為，讓在艾爾蒙地的這類行當更加地下化。」蘇主張道。「我們堅
持，移民暨歸化局不應該與剝削工人的雇主勾結。」血汗工廠監督聯盟的成員進行了整整一周的激烈
示威抗議，那些飽受折磨的泰國工人才因此獲得移民機構釋放。

最後，扣留工人的那些人被判兩年到七年的刑期，工人們則獲得四百萬美元的民事訴訟和解金。
最重要的是，那些距離艾爾蒙地兩步之遙的製造商沒能推卸掉責任。這是一個突破，打擊了肆意揮霍
又試圖保有名聲的各大品牌。服裝業的慣例是，製造商或是設計師畫好版型，然後用大型手動或電
腦操控的線鋸機，沿著版型線裁切厚厚的一疊布料。裁好的布料接著會運送到承包商那裡去，員工再
把服裝一片片縫組好，通常採用裝配線的作業方式，而大部分的虐待就是在裝配線上發生的。承包商
向製造商按件索價，所以不遺餘力地想把勞動成本降低到見骨的地步；製造商則袖手旁觀，假裝沒看
見承包商跟員工之間的關係，假裝自己無能為力。在艾爾蒙地一案中，泰國工人的律師在法庭上成功
主張製造商不能以不知情來抗辯，他們把裁切好的布料送到製衣區的幾家小型承包商，要求交付成品
的時限那麼短，他們一定知道工作會分包給那些位於艾爾蒙地的大型單位。承包商的拉美裔員工後來

也加入了泰國工人的訴訟案，他們的工資嚴重過低。這是南加州少見的跨種族合作，此地的工權運動
通常是由韓國人、拉美人、柬埔寨人等分別組織而成的。

虐待案的消息傳開來了，該州在一九九九年立法追究製造商和零售商的責任，他們必須為縫紉
承包商違反最低工資和超時的工時負起責任，不過執法並不徹底；法案頒布一年之後，州調查局和聯
邦調查局發現，在洛杉磯檢查的縫紉承包商中，只有三分之一遵守勞基法，比前一年的百分之三十九
還少。^[4]

製衣產業的情勢就像主宰大多數美國企業的市場力量一樣，不利於基層勞工取得像樣的工資，因
為競爭很激烈，利潤非常微薄，很多雇主都覺得招架不住；他們認為不雇用非法移民，他們就沒辦法
在這個行業裡生存下去。不過這麼做，他們也得冒著被起訴和布料存貨遭到沒收的風險。很多小型縫
紉承包商自己也才剛移民過來，不少是從香港來的，在這個英國殖民地移交給中國管轄之際，毫無疑
問地，有些人就是靠著騎在那些韓國、中國和墨西哥工人的頭上致富的。不過他們通常也沒賺到什麼
錢，「很多承包商賺的只夠支付他們自己的工資。」業內發言人喬·羅德里格斯說。他同時也是南加
州製衣承包商協會（Garment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領導人。「有個傢伙告訴我，他
每年付自己三萬六千美元，這就是為什麼健康保險這類東西像是白日夢了。」

通常喬·札伯尼會付自己兩倍多的數目，不過這對於一個做了二十五年生意的人來說並不多。他
和妻子每個月從他們的縫紉工坊拿五、六千美元。位於八樓的工坊叫作艾德利安，員工約十五人（景
氣好的時候會有二十二個），用陳舊的機器車邊，縫紉晚禮服和其他服飾，而這些精緻的衣服他們自
己永遠也買不起。喬是一個眼神哀傷的憂鬱男人，全身上下都是灰色的——灰髮平頭、藍灰色的短袖

上衣和牛仔褲。幾十年前，他從貝魯特來到這裡，他的家人在那裡從事零售業。「其實我的家人是做男裝，不是女裝，所以這對我來說是新東西，」他解釋道。「到今天我都還不知道要怎麼縫紉，不過我知道如果事情出錯了，問題該怎麼解決。」

那些知道要怎麼縫紉的是女人，都是技術純熟的老員工，至少都能賺到最低工資，但通常一小時不會超過七到七點五美元。「有女孩子在這裡做了二十年，」他說：「其他人平均大概也都做了十年。」換句話說，升遷是不存在的。她們沒有額外福利，工作不夠的時候，他還得打電話告訴她們幾個星期不用來上班。

按件計酬而不是按時間計酬，讓他更容易計算，因為他可以清楚知道一件衣服要花多少。不過他沒辦法按照自己的喜好來行事，因為設計師的要求很高。「這些做工太精細了，」他說道。「得花很多時間，沒辦法真的知道到底要多少時間才能做好，只能用大略估計的。」他不得不讓將近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員工按時計酬，其他按件計酬的人有時則會要求加薪；如果工作花的時間比預期還多，有時候喬也會提高工資。「要看看我拿到多少量，如果利潤很低，我也做不了什麼，就算我想平衡一下也沒用。也許就我損失五十分鐘，然後把那五十分鐘給她們吧，有時候會發生這種情況。」他不能回頭找設計師，要求他為每件衣服多付點錢嗎？「那很少見。基本上，你被迫接受那樣的價格。有時候你接工作，只是為了讓這些女孩有工作，收支只能打平。這發生過好幾次了。」

這種小眾市場、高品質的設計師作品必須做得又快又好，這是喬在市場上生存下來的原因。大部分大型產縫紉都已經南移至墨西哥，或是西移到亞洲去了。如果針腳可以相對粗糙一點，製造商也願意為了成品多等幾個月，那就可以把布料運送到技術比較不純熟的海外去製作衣服；但是瞬息萬變

的時尚品味有時必須在幾周之內得到滿足，這時製造商就得用到喬跟其他街邊或樓下的承包商了。

他們為此多付的額外費用，當這些錢輾轉到了裁縫車後面的女人手上時，早已所剩無幾。據喬的估算，架上那件黑色無肩帶禮服，售價大約在兩百到三百美元之間，而他只收二十美元的縫製費用，大約只比製作成本多了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而勞力成本大約占他公司開支的百分之七十，所以他沒辦法提高工資，否則就會失去競爭力，不然就是利潤會大幅度降低。他說另一個承包商也許能用十美元做好這件禮服，不過品質會比較差。

欺騙工人的血汗工廠讓喬很生氣，因為他給員工的薪水比較多，成品的成本比較高，他完全沒辦法在價格方面與人較量，只能用品質來比。「一家店只開個半年一年，」他提到那些血汗工廠的老闆，「他們在那裡工作，然後把店關了，又去其他地方……後面那塊空地，三年內大概開關關了三、四家店吧，開張半年後收掉，又新開半年，又收掉。新店名、新老闆。人家來領工資，但是本來的店關門了，一個人影都沒有，他們拿不到錢。」如果老闆積欠工人兩個星期的薪水，喬指出，「那也許就有兩萬到三萬美元進到他自己的口袋裡去了，這種事情常常發生。」

喬以前會雇用非法的工人，沒考慮到法律其實禁止雇用沒有證件的工人。現在他的員工全部都有證件，他覺得法律會保護他，不過他還是覺得這很荒謬。「絕對有移工的需求啊，」他說道：「我懷疑有哪個美國人會願意為了一小時七美元、八美元，或六美元而工作，這是不可能的，這個產業會倒閉。」他的推測只對了一半，進入美國經濟體系的新工人有一半是移民，但是也有許多美國人在各行各業中領的就是這樣的薪水。製衣產業只是個例子，顯示出在全球競爭之下，很難把經濟正義普及到一般人身上，市場的硬規則也只會屈服在更嚴格的政府管制和良心程度之下。

在時尚界的上流圈子中，有些設計師像倪可一樣，會覺得良心有點過不去，因此她會關心工人的工資跟工作條件，會留心檢查他們的承包商。他們有能力這麼做。

身材修長、精心打扮，倪可就算在她亂糟糟的工作室裡也希望自己看起來時髦。她的深色頭髮仔細捲過，雙唇塗成大紅色；她對做生意跟道德都有鋼鐵般的堅持，據她推測，如果她願意找那些不擇手段的縫紉公司的話，她可以用一半的價格就把衣服做好。「外面肯定有很多噁心的商家。」她說道：「你根本連看都看不到那些經營者，因為他們就像是貧民窟的惡房東一樣。你知道嗎？對我來說他們一點吸引力也沒有，我絕對不會去那裡，不值得，我覺得那真是令人髮指、傷風敗俗，而且很多行業都有這種事情。」她尖銳地觀察道。似乎沒有什麼人聽說過製造收音機那類小玩意的產業有剝削行為，但是奢華高雅的服飾在血汗工廠裡被製作出來，這種劇烈的反差就讓人無法忽視。

倪可盡量做對的事情，避免使用「手工」布料，因為對她來說，那就等於是在中國或印度剝削童工所生產的紡織品。「我不買那些標榜手工製造的東西。」她宣稱：「因為我知道手工製造就表示實際上有人在泥地上工作，還只得到一籃魚頭作為報酬。」她給自己員工的最低工資是一小時八美元，最好的打版師傅可以賺十三到十四美元。「有些店家說：『如果妳再打個八折，我們就可以多買一點。』」她說。但是，「我們付高薪，因為這是她們應得的，她們真的做得很好，我敬佩這些女性，因為這是一門手藝。這不是把大家找來粗製濫造，做越多越便宜越好。給她們高薪，代表期待她們能以專業和誠信回報，而我每天都能得到這些。」

不過多愁善感並不能讓人在做生意的經營需求中站穩腳步，炒過股票的人都知道，經濟行為與心理影響息息相關。如果你白手起家，就像瑪麗亞·沃契柯夫斯基一樣的話，你就會出於本能地感覺到富裕是多麼的脆弱，因此轉而焦慮起你能付給員工多少薪水。瑪麗亞是個高個子，一頭金髮，身材保持得像以前當模特兒時一樣瘦。她現在做得很好，擁有每年獲利五十萬美元的女裝服飾品牌「瑪麗亞·畢安卡·妮洛」(Maria Bianca Nero)，由她設計製造，在布魯明黛百貨(Bloomingdale's)、薩克斯百貨(Saks)和百餘家商店裡銷售。然而創業初期的艱辛還是影響了她的判斷，使她對於提高工資很小心審慎(她寧願發獎金，如果景氣不好就算了)，也不願意貸款(她存有準備金，好購買原料和給付薪水)。她的辦公室也兼作大型工作區，裝潢得就像大學剛畢業孩子的公寓一樣。書桌是一張舊門板，底下用兩個黑色的文件櫃支撐著，她的思維模式還沒有跟上她的成功。

她的事業從犯下基本的錯誤開始，她開了一家小店，畫版型、買布料，把東西都拿去給某個女人，那人在自己家裡有個小工廠。她下訂單：十件黑色的S號，三件M號，然後把做好的衣服拿回來，放在自己店裡販售。對於這麼做的花費如何，她只有模糊的概念。她替那女人付房租，加上每小時付她二十到二十五美元——這在製衣產業是個天價。三年後，她發現一件可賣兩百美元的洋裝，她大概得花兩百五十美元的成本製作。此外，竊賊闖入她的店裡兩次，大部分的庫存都被偷走了。幸運的是，第二次被偷的時候，新一季的庫存在她的公寓裡。於是她決定放棄零售營運，改走批發。她與丈夫雅尼斯合作，跟一個業務代表簽約，付給對方百分之十的佣金。「我們弄了一個小小的產品線交給她，」瑪麗亞回憶道。「她賣出去了，我們就一點一滴地完成訂單，剛開始的規模很小、非常小。」他們小本經營，甚至連醫療保險也沒有，不過他們有的是瑪麗亞的創意。有些服裝設計的眼光

保守，但帶點創意，且不浮誇，一步步地，她的觀念也跟上了。

回想起來，她所學到的基本教訓就像是直接從創業指南中搬出來的，「要擁有自己的企業，就從日常管理開銷開始。」她說道。而開銷有很大一部分是勞力成本。「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沒有開銷，公司就只有我跟雅尼斯，我們自己不支薪，需要什麼就拿什麼，像是吃飯的錢；我們沒有員工，房租的開銷也很低，大約一個月兩百五十美金，所以我們就知道就算幾乎什麼都賣不出去，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做生意，因為低開銷就是關鍵。隨著生意越做越大，你還是會想把日常開銷控制在能處理的範圍以內……這是為了吸收景氣不好時的成本，因為你想不到時候把大家都開除了，又從頭來過。你想要的像是『好吧，我們沒賺錢，不過我還不至於請任何人走路。』」

同樣的縮減開銷策略每家公司都在用，當然在生產和銷售的每一環節都可以見到。因此這個產業有點像食物鏈，每個較低等的生物都比上一層的生物更加無助；最無助的在最底層，縫製昂貴時髦的服裝，換取最低工資或是比那更低的報酬。

瑪麗亞的上游跟下游公司的掠奪本性，使得她對自己的商品訂價充滿防衛，加了很多成。零售商會想出無數的花招來規避談好的價錢，如果他們以折扣價賣出衣服，他們就會扣除部分款項；如果他們在一段時間之內沒把衣服賣出去，「他們會要求所謂的回饋金。」瑪麗亞解釋道：「從要給你的支票裡多扣一點錢下來。」如果服裝有瑕疵，他們會要求損失賠償。「喂，拉鍊壞了，總共有二十件衣服都這樣，我花了三百美元才修好，所以你這系列產品我會少付三百美元。」他們每件事情、一分一毫都要算清楚，然後又是『我們需要特別的商品來做促銷』、『店長有特殊要求』、『買最多畢安卡·妮洛的客人可以獲得免費禮物，我們送出了十件免費禮物，所以又要少付五百美元。』你可以去

跟他們爭執，也可以說事情就是這樣子……錢能拿回來就很幸運了，所以你要把價格墊高一點。」

她從布料的成本開始計算價格，雅尼斯用電腦排列出衣服的各个部件，把它們像拼圖一樣湊在一起，以減少布料的浪費，接著由她估計縫紉承包商會收多少費用。「大概抓個差不多的數字，我付十美元，所以假設成本是十美元好了，然後可能要多估一條拉鍊還是三顆扣子之類的錢，再加一點裝飾什麼的。」

這個「成本」還不包括她的房租、水電費、保險費、員工薪資或是其他日常開銷，也沒有考慮到縫紉承包商可能會犯的錯誤。「他們拿錯顏色、裁錯布料，縫錯了，你只好重做。衣服送來的時候損壞了，浪費掉很多。」她說道：「而你必須吸收那些成本。」她的目標是希望能夠以製作成本的兩倍賣給商店，而詭異的製造業算術使她沒有把成本乘以二，而是乘以兩點五，希望額外提高的價錢可以彌補承包商的錯誤、業務代表的佣金，還有商店為了不付全額而想出來的花招。

「比如說這件衣服的成本是十五美元，你就得要價三十七點五美元。」她解釋道：「你希望你能賺到大約十五美元，而成本花了十五美元，所以那七點五美元就是墊高的緩衝。這之中，你得付三點七五美元給業務，所以基本上你就只剩下三美元左右可以打折。」接著要訂出最後的售價，商店會把瑪麗亞提出的價格乘以二點一或二點二——在比較高級的商店裡，甚至會乘以三。所以一件瑪麗亞花六十美元做出來的洋裝，會以一百五十元賣給零售商店，然後以三百美元以上的定價賣給顧客。

所有行業都必須承受的還有無情的時間。「你必須在出貨前四到六個星期就開始製作。」瑪麗亞解釋。「而出貨之後，你得等上四到十個星期才會拿到錢，所以總共大概得等三個月，才能真正收到貨品的款項。因此如果下個月的訂單是這個月的兩倍，那我就得掏出兩倍的錢，然後三個月內都看不

到任何一毛錢回來；我得自己撐著付工資、付帳單，還要多餘的錢可以維持這三個月的開銷。」她說很多製造商會「找代管」，意思就是由銀行墊付，然後讓銀行抽取百分之四到五的利潤，但她沒有採取這種做法。

有時候，瑪麗亞平常合作的那三、四家承包商會抱怨說，他們接的工作讓他們賺不到錢，因為花的時間比預期的要久；有時候她付給他們的錢會比談好的價錢更多，但是因為成本至關重要，也因為她自己的員工薪資也是經常性開銷的一部分，所以她必須小心留意。她認為把工資提高到高於業內現行水準並不明智，即使她的同情心經常要她這麼做。「我總想多給他們一點，」她說：「但是我會想：我有兩個小孩，要是生意不順利怎麼辦？我已經把我的錢都給花掉了。你也看到他們過的是什麼生活，他們搭公車，而我們沒車子，這是很難堪的事情。我們現在過得還不錯，但是是這兩年才開始變好的。你就是得要慢慢來，如果你一開始付人家一小時二十美元，結果生意開始變差了呢？我是說，我要讓他們減薪嗎？」她問道：「還是我現在得開除你，因為你拿這麼多薪水，卻沒有人要買我的產品？」高工資會增加她經營上的風險。

「我們聘請的第一個員工是打樣師傅。」瑪麗亞說道。那是一九九三年的時候，時薪十二美元，在當時有點高。「她現在還是領一樣的錢，」不過有外加獎金，「有時候我們會給大概八百或是一千美元。」一年兩次，在六月和十二月。如此一來，不景氣就表示獎金會變少，而不一定會減薪或裁員。

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曾經說過，民主是人類制訂過最糟糕的體制，但比其他已實施過的政府形式來得好。同樣的話也可以用在資本主義自由企業上，除了其他崩壞的經濟制度以外，資本主義是最糟糕的——它有無情的一面，冷酷競爭的精神加劇了適者生存、弱肉強食，但是也打開了機會

的大門，這一點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或是任何其他人類嘗試過的體制都比不上。資本主義培養出來的不公義感受源自於平等主義的缺乏——這個崇高的理想就算透過其他體制也無法實踐。美式理想擁抱的是人人機會平等，而不是結果平等。事實上，自由企業因差異而興盛——企業主與勞工的差異、受教育者和缺乏教育者的差異、熟練者和不熟練者的差異、愛冒險跟畏首畏尾的差異，還有歸根究柢來說，有錢人跟窮人的差異。這種差別，尤其是以相對低成本雇用勞工的自由，讓企業有較大的冒險空間，對於強大而分散的經濟體制來說是必要的。而這個受到高度規範的經濟體制，充斥著法律和契約限制，也禁止虐待行為，儘管這些規範的目的在於保護健康、環境和員工的福祉，卻常常受到質疑，尤其是在美國政壇上不斷引起爭論，一部分人想駁斥這種對私人企業的扼殺，因為私人企業需要空間，才能創新與成長。

就像大部分的雇主一樣，瑪麗亞覺得不同等級的工人之間有差異是別無選擇的事情，她也努力維持這樣的差異。「你一定不會想付高薪給負責運送或是做枯燥手工藝的人。」她宣稱：「這簡直就是不公平。有些人去大學唸書，試著在生命中創造一些東西，那些人應該得到獎勵，應該賺比較多的薪水；至於高中就輟學的人……我的意思是，那樣講不通，如果人人平等，那就沒人要去做大學了。事情就是這樣。如果你去學校接受好的教育，你就可以得到薪水比較高的工作。」

堪薩斯市某家短期工仲介公司的主管，想到要付給員工高於六到七美元的時薪就覺得不寒而慄。「你會陷入混亂，」她說。而陷入混亂是件令人不安的事情，「你在補貼整個薪資結構，這樣他們一小時賺的比他們可能應得的還多三、四，或五美元。處理文書的辦事員通常薪資是七美元，如果我付

十美元給他們，我也得付給會計十三、十五，或十七美元的時薪，這樣，整個薪資水準就提高了。」

「應得的」這幾個字很重要，另一名堪薩斯市的雇主保羅·李利用了同樣的字眼來感嘆時薪上漲。幾個操作自動郵件處理機的工人薪資，從六美元漲到了九美元。「很快地，我們付給這些人的薪水就會比他們真正應得的更多了。」他宣稱道。其他雇主也認同這種想法，認為一份工作應該要有「正確的」工資。如果他們提高手工勞動者的工資，就得同樣提高領班、會計、行政人員的薪資，才能維持不同職位之間的薪水級距。換句話說，這個國家的倫理很矛盾，一方面譴責這種差異不平等（有些執行長領的薪水是他們公司基層員工的五百倍），一方面卻又欣然接受差距，認為這是一種美德，因為付給會計的薪水要是比不上給祕書的，在道德上似乎說不過去。

這種賺錢能力的差異，甚至銘記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用來計算賠償金額的公式中。比如說，一位三十一歲、已婚、有兩個小孩的父親在世貿中心喪生了，如果他的年薪是兩萬五千元，那麼他可以得到一百零六萬六千零五十八美元的賠償金；如果他的年薪是十五萬美元，那他可以得到三百八十五萬六千六百九十四美元。每個人的生命都有其價格。

有些雇主甚至會用收入差距來反對薪資的差距縮小，指出提高底層工資會直接影響到同樣一群人的物價。藍迪·羅爾斯頓是文具公司維多利亞紙業（Victorian Paper）的總裁，他是這麼說的：「如果你把最低工資提高，他們花的錢還是會回到最低工資的領域裡……他們負擔不起好餐廳，如果他們去溫蒂漢堡或是麥當勞吃晚餐，好了，你讓那裡的價格提高了；他們去雜貨店，在那裡買食物，你也讓那裡的價格提高了。工資提高時，價格也會上漲，大家要不是關門大吉，就是得提高價格，這種通貨膨脹是一種低檔的通貨膨脹，到頭來他們還是都在那些地方消費。」

工資差異所構築而成的經濟體制，在回應供需和創新動力上一直很靈活，但不幸的是，也增加了貧富差距——面對惡兆連連的險峻未來，工人這輩子向上流動的機會不可能增多，尤其是來自第三世界的移民，還受到低教育和低技術的阻礙。

在經濟急速發展的時候，幾乎每個想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但通常是低薪工作，也沒有太多前景可言，除了醫療保健這類在成長的行業以外。這類產業的特質是：流動率高，需要各類人才二十四小時待命，入門工作往往也是沒有出路的工作。

美國社會的階級流動性享譽全球，素有機遇之地的名聲，這種印象讓大眾認為，比起其他社會，這裡比較開放、階級之分比較不明顯。二十世紀初期，一個波蘭移民之子可以唸到八年級以後輟學，到澤西市的碼頭工作，一小時賺八分錢，最後升職成為伯利恆鋼鐵公司（Bethlehem Steel's）輪船生產線的總裁，我的祖父正是如此。但今天不可能這樣了，大部分現代美國的流動都是由經濟成長所致，而不是因為種族或階級的界線消失了。這種經濟擴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相當迅速，打開了發展的康莊大道，到一九七〇年代以後慢了下來，於是許多工人落在後頭，尤其是只有高中文憑的男男女女，世代之間的流動多於同代之間的變動。可悲的事實是，如今一名技術有限、教育程度不高的年輕人踏上這裡的海岸——或是從貧困的背景進入職場——得從底層做起，卻會發現更高的職位遙不可及。

這種令人窒息的挫折感，在少數民族組成的美國經濟體中最为明顯。令人望而卻步的高牆包圍著種種次文化，韓國人、中國人、越南人、墨西哥人、宏都拉斯人、衣索比亞人，還有其他構成低收入勞工的種族，那些英文不流利、沒有正規移民文件或是高階技術的人，無法輕易攀越高牆，受困在廉價勞力分散區域的群島上，推動著這個國家的利益。他們不是美國人，但卻是美國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他們不只撐起了製衣產業，也撐起了餐廳、農地、停車場、庭院造景、粉刷承包、建築營造和其他攸關美國人福祉的領域。

「他們看待工人就像看待一坨屎，」羅克希·何比肯說道。她的身材瘦長，講話速度很快，負責組織工會，也是華盛頓特區停車與服務業公會的主席。她代表華盛頓、北維吉尼亞和馬里蘭郊區的停車場管理員，這些人大部分都是衣索比亞移民，加上一些西非人、拉美裔和非裔美國人。「大家常常無緣無故被開除，」她說：「工作上也有很多種族歧視的潛規則，有色人種很難走出停車場，去做更高的職位，像是主管職、管理職、會計。」很多工人，「感受到這堵不尊重的牆，」她說：「而且很多移民，尤其是衣索比亞來的，都是專業人士。他們很多人是律師、藥劑師，訓練有素……可是他們卻來做這些工作。有些年輕的白人小鬼當主管，以為他們什麼也不懂。」

停車場管理員領的是最低工資——但是很多人的工時卻沒有紀錄。何比肯抱怨道，一個收銀員也許在打卡下班以後，還要花二十分鐘填寫表格和銀行存單，但這些時間卻沒有報酬。某家大公司有一「強制休息時間，」她說：「他們自動扣除一小時又十五分鐘休息時間的工資。可是啊，大家其實沒有休息。」大多時候他們必須一路工作下去。人脈也很重要，如果你有朋友可以幫你弄到傍晚或夜班的市中心停車工作，你一周就可以從來領車的人那裡拿到將近兩百美元的小費，不過你得有管道，還得是個男人，女人通常只能做些沒小費可拿的收銀員工作。

有個嬌小的女人名叫萊蒂，在華盛頓一個車庫當收銀員，一天工作十二小時，疲憊和挫敗全寫在她黝黑的臉上。雖然她英文講得很好，在衣索比亞卻沒唸完高中。工時長加上有兩個孩子，她也沒時間在這裡完成學業。十七年前她用觀光簽證來到美國，兩年後設法取得綠卡，這顯示了她的合法移

民身分，不過無論是綠卡或是她的英文、還是已經在這個國家待了這麼久，都沒有替她開啟任何一扇門。「我覺得我就像去年剛到這裡，」她說道：「什麼都沒有改變。」

在洛杉磯，娜拉跟她先生也被生活困住了。她銳利的眼神因為憤怒而更顯明亮，言語中盡是苦澀。她在一家韓國餐館裡當廚師助理，一周工作六天、一天十二小時，顧客的小費並不會分給燠熱廚房裡的員工。到了傍晚，因為她先生不願意自己煮飯，回家以後她得替他還有兒子準備晚餐。「整天都在煮飯，回家以後還要煮，就像是在地獄裡一樣。」她憤怒地說著。她跟先生吵過很多次，某次她對他吼道：「你為什麼讓我來這裡？」他走出去，十天都沒有回家。

一九九一年，他從韓國帶著兩萬美元來到這裡；六個月後，她帶著一萬五千元也過來了，如今他們的存款已經降為五千元。他們搬到一間更小、更便宜的公寓裡；他們睡客廳，讓十三歲的兒子睡在唯一的臥房裡。在首爾時，先生經營進出口事業，經手的主要是太陽眼鏡；在洛杉磯，他打零工、做電焊。娜拉以前是個服裝設計師，但是在這裡，她不會講英文，找不到類似的工作，所以她覺得自己被困在洛杉磯的「韓國城」中，被困在韓國餐廳的次文化裡。「我去語言學校上了三個月的課，」娜拉透過口譯員說道：「不過很快就忘光了，我年紀太大了，」她四十五歲。「我住在韓國城，不講英文也可以過日子。」她可以過日子，但是卻走不出去。

他們兩個人都有工作的時候，帳面上的收入看起來不差，她一個月大概賺一千七百到一千八百美元，但過長的工時代表她的時薪只能勉強達到加州法定的最低時薪六點七五美元，而且加班時間被刻意忽略不計。他焊接大門和籬笆，一個月可以賺一千到兩千美元，合起來兩個人一年可以賺將近四萬美元。這很清楚說明了雙薪家庭的好處和單親家庭的風險：對那些低工資的人來說，單親是通往

貧窮之道。儘管如此，他們還是覺得生活很拮据。洛杉磯是個高消費水準的城市，大眾運輸系統很糟糕，他們需要兩輛車子，一台卡車、一台轎車；他們的工作沒有提供健康保險，所以他們得花大錢去看韓國醫生跟牙醫。身為非法移民，他們幾乎完全得不到任何政府提供的福利（娜拉堅持，就算有的話她也會拒絕）。此外，心理上的封閉讓他們有一種挫敗感，邊緣化又與世隔絕，有如一灘死水。娜拉只想回韓國，她先生卻想留下來。

李正姬也覺得自己被困住了，她是一個嬌小卻健壯的女人，帶著一抹蒼白的微笑，在一九九五年跟先生一起從韓國來到這裡。當時他拿著學生簽證，要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唸電腦科學。「我們把在韓國的房子賣了，」她解釋道：「還在韓國時我們就計畫好了，如果把房子賣了，會有一大筆收入，我們可以來這裡唸三年的書，舒舒服服地過日子。而且是我們倆都可以去唸書，我從來沒想到我得去工作。不過到這裡後，短短一年錢就用完了。」他們對這裡的生活成本感到吃驚，從在韓國三房兩廳的房子，淪為在洛杉磯的一房公寓；兩個孩子睡床上，做父母的睡地上。

她從韓國的銀行櫃台出納員，淪為洛杉磯的服務生，賺的比最低工資還要少，好幾個小時就這麼兢兢業業地在餐廳廚房的濕滑地板上走著。某天她端著盤子，失足滑倒了，餐具摔碎在地板上，夢想也同時摔得粉碎。她的背傷很嚴重，一整年都沒辦法工作。由於急需用錢，她先生不得不輟學找工作——大學學位淪為遙遠的夢想，而李正姬的雇主也沒有給予勞工賠償。她找了一個律師，同意只有打贏了官司才收取勝訴酬金，但是過程可能要持續五年之久。

這個家庭的收入算得上好了，但是他們來美國時所懷抱的雄心壯志也破滅了。先生現在是個製衣承包商經理，一個月大約賺兩千美元，比大部分的製衣工人好多了；李正姬回到一家韓國餐館端盤

子，一周工作六個晚上，那裡的小費很不錯，幾乎能讓她一個月八百美元的薪水變成兩倍。然而這些錢逐漸消失，他們沒辦法存錢，因為沒有健康保險，他們的醫療花費很高，生活中的壓力耗盡了他們的耐心。他們可以回韓國，但是他們覺得這樣失敗地回去很丟臉。

「如果單看賺的工資，那還不錯。」她說道：「不過問題是你的工時很長，而且當你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工作時，誰來照顧小孩？所以到最後你每個月要花五百美元請保母，也沒什麼時間陪家人或先生，生活就是上班、回家、睡覺，然後又出門。我沒時間煮飯，所以他們都在外面吃。」她談到先生和孩子。那樣花費很高，他們的日常飲食跟健康也受到影響。

「我先生是個上班族，但是他沒有任何社交生活；他有朋友，但是他不能跟他們一起出去，他得回家照顧小孩，所以我們很常吵架，他認為自己沒有一天能休息……在韓國時，我們從來沒吵過。我聽其他移民說，移民的最初五年妳會跟先生吵不停，但是如果你們可以撐過去，你們以後就會一直在一起。」

「在一起」只是一種相對的說法。她先生每天早上七點半或八點離開公寓，晚上八點半回來，而那時候她還在工作。「我大概晚上十二點或凌晨一點走進家門，門一打開，我先生在打鼾，大家都在睡覺，我會產生『我活著到底為了什麼』的感覺。我變得非常憂鬱。在韓國的時候，起碼我們晚上會待在一起，可以聊一些事情，但是現在我們彼此沒什麼好講的，沒時間可聊，也沒話題可講。」某方面而言，韓國移民已經被美國同化了；他們的離婚率大約是百分之五十。

在美國的移民若想得到解脫，幾乎都得等到下一代才有辦法。比如做父母的不會講英文，但孩子會講；做父母的被局限在高工時和低工資之中，但他們的孩子能藉由自身技術和良好教育找到出路。

第四章 充滿恥辱的收割季

Chapter 4

這些是遭到遺忘的人，
缺乏保護、沒受教育、
衣不蔽體、食不果腹。

——愛德華·默羅 Edward R. Murrow，

《收穫的恥辱》(Harvest of Shame)，1960

儘管我們很難跟從前的時期相比，但在今日的種族圍城中，前述這些假設並不一定能成立：下一代不一定會成功、進步，出人頭地走進陽光下，共享這個國家的繁榮。

事實上，我問李正姬，她認為她的孩子將來會過怎樣的生活，她的回答很妙。她描述了自己在韓國移工扶助會的活動中有多麼積極，她想要改善韓國餐館的工作條件。這場戰役若是獲勝，她相信就能讓她的孩子的生活變得更好。我問她，這是因為她希望他們在餐廳裡工作嗎？「不能保證他們不會在餐廳裡工作啊，」她哀傷地說道：「當然，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去唸耶魯、哈佛、哥倫比亞或紐約大學，成為一名醫生或律師。現在我兒子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警察，我女兒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小學老師，但是考慮到未來就業的實際情況，誰知道呢？他們到最後可能就在餐館裡工作。」

如果空心磚搭建的簡陋工寮裡塞滿移工，這種建物給人的印象就不會那麼惡劣。我們會跟這些男女女談話，開玩笑，聆聽他們的故事；我們會忙著聆聽他們的笑聲、觀察他們粗糙的臉龐和疲憊的雙眼，而不太會去注意一無所有且漆黑的房間、生鏽的雙層床架、有污漬且發臭的床墊、骯髒的廚房水槽、破損的窗戶、沒有隔間的成排廁所，這些人的出現會淡化他們糟糕的生活情況；但現在是十二月，北卡羅萊納州的生長季節已經結束了，因為橫掃田地的颶風席捲一切，毀了作物而提早結束。一小堆滿布灰塵的番薯是此地最後的收穫，被堆放在外面的牆邊。陽光普照的星期三午後，「營房」空蕩蕩的。在這空蕩之中，迴盪著艱辛的餘音。

就像大部分的工寮一樣，這個地方鮮為人知，很難找到。牧師湯尼·羅哈斯用廂型車將我們從牛頓格羅夫載來這裡。車子夠大，足以在顛簸的泥土路上穿越一個個水坑溝渠前進，最後抵達一大片田地。在雜草叢生的土地上，距離種植感恩節番薯不到二十英尺之處，矗立著一棟建築物。它看起來就像是荒廢的穀倉般淒涼，狹長的建築有著尖尖的屋頂，每層樓有很多扇門，每扇門都通往一個未經粉刷的空心磚搭建的房間，就像牢房一樣。每間「牢房」都有霉味，天花板上掛著一個光禿禿的燈泡，擺著兩、三張床，但遠遠不夠工人們睡。牧師把乾淨的床單發給工人，我請我的兒子麥可做西班牙文翻譯，好跟他們交談。

一幅這棟建築物的淒涼攝影像個悲慘的象徵，掛在湯尼牧師辦公室的牆壁上。這是一幀大型彩色照片，畫面中一個年輕人坐在地板上，四周的床墊髒兮兮的。有天這個年輕人去湯尼的辦公室時，很驚訝看到自己曾置身這樣的環境之中。他告訴牧師，如果他的家人看到這張照片，就永遠也不會讓他來這裡了。「床墊看起來令人作嘔，很黏膩，聞起來很噁心。」湯尼牧師曾經對我們這麼形容。「在那裡很恐怖，他們寧願睡在地上，因為怕睡在床墊上會得病。」

湯尼是個年約五十歲的哥倫比亞人，本來是天主教神父，後來轉為美國聖公會的牧師。他有一張寬闊的棕色臉龐，能夠生動地表現出喜怒哀樂。他試圖透過聖公會的牧師職位來幫助這個地方的移民，這些移民既脆弱又堅強，既漂泊又堅定，在採收季節的高峰時期，他說會有十二到十四名男人擠進這些十二乘十五呎大小的「牢房」裡；女性人數較少，被分配在另外幾間。夏日酷熱難當，沒有空調，除非工人剛好自己有帶，否則連電風扇都沒有。移民們往往輕裝上路——一雙鞋、兩三件褲子，男男女女擠進一輛廂型車或貨卡，隨著季節從佛羅里達州的柑橘園移到北卡羅萊納州，那裡有棉花田、菸草田、菜園、草莓園和番薯田，有時候再移到賓夕法尼亞州和紐約的蘋果園，接著再次南遷；秋末，有些人會去砍聖誕樹。你生命中的每一天幾乎都會接觸到他們的勞動成果，更不用說到了節慶的時候。

農場主人通常會提供住處給移民——就像上述的工寮、破爛的拖車，或者年久失修的木造農舍，看起來就像是耕地上遭遇船難的船隻。我們離開主要道路，經過一區整齊的、已掛上聖誕節裝飾的磚房。滿是車轍痕跡的泥土路通往兩間看似廢棄的腐朽房屋，窗戶破了，門半懸垂在門樞上，油漆彷彿已塗了幾十年般的斑駁。屋裡空蕩蕩的、骯髒灰暗。湯尼牧師說，這裡住了很多工人，他們都睡在走廊上。多年以前，有人爬到屋頂最高點，放上一塊手工製的牌子，上面寫著「六號汽車旅館」。

「他們每天都開開心的。」湯尼牧師觀察道。而在田地那一頭，在整齊的白色圍籬後面，他們能看見紅褐色的馬匹，在粉刷得白亮的寬敞房屋前跳躍嬉戲。

就像以空心磚搭建的工寮作為住處一樣，有時候屋主會把房子租給負責召集、運送、組織農場工

人的承包商。有些農夫會向移工收住宿費，有些不會；有些農夫付的工資還不錯，也會一起負擔車子和拖車的貸款，有些不會；有些農夫對工人既冷酷卻又在小細節多加關照，雖然無情，有時卻會像父母般照顧他們。

不像那些破舊的木屋，這個工寮從一開始顯然就只有一個功能，不管屋主是誰（湯尼牧師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一定很清楚自己在幹什麼。設計出這樣粗糙的建築，格局也無法作為他用，只能給工人住——並且剝奪他們的尊嚴。這不是一棟老舊的建築，只是有效率得比老建築還令人不寒而慄。廚房裡有一座瓦斯爐，還有五個瓦斯接頭，承包商會按照季節提供瓦斯。餐廳兼公共休息室，擺了兩張野餐桌，還有一個布告欄，注意事項都以西班牙文和英文同時撰寫，講的是最低工資和移民權利，有一則警告只有英文：

男性

請勿靠近女性浴室

女性

請勿靠近男性浴室

擅闖被逮，罰款三十美元

人人都有自以「的浴室，各用各的。

男性浴室裡有一個水槽，四個一覽無遺的廁所、四個蓮蓬頭，安裝在窄到不可能讓四個人同時淋浴的空間裡；女性浴室的格局一樣，只是有兩個廁所、兩個蓮蓬頭，看起來沒有任何一樣東西是乾淨的或維修過的。這裡沒有隱私，更談不上什麼舒適，就連原始村落裡能夠找到的寂靜簡樸也沒有，在那裡，至少人們在過生活，而在這裡，他們只是被存放著，像種子跟肥料一樣被儲藏起來。

湯尼牧師知道在我們走過這些房間時不要打擾我們，彷彿我們正在參觀犯罪現場的紀念碑一樣。事後，我和麥可比對兩人的筆記，才發現我們都被喚起同樣的回憶：我們都想到另一種營房，那裡曾經上演滔天罪行；接著我們又覺得自己錯了，不該這樣比喻，因為兩種狀況無法類比，這裡所發生的不公義與那裡的情況相差甚遠。但是，置身於糟糕之處的感受卻如出一轍。即眼前空無一物，你還是成了見證人。

克勞帝奧和他十八歲的妻子住過這裡，他是個不苟言笑的二十四歲青年，穿著毛衣和迷彩軍服，鬍鬚和薄山羊鬚勾勒出一張消瘦的臉，在十二月的黯淡光線下，看來有些灰暗。去年夏天，這對年輕夫妻展開他們的美國新生活，他們付錢給「土狼」，也就是人口偷渡販，讓他們穿越靠近德州拉雷多市的墨西哥邊境，從那裡潛入美國。克勞帝奧付了一千三百美元，他的妻子付了一千四百美元，這個價格在過去十年之內已經翻漲了一倍。「女人的費用比較高，是因為女人比較費事。」克勞帝奧解釋道。

他們沒有現金，所以這筆費用以貸款預付，在之後的三個月內從他們的工資裡分期扣除。作為抵

1 編註：作者在此加註，原本本來就是錯字。

押，克勞帝奧的父親必須簽字轉讓自己在墨西哥的房子和七點五英畝的土地，替克勞帝奧和他的妻子簽下現代的奴隸契約。他們不能不去工作，因為他們沒錢；他們不能不交錢，因為這樣一來他的父親就會失去財產，這是墨西哥人非法進入美國常見的安排。

這趟旅程艱辛而危險，並且越來越困難，因為美國邊境巡邏隊加強了監管，尤其是在城市地區。移民因此轉而由偏遠的沙漠地帶進入美國。他們帶的衣物太少、飲水不足，使得在荒野中因寒冷或酷熱而倒下的人數不斷攀升。自一九九三年起，引進新技術並增派人手監管邊境後的五年以來，因為穿越邊境而死亡的人數從六人激增為八十四人，而單二〇〇四年十月到二〇〇五年十月之間，就有四百七十三人死亡^[1]；二〇〇八年，美國政府統計的死亡人數為三百二十人，但是墨西哥政府統計的死亡人數為七百二十五人。^[2]

克勞帝奧和他的妻子很幸運，一路走來還算簡單。他們白天躲著德州的邊境警察，夜裡趕路，只走了三個晚上就到了事先安排好的地方，承包商開著廂型車來與他們會合，把他們載到南卡羅萊納州的一個農場（而且不用額外收費噢，克勞帝奧很高興地說道）。他們在那裡做了一個月，把木樁跟塑膠布從番茄田裡搬出來。他不太清楚工資是怎麼算的，「我們永遠都不知道他們會怎麼付錢，」他承認，「他們沒告訴我們。」他覺得不是照小時算，而是照木樁的行數來算；他只知道工資比在墨西哥多很多，而且——他現在知道了——照美國標準來說微不足道。他和妻子所搬的行數相同，兩個人大約拿到兩百五十美元——但兩個星期才領一次，因為承包商扣留了一半的收入給「土狼」。「一張支票給我們，一張給那個人。」克勞帝奧說道。

接著他們被送到北卡羅萊納州的空心磚營房。他們每天早上五點起床，一台廂型車把他們送到幾個小時車程以外的遙遠農場去，而他完全不知道農場主人的姓名。在那裡，他們每天花八到九個小時跟在挖番薯的拖曳車後頭，用手撿番薯，並且盡快裝進八加侖大的桶子裡。裝滿一桶賺四十分錢，而他一小時可以裝三十桶。他說：「如果田裡狀況好，就有很多可以撿。」我問他是否一小時就可以賺十二美元？「不，」他看起來很迷惑地回答道：「沒有，應該比這少，因為一天想賺五十元的話，我們必須整天都很賣力。」不是克勞帝奧的算術很糟，就是承包商太狡猾。克勞帝奧和妻子都沒有念完小學六年級，相反地，承包商知道如何巧立名目，從薪資單上扣錢，讓他們每天的工資只剩下大約四十美元。不過即便如此，日薪還是比克勞帝奧在墨西哥的田裡工作一星期來得多，所以他沒有表現出一絲不滿。「支票上扣了很多項目，」他平心靜氣地說道：「他們會扣租金、照明費、清潔費等。」他不記得扣了多少。

清潔費，租金。在這間骯髒的空心磚營房裡，克勞帝奧和妻子不情不願地付了租金。他們還算走運，跟另一對已婚夫妻一起住，只有他們四個人；而許多晚上的人都被塞進小房間裡，那些人得睡在地上，睡在水泥地上攤平的紙板上。「我們賺的錢不夠買食物，」他說。後來颶風帶來的暴風雨淹沒了一切，只剩下營房，像個廢棄物般孤零零地矗立在汪洋泥濘的水澤之中，工作因而暫停，移民們用打牌來打發時間，等待新工作，而克勞帝奧跟妻子還欠土狼兩千三百美元。

一個月後，這對年輕夫妻在一通打回墨西哥的電話中，得知他們十四個月大的女兒生病了，他們得寄五十美元回去給她看病。於是他們不再空等工作，兩人離開空心磚營房，徒步走了出去。很少移民自己有車，大部分人都困在偏遠地區，靠承包商定期載他們去雜貨店或是城裡的洗衣店，不過他們的承包商沒有來，所以這對年輕夫妻跋涉好幾英里，來到牛頓格羅夫。在加油站，一個墨西哥人收留

了他們，直到因暴風雨滯留而延宕的工作有點進展為止。另外兩名墨西哥人邀他們一起分租房子，那是一棟飽經風霜的小屋，位於殘破不堪的韋德鎮。克勞帝奧沒有工作，有一陣子他受雇蓋屋頂，一星期賺兩百五十美元；接著他又受雇於伐木工，結果伐木工的卡車壞了，他再度失業；一星期前，克勞帝奧的妻子受雇於一家肉類加工廠，但他不確定她能賺多少。妻子想回墨西哥去，只是土狼還在等他付錢，因為颶風的緣故，他可以延期還款。

我前一天才去過工寮，現在則想透過克勞帝奧的眼睛來看這一切。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不會內省或做生動的描述，所以我的問題要具體，但不能有引導性（我想知道他住在這裡有什麼感覺，但不能暗示他我認為他應該有怎麼樣的反應）。他表達出來的意思是，這裡的骯髒邇邇跟沒有工作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因為他來這裡的目的就是為了工作。工寮的環境符合他當初的期待嗎？還是比他預料中更糟？「對我來說不好，因為那裡沒有工作。」他回答道。除了沒有工作以外，他對目前的情況沒有其他想抱怨的嗎？「像是什麼？」嗯，任何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可以，有沒有什麼是他不喜歡的？「唯一不喜歡的是沒工作。」

隔年四月，我們又碰上了這種奇特的、缺乏憤怒情緒的人。二十五歲的佩德羅坐在另一棟空心磚建築的床鋪上，那個房間只有八乘十英尺大，位於北卡羅萊納州芒特奧利夫和費森山之間的伯奇農場。房間裡粉刷成鱗鱗分分的藍綠色，外面則是斑駁剝落的粉白色。在十三號房的門上，有人貼了一張保險桿貼紙：「多吃番薯。」第一批春季萵苣、甘藍菜、蕪菁已經從成排的塑膠布中探出頭來，一整片田地看起來就像是陽光下發光的洗衣板。

佩德羅左耳戴了一個小小的金色十字架，頭上戴著有點髒的克里夫蘭印第安人隊棒球帽。他才剛

像難民似地從另一個人稱「地獄」的房間裡搬過來，因為那邊的人太野了，整天喝酒、持刀鬧事。他沒有床，只能睡在地上，他十五歲的表弟被刺傷之後，他就讓承包商把他換來此處，起碼「工寮」這個名字沒「地獄」那麼聳動。這裡很陰冷，不過到目前為止都很安靜。房間裡的兩張床都有床墊，其中一張床立起來靠在空心磚上，一幅耶穌的彩色畫像用灰色大力膠布貼在牆上。角落裡，兩根釘子中間綁著一條廢棄的黑色電線，用來掛毛巾和牛仔褲。他所有的家當都放在兩個黑色的塑膠牛奶箱、一個冷藏箱跟幾個塑膠袋裡面。牛奶箱上面有一個滿新的棒球手套和一個簽了字的棒球，上頭用大大的西班牙文寫著「佩德羅，我愛你，」是他在墨西哥家鄉的女友寫上去的，他已經一年沒有見過她了。

現在是人口普查的季節，但是佩德羅的戶籍並不存在於此處，他沒有收到普查表，也沒有見過普查員。幸運的是，移民暨歸化局也不知道他的存在。不過國稅局和社會局知道他，因為他們會從他的工資中扣除一部分，每個星期按時由他的雇主來扣除。他領的是最低時薪五點一五美元，從來沒領過什麼社會保險福利，當然他也不敢去報稅，萬一國稅局向移民暨歸化局告發他的話該怎麼辦？

颶風過後，佩德羅決定留下來過完冬天，包裝洪水過後僅剩的番薯跟紅蘿蔔。他每星期工作六個小時，賺的錢是他在墨西哥屠宰場的九倍；每個月可以寄三百到五百美元給他的父母，他們則用這筆錢在墨西哥替他蓋房子。「上帝保佑，只要再過兩年，」那時他就有望回墨西哥，住在新房子裡，在家裡的田地上收割玉米和豆子。這是佩德羅說過最接近抱怨的話。

這裡的主人倒是對這棟建築物多有抱怨。吉米·伯奇一邊碎碎念一邊開貨卡，載著我們參觀這座他跟兩個兄弟共同經營的大農場。「看到院子裡的啤酒罐跟大便了嗎？」他帶著鄉下口音說道：「十年前我花了六萬美元蓋了這裡，結果為了這個工寮，我大概被罰了兩萬五千元。就算我說院子裡的

那些啤酒罐、破掉的窗戶」是他們幹的，不是我」，但完全沒用，被罰款的還是我。」罰款是由勞動部徵收的，這個部門發給這棟房子建造許可，但是似乎沒有盡力確認它符合標準。吉米想把房子脫手給別人，「每個星期都會被破壞，所以我不想再浪費錢了，也不想再管了，有達到最低標準就好。我祖母給我的爐灶，我用了四十年。但這些工寮裡的爐灶連一年都撐不過。」

吉米是個滿胖的人，個子不高，不過整個人很緊繃，有一股「我說了算」的氣勢。他有一頭淺棕色的亂髮，臉色紅潤，一雙警惕的藍色眼睛不時掃視著成排閃亮的紅葉萵苣。銳利的目光讓他能夠看得清楚，同時知道自己遺漏了什麼。他開著濺滿泥漿的黑色雪佛蘭貨卡滔滔不絕地講著，接著突然從路面轉進泥土路上，繞進一片田地。他先是直直往前開，輪胎從成排綠草上壓過，接著從對角切過不平坦的草坪，直到停在兩、三個人面前。一旁有輛牽引機和拖車，上面堆滿了灌溉用的水管。他用整脚的西班牙文跟年紀比較大的工人講話，北卡羅萊納腔拖得太長，麥可一個字也聽不懂。年紀比較輕的那個工人看起來有點害怕，畏畏縮縮的，什麼話也沒講。吉米既腳踏實地又能綜觀全局，他在自己的地盤上自在而謹慎。

他把車停在拖車附近的泥濘地面。「我們家是從這裡開始發跡的，」他說道。他的哥哥大衛是一名直升機駕駛員，在一九六八年越戰的春節攻勢中遭擊落陣亡，當時他十四歲，他家人用壽險理賠買了這塊十四英畝的地，後來擴大到三十五英畝。種菜賺的錢足夠讓五個兒子都讀完大學。「我們以為我們家很有錢，」吉米看著地上的泥土說道：「但其實是父母把所有錢都花在我們身上了，他們就是這樣，自己一毛錢都沒有剩下。」

現在他們有兩千英畝的地。他和兩名兄弟種植黃瓜、青椒、冬南瓜、茄子、各種綠色蔬菜和番

薯，銷售通路遍及波士頓到邁阿密，年收入總計約一千五百萬美元。通常每一塊錢的稅前淨利是三成到四成。這樣的利潤在許多行業中很常見，不過農業很容易受到天氣的影響，比如去年洪水造成了一百萬美元的損失，但聯邦政府只補貼一萬七千五百八十三美元，其中包括八千零九十五美元的賑災款。^[3]「太可怕了，整個秋季的綠色蔬菜、黃瓜跟冬南瓜都沒了；幸好我們搶救回大部分的番薯。」他繼續說道：「大自然就是這樣，能給予也能奪走。」還有石油公司也是：今年和去年相比，吉米每個星期要多花三千美元買燃料，而種子、肥料、殺蟲劑的費用在過去十年來漲了一倍。

現代農業是一門棘手的行業，必須算準時間，在合適的時間讓合適的蔬菜上市。隨著季節無情地嬗遞，「你只有一小段時間可以種植，」吉米解釋道：「你要把握那段時間種東西，如果沒有的話，你就知道你什麼也賺不到了。佛羅里達州有佛羅里達州的時間，喬治亞州有喬治亞州的時間，我們有我們的時間，然後到了澤西跟密西根也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蔬菜交易時間，如果跟別人重疊了，你在市場上會死無葬身之地，價格直直落。」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用好年頭來抵消壞年頭，「就像去大西洋城賭博一樣，差別很小……別誤會我的意思，我們已經做得很不錯了……我工作了這麼多年，一頭栽進熱門市場，有一年賺了不少，把債務還清了，又再繼續做下去。幸運的是，我有賺錢的年頭夠多，可以把債務還清再繼續。」貸款專員對他夠有興趣，願意偶爾開車出來看看他的作物。「我跟銀行的人很熟，」吉米笑嘻嘻地說著：「我們認識彼此很久了，不過我一向都有還錢，所以他也樂意借我。」

吉米開著卡車來到一片芥菜田，將車停在一排繁茂的甘藍菜和其他綠色蔬菜的後面，一群人正以手工割採蔬菜，把翠綠的新鮮蔬菜裝進箱子裡，他付他們一箱一美元。他說，大部分的工人一小時可

以裝十箱，動作快的可以裝到十五箱，而他每箱蔬菜賣五美元。不過，吉米很快又補充說：「我這樣可賺不了大錢。你知道的，盒子一個要一點一美元、工人的工資一美元、冰塊二十五分錢，種一箱菜成本要一塊半，我每箱能賺的大概也就五十分錢。」從這些數字看來，利潤其實還要多出兩倍，數學在這裡似乎是個模糊的科學。「我想一箱賣十美元，不過市場不允許。」他有沒有可能壓低付給工人的錢呢？「唔，大概可以吧，我知道可以。但是，唉，我希望這些人整年都可以待在這裡，我想要穩定的勞力來源。」這就是為什麼他種植一連串作物的原因：保持穩定的勞力需求，讓一些好工人有事可做；這也是為什麼其他農夫會栽種菸草的原因。舉例來說，因為種黃瓜之前可以先種菸草，然後等到收成黃瓜之後再來收成菸草。

伯奇農場全年雇用了一百一十五到二百二十個人，從五月到十一月還要再另外多雇一百個人左右，勞工的工資占農場開支大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顯然有壓低工資的動機。另一方面，吉米自稱對可靠的工人有強烈的需求，希望他們能夠留下來，或是每年都能夠回來。「他們來這裡不是要讓我賺大錢的，」他說道：「他們是來討生活的，他們也有自己的夢想。」所以他盡量多付他們一點，讓他們的工資足以跟在工廠上班相比。這表示他認為農場上的人手按件計酬所領的錢，應該要讓他們每小時平均可以賺到十美元（「他們因此必須忙個不停，不過他們辦到了」）。包裝工人原本拿的是最低工資，不過吉米會調漲到六或七美元。他還打算為全職員工加買健康保險。「要想留住他們，你就得多付一點，沒有人會為了賺最低工資而留在這裡。見鬼了，他們靠最低工資沒辦法生活啊。」事實上，最低工資對於更高的工資會有影響，如果最低工資提高一美元，照他算來，薪資高於最低工資的人，薪水至少得再提高五十分錢。原因很簡單，他宣稱：「沒人是因為喜歡你而替你工作。」

留住好工人的另一個方法，是幫助他們買房在此安頓下來。為了說明他的觀點，他開車帶我去看群聚的拖車，當地人稱這裡為小墨西哥。「我和這些人聯名擔保拖車，」他解釋道。接著指了指一棟不錯的老式獨棟房屋，「我幾乎是把那間房子送出去了。」雖然他還是土地的所有權人，但是他不收租金。這是因為他發現很多墨西哥移民如果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就會留下來，所以他給他們房子，提供理財建議，為他們的貸款聯名擔保，幫助他重視的員工脫離顛沛流離的生活，在他的農場上落地生根，對他保持感激之情。他替大約二十名員工這麼做，誇口說好處是互相的。他指著另一棟房子說，一名值班工頭跟他太太住在那裡。「我去法院把那棟房子過繼給他，他現在是所有權人了，這樣我就不用再忍受政府的胡說八道……如果院子裡有啤酒罐，我可以說：『房子是他的。』而且你可沒看到院子裡有半個啤酒罐，是吧？所有權會帶來很大的不同。」

對他來說，這麼做的風險很小。「如果買全新的拖車，大概要兩萬美元。」他說道，邊指著「小墨西哥」上一台又一台的拖車。「這輛是舊車，我想這個人大概花了一萬美元吧。那個人買新的，我想花了一萬八吧。在這裡的都是結了婚的人，有太太有小孩，他們不想再待在工寮裡，想要有點隱私，他們也不想那些年輕人在他們的小孩附近晃來晃去，周末就喝得醉醺醺鬧事。」吉米說，自己從來沒有在房子的事情上被騙過。「不過車子有，」他說：「我不再幫人家聯名擔保車子了，他們的想法很奇怪，認為變速箱或是發動機壞了就不用再繼續付錢了，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那樣想，所以遭殃了兩、三次後，我不再聯名擔保汽車貸款。不過房子就沒事，從來沒有。」他會嚴格篩選要協助的人，這代表他不是一個單純的利他主義者。「得是在這裡待一段時間之後，彼此相熟才行，我可不會替哪個隨隨便便走進來說『幫幫我吧』的人做這種事情，我沒興趣。」

他幫過狄加多一家人，他們的煤油暖爐爆炸，燒毀了拖車，而他們沒有保險。「他借錢給我們買車，還把工寮裡的房間借給我們，又替我們聯名擔保貸款。」瑪麗貝說著。這名年輕的母親說話時臉龐亮了起來，她和丈夫海克特一起坐在長拖車尾端的廚房裡，對面有兩間臥房，中間是寬敞的客廳。「活動拖車式房屋」幾乎不動，就擺在空心磚上，土地仍舊為吉米·伯奇和他的兄弟所有，狄加多夫妻希望他們能夠買下土地，但這塊地需要清理，再挖一口井，除了拖車的四千美元以外，還要花上兩千五百美元。

吉米跟這家人利益攸關，他們對他的長期忠誠是一種資產。瑪麗貝的父親多年以來一直在這裡的農場工作，而她在包裝工廠上班，一小時賺六點二五美元，海克特包裝一箱蔬菜也差不多是這個價錢，他達不到吉米吹噓的一小時十美元。他算過了，在收割高峰時期，每星期工時將近七十小時。「沒蔬菜或下雪的時候，」他說：「我們就完全沒工作了。」他們盡量每兩個星期寄一百美元給在墨西哥的親戚。

狄加多夫妻沒有醫療保險，不過他們的三個孩子有醫療補助；他們在美國出生，有美國國籍。這家人的收入夠低，所以可以領取食物券，不過自負的職員總是跟瑪麗貝說她來的時間不對，或者說她不是「真正的」居民（雖然她也是美國公民）。沒有證件的移民無法享有這些福利；而合法移民當中，只有兒童、老人或殘障人士才能享有福利，並且這些人必須在福利改革開始之前來到美國，也就是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之前。拒絕繼續給予福利是為了遏阻非法移民，不過效果不彰。

瑪麗貝證明了沒有任何手段可以遏止移民，青少年時期，她多次與移工父親穿越格蘭河，他們受到武裝強盜襲擊，晚上則遭到邊境巡邏隊警察用探照燈搜捕，整群人被逮捕，遣送出境；後來她又

試了一次，但是河水湍急洶湧，把她沖到下游，她以為自己要溺死了，最後她回到墨西哥那一側的河岸，一群人再度遭受攻擊，有一個人被捕了一刀；第三次嘗試時，「我們穿過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那裡全是毒販，」她說道：「帶我們穿越那裡的人，我想他認識毒販們，所以毒販才讓我們過去。」她跟母親住在德州的布朗斯維爾，然後申請了一九八六年の特赦，當時給予某些沒有證件的移民合法身分，她因而拿到綠卡，保證了她留在這個國家的權利。七年後，她取得公民身分，海克特也取得了身分。

這群人現在似乎成了社會的中堅分子，樹立了典範，從基層奮鬥起，在艱苦貧困的生活中不斷增加收入，關鍵字是「不斷增加」。但要說他們的生活是典型的移民之旅，從貧困開始到平順，那倒是很難看出來。瑪麗貝和丈夫以及父親都做一樣的工作，所以世代之間沒有社會流動，除非把搬到美國來算作向上發展。儘管她對孩子唸的農村學校還算滿意，不過那不能讓他們上得了大學還是個問題；從他們生活在小墨西哥的拖車中看來，未來機會不多，也很有限，他們看不到遼闊的可能性。

對這裡大部分的工人來說，「升遷」只會出現在農場勞動的圍城之中：從農地工人變成牽引機司機、從採摘工變成主管、從移工變成承包商。賽維里諾·桑蒂瓦內茲就從移工成為承包商，他渾身散發成功氣息，雖然他只比他管理的那些人多賺了那麼一點點。他有點發福，白襯衫的扣子在肚臍上方敞開，露出一點啤酒肚；他笑的時候看得見金牙，他常常半坐半倚在卡車司機座上笑著，車門在黃昏中的暮光中敞開。

卡車停在房屋外面，一九八九年時他住在這裡，如今他讓手下的工人住，這九名工人都來自墨西哥維拉克魯斯州。「我喜歡這棟房子，」他說道：「因為這裡的水很涼，很適合直接喝，而且這棟房

子很堅固。」為了證明他的論點，他指出雖然房子看起來早就廢棄了，卻仍然屹立不搖。他還宣稱幾年前刮過龍捲風，但房子安然無恙。

這棟房子也是容易引起火災的建築物，它離最近的消防局要半天的路程。從遠方的狹窄柏油路穿過一望無際的平坦田地，經過無數緊密相鄰的房屋，接著轉進泥地裡，又在剛種下菸草的田裡轉來轉去，然後才到得了這間房屋。房子只有一層樓高，以前是白色的，殘存的油漆還在持續剝落，露出下方飽經風吹日曬的木頭。有扇窗戶的玻璃已經消失，那裡就用紙板蓋住了。前面殘留的電話線桿上，釘了一塊褪色的綠色合板，上面接著一個生鏽的籃框，但他們沒有籃球可打。破損的紗門裡以前是餐廳，現在則擺著四張床鋪、配上鬆垮的床墊，還有一台生鏽的冰箱；從前的客廳壁爐已經被封起來了，客廳一樣擺著四張床，沒有衣櫥，牆壁上釘著釘子，上衣和褲子吊掛在層層疊疊的鐵絲衣架上。

賽維里諾沒有為這棟房子花半毛錢，農場主人慷慨大方地讓他使用，幫賽維里諾支付住處的房租，還按照賽維里諾手下的人數計算，一個人給他一小時五十分錢。所以在高峰期，他手下的人數會增加到二十七名，每小時可以賺十三點五美元，差不多是美國的平均薪資。對於一個只有小學一年級教育程度、幾乎不會讀寫的人來說，算是不錯。「我在這裡學到更多，因為我得寫名字。」他給我看他手下的人的清單，這些人現在都替吉米·伯奇工作。賽維里諾是碰巧才升到這個位置的，十多年來，他在佛羅里達州跟北卡羅萊納州之間的農場遷移，後來升到主管，某天農場主人要他多找些人手來，他照辦了，於是 he 有了新的職位。

他手下的人都很憂鬱，他們都很想念家人，渴望回到墨西哥的家中。每個人都有一張精心規畫的時間表：明年一月、一年後、兩年後，他們就能回家。他們賺來的錢有七成都寄回家了。在這裡的經

驗啟發了他們對事情優先順序的思考：「我學會了珍惜家庭，」一名年輕人聲稱。「這裡有物質、有錢，但這不是生活，這是生計；用錢買不到精神生活跟家庭，而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工人們住的地方離最近的城鎮有好幾英里遠，除了賽維里諾能提供車子之外，沒有任何交通工具，這些人覺得自己放棄了獨立生活。「我在這裡一切都得靠大家，」其中一人說。在家鄉，「你有自由，」他補充道：「你可以去這裡，可以去那裡，不必住在離城鎮十到十五公里遠的地方。是為了錢，我才在這裡承受這一切。這裡就像坐牢，像是監獄，只能看到牆壁，我們不能去城裡找樂子，也不能一起去店裡，因為移民局會把你抓走。」

他們沒人會建議親戚朋友來美國工作。「我的兄弟想來，不過我叫他不要，」有個人說道。

「我對我的家人說，大家都不應該來這裡。」另一個人說：「如果他們在家鄉有工作，最好繼續待著，這裡並不好。」

他們的日子過得惶惶不安，幾個星期以前的某個星期日，賽維里諾帶他們從原本住的拖車處去戈爾德伯勒的洗衣店，而等他們回來的時候，拖車已經被起因不明的火災給燒掉了。除了身上穿的衣服跟洗衣袋裡的東西以外，他們全部的家當都化為灰燼。傷亡的還有他們唯一的一台電視，在佛羅里達州的沃爾瑪超市花了兩百八十八點八六美元買的。一名身材瘦高的傢伙拿出收據，然後說道：「對我來說，物質的東西不重要，起碼我們沒有在睡著的時候遇到火災。」

這件事情讓他們緊張起來，儘管賽維里諾讓他們搬到這棟房子，不過他們知道火勢蔓延會有多快，在這種光禿禿的木頭牆壁和地面上，他們焦慮如果晚上失火該怎麼辦。他們沒有電話，沒有車子，離最近的鄰居好幾英里遠，四周也看不到其他房子。我問一個帶我們來這裡、替農業勞工組織委

員會 (FLOC, Farm Labor Organizing Committee) 工作的女人，能不能給他們兩、三個煙霧偵測器，她很堅定地回答說，這是屋主的责任。我說屋主不願意弄啊，我建議她去買幾個，一個只要十美元，把東西交給賽維里諾。但這似乎觸犯了她的某種獨特的道德責任感，她顯然不願意這麼做。我問了賽維里諾，他說也許他有一個，但不知道放哪兒去了。

我們在聚攏的暮色中開車離去，這些人站在外面跟我們道別。即使身處人群之中，他們看起來也很孤獨。

拉米羅·薩拉比亞矮壯結實，留著黑色鬍鬚；比爾·布萊恩精瘦而輪廓分明，穿著灰色休閒褲和白色網球衫，看起來就像是一九五〇年代《奧茲與哈莉特》(Ozzie and Harriet) 影集中的角色。拉米羅的破舊辦公室以前是一棟灰色房子裡的客廳，座落在小鎮水塔的基地附近，看起來像是走太多哩路的舊鞋；比爾的辦公室位於芒特奧利夫漬物公司加工廠的核心區域，整潔而精緻，牆面和地上都鋪了毛毯，正中央有張深色的木製會議桌，上面擺滿了一罐罐醃漬品和開胃菜，都是他公司製造的。

從一九九八年開始，這兩人就成了一樁不尋常的勞工管理糾紛案中的對手。拉米羅是北卡羅萊納州農業勞工組織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他試圖把勞工整合起來，但不是傳統那種由下而上、組織成陣線，以尋求雇主認可的方式；因為移民很難組織起來，他們待的時間不長，不能冒險罷工或被開除，大部分都有被遣送出境的可能。拉米羅代表的六千名工人當中，有將近一半都跟他簽了約，所以他真正想嘗試的是「由上而下」的方法，不只試著跟雇主、也就是農夫談判，還跟購買黃瓜的人談判，比如比爾·布萊恩這個北卡羅萊納州芒特奧利夫小鎮裡大型企業的總裁。農業勞工組織委員會認為，比

爾收購農產品的這些農夫都不夠有錢，除非芒特奧利夫公司願意提高黃瓜的收購價格，不然他們沒辦法以工會希望的收購價簽訂合約；此外，種植者人數很多，分布很廣，眾人對於工作環境與勞動條件的討論無動於衷，所以拉米羅希望比爾的公司能夠成為三方合約的一員，這三方分別是芒特奧利夫公司、農業勞工組織委員、農夫，這樣一來就可以提高工資、改善福利，讓田裡跟工寮都像樣點。

比爾就像個童軍團團長解釋為何該由年紀大的男孩決定誰會被分配到漏水的帳篷那般，和善真誠地說這是辦不到的。「我們不應該干涉雇主和他們的員工之間的關係，」他解釋道：「但如果你去農場，說服農夫跟工人說，有個工會符合他們的利益，我們會尊重這一點，就像我們會尊重其他跟我們做生意的人一樣。我們有些供應商有工會、有些供應商沒有工會。在農業方面，我們唯一有工會的供應商在俄亥俄州，那裡是農業勞工組織委員會的根據地。那個例子的情況是，那個供應商……幾年前來找我們，說他正在跟農業勞工組織委員會談一份合約，覺得那樣對他最有利，問我們覺得怎麼樣？我們說：『嗯，我們覺得你得做出對你營運最有利的決定，做你認為最好的事。只要你不改變供貨方式，提供一樣水準的服務，保持競爭力，我們覺得那就不成問題，我們會繼續跟你做生意。』現在我們跟那個供應商仍舊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不過比爾說他不會強制要合作的農夫都得組織工會。

農業勞工組織委員會認為農業就像製衣產業一樣，需要那些大品牌製造商先妥協，供應商才可能有良好的表現，因為這些名牌對於負面宣傳非常敏感。此外，拉米羅認為芒特奧利夫公司並不像他們所假裝的那樣，與農夫保持距離。這家公司甚至常常在開始種植之前，就以一定的價格跟農夫簽訂合約，這種種植者不只是分包商而已，芒特奧利夫等於「規定了種植者，也控制了工人的勞動條件，」一份農業勞工組織委員會的報告這樣指出。為了反駁這個觀點，比爾指出他的供應商種植的作物相當

多元，除了黃瓜以外，還有菸草、番薯等等，什麼都有，他們是獨立自主且不受限制的。

這種非正統的策略，把加工者視為實際上的雇主，在密西根州和俄亥俄州部分地區奏效了，因為那裡比較靠近農業勞工組織委員會在托雷多市的總部。金寶湯公司（Campbell's）在受到抵制拒買後簽署了合約，接著卻逃避合約的安排，停止於本區採購番茄；亨氏食品公司（Heinz）、維納斯（Vlasic）和迪安食品公司（Dean Foods）針對該地區的黃瓜，與農業勞工組織委員會及農夫簽訂了三方合約。不過，農業勞工組織委員會在小芒特奧利夫卻沒有絲毫進展。北卡羅萊納州東部對於工會來說，就像是弦樂四重奏之於蠻荒的西部，而拉米羅對小鎮的政治反彈與經濟利益了解不多，經過一年毫無成果的會面以後，比爾沒有讓步，於是農業勞工組織委員會發起抵制，拒買芒特奧利夫公司的產品。拉米羅和他的同事發放引人注意的傳單，寄發公開信件，並且得到教堂和地區大學的支持；比爾採取反擊，捐款給那些有影響力的機構。的確，比爾是個有名的人，慷慨大方、有身分地位、廣受喜愛，鎮上甚至有一年一度的漬物節。不過抵制最後還是成功了，二〇〇四年，芒特奧利夫與農業勞工組織委員會和種植者協會簽署了三方合約，提高了黃瓜的收購價格、提供工人賠償保險，並且建立起申訴程序。

農業勞工組織委員會與其他農場工會關注的並不局限於工資和合約，他們也關心殺蟲劑和除草劑對男女老幼造成的傷害。這些受害者負責在美國的土地上大量收割作物，即使政府已經把越來越多這類「過火的東西」（吉米·伯奇如此稱呼那些致命的化學物質）從市場上下架，但有些農夫（吉米堅持說他可沒有）還是會不負責任地使用那些得到許可的化合物，在風中噴灑，噴完以後又太快讓工人下田，卻沒有提供水槽、淋浴和洗衣設備，讓工人還有工人的小孩暴露在數不清的健康風險之中。最令人擔心的是住在田地工寮中的小孩，他們在外面的雜草皮和土地上玩耍，在地上爬行、把手放進嘴

巴裡。他們的父母在上面留下了有毒的殘留物，而發育期的小孩特別容易中毒，畢竟他們的大腦與身體都還在成長。

中毒最明顯的影響是「嘔吐、噁心、暈眩、頭痛、疲勞、嗜睡和皮膚起疹子」，還有支氣管炎和氣喘。根據加州一項研究指出，比較不明顯但更為嚴重的問題包括了「兒童腦瘤、白血病、非何傑金氏淋巴瘤、肉瘤」，對於免疫系統、內分泌和神經系統也會造成損害。不過報告中承認這些症狀「很難證明與接觸殺蟲劑有明確的關係」，因為大部分症狀都在很久以後才出現，可能是多年累積之下才產生症狀的。有毒物質也可能導致農場工人的新生兒有比較高的缺陷率，據記載，約比一般美國大眾高出三到十四倍^[4]，不過這些統計數字並不完整，因為很多症狀都沒有上報。大部分在農地裡工作的人都沒有健康保險，而且離最近的免費診所太遠了。除非病得很重，他們通常不想少領一天的工資，也不想冒著遭到解雇的風險去看病。

由凱薩·查維斯（Cesar Chavez）所創立的美國農場工人聯合工會（The United Farm Workers of America），抱怨加州沒有嚴格執行該州的法律，比如農夫沒有張貼警告說明田裡已經噴灑了農藥，也忽視要等過了強制等待期，才能夠繼續徒手收割。工會報告指出，只罰款兩百到三百美元根本微不足道，而且只有等到患者出現明顯的病徵，罰款才會提高到兩千美元^[5]，但受害者根本不曉得這些事。

移民的孩子在學校也缺乏關注，他們可能只上了幾個月的課就又搬走了。美國對於教育這些年輕人很有興趣，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會留在這個國家，長大後成為公民。他們的教育中斷問題嚴重，並不利於社會的福祉；然而卻只有少數幾項小小的計畫（大多是由美國教育部提供經費）致力於解決這個問題。比如提供孩子筆記型電腦，讓他們可以上網學習；或者是請巡迴教師跟著這些家庭隨著種植季

節南來北往，讓學習不中斷。有了這些努力，這些青少年才能從高中畢業。這項政策在佛羅里達州、伊利諾州、肯塔基州、北卡羅萊納州、奧勒岡州和其他地方都有，不過招收的學生太少了，無法解決大部分人教育資源不足的問題。他們的人生就這麼被局限在註定好的道路上。

從前在北卡羅萊納州工作的都是黑人，先是奴隸，後來則是受到強硬經濟法則囚禁的自由公民。「他們的待遇很糟，」吉米·伯奇看過其他農夫毫不留情地使喚工人。「他們一整個星期都在工作，不管工作有多繁重，他們都只能賺到酒跟三餐，或者是大麻跟三餐，」他回想道。「你可能會說：『唔，這個人只是在利用他們罷了。』他的確是，但這樁交易的另外一面是，他們還能去哪？他們要去哪？他們能做些什麼？我的意思是，他們沒有任何其他職業所需的技能，而這些工作讓他們有個屋頂可以遮風避雨，也許不是多好的屋頂，但起碼有遮蔽、夜裡會暖、每天有得吃。對我來說，這樣活著很糟，但是對他們之中的某些人來說，我猜還可以吧，我猜啦。雖然這樣說有點悲哀，但是我想這大概比在紐約或華盛頓當個流浪漢，等著別人給你五十分或一塊錢好多了。」

如今，大量的黑人從農田移動到城市裡去，從南方去了北方，於是農田裡的工人大多是墨西哥人和中美洲人，而且幾乎都是非法移民，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人是透過名為 H 2 A 的有限農工簽證計畫來到美國的。H 2 A 的申請手續非常繁瑣，而且如果他們抱怨雇主，就有可能失業，隔年也無法延續簽證。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沒有簽證，如果法律能有效禁止雇用這些人，農民認為北卡羅萊納州和這個國家某些地方的農業就會停擺，畢竟手工收割某些作物比較不容易受損。吉米認為，既然美國可以隨意發放簽證給開發電子遊戲軟體的外國人，對於幫忙收割食物的外國人也應該一視同仁。

沒有證明文件的生活很不穩定，因為害怕遭到遣返，對工資或工作條件提出異議之前，你得三

思。除了得不到政府的福利補助、學校裡的免費早餐和午餐、緊急醫療補助、疫苗接種和傳染病治療以外，還有一些沒那麼明顯的不便之處，像是沒有銀行帳戶，轉帳的時候你就得另外支付費用。換句話說，因為你無法讓自己在這個國家的存在合法化，因此美國政府和企業可以從中獲利。

據皮尤拉美裔研究中心 (The Pew Hispanic Center) 估計，美國大約有六百一十萬墨西哥人是非法移民；而根據美國審計總署統計^①，美國境內一百六十萬名農工中，約有百分之五十二未經許可進入美國。他們每年寄超過九十億美元回墨西哥，幫助他們的家人購買食物、衣服、藥物和房屋，湧入的現金甚至超過了某些墨西哥地方政府的預算。大部分工人似乎都著眼於能快速賺到多少錢，而不關心難以捉摸的職涯階梯。一個名叫亞伯的年輕人就是個好例子，他知道該怎麼修理農機，但是卻沒讓任何人知道他有這項技能，因為他寧願待在田裡。如果成為一名技工，在他想像中，「他們會付我跟別人一樣的薪水，但我要做更辛苦、更困難的工作。」

亞伯和許多人一樣，來此只有一個目的——不是要在美國獲得立足之地，不是想要融入主流社會，只是希望能賺夠錢，維持家鄉貧困家人的生活就好。尋常的美國從他們所處的幽黯邊緣看起來，太過遙遠。

亞伯和兩個表兄弟在棉花田裡工作，賺取最低工資。種植季節時，他們得從早上七點工作到晚上七點；十月到十二月的收成季節，則是從早上七點工作到午夜，而且全星期無休。在勞力密集的高峰時期，九個表兄弟全擠在一台骯髒的小拖車裡，拖車就停在棉花田和菸草田中。

在這個農場，種植者依法律規定支付他們每星期超過四十個小時以後，每小時七點五美元的加班費，而且不收他們瓦斯費、電費，骯髒的宿舍也不收租金，這比他們冬天在佛羅里達州採收橘子得

到的待遇好多了（那裡的農夫每星期收他們四十到五十美元的房租）。在最忙碌的時節，他們把將近一半的收入寄回墨西哥，作為讓家中父母脫離貧困的生命線；在比較閒暇的月分，他們幾乎把所有的收入都寄回家，只留下每星期約三十美元的伙食費，還有每個月兩百美元用來支付三人設法買下的舊車。老爺車並不是奢侈品，有車他們才能在農活之間穿梭來去，做些粉刷油漆和建築的工作。儘管如此，所有的勞動都只能換來微薄的成果：三年來，在這裡待最久的表哥羅藍多只存了兩千美元，而他需要五千元才能在墨西哥蓋房子。「如果你肯給我三千美元，」他笑著對我說：「我現在馬上就回去。」

他們付出的代價是與世隔絕的孤寂，與一切相似的社群都沒有接觸；在這南來北往、忙亂又短暫的移民人潮之中，亞伯講得很簡單扼要：「我們都單身，我們想找女朋友。」

這些人寄錢回家，但有百分十到二十五的錢因為匯率還有高額的電匯手續費，被美墨雙邊的西聯匯款、銀行還有附設匯款務的藥局給抽走了。而且那些沒有銀行帳戶的人，還必須繳交最高的費用：根據德州信貸工會聯盟指出^[7]，平均電匯三百美元到墨西哥去，就會被扣掉八十到九十美元。

為了開戶，移民在美國必須有合法的身分，所以沒有證件的移民無法取得社會保險號碼。這不成問題，說著說著亞伯便拿出他的社會保險卡。他和他兩個表兄弟都住在拖車裡，三人圍坐在一張坑坑疤疤的圓桌旁，三個人都沒有經過美國政府許可就進入美國，做著美國經濟體系中不可缺少的工作。他們三個人都有銀行帳戶，他們拿出來的社會保險卡不算非常精緻，但在未經訓練的我的眼中看來，就跟真的一樣。亞伯那張比較繁複，綠色的卡片有護貝，上頭還蓋著移民暨歸化局的印章，看起來也像真的。這些全部花了他們一百美元。亞伯說如果他再多付一點錢，品質就會更好，但「我們只拿來申

請工作用，」他解釋道：「之後都不會帶著。」

製作這類文件，只是這場戲中的一個環節：工人知道農夫通常都曉得這些卡片是偽造的，農夫也明白工人知道他們清楚這一點。不過這張小小的卡片，似乎能夠讓雇主免受聯邦法律的罰款，畢竟雇用戶已經盡責地檢查過文件了；移民局通常只會把工人遣返，而不會連帶追究雇主的責任。不過也有例外，某個著名的案件，是聯邦大陪審團起訴泰森食品公司（Tyson's Foods）與六名雇主，罪名是安排非法移民入境，並且提供偽造文件。可惜這個案子的恫嚇力很薄弱，儘管好幾名被判有罪的員工都提供了證詞，但聯邦陪審團宣判該公司與三名受審的經理仍然無罪。^[8]

非法移民唯一能夠拿到的真正的證件是駕照，不過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這也越來越困難了。駕照對初來乍到者並不是必需品，他們沒有車，也不需要駕駛農機；不過對於那些想要脫離移民遷徙列車、在某個地方待上一陣子的人來說卻很重要，他們可以藉此在職涯階梯中往上移動，從農地裡的工人變成牽引機駕駛。某些州需要社會保險號碼，如果號碼是假的，申請人會當場因為詐欺遭到逮捕。九一一事件之後，規定越發嚴格，賓夕法尼亞州會在移民證件上加蓋「非公民」的戳記，等他們的簽證到期，該證件也就失效了。^[9]這項政策增加了無照駕駛的人數，而且也變相鼓勵警察依種族相貌行事，他們會把警車停在拖車營房外，攔下拉美裔長相的駕駛盤查；司法部也要求警察執行移民法，特別針對來自伊斯蘭國家的人。

這種打壓也在移民之中又製造了移民——他們從俄亥俄州、田納西州或是南卡羅萊納州這些規定嚴格的地方，遷移到像是北卡羅萊納州，因為該州曾有訴訟案例打破了州的慣例，允許沒有社會保險號碼的人可以在空白處填「零」代替。但就算在這裡，你還是需要雙證件，而這有點麻煩。墨西哥

的選民身分證是算數的，墨西哥的出生證明也可以算數；要不然的話，擁有車子加上選民身分證也可以，不過那還需要保險證明，而保險證明又反過來需要身分證，事情就這麼陷入迷霧之中。九一一事件之後，對移民的恐懼攀升，北卡羅萊納州因而實施了新的要求：雙證件得是本州居民證明，再加上有效的社會保險號碼、或是個人納稅識別號碼（要從國稅局拿到個人納稅識別號碼可不容易）。接著國會介入，在二〇〇八年以後禁止各州發放證件給非法移民。

保羅·布蘭特神父的老舊廂型車每周會跑一千五百英里，這代表他頻繁穿梭在北卡羅萊納州東部：做彌撒、提供諮詢、安排醫療服務，幫助移工拿到駕照，懇求、催促、要求機動車輛管理局遵守自己的規定。他是耶穌會的神父，從在布朗克斯時就開始幫助窮人。他長得有點虎背熊腰，圓腫的臉龐紅潤，藍色的雙眼總是帶著笑意，窄框眼鏡後討人喜歡的眯眯眼散發出同情之意。他留著一小撮灰色的鬍子，穿著一件T恤，上面寫著「一九九八年，威明頓市拉丁美洲節」。他流利的西班牙文中，帶著很重的美國腔。

他才剛代表派蒂和葛蘿莉亞去跟官員吵了一架。她們兩個人都不會講英文，所以根據北卡羅萊納州的法律規定，她們可以用西班牙文參加路標辨識測驗。兩年前，基南斯維爾辦公室的一名主考官斷然拒絕用西班牙文進行路標辨識測驗，儘管他桌上就擺著翻譯好的卡片；而現在的主考官是一名比較認真負責的女人，當初還是保羅神父幫她找到這份工作的。不過神父決定還是先打個電話，確定一下細節。他打電話詢問時從來不說自己是誰，因為他想要知道當局對每個人會如何回應，而不是只對「熱心的神父」有反應。主考官沒認出他的聲音，告訴他申請者可以用西班牙文參加筆試，不過路標辨

識測驗必須等口譯員到場，而且只有星期五才有口譯員。保羅神父感到不解，他打電話去該州首府羅里，想確認規則是不是改了，結果並沒有改。一名政府機關主管聯絡了那位倒霉的主考官，問她為何拒絕提供測驗，所以當神父帶著派蒂和葛蘿莉亞走進她的辦公室時，她看起來不高興。這名主考官要求神父，不可以打個電話給政府機關的主管，好讓她能夠擺脫困境？「我是可以這麼做，」神父告訴我：「不過我在場時她的語氣，跟接電話當時的下意識反應完全不一樣。」

另一個讓保羅神父困擾的是羅馬天主教會的官僚制度——那些愛發號施令的教區神父，以及僵化的教區。教會的統治階級似乎對於暫居此地的拉美裔信徒的需求漠不關心，而教堂本身似乎也無法容忍保羅神父：這個沒有教區的巡遊神父，在社會邊緣遊走，惹事生非。

「我希望能夠讓大家得到力量。」他宣稱：「我想要讓組織動起來，去幫助那些移工們。不過我總是跟我的主管鬧得不愉快——不是耶穌會的主管，是其他的。他們不喜歡起波瀾，不喜歡改變，這真的很妙。官僚制度不管在哪裡都是一樣的，抗拒任何形式的創新，抗拒任何一種改變。」

比如想結婚的移民，會碰上教區限制的約六個月的等待期²，要他們冷靜下來好好思考。這聽起來很合理，但是六個月同等於一整個生長季節，新郎、新娘或者是他們的家人，等到六個月結束，很可能早就離開這裡了。保羅神父認為，那些維繫不久的婚姻大多是在十五、十六歲時定下的，他相信虔誠的拉美裔成年人看待婚姻足夠嚴肅，因此不需要強制的慎思期。「當一對拉美裔情侶來找你在

教堂證婚，你就差不多可以確定他們已經準備好要做出一生的承諾了。」他堅持道：「不過這些少與拉美裔有接觸的神父會說：『這個……首先我不會講西班牙文；再來，流程是有規定的，所以不行。』」他惱怒地笑了，「這附近大部分沒跟拉美裔打過交道的神父都會照章行事，不會為了任何事破例，也不會深入的詢問他們，只會說不行，所以把很多人都趕跑了。」

那些青春期的失敗婚姻成了問題，因為教會反對離婚，因此第二次結婚不能在天主教堂裡面舉行，除非廢止了第一次婚姻。而要廢止婚姻，必須由雙方各自所在的教區來宣布——如果妻子遠在墨西哥或是宏都拉斯的話，這可不是簡單的事情。「除非雙方都住在該教區，不然我們的教區沒有任何處理婚姻廢止的權限，」保羅神父說道：「所以需要跟羅馬特別上告，才能變更管轄權限，讓這個教區可以處理隸屬另一個教區的婚姻廢止。因此這兩年，我都會把這個問題提交給管轄我們裁判所的人。畢竟這種情況並不公平，因為就算他們可以跟拉丁美洲的教區溝通，但這些教區大部分都沒有裁判所（他們沒錢讓兩、三名神父在辦公室負責處理婚姻案件）。所以，基本上，一對夫妻不可能從前一段婚姻關係中解脫出來，也不可能再婚；而現在他們允許我來辦這件事情，他們說：『記得告訴這些人得再多花一年，因為我們得向羅馬要求變更管轄權限，得到許可以後才開始跑流程。』」

不過他大部分的時間都被世俗事務給占據了，包括那些所有農場工人都會碰到的困難，比如缺乏屬於他們的社群、親密感和信賴感，特別是沒有家人同行的年輕人尤其如此。「如果有族長或者祖父母在，比較能夠解決問題，」他指出。「我會在他們分享心事以後問他們：『你有沒有其他可以信賴的夥伴，可以輕鬆談談這些事情的人？有沒有人可以講話？』他們都說沒有。」

所以保羅神父試圖填補這個空缺，給予他們良好的建議，並發放書籤大小的卡片，上面有聖母瑪

利亞的肖像和一句西班牙文的禱告詞，以幫助他們戒酒和戒毒。卡片是他在自己擁擠的黃色小屋裡面用電腦做出來的，移民們可以隨身攜帶。保羅神父觀察，酗酒原本就很氾濫，而古柯鹼和大麻則是隨著年輕的工人一起過來的。他說許多人到美國之前就已經染上毒癮，有些人來了才戒掉，雖然說少了家人和社群的支持，要戒掉非常困難。但移民們的健康問題還是越來越嚴重，不只是因為毒品、酒精和缺乏醫療保險，也因為在農場工作的事務發生率很高。

保羅神父讓他們走上正途，替他們處理雜事、仲介、協調談判，也替他們找到願意接受分期付款的牙醫、願意給沒有保險的工人減價甚至分文不取的醫生。他同時也是財務顧問，跨越文化且有耐心地向這些人解釋，在美國最好定期付一點錢，不要什麼都不付，到最後才積成一大筆。他教了他們一些關於這個國家的事情。

對美國來說至關重要的這群移民，遊走在邊緣，財富之於他們，就像切線與圓一樣擦身而過，永遠穿不透、永遠無法從內往外看；所以他們看待自己的方式，跟別人看待他們的方式不同，他們也不會用美國人衡量痛苦的眼光，來看待自己所承受的一切。

當移民停止遷徙之時，代表他真正開始進入美國了，他看看四周，安頓下來，也許開間小店，不協調地座落在北卡羅萊納州的某個十字路口，賣些他同胞所熟悉的墨西哥辣椒之類的食物；也許就像奧古斯丁·巴塔薩一樣，最初他只是一年到頭都在同一個農場工作，後來，他開始琢磨自己的人生。

奧古斯丁和妻子以及三個孩子住在白色的小木屋裡，屋內有可愛的聖誕樹還有閃爍的小燈泡裝飾。房子是養雞場老闆的，不收租金。奧古斯丁是個帥氣的三十三歲男人，不得不花掉賺來的每一分錢以維持生活，但是他不确定自己屬於哪個階級。

第五章 令人畏懼的工作場所

Chapter5

不來工作又不打電話說一聲的人，
大概覺得自己無關緊要吧。

——陷入貧困之後的安·布拉許

「我不能說我很窮很窮，因為我有車。」他解釋道：「最重要的是我有太太、有小孩，生活能繼續下去，所以不能說我很窮。不過我也承認我沒錢。我有東西吃、孩子有衣服鞋子可以穿，這樣還算不錯吧。所以如果說我很窮，也許是；但如果要我在上帝面前說自己很窮，那又不太好；但說我有錢，又太驕傲了。所以我沒辦法歸類自己。」

他們是一群堅強的人，他們熬過了毒癮、無家可歸跟牢獄之災，如今卻涉險踏入真正令人害怕的領域——陌生的工作世界讓他們嚇壞了。

這十六個人都是黑人，多年來吸毒成癮、酗酒，並且有前科，在華盛頓特區的街頭艱困地討生活。某個星期三晚上，他們聚集在中途之家參加每星期的互助小組，美國國會大廈閃閃發光的穹頂就在他們視線可及之處；他們有的坐在房間內的椅子上，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倚著牆壁，開始對彼此吐露心聲。

恐懼在他們以前的生活中是一項禁忌話題，那時「壞」才是好，而最好的防禦就是擺出侵略的威脅姿態。為了安全起見，他們必須看起來卑劣，行事作風危險，絕不承認自己害怕。做母親的這樣教導兒子，做哥哥的也這樣教導弟弟；但是今晚，安心圍坐成一圈的他們發現，坦率有療癒的效果，他們在這裡可以放心談話。他們的治療計畫要求他們在一個月內找到工作、找到公寓，靠自己搬出去住。每一項任務似乎都很艱鉅，他們很緊張。

找工作從來都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對於一個中產階級的白人大學畢業生來說，擁有高學歷，在工作場所中可能還算自在；但是對於這些人來說，工作場所就像是異國文化，他們背負著各自反覆失敗的歷史踏進這個世界：沒能完成學業、沒能抗拒毒品、沒能維持感情、沒能保住工作，他們的成績紀錄中，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們以後會成功，也沒有任何勇敢的承諾，可以掩飾他們對自己的懷疑。他們傲慢且深諳街頭生存法則的堅強外表，似乎只是一層淺薄的虛偽裝飾，在那樣的表面之下，他們就跟孩童一樣柔弱，極度容易受到傷害。他們承認自己害怕打電話、害怕沒得到回應、害怕投遞履歷、害怕去面試，他們緊張地等待被問到那個避免不了的問題，也就是犯罪紀錄，也害怕說出事

實，害怕說謊。「你得寫下你有沒有被逮捕過？我總覺得寫了就沒人會雇用我了；或是坐在那裡看著大家的臉，就知道我不會被雇用了。」韋恩頭低低地看著地板說著。「所以我到處找些零工，麥當勞那種，我害怕被拒絕，這讓我無法前進。」

「每一步對我來說都是障礙，面試就是個障礙。」一個又高又壯的男人坦白說道：「面對拒絕我總會有點發抖。我知道我得去處理；但以為自己得到了工作最後卻落空，我還是會有感覺，還是會覺得失望。我總是擔心這些事，在看待事情的角度上我還需要努力，謝謝你們聽我分享。」

「謝謝你的分享。」全組的人異口同聲說道。

這個中途之家的房間裡有一絲絲成功的味道，有人穿著深藍色的制服，上面有個紅色的三角形臂章，寫著「王子保全公司」；另一個人找到了搬運家具的工作，時薪六點五美元；不過第三個人因為他的犯罪紀錄，在求職機場行李搬運的工作時遭到拒絕了。

就算獲得雇用，也無法終止這裡某些人的焦慮感。有幾個人害怕真的找到工作，因為他們懷疑自己不能勝任，而且不管是哪種工作都一樣；不過至少對他們其中一人來說，工作本身成了一種治療。「剛去的時候我很害怕做不來，」他承認道：「不過每天感覺都會回來一點。媽的，我都忘了我會這個人了，這讓我覺得很好。」

談論恐懼需要很多勇氣。

在美國的另一端，卡蜜莉亞·伍卓夫刻意錯過了梅西百貨珠寶部門銷售員的職前訓練。她是一名二十六歲的黑人女子，住在洛杉磯一處名為「帝國庭院」的公營住宅裡；她體態輕盈，走路穿過院子的姿態彷彿是名局促不安的舞者。卡蜜莉亞想讓自己看起來時髦一點，她拉直頭髮縮成圓髻，讓髮

髻順勢垂下，把一綹頭髮以某個角度覆蓋在前額上；她戴著搖搖晃晃的金耳環，但又想避開男性的注意。焦慮和憤怒從她持續不斷的肢體語言中傳遞出來，彷彿在說「滾出我的視線」，她的聲音冷得有如刀刃。

在她的客廳裡，她只能暫時坐在一張亞麻色的木頭電視櫃上——唯一的另一件家具是一張白色的塑膠草坪椅。不過她沒辦法坐定，講話的時候，她坐立不安地東擦西掃，邊踱步邊比手畫腳，接著突然轉頭，對一個走到她門邊的壯漢輕蔑地說：「我正在講重要的事情！」對方匆匆忙忙地避開了。

卡蜜莉亞十一年級的時候就輟學了，接著開始「街頭生活」，陷入一段虐戀當中，然後看著母親因為嗑藥過度而死掉。她沒有結婚，也還沒有小孩，喜歡照顧朋友的小小孩，偶爾做一些低薪工作。照她看來，她每份工作都做了滿長一段時間，「我已經工作很久了，」她誇口道：「四個月、五個月、六個月、七個月、八個月。」她的眼光看得並不算很遠，從來沒有想過十年後自己要在哪裡。「每天早上爬起來工作似乎很難，」她說。夢想中的工作呢？「我想做跟小孩有關的，像是教師助理或是去托兒所。」

公營住宅裡的生活與世隔絕，很多像卡蜜莉亞一樣的人缺乏鼓勵，除非有人幫忙推一把，或者替他們打開一扇門，否則他們通常沒有人脈能幫忙找到像樣的工作。卡蜜莉亞的幫助來自葛蘭達·泰勒，她是負責公營住宅的社工，在政府資助的就業服務中心計畫上班，該計畫的目的在於幫助求職者克服種種的就業障礙。那些障礙外人並不一定看得到，但是葛蘭達卻很清楚。她從小就住在幾條街之外的瓦茲社區；就讀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的時候，她成為家族中唯一高中畢業後就去讀大學的女孩，接著在逃離瓦茲社區以後，她又回去提供幫助。就像目光銳利的追蹤者一樣，她可以讀出這些年輕人身上

的異常，那些扼殺他們進取心的內在焦慮。「恐懼」是她的清單上列出來的第一個障礙，「因為害怕與恐懼而不願意面對外界，」她說。接著她又坦率地補充道：「另一個問題是，大家只是太懶了。」

或者據她觀察，他們從來沒看過家裡有人出去工作，所以「這變成一種循環……我覺得小孩會模仿，而他們首先看見的就是家裡的情形。以我自己為例，我爸是名建築工人，每天早上都四、五點就起床。」

很多人因為缺乏自信，容易憤怒。她補充道：「他們在內心累積怒氣與自卑的感覺，而這種感受讓他們無法前進，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做不到。而且總是會有人說：『喔，你不行啦，做不到的。』當你在生活周遭老是聽到這種話，就連在學校也會聽到；即便反抗了，老師也會說：『喔，你只會惹麻煩，一事無成。』到最後事情就會變成這樣子了。」

所以葛蘭達想利用關係替卡蜜莉亞打破這樣的循環，她在梅西百貨兼差的時候認識了一名經理，於是她替卡蜜莉亞做擔保，讓她得到一份銷售珠寶的工作——這個職位有升遷的可能。

但卡蜜莉亞有點擔心，職前培訓的兩天，她告訴葛蘭達，她不去，因為她的犯罪紀錄上有一條尷尬的順手牽羊罪，她很確定自己會被拒絕。「但我還是希望你去，讓他們來處理，這會很有幫助。」葛蘭達建議她，「如果你誠實以對，他們也會坦誠以對。」但是他們會雇用一個扒手嗎？「我覺得不會。」葛蘭達事後告訴我，「但是我也不認為你能夠一直躲在自己的過去後面，你得破門而出，讓自己體驗一些事情。」此外，門也不是完全關上的，如果主管階級同意的話，經理就願意雇用她。梅西百貨也有自保措施，他們會向新進員工展示店內嚇人的高科技保全設備。「那是高級珠寶部門，所以他們在四面八方都裝了攝影機。不管你在哪個隔間，每一側都有攝影機在記錄。」葛蘭達

說：「如果他們很懷疑你，他們可以從辦公室裡調出你在電腦上的收銀紀錄，看你有沒有老實交易。」

卡蜜莉亞被逼得一定得去參加職前訓練，她宣稱自己搭公車出發了，但是卻沒有抵達。「一下車我就迷路了，」她說。那麼她有打電話求援嗎？「沒有，我不知道。我覺得這不是我想做的工作，我是那種喜歡在外面活動的人。我聽說這工作靠抽佣金賺錢，我覺得我沒辦法賣得很好。」其實這份工作的薪資是底薪加上佣金。

所以，她想了四個不去參加職前訓練的理由：羞愧自己當過扒手、不喜歡老是關在室內、懷疑自己的銷售能力、還有她迷路了。她找不到出路，陷在層層交纏的焦慮與藉口之中；她也從來沒有打電話給葛蘭達，向她道謝或是致歉。過了幾天以後，葛蘭達才從經理那裡知道她爽約了。那麼現在又該怎麼幫卡蜜莉亞？葛蘭達的回答是：「繼續擁抱她。」

幾個月之後，葛蘭達被調派到另一處的公營社會住宅，離開了卡蜜莉亞的生活。

在帝國庭院，破舊的小公寓之間隔著長滿雜草的草坪，孩子們在草坪上蹦蹦跳跳，年輕人成群站著，故作姿態、怒目張望。就美學而言，這個混雜社區比起芝加哥和紐約那種監獄風格的高聳磚石叢林，顯得沒那麼慘淡淒涼；但是就社會和經濟上而言，這是個傷痕累累的社區，舉目皆是家庭暴力。一千四百六十二名住戶中（三分之二是黑人，三分之一是拉美裔），只有五十四個人有全職工作，十二個人有兼職工作——這還是在二〇〇一年經濟衰退之前的情況。

這些找工作的成年人陷入一種奇特的模式，跟在其他住在低收入住宅區的人們一樣：他們不想離開這一區，外面的文化有著陌生的規則和令人恐懼的挑戰，對這些住戶來說似乎太嚇人了，他們寧

願在公營住宅裡工作，最好是替房屋管理委員會工作。根據葛蘭達和其他地方的社工指出，儘管建築物破舊、眾人的生活精疲力竭，幫派、毒販氾濫，入夜之後還有槍戰火拚，公營住宅卻是他們的安樂窩。「這裡就像一面盾牌，讓他們覺得受到保護。」張坎（音譯）說。他是來自洛杉磯的移民，就在他長大的「威廉米德之家」工作。這個公營社會住宅四周都是工廠，但是這些工廠不會雇用這裡的居民。「這裡就像個小型都市，每個人都認識彼此，」他觀察道：「如果你要介紹他們去外面工作，就算只有四、五英里遠，他們也不想去，因為他們怕見到不認識的人、體驗不熟悉的東西，甚至怕索取申請表。這是因為他們很自卑，他們會想：『喔，他們不會給我工作的，因為我住在公營住宅裡。』他們絕大多數都是這樣想的。」

這種自我懷疑的折磨潛藏在表面之下，但雇主只能看見表面的行為：員工遲到或是乾脆不來、缺乏「職業道德」、缺乏守時勤奮的「軟技能」，也沒有苦幹實幹的態度。有時候他們會看到消極的員工：跟同事關係惡劣、動不動就發火，老闆一吩咐事情就發脾氣。如果雇主可以選擇，低工資的員工具備「軟技能」甚至比具備讀寫或會數學等「硬技能」更重要。[1]很多低階工作不需要會寫字或懂數學，不過都需要工人準時上班。「基本上唯一需要的技能就是職業道德，但有時連這個也得教他們，」布萊恩·哈金說道。他是馬里蘭州一家漢堡王的經理。

軟技能應該是在家庭中學習到的，不過在很多情況下，家庭放棄了這個角色，丟給學校；反過來，學校又把這個角色丟給雇主，雇主簡直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比如布萊恩開了一家新的漢堡王，他花了超過六個月，挑選過幾百名應徵者，直到找到一群可靠的員工。有些新員工甚至連牙都不刷，他們看起來「就像是剛爬下床，穿上制服就來工作。」他感嘆道：「你得教這些人：『聽著老兄，你

來吃我的頭路，就得好好梳洗一下，男人得刮鬍子。」他給工人的起薪是一小時六點五美元，同樣一個職缺一年得徵三次，人員流動率將近百分之三百。

必須教導成年人如此基本的工作原則，讓密契爾·鮑爾覺得很驚訝。他接手了傑克森郡康復實業，這是肯塔基州東部的一個在職就業培訓中心，跟附近的公司都有簽約。「我覺得這是我聽過最瘋狂的事情了，」他說道。有好長一段時間，他拒絕相信他的學員（全部都是來自阿帕拉契地區的貧窮白人）竟然需要學習這些他認為是本能的事。「我知道什麼時候該去工作，」鮑爾宣稱：「我知道我不能無故不到；我知道如果車子出了問題，要打電話找人，或者起碼打電話跟公司講一聲，把車子修好。如果生病或小孩沒人照顧，我會打電話或想其他的辦法。我不是那麼好講話的人，我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工作了，還做過很多農場裡的粗活——所以我很難被說服，每個人都知道要起床，知道要梳頭，知道要洗澡。我不是吹毛求疵，但我過了好一陣子才明白，我們需要教他們軟技能、求職準備技能、就業準備技能。」

缺乏這類技能的人，中途離職的機率也很高。保羅·李利的「多酷索」(DocuSor)公司需要大約兩百名員工，這是在密蘇里州堪薩斯市所創立的，負責為企業客戶建立條碼編號，處理寄出的大宗郵件。他雇用了約兩百五十名員工，大多是貧窮的黑人和越南移民，付給這些人最低工資。結果，無論是哪天，員工出席人數大概都在最低底線的兩百人。「我們今年大概要處理三千到四千份的W-2稅單。」他抱怨道：「就算今天他們有來上班，明天可能就不來了。」他觀察他的員工，發現他們很容易因為種族問題而有摩擦、也容易因為自己的問題而怪罪別人，而且「很脆弱、非常脆弱」。他最後幾乎用機器取代了所有人，這樣對收支的壓力比較沒那麼大，他也不會那麼不安。

在堪薩斯市，我安排拜訪的三個雇主焦點團體都在抱怨工人：拖拖拉拉、曠工、缺乏主動性、打架、嗑藥、流動率太高。不過也有好幾名雇主沒有抱怨，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出席已經答應要參與的聚會，還有兩個姍姍來遲；相較之下，所有之前領取社會救助金、答應要參加團體討論的人，全都準時出席了。更諷刺的是，遲到的雇主之一布萊德·凱西，他經營一家文件影像處理公司。他抨擊那些領取社會救助金的工人，「光是每天都有來上班就是新鮮事了。」他這樣講那些人，「更何況要求準時呢！」他板著臉補充道，臉上沒有絲毫不好意思的笑容。

有些員工「問題」也許比經理們的想像跟誇大來得更嚴重些，不過那些經理也對少數民族、女性和接受社會福利救助的人都懷有偏見。固有的美國刻板印象認為黑人懶惰無能、女性要花太多時間照顧家庭，無法成為有效率的員工、而接受社會福利補助的人都不願意去工作，因此一旦真的碰上這樣的例子，就落實了長期以來的印象。仔細詢問這些雇主，就發現他們有時候會把幾個極端的例子，類推到所有人身上。

另一方面來說，真正的問題也確實存在。「我有個女性員工，她有七個小孩，所以她永遠都在打電話給小孩。」溫特洛抱怨道。他是一家位於堪薩斯市的建築供應商「西斯柯」的經營者。「我們很難跟她溝通，你知道的，『休息時間再接小孩的電話好嗎？』但是她有一半的時間都在講電話，處理她的個人危機。很多這種出身的員工都是這樣。」他說「這種出身」，指的是曾經領過社會救助金的那些人。他雇用這些人一方面是為了大家好，一方面是為了密蘇里州付給公司的每小時三美元的補助金。不過他發現這些人表現很差，管理成本太高，所以他忍不住大聲疾呼，反對政府救濟這些領取社會救助金的人，怒吼著政府反而應該來救濟他。「我每雇六名員工就需要有一名全職主管來管理他

們，」他宣告的樣子彷彿在跟州政府喊話，「你付我這六個人一整年的薪水，我就願意扛這種社會責任。」

這類恐怖故事很多，特別是那些從收容中心找員工的雇主講出來的。沒有任何一個來自收容中心的人在約翰諾克斯村(John Knox Village)有過好表現。約翰諾克斯村是堪薩斯市的退休社區，據人力資源主管雪倫·伊比表示，有一名護理師助理，「只會做很奇怪的事情。」她說：「有天她坐在護理站，把鞋子跟襪子都脫掉，然後就開始摳起腳趾來。這種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他們試過很多方法來糾正她，告訴她『這樣是不恰當的，』但似乎沒有幫助。某天她打電話給我，說自己沒地方可去了，甚至連收容中心都回不去了，她想跟副總裁談談，替她安排一個住處……他們最後把她安排在村裡某個地方，結果她在房間裡開了一場派對……瘋狂的事蹟一件接著一件。」

不論是因為心理疾病或是錯綜複雜的其他問題，有些人「就是雇用不得，」維多利亞紙業的總裁藍迪·羅爾斯頓斷言道：「不管你怎麼激勵員工，或是不管你怎麼威脅他們都一樣。」他的說法和他自己公司的經驗嚴重不符。他們銷售文具和賀卡，成功地利用每小時補貼三美元的政策雇用了許多人。「我們運氣很好，」他承認，「我們有個員工已經做了兩年，她很棒，是最好的員工之一。」她被提拔去做創意工作，負責製作禮物籃；儘管如此，在他的腦海，還是能夠輕易地召喚出無望又無能的工人的身影。「他們的祖父母靠社會救助金度日，母親靠社會救助金度日，他們自己也靠社會救助金過活，是我們這種人把他們帶到陌生的國度。」他斷言：「他們在那樣的環境中長大，過那樣的生計，所以要把他們拉出來，讓他們負起某種責任，對他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事，幾乎永遠不會有效果的……他們從來沒有榜樣可循，於是期望雇主能夠當他們的榜樣，或提供榜樣。」

要雇主除了惱怒以外還扮演其他角色，也許期望太高了。底層勞工常被視為消耗品，出身貧窮的員工很少有自己的支持網絡、缺乏應對技巧，也沒有後援機制可以將他們的個人困境隔絕於工作之外；只有在勞力吃緊的市場上，企業求才若渴，企業家才有可能投資培訓，留住低階的工人。全球化放大了這些趨勢，而窮困的美國人無法在世界上與他人競爭。柬埔寨人和菲律賓人願意做同樣低技術的工作，領的錢更少，而那樣的收入甚至無法維持在美國所需的最低生活水準。

很少有主管能了解為什麼員工會用最差勁的藉口來曠工，而且甚至連電話都懶得打。或許就像很多老闆所認為的那樣，他們完全漠視工作義務、或是對職場慣例一無所知。不過安·布拉許觀察到，應該還有些更深層的事物起了作用。她在中產階級的舒適中成長，而後墜入貧窮；她感受到一種毫無自我價值的感覺，那令人窒息，就像一件沉重的斗篷圍住了她。「不來工作又不打電話說一聲的人，大概覺得自己無關緊要吧。」她簡單解釋道：「這不只是自卑，而是隱形了。」

我把安的觀察轉述給雇主們聽，他們有些人說「噢！」好像啟示之燈剛剛亮了，他們忽然之間弄懂了什麼。那種「你這個人無關緊要」的感覺，就像沒人看見自己，對工作的商店或工廠而言沒有價值，表示你可以任意曠工，因為老闆根本不在乎你有沒有去上班。要對應這樣的缺乏自尊，只有戲劇化的做法才行。邁可·薩默斯是位於克里夫蘭的薩默斯橡膠公司的總裁，他從父親那兒學到了這一點，沒來上班的員工會接到電話，如果他的車子壞了，邁可會派人去接他；如果他說早上九點要看醫生，「你就說：『好，那我們等你十點看完醫生再見。』」還有一個方法是煞有其事地告訴他們：「我們希望你來，如果我們不希望你每天都來，就不會請你來工作了……我們需要你，你不在這裡的話，公司運作會有困難的。你一定要來上班，如果你不能來，起碼得告訴我們發生什麼事了。」你要

把這些話說進這群人心裡，因為他們不習慣負起責任，這就是這群人的問題。」

他的公司是一家有六十名員工的小企業，由他的祖父和父親所創立，生產水管和接頭，提供給液壓、化工、燃料管線等重工業機械使用。就配裝、包裝和準時出貨的需求而言，每一名站在工作台旁或是坐在桌子旁，又或是駕駛堆高機的男男女女，全都至關重要。這表示一有人曠工，製作過程就會出現漏洞，要不是從另一個工作崗位上調人來補，就是得延遲生產進度。「我父親經營這個生意很多年了，他在我第一次來到這裡的時候提醒我說：『你會像個教區神父一樣。』邁可回憶道：『你得把自己打理好，然後去處理這些問題，因為這影響了他們的工作表現，而我們需要這些人的技術。這些人本來在監獄裡，父親解釋他們，讓他們能來這裡替我們焊接金屬管子。』」

身為執行長，邁可非常謙遜，並不張揚。從他斯巴達式的辦公室可以看見壯觀的停車場景色，接待室很簡約，有四張黑色塑膠椅面的木頭椅子，地上鋪著洋紅色的地毯，粗劣的白色牆上有藍色和黑色的污點，接待窗上有可以推開的玻璃片，櫃台上有個銀色小鈴，上面有個塞桿，就像是老式旅館的呼叫鈴。接待窗後面坐了一位紅髮的接待員，看起來有些無聊的樣子。牆上掛了一幅裱框的《克里夫蘭誠懇家》(Cleveland Plain Dealer)報紙頭版影本，日期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公司就是在這一天創立的。當日頭條寫著：「五十萬人辭職，鋼鐵業大罷工。」

當年，男孩子只要在自己的車子上敲敲打打，不需要昂貴的電腦工具和複雜的訓練，就能夠學會手藝。許多發覺了自己的機械天分的人，跟隨自己的父親開心進入工廠，在那裡找到財務安全，找到專業感，還有一條有發展的出路。邁可·薩默斯當時還年輕，但是他對那段歷史有所感觸，很懷念那段時光。「現在的小孩沒有擺弄機械的能力，」他說道：「我們處在用過即丟的社會，割草機要

是壞了，你不會把這個二行程的小引擎拆開來，你會丟掉再買一個。小孩看父親把東西都丟了買新的——如果這小孩有父親的話，這個小孩就會這樣預設：你說，製造東西有什麼意義？我們把東西拆開來修理又有什麼意義？如今我們缺少模具工人和液壓技工，這些人基本上就是把東西湊在一起，建立起系統來。擅長做這種事情的人很厲害，因為他們喜歡做這些事，他們有天分，也接觸過這類東西。很多小孩本來可以擅長這項技能，但是他們根本沒機會知道自己對機械有興趣。」再加上家庭功能失調，街頭的生存本能和進入職場的文化衝擊，你就缺少合格的員工可用了。「家庭問題壓垮了他們，工作變成次要的，」邁可觀察道：「所以有人會上一個月的班，然後突然就不來了，接著兩天後又出現。如果你問：『你去哪了？』他們會說：『呃，我的車子壞了，我得去修車。』或者是『有人病了，我得在家陪著。』你要與他們討論這些問題，試著去解釋：『你不明白，家庭問題可能很嚴重，不過你得想個變通方法來解決，你不能不來上班，尤其是連通電話都不打。』」

一般來說，那些他歸類為「還沒準備好要就業」的人，往往會與致勃勃地開始工作，通常這份興致可以維持一、兩個月。邁可注意到：「接著他們就會跟其他同事、或不了解他們的主管出現磨擦，而他們不知道該怎麼應付這種狀況，反應就是『我乾脆離職』。我認為，身為雇主，面對這群非常脆弱的族群，就是要學習該如何帶領他們度過情緒危機。我幾乎可以保證，這種事情一定會發生。『在你到這邊上班的前六個月裡，你有可能會對這裡的某件事情感到非常煩心，但我們保證會處理這個問題，你要來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不要因此不來上班。』」

不過邁可也承認，公司的主管階層裡沒有黑人，有可能因此讓管理沒那麼順暢。「我們的主管，那些基層主管，他們沒受過訓練，也不夠敏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問題。他們被新人的表現給打敗

了，很快就失去耐性，然後會說「你被開除了」。如果再加上文化差異（中產階級白人男性跟年輕的
黑人男性的不同文化），就會產生很大的溝通障礙。主管難以忍受員工表現不佳，無法體會和理解，
而年輕黑人男性員工會說：「這是個對我有敵意的環境。」

那麼，讓員工覺得自己很重要有幫助嗎？「我把那些濫用雇佣關係的人都請走了。」邁可說道。
至於其他對職涯有雄心壯志的人，「他們應該能用不同的觀點來看待職場了。」

有人認為，如果領的工資太低，工人會覺得自己的價值遭到貶低，提高工資是最實際的管理方
法，能表達他們需要員工。但是在薩默斯的情況中，就像其他許多小型企業一樣，利潤空間很小，
沒有多少緩衝的餘地。一個新進的倉庫管理員的起薪是每小時八美元或八點五美元，大約過兩年可到
達時薪十二美元。邁可抽出一張試算表，上面列出了他這家年營業額一千萬美元的公司的收支情形。
「如果以銷售額一美元來看，」他解釋道：「有六十分錢用在製造材料，二十五分用在人事，那基本
上就已經用掉百分之八十五了。」剩下大部分的錢都花在「水電費、電話費、交通、保養、維修、培
訓，」他補充道。接著他指著試算表最右下角的一個數字：這家公司的利潤是百分之三。「在這一行
裡，這算中等。」他說道：「不算好也不算壞，所以一美元稅後分配還有三分錢，算是相當不錯了。
就是這三分錢刺激著我們成長。」

在景氣好的時候，邁可·薩默斯會給自己八萬到十萬美元的紅利。「坦白講我覺得這是一大筆
錢，」他宣稱這大約是他員工起薪的六倍。「當然我們看過差距很大，差五百倍那種的。」他做了個
鬼臉說道：「我覺得那有點像犯罪。就我個人來說，我沒辦法理解有誰對公司而言值那麼多錢。你知
道的，一千萬美元耶，太荒謬了。不過那也不是常態，我們這樣才是常態。」

如果雇主認為自己沒辦法花錢來讓員工覺得受到重視，他們可能就會找其他的辦法。位於阿克
倫的藍德馬克塑膠公司（The Landmark Plastic Company），每年的人員流動率超過百分之百。該公司決定
要在離職面談時間清楚為什麼大家要離職，結果答案讓經理深感訝異。藍德馬克公司的工廠占地廣
闊，有兩百名員工，做的是製造拋棄式塑膠花盆和托盤，供苗圃植物使用。小塑膠片裝在紙板桶裡送
來，加熱後弄成小顆粒狀，接著再次加熱，以液壓注入模具內，壓縮成各種尺寸的黑色、白色或綠色
花盆。大型機器的內部結構像迷宮一樣，由管線和厚重的活塞所組成，一面發出雷響般的轟隆嘶聲，
在地面上的人幾乎得用吼的才能讓對方聽見自己說的話，空氣中瀰漫著塑膠粉塵。一名工廠安全主管
肯·史隆稱這是「灰色調」；聯邦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署很體貼地把這情況標示為「滋擾粉塵」，所
以不算是危險，而且有提供面具讓工人使用，不過沒有人戴。但起碼每個人都有依規定戴護目鏡，
有幾個人還在耳朵裡面塞了綠色或橘色的小橡膠耳塞。每隔六秒，那台價值二十萬美元、名叫「哈士
奇」的機器會吐出四個塑膠花盆到一條短短的輸送帶上，這條輸送帶再把花盆升高送到一名女性的眼
前，倒進她面前的一個寬托盤中。當花盆落下時，她會約略地檢查一下，把花盆一一疊起，然後裝進
她後面的一個紙箱裡，每隔兩小時她可以休息十五分鐘。

不過離職員工抱怨的不是令頭腦麻木的重複工序，也不是噪音或塑膠粉塵，甚至也不是每小時
七美金的低薪，而是比較沒那麼具體的事情——「他們並沒有感到被需要，覺得自己可有可無。」大
衛·伯克米勒宣布道。他是一位不苟言笑、實事求是的製造業經理。「而『被需要』是大部分人想要
在生活中感受到的。」他繼續說道：「他們被忽略了，覺得自己只不過是一具軀殼。擔任主管的沒有

做好這一點，因為他們正忙著做主管該做的事。所以我們得回頭去檢視整個環境，好吧，是什麼讓這些主管分心了？為什麼主管沒辦法做到那些他需要做的人本管理？因為他忙著技術面的事。」該公司的解決方法是給每位新進員工指派一名「引領人」、一個同事，「可以說是當朋友，指引他們度過九十天的試用期。」大衛說道：「確保他們覺得安心，相信可以交到朋友，讓他們跟其他人有所聯繫，不會落單或者不知該如何是好；跟他們一起吃午餐、一起休息，希望能引發他們對社交的興趣，或起碼嘗試這麼做。就是要讓他們覺得和別人有聯繫、被需要，幫助他們了解規則和政策。我們在離職面談時聽過有人反應，他們來了十天都還沒看過主管。我的意思是，這有點像是恐怖故事，不過卻真的發生了。」如果新進員工至少待滿九十天，「引領人就可以得到一百美元的獎勵。」

試圖用「金」手銬來鎖住員工，也就是增進福利、提高薪資等，大衛堅持這種方式沒有用。「我可以出去跟那些一小時賺七美元的人說：『我每小時多給你兩美元。』相信我，除了勞動成本提高以外，我什麼也得不到。」他說：「如果我們提高每小時的單位成本，我的客戶不會為了這個買單，我得想辦法吸收這些增加的成本。」接著他若有所思地補充道：「不是你付多少錢給他們，是你得付出多少代價。你付他們應得的錢，你就不用因此付出代價；你付給他們的錢太少，你就得付出一切作為代價。」

失業率降低，產品的品質也就跟著降低了，這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殘酷面之一：景氣越好，雇主就越難找到高水準的工人，特別是在工資很低的情況下。所以如果當老闆的不打算多付點錢，他們至少得表現得關懷備至，但似乎很少人會願意這麼做。在堪薩斯市全民就業委員會（Kansas City Full Employment Council）裡工作的卡拉·提爾曼指出，她很少看到經理會去參加訓練課程，以了解要如何

管理曾經接受過社會救助金的人。「我聽到的時候簡直氣瘋了，外面有些雇主一小時只給六美元，卻想要人家替他摘星追月、包山包海，」她說：「他們要求高中學歷、有工作經驗之類的，要求沒有瑕疵的完美經歷。但人非完人，你總得原諒某些有過失的人，讓他們能向前邁進吧。」

在堪薩斯市，聯邦政府的福利改革政策促進了企業和就業培訓方案之間的密切合作。抵制領社會救助金者的高階主管常常受到挑戰，要他們兌現自己的主張。「我說好吧，那你就把錢花在你說的地方吧，」泰倫斯·華德這麼說。他是布洛克稅務公司董事長的助理。「典型的接受社會福利者許多是單親媽媽，高中輟學，只有中學二年級或三年級的教育程度。你說她應該找份工作，那你打算怎麼做？」他得到的都是推託的回答：「如果他們說：『我們沒辦法雇用她們。』我就會說：『那你要讓她們繼續領社會救助金囉？』」呃，也不是。」「好吧，你自己選，不是這個就是另一個，她們唯一少的就是一份工作，而你可以提供工作給她們。」

雇主還得提供華德所謂的「嚴格的愛與扶植的態度」，結合紀律與同情，既是良好的管理方法也是教養之道。景氣好的時候，這樣的做法在斯普林特公司強制執行過。這家公司每小時付七點四五美元，已經吸引不到足夠的接線生去位於郊區的客服中心工作。那裡的失業率降到四分之一，年度人員流動率則是百分之八十。所以為了把工人從市區的大半黑人社區吸引過來（那裡的失業率超過兩位數），斯普林特公司大張旗鼓地在堪薩斯市市中心歷史悠久的爵士區，開設了一家客服中心；在第十八街與藤街口一棟舊磚樓的三樓，隔出了許多小隔間，裡面塞滿了電腦設備。該公司把教育背景從「要求高中畢業或高中同等學歷」，降低到「尋求高中同等學歷」，起薪也提高到八點二五美元，並且指派了幾名黑人婦女來管理這四十五名幾乎也全是黑人女性的員工。

「她們誰都不信任，」業務經理海柔·巴克利說道。她進辦公室穿得就像是要上教堂一樣，還帶著一股教師般的關懷堅定（當老師的特質就是當下令人畏懼，多年以後回想起來卻叫人懷念），她發現領過社會救助金的媽媽普遍都有兩個問題，一個是不相信任何人，帶著一種深刻的不信任感，另一個是相信退讓就表示軟弱。這兩種缺陷讓她的員工失去了管理憤怒的能力，無法在職場與同僚建立良好關係。她會教導她們、要求她們不要尖叫大喊。「妳要大器一點，直接走人就好。」她是這麼說的：「如果我們可以幫助她們面對這個問題，我們的流動率問題也許就能得到改善了。」該公司每年的員工流動率是百分之四十八，雖然比郊區那邊好一點，但還是太高了。

為了避免雇用容易生氣的人，匆忙的雇主往往以成見來做判斷。黑人長久以來在許多白人心目中的形象一直都是「暴力」，所以如果你是黑人，如果你是男性，如果你塊頭大再加上體格壯，又或者你有入監服刑的紀錄，你很可能就會被認為是脾氣不好的人，容易暴怒。

凱文·費爾茲完全符合這些刻板印象，他喜歡看電視上的摔角節目，本身也像個摔角選手——高個子、肌肉結實，體重兩百八十磅，剃光頭，右耳戴著小小的金耳環。未來的雇主問他是否犯過重罪，他據實以告——他曾經入監服刑兩年。他們問為什麼，他也老實地告訴他們：「是傷害罪。」他說：「有五個人對付我一個，他們朝我的車丟瓶子，瓶子破了，當時跟我在一起的女孩被玻璃碎片畫傷。他們就是很沒禮貌，你懂吧？他們告訴我：『滾回車子裡，不然我們就踢爆你！』所以我回到後座，抓了球棒出來，然後就出事了。我離開的時候，每個人都躺在那裡，接著警察開始到處找我，我媽就叫我自首。」

通常雇主還會問下去。「他們總是會提到什麼『如果這裡發生什麼衝突，你會怎麼做？』」凱文再度老老實實地回答：「我告訴他們，我會替自己挺身而出，因為我是個男人。」他說道：「你了解的，我不會讓誰從我頭上踩過去。」他有沒有想過要說謊，一點點說謊話就好，說他會轉身離開或是保持冷靜？「沒有，我不會讓人亂搞我卻不吭聲。」他宣稱。所以他幾乎沒有找到工作過，頂多只能修修剪草坪。

有些公司會自動回絕有服刑紀錄的求職者，有些不會。「在我們這一行，他們必須要讓人能夠信賴。」堪薩斯市短期工仲介的負責人說：「被信得過表示可以替公司處理支票、經手現金和機密資訊……曾經因為犯罪而被判刑的人，我們當然會問原因，如果跟偷竊有關的話，我們會立刻有所警覺，不管你為什麼被定罪，都免不了有責任的問題。」約翰諾克斯村的退休之家和其他醫療機構都受密蘇里州的法律禁令管轄，「你不能讓重罪犯替你工作，尤其那些犯有 A 級或 B 級重罪的人——包括人身攻擊、侵犯財產、性侵。」雪倫·伊比說道。沒有哪條法規禁止維多利亞紙業的總裁藍迪·羅斯頓雇用有前科的人，不過「最好還是避免這種事情，」他說道：「我們找了一家公司，只要花五十美元，他們就會把對方全部的犯罪紀錄都給我們。」

隨著經濟不景氣，恐怖主義的威脅升高，雇主對於員工的背景調查越來越嚴格。比如在華盛頓特區，任何一個有嗑藥或暴力前科的人，都不可能會被雇用為有證照的護理師助理，儘管這個課程在就業培訓方案中很受歡迎；因為擔心責任問題，大樓業主也越來越不願忽視應徵維修工作者的前科——而維修工作正是就業培訓中心另一個最受歡迎的課程。有犯罪紀錄的人只能做按日計酬的搬運工或是替地板打蠟，沒辦法做那些能不受限制出入辦公室或公寓的工作，有些公司甚至會拒絕曾經控告前雇主種族歧視或是性騷擾的人。

不過布萊恩·哈金在替自己的漢堡王找人時，有一套不同的方法。「我一直都從中途之家還有剛出獄的人中雇用人手。」他說：「這些傢伙來工作時，腳踝上還有電子腳鐐。『誰在監督你？』城裡有幾家公司在做監視服務。『你何時該離開？你何時該在家裡？』如果你可以問出這些，你就能夠幫忙他們。有些人會覺得感激，不過大部分都不會。」

他提到一個成功的例子。他的員工有個朋友，是個吸毒的年輕女子，正在勒戒所戒毒。一開始只是這名員工的簡單請求：「她才剛出獄，」這名員工告訴布萊恩：「她需要工作，你能幫幫她嗎？」

「我面試了她，她看起來還可以。」布萊恩回憶道：「她不是那種非常棒的人。」不過他還是雇用了她，當作是幫忙自己的員工。在工作時，他花了很多時間跟這個人談論私人問題，然後開始尊敬起她的努力。「她了解我需要她，就像她需要工作一樣，我要靠她才行。她明白這一點之後，工作能力就開始突飛猛進。能夠將一個人從街頭拉回來，真的讓人打從心底覺得『太好了』。她邀請我去參加她的戒毒結業式，她很替自己感到驕傲，她也應該要自豪沒錯，因為她逆轉了自己的困境。我不會說在漢堡王工作讓她有了這樣的轉變，不過我認為這份工作給了她很多自尊，讓她可以振作起來，重新生活。」

「後來她換了公司，也換了職位，我偶爾還是會跟她聯絡。她現在是一家房地產公司的接待員，也在一家旅館兼差。她做得很好，我的意思是，不是說那有多棒（畢竟她不是在矽谷上班）；不過從她的出身來看，她做得很好。」

在混亂的市場上，可以花點低成本，冒險用幾分鐘留意指點，或許就能拯救低技術的工人了。「有一次，一名年輕女子就快要被我們開除了，因為她沒辦法準時來上班。」斯普林特公司的海柔·

巴克利說。「她從來沒有搭過公車，」也不知道該怎麼做，因此她的主管教了她。「現在她會看時刻表，會搭公車，一切就都沒事了。」換句話說，一旦貧困缺乏自信的勞工遇上求才若渴並且富同情心的雇主，雙方都能得到好處。

在景氣持平的時候，約翰諾克斯村這個堪薩斯市的退休之家，從來不會因為大眾運輸到不了這裡而有什麼麻煩；就業市場吃緊的時候，退休之家可以找到一千個人來上班，大家都自己開車；但是等到景氣變好，就會爆發嚴重的人手不足，得動用到市內的儲備勞動力。「勞動力嚴重不足時，通常是失業率低於百分之五的時候。」人力資源經理雪倫·伊比說。「我們就是招不到人，每個星期我們都缺了幾百個人的情況下運作。」她終於意識到交通是一大障礙，解決方法就是出動退休之家自有的廂型車和公車，那原本是用來載退休人士出遊的，而現在她調動車輛，往返市內。

這種單靠一家公司想出來的權宜之計只能治標（這是美國人偏好汽車所導致的問題），不能治本，應付不了經濟失調的問題。這種方法沒有解決勞工長期以來的劣勢，他們窮得買不起性能可靠的車子，也沒能把稅收從建設高速公路轉移到大眾運輸上。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了私人公司在解決社會問題時的局限，這樣的解決方法等到景氣轉好以後就撐不下去了。

漢堡王的布萊恩·哈金說，他唯一的要求是職業道德。他這麼說就已經在無意間限制了員工的可能性，煎漢堡包的不會升到管理職，除非你有大學學歷，以及除了守時之外的許多特質。艱困的出頭地之路已經成為一條險阻之道，除非有像樣的資歷，否則幾乎不可能穿越。

在布萊恩看來，文憑並不代表你知道什麼，而是代表你有多努力。「看到人家有大學學歷，」他說：「我首先會想到的是這個人很執著。如果你能念到大學畢業的話，就算拿的只是政治學學位，至

少你畢業了，你成功了，那表示你可以在其他地方獲得成功。」

不過像執著這類的「軟技能」，得靠「硬技能」才能產生，而硬技能應該要在學校或是在職訓練中學習。沒有哪個覺得自己無能的人還會執著、守時、正面積極，或者是對於進步懷有任何實際的期望。雇主抱怨那些不會填寫申請表的求職者，高中畢業了連「高中」兩個字都不會寫，但是他們還是會雇用這些人——只不過這些人升遷無望。雪倫·伊比不在乎房間清潔工和食堂工人會不會寫錯字，「他們不用在紀錄簿上面寫什麼，」她說道：「他們只要能夠看懂訂單變更那類的東西就夠了，這才真的會造成影響。」那類工作一直做下去，只會走進死巷裡。

「我有個收銀員有點問題，」布萊恩說：「這傢伙的個性很好，顧客都喜歡他，不過如果他學不會算錢，他就只能困在這裡。而他就是學不會。」有時候收銀機派不上用場，「比如說，你在收銀機前，然後人家說：『嘿，布萊恩，我需要把我的錢換成幾張五美元紙鈔。』我把抽屜打開，拿一些五美元紙鈔出來；我是按下現金鍵把抽屜打開的，所以上面有顯示金額，但是機器不會顯示要怎麼把這些金額換算成五美元，於是他們就不知道該拿多少錢了。他們猶豫起來，你得告訴他們應該是多少……這要我怎麼做？教他二年級數學，然後找問題考他：『幫我算算這個？』顧客也許很愛他，但是他當不了經理。」

這名員工的情況並不特殊，約有百分之五十五的美國成年人算不出辦公室用品訂單目錄上的總價，也看不懂用藥指示說要餐前或是餐後服藥。根據美國教育部二〇〇三年的全國成人智能調查，有百分之四十三的人無法概述求才廣告中的經歷要求為何，百分之三十四的人看不懂地圖，百分之二十二的人無法用時薪算出周薪是多少，因此，他們沒辦法在全球市場上與人一較長短。美國的消費水準

很高，從事非技術工作的美國工人，比起在其他地方做相同工作的人，需要更高的工資；除非那項工作有地理上的必要性，一定得在美國境內完成。因此，大部分這類工作都會快速移往低工資國家，有如百川奔流入海般勢不可擋。這就是為什麼當領食物券的人遇到問題，在紐澤西撥了八〇〇免付費電話，接聽電話的人卻遠在印度；這也是為什麼保羅·李利的多酷索公司會把信封的圖檔從密蘇里州傳送到墨西哥去，再由那裡的工人在電腦螢幕上輸入郵遞區號，製成條碼。美國渴求更多有技術的工人，而那些缺乏技術的，向上爬升的機會就越來越渺茫了。

研究顯示，能夠善用雇主提供的學費補助以及其他教育獎勵的工人，往往是那些原本教育程度就已經很高的工人。教育就像是資本，你擁有的越多，就能得到更多。剛擺脫貧窮的員工，或者是那些徘徊在險峻貧窮邊緣的人，鮮少有人能夠享受事先計畫的好處，也無法計算諸如健康保險、人壽保險和退休計畫等方案的影響和益處。「底層的人工作是因為走投無路或有需求，他們沒有職涯目標。」大衛·伯克米勒觀察道：「他們不知道『職涯』是什麼，他們賺取最低工資，只能勉強餬口或是支應自己的惡習，因為不工作的話他們就得回牢裡去。他們沒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或者只是打定主意不上班……他們的生活一團糟。」據保羅·李利觀察，他的低薪員工常被個人與家庭問題拖垮。不過他有另一種說法：「工作不是他們主要的工作。」

布萊恩·哈金通常可以很快地在面試中辨認出這種人。「你要問對問題，」他說：「要用直覺去把他們找出來……有個可以提出來的好問題是：『今天是星期二，你通常怎麼度過星期二？你會做什麼？』如果他們可以一下子講出六、七、八件事情，或是有人說他們要去見緩刑官，你大概就知道你該怎麼辦了。但是如果有人說：『我會從我祖母家出發，去本地的小餐館吃個早餐之類的；或者是我

第六章 父的罪行

Chapter 6

我不會讓你太接近我，因為如果你靠得太近，我就會有危險：
我會有被搶劫的危險、被偷的危險、被當作理所當然的危險。

——桃子，一名無家可歸的女工

去萬寶盛華人力銀行填了一些資料想找工作。」你大概就知道他們是怎麼樣的人，了解他們有什麼抱負了。」

布萊恩也會用自己的雙眼來試著看清狀況。「你要找一些看得到的線索，肢體語言那類的，試著搞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很多時候，你面試的人從頭到尾都盯著地板看，這是什麼意思？是表示他們會騙人，還是表示他們很害羞？」又或者，那只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無能充滿了恐懼？

那名十歲的小女孩坐在晃盪的鞦韆上，跟坐在她旁邊的鞦韆的社工聊天。「到底有幾次啊，」小女孩問道：「妳被強暴過幾次？」

問題來得漫不經心，彷彿只是隨意展開的對話，社工芭芭拉試圖保持鎮靜。

「我說我沒被強暴過，她很驚訝。」芭芭拉回憶道。

「我以為每個人都被強暴過。」她記得女孩是這麼說的。

「她的朋友在學校都會討論，」芭芭拉觀察道：「那是家常便飯。」

這就是芭芭拉談到性侵犯存在於無數美国家庭時的開場白。這名女孩是芭芭拉在高度危險兒童輔導計畫的第一個案，由教師轉介而來，他們注意到她生活中有遇到麻煩的跡象。芭芭拉在新英格蘭某個鎮上試圖幫助的十三名男女孩當中，有十二個人遭受過性騷擾。據她說，他們說出這些經歷時，常常是坐在她旁邊的時候說的，特別是在鞦韆上或是在車上，這樣他們就不用看到她臉上的反應。那名十歲的女孩被自己的父親強暴，而她父親已經六十七歲了。

芭芭拉不知道她長大以後會變得如何，她在寄養家庭裡來來去去，她的母親酗酒成性。「這麼一個甜美的小女孩就快完了，」芭芭拉說：「能撐過二十幾歲就能熬下去吧。」

熬下去，這是芭芭拉最樂觀的預測。她差不多說對了，十八歲的時候，這名年輕女子懷孕了，不確定三個男人之中的誰才是孩子的爹。

處在貧窮邊緣的女性當中，有為數驚人的性侵倖存者，就像是一筆龐大的債務，她們的創傷在事發多年過後仍舊壓在她們身上。但這又不像債務，不能用宣告破產來一筆勾銷。她們的未來變得殘缺不全，因為她們的過去會在她們解釋自己的身分時強行出現，有時候會在第一次討論時坦率地現身，

有時候則要見面四、五次以後，才會拐彎抹角地表現出來。即使我從來沒提到那個問題，但大部分我採訪過的貧窮女性，遲早都會提到她們小時候被性侵的事情。

我跟一個名叫卡拉·金的年輕媽媽見面才半小時，就把她的故事告訴我了，而我只不過是問了她的家庭狀況。「我爸在我小時候就對我毛手毛腳的，我先生不知道這件事情。」她直截了當地說道：「當時我十二歲，他有一整年的時間都在撫摸我，每當他喝醉了，我就會把自己鎖在房間裡，醒來的時候他壓在我身上，我把他推開，他說：『爸爸跟女兒就是這樣的。』」

「你知道這樣不對，但是你不知道要跟誰說。」卡拉繼續說道：「我跑去待在一個朋友的家裡，之後我才跟我媽說，結果她說：『沒關係，我爸爸喝醉的時候也會那樣對我，不過這種事情不會再發生了。』」

一個女人會將如此私密的恥辱告訴一個陌生人，透露出問題的嚴重程度。她忍不住追溯起她的許多缺陷，似乎都源自於童年時期造成的恥辱和自我厭惡，這些缺陷會改變人的一生；她無法明智地選擇男伴、不信任感很深、情感疏離、無法產生歸屬感。那些侵犯太過深刻，無法隱藏。

性侵害折磨著所有的階級和所有的種族，社會越開放、時代越開放，大家就越能夠坦率地討論這個問題，因此美國人也越來越能意識到這個問題。受害者克服了不該產生的羞恥感，控訴神父、舅舅、家人的朋友與父親，然而還是有很多人隱藏起來，因此問題依舊比解答多；貧窮的孩子比有錢的孩子更容易受到傷害嗎？物質匱乏的家庭沒有辦法保護自己的孩子，讓他們免於這種難以磨滅的傷害嗎？性騷擾在破碎的家庭中是不是比較常見，因為單親媽媽加上男友來來去去、酗酒、吸毒、長時間值夜班家裡沒大人？

眾所皆知的是，這種創傷會令人衰弱，就像是窮人身上常見的各種殘缺一樣。受到性侵的孩子容易有無力感，如果這樣的感覺延續到成年，就如同許多受害者所證實的，會摧毀人的信念，讓人不相信可以自己可以掌控生活，失去自己真的能夠作主選擇的信念，也不相信自己現在所做的決定，可以改變未來。令人麻痺的無力感湧入，混雜了其他侵蝕人心的困境，剝奪了那些置身貧窮或瀕臨貧窮者改頭換面的能力。

童年時期被性騷擾的經驗會破壞一個人成年後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也因此破壞了一個家庭的經濟潛力。所有貧困的家庭之中，約有百分之五十一是由單身女性獨力支撐，而有百分之十是由單身男性獨力支撐，這表示有百分之六十一的貧困家庭是單薪家庭，這對於低工資者來說是一大障礙。因為女性到頭來往往得照顧小孩，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從孩子的父親那裡得到足夠的扶養費。

性是無法建立健康伴侶關係的原因之一，受虐兒的無力感會導致屈服，因而訴諸心理醫生稱為「解離」(dissociative)的逃避方法：受害者在心理上抽離出來，旁觀傷害的發生。同樣的現象也可以在其他創傷受害者身上觀察到，包括戰爭受創者，這種置身度外的經驗會給人一種被保護的感覺。冷漠與情感疏離在事發過後會持續好幾年，甚至一輩子都如此，而小孩特別容易受到傷害。「成年時期的反覆創傷會侵蝕已經形成的人格架構，」哈佛醫學院的心理醫生萊蒂斯·路易斯·赫曼(Judith Lewis Herman)指出，「但是童年時期的反覆創傷會形成人格，扭曲個性。」

倖存者的親密關係會受到渴望保護與關懷的心理影響，她們害怕被遺棄或剝削，恐懼如影隨形。為了追求被拯救，她會找尋強而有力的權威人物。這看似能夠給她承諾，能夠帶來一段特

別而滿懷關愛的關係，藉由理想化這個她所依附的人，她試圖跟遭到控制或被遺棄時的恐懼保持距離。

然而不可避免的，她選擇的那個人達不到她幻想中的期待，失望之餘，她會憤怒地詆毀那個前不久她才愛戀不已的對象。在倖存者的心中，僅僅一般的人際衝突就會引起強烈的焦慮、憂鬱或憤怒，稍微的怠慢都會讓她想起過往被無情忽略的經驗，稍有傷害都會喚起過去被刻意殘酷對待的經歷……因此倖存者發展出一種緊張、不穩定的關係模式，再三上演拯救、不公和背叛的戲碼。^[1]

種種形式的侵犯也可能會導致過早發生性關係。有項研究發現，「情感匱乏，尤其是發生在早年時期，會使得青少年容易透過性行為和早早成為父母來尋求情感上的親密感受。」^[2]另一項研究以曼斯菲城一千零二十六位非裔美國年輕女性為樣本，發現遭受身體虐待(非性侵害受害者)與早孕無關，而性侵害受害者則與早孕有關。幼年曾經遭到性騷擾的女孩，往往會在比較年輕的時候就同意與人發生性關係(平均是十四點九歲比十五點六歲)，而她們懷孕的年齡也更早(十六點七歲比十七點四歲)。「臨床醫生應考慮把童年時期曾經受到性侵犯的青少年，視為過早發生性行為的危險群。」該報告的結論指出，「這些青少年應該接受合宜的家庭計畫諮詢，並轉介到心理健康諮詢，以降低過早懷孕的風險。」^[3]他們應該要如此，不過他們卻很少這麼做，尤其是如果他們很窮的話。

在低收入家庭中，性侵也成為一種把貧窮傳給下一代的機制；儘管有錢人家也會發生性侵犯事件，

不過富有的人有其他辦法推動自己的孩子前進。雖然內心的痛苦是一樣的，但父母的野心和高期望、成功的壓力、受教育的機會、追求專業成就的動力，全部混在一起，成為一種權力意識和機會，倖存者常會因焦慮而努力，想要取悅他人，這在某些家庭中就帶來了傑出的學業表現。

低收入家庭則大不相同，侵犯問題累加在堆積的多重壓力上。根據研究人員估計，每四或五個女孩中，就有一個遭遇過性侵犯，但是在低收入的單親媽媽之中，這個比例可能更高。報導福利改革的記者遇過許多貧窮的女性，她們都提及遭到性侵犯，向自己的母親尋求保護卻不信任，安全感因此粉碎了，家庭所能提供的避難功能也沒了。有個撰寫這個主題的白人記者，在我告訴他新英格蘭那個鞦韆上的女孩的事情時，顯得很困惑。但是她是白人吧？他問道。我回答，對，那個城鎮基本上全都是白人，卡拉·金和許多其他跟我說過遭到性侵犯的女人，都是白人。好吧，他坦承，他以為這個問題跟黑人文化有關。他似乎對自己的偏見感到很吃驚。

華盛頓特區的溫蒂·韋斯勒才剛停止領取社會救助金，她剛做好拮据的預算規畫。就在我們第二次談話時，她開始講起交織在童年記憶中的傷害事件，將近三十年過去了，如今她決定要掩飾好傷疤，強迫自己從失敗中恢復過來，努力工作、盡情歡笑，做她殘障的女兒的榜樣。

她對自己的生母一無所知，只知道自己四歲以前是在兩個寄養家庭裡度過的。「他們認為做錯每件小事都該揍我們，」她這麼描述第一個寄養家庭。「他們有個兩歲小孩，她也是養女……我記得有一天，那天就像個不斷重複的惡夢，不肯讓我忘記……因為那個小女孩尿在自己身上還是什麼的，養母帶她去地下室打她。養母氣瘋了，因為她還得清理，突然間我就沒聽到尖叫聲了，養母上樓來，不過那個小孩沒有。我很害怕，我猜她看到了我臉上的表情吧，她說：『怎樣，妳不想待在這裡

了嗎？』我記得我跟她說我不想，於是她叫人來帶我走，他們就來了，我就這麼去了下一個寄養家庭。」溫蒂一直不知道那個小女孩是死是活。

第二個家庭也沒能提供庇護，他們有另一個領養的小孩叫賣拉，還有兩名欠缺管教的青少年兒子。「這些男孩把我跟賣拉帶到地下室去，拉下我們的內褲，做……」溫蒂沒辦法把話說完，「不管你幾歲都一樣沒辦法把這種事情忘掉，直到死亡來臨的那一天都永遠不會忘記。」

她再次被救出來，這次是個沒有小孩的離婚女人收養了她。「收養我的時候，她說我看起來好像有厭食症。」溫蒂回憶道：「她說我的頭髮亂七八糟，衣服髒兮兮的，還說我的牙齒都發綠了，還能待在我嘴裡真是個奇蹟。她說：『我救了妳。』」

但是事實證明，她沒有完全得救。養母經常把她留在保母家，她常常得跟保母的兒子單獨相處。「他們常做一樣的事情，把我帶進浴室之類的，叫我做奇怪的事情……」溫蒂還記得，「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肛交，我想那時候我才上小學二年級吧……我媽從來不相信我，認為我在說謊，因為她問那個女人，那個女人什麼也不知道。」

就像許多遭受過侵犯的女人一樣，溫蒂應付不了男人，處理不了親密關係、信任和愛。她母親竭力避免她步上通往貧窮的快速道路，青少年常常就這麼一腳踏進去：懷孕、未婚生子、輟學、跟有暴力傾向的男人混在一起、斷斷續續領取社會救助金、在低薪工作中載浮載沉。她母親盼望她能夠上大學，溫蒂也被霍華德大學錄取了，但就在高中畢業的那一天，她得知自己懷孕了。她害怕地告訴母親，一講出來以後，她母親堅持要她墮胎。

溫蒂先是反抗，後來還是不甘願地去了，她懷的是雙胞胎。「手術後我回頭看，有個瓶子裝著那

些人體器官。」她記得清清楚楚。「我覺得這真的很殘忍，如果你要我經歷像這樣的事情，就不要把結果擺在那裡。」一道缺乏尊重的鴻溝在溫蒂與她母親之間裂了開來。

每次懷孕都沒有好結局，就像每段關係都沒有結果一樣。多年來沒有生育、沒有結婚，沒有成功的懷孕或戀愛關係；流產過一次、還有一次因為男人打她，所以溫蒂解除了婚約。後來她又墮胎過兩次。因為害怕再有小嬰兒死掉，她覺得痛苦、無依無靠。她孤身一人，與養母疏遠了，經濟狀況也很不穩定，負擔不起霍華德大學的學費，於是她轉學到哥倫比亞特區大學，但沒拿到學位就輟學了。接著她遇見另一個她想嫁的男人——在發現他的缺點後又取消了結婚儀式。「大概是婚禮前一個星期吧，我發現原來他在吸毒。」溫蒂說：「我只好放手讓他走，但是我肚子裡還有寶寶。最後我失去了那個寶寶，寶寶死了，只活了八個小時就死了。」

她在美國航空、肯德基和其他地方打零工，但是她賺的不夠，沒有自己的住處，只好跟不同的男人到處搬家，有時候無家可歸，有時候住在收容中心。她又懷孕了，這一次，她決定就算孩子的爹不願意承擔照養，她也要把孩子生下來。「如果我把她流掉，我永遠也不會原諒自己。我發過誓再也不會這麼做了。我得告訴我自己：不要再逃跑了，恐懼應該要結束了，要好好處理這件事情。整個懷孕期間，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都會愛這個孩子，好好照顧這個孩子。」

孩子是女孩，她替她取名為琪雅拉，早產三個月，重兩磅一盎司，出生在特區綜合醫院。當時溫蒂住在收容中心裡。「因為我無家可歸，他們把我當成泥土般對待。」她說道：「護士表現出一副我什麼也不懂的樣子，我就是個街上的蠢蛋。」她替自己說話，堅持要對方尊重點，但她沒有得到。

她女兒的出生不是一件喜事，「因為她出生得太早了。他們一直跟我說我沒有子宮收縮，但我已

經收縮三天了。他們想告訴我，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他們說我只是感染；我告訴他們，如果是感染，吃藥都吃三天了，為什麼還是這樣？……於是他們替我接上監測器就走了。我沒辦法呼叫護士，因為那個設備壞了，而他們都不來看我的狀況，我得自己拿著兩個監測器，裹著毯子走到廊上，一直走到盡頭的護理站，對他們說：『不好意思，我已經呼叫你們三個小時了，我需要多塗一點潤滑劑在胎兒心跳監測器上。這個監測器的嗶嗶聲快把我搞瘋了，我在宮縮，我需要有人來檢查看看，確定一切都正常。』」

「結果他們說：『妳為什麼跑到走廊上？』我說：『因為我要試著引起你們的注意。我一直在大叫，而我本來不應該大吼大叫的。』我還說：『你們關心我應該像關心自費病人一樣，對吧？』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小孩出生……看吧，他們就是這樣對待沒錢的人。」

接著那個令人驚恐的消息傳來了，她被告知收容中心不收留新生兒，這個早產兒一出院就得送去寄養家庭，直到溫蒂有地方可住為止。「我跟他們說：『辦不到。』」溫蒂聲明：「除了我以外，沒有人可以扶養我的孩子。我在寄養家庭長大，我知道那些人是什麼德性。」只剩下唯一的一條路了，「我咬緊牙根打電話給我媽，我說：『聽著，我生了個孩子。我知道我們之間意見不合，不過我不打算讓其他人養我的孩子。』我說：『我需要先住在妳那裡，直到我找到公寓為止。等我身體好一點，我就會去找。』我媽同意了，我想這是我第一次從我媽那裡得到尊重。」

接著是第二個打擊：八個月大時，琪雅拉被診斷出腦性麻痺，起因是出生前或出生時所受到的腦部損傷。這個小女孩長成了一個可愛又笑咪咪的流水小朋友——不過她學不會走路，她永遠也不能走路，註定要坐輪椅。快四歲的時候，她還不太會講話，她也永遠沒辦法流利地說話。

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殘疾，也許就能打破原本的典型模式，因為琪雅拉的經歷跟溫蒂早期的創傷經驗完全不同。「我會打琪雅拉屁股，」溫蒂承認。「但那絕對、肯定是因為她真的做錯事了，我不會每件小事做錯了都打她，可能只是稍微拍拍她的腿，而不會用皮帶跟戒尺。」不論溫蒂的母親用怎樣嚴厲和擔憂的方式表現出她的關愛，溫蒂相信那都彌補了早些年時的剝奪和虐待。

但即使是努力想要當個慈愛的母親，溫蒂還是無法從受虐的過往中抽離出來，這阻礙了她與男人建立戀愛關係；到她終於結婚之時，她還是選錯了人，她先生有躁鬱症，比較像個對手而非幫手。結婚兩個月以後，他辭掉熟食店的工作，因為他「想要靠我吃軟飯，」她說道。他們有個健康的孩子，但是他坐在家裡，拒絕幫忙照顧孩子，抱怨她煮的食物，打電話恐嚇她的公司同事，無中生有地想像她跟那些人眉來眼去。「他沒有安全感，」溫蒂說道：「他會發脾氣，因為我一直叫他『動動你的黑屁股滾出去找工作！』」他喝了酒，想打她，「不過我把他打得連鼻涕都流出來了。」她說著，並憤怒地笑了，「我抓起電話朝他兩隻眼睛中間打過去。」她又笑了，「我揍他的臉，還試過用衣架勒他。」她爆出一聲爽快的大吼：「我用煎鍋打他的頭，一個很大的老舊鑄鐵鍋。」她笑個不停。最後他逃走了，她則提出離婚。

據觀察，性侵犯的倖存者往往會過度保護自己的孩子，他們不停地跟孩子說「不、不行、不可以」，這種態度破壞了年輕人探索與學習的意願。溫蒂也表現出了這類焦慮，不過很難分辨那是因為她自身的經歷，或者是因為她大女兒的疾病；溫蒂對孩子既寵溺又盡責，決心要讓琪雅拉發揮生命中最大的可能性，就像她這麼晚才開始努力實現自己人生最大的價值。她現在有理由要當個好榜樣了。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不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挫折什麼的，要很堅強的人才能夠克服那些事情。」溫蒂勇敢地說道：「我要讓她看著我克服我的挫折，我希望這能影響她，讓她也去克服她的挫折。」

「叫我桃子。」這名眼神中帶著傷痛的女人說道。她的左顳骨上有一道小小的傷疤。她選擇這個化名一定是出於嘲諷或渴望。她傷痕累累、過於魯莽、吃過太多苦、被嚇過太多次、太過老練世故。她住在收容中心，替華盛頓特區一家高級律師事務所影印東西，這份工作令她感到愉快，讓她逐漸得到滿足。她工作的辦公室位於一座繁榮的聖殿中，寬廣的大理石大廳周圍盡是龐大的柱子，有成排棕櫚樹和水晶玻璃塔，看出去是天空和大廈；她住的地方是個危險的社區，裡面都是窮困潦倒的女人，會偷別人的食物來吃。

「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誰。」桃子說道：「收養我的人在我五歲的時候就死了。」接手的寄養家庭在馬里蘭東岸，刻意殘忍地對待她。他們是黑人，就像她一樣。不過，或許沒她那麼黑，因為他們會嘲笑她的膚色。「我被關在屋外，他們說我什麼也不是。」她說道：「他們說我就像我媽一樣，又黑、又醜，瘦巴巴的——反正就是一文不值。我就生活在那樣的家庭裡。」

而她的生存意義是為了養活那個家庭。每年夏天，「我從八歲開始就到工廠工作。在鍋子中將滾燙的熱馬鈴薯去皮，再裝進桶子裡去。桶子就是你用來拖地的那種大小，一桶賺十分錢。推過來又拉過去，你可以想像吧……就這樣把桶子推來拉去，拿起鍋子又放下，做這些粗活，從早上六點開始一直做到傍晚……這是違法的，但是我得工作，那就是我的夏天。」

她身上還有養母留下的懲罰印記。「我的手臂上全是疤痕。」桃子說道，邊露出扭曲的傷疤，

就像被磨光的金屬一樣。「衣領沒燙好，就會被燙一下……如果我到旁邊喘口氣，就會被抽鞭子。」青春期突然到來，令她茫然不知所措。「他們根本沒有教過我什麼。」桃子回憶道：「我是女人，年輕的女人都會開始有變化，有月經周期。但是我不知道我怎麼了，沒人告訴我。他們給我的感覺彷彿是：『喔，妳現在是怎樣？噢，省省吧。』沒有那種『嗯，妳就是會這樣，妳現在是個年輕女人了。』的態度。」

她的苦難並沒有隨著童年的結束而終止，她沒有提到被性侵犯的經驗，不過肉體與情緒上的打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別人會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她說道：「就好像是，『妳表現得就像是從來沒跟別人互動過似的，妳有缺陷。』好吧，我確實沒有。我從來沒看過電影，從來沒去過馬戲團，我有個女性朋友請我去看馬戲表演，我那時候二十幾歲，大概二十七歲吧……我哭了，因為那對我來說是新鮮事。我確實沒跟一大群人出去玩過，我得待在家裡，因為我沒得選擇。」

「我還注意到另外一些事情，別人在講他們的朋友、哥兒們，那些高中時建立起來的關係，我都沒什麼好講的，因為我沒有跟別人互動，所以我沒有發展出那種友誼……最後幾年我去上黑人白人都收的綜合學校，但是，見鬼了，我在黑人當中都覺得自己一文不值了，你就知道我在白人當中有多沒價值，所以我更孤立……我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價值，因為人家總是告訴我，我一文不值。」

桃子高中畢業以後，寄養家庭就把她踢出去了。「我第一次發生性關係就懷孕。」她被罵了一頓，「『妳就像妳媽一樣，不是好東西。』我覺得……嗯……不好意思喔，又沒人真正好好坐下來跟我談論我的事情，讓我覺得自己有點價值，所以我就跟一個年紀比我大的男人上床了，我不喜歡，很痛。」她沒有把孩子生下來，這次或後來的懷孕都沒有。她參加了青少年職業培訓，在那裡被一個拉

皮條的強暴了，要她去當妓女，她很快墜入地獄裡，在這過程當中，她努力想要抓住任何一絲可以獨立的機會。「當時我已經在賣淫了，」她承認。但不是替拉皮條的工作，她宣稱她是自己的老闆。

「我沒辦法替別人做這種事情。」

桃子拚命想尋找些許關懷，卻一再挑錯男人，在夢想與恐懼之間遭到鞭打；她夢想能夠擁有完美無瑕的家庭，又恐懼會創造出跟寄養家庭一樣的地方。「我懷孕過幾次，不過讓我覺得不願意生小孩的原因是，這一切不停在我腦海裡重複播放，如果我不能擁有想像中的那種男人跟那種家庭，像在電視上看到的那種——『哈囉，親愛的，我回來了』，而不是『他X的，你怎樣怎樣』——我才不要把小孩帶到這個世界上來。」她宣稱道：「嗯，我想要的是教科書上的那種家庭，有丈夫、有妻子、有一個家，或許還有一隻狗跟一隻貓、兩個孩子、一輛車子跟一間房子。不過我從來都沒辦法真正抓住這些，我從來都抓不住，那些東西都從我身邊溜走了；我爭取過，或為此哭泣，為此痛苦得不得了，但是這些就是從我身邊溜走了，因為有太多事情壓著我，而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我就這麼活著，過一天算一天，去工作，喝酒，從星期天一直狂歡到星期六……如果有人出現，起碼假裝他們愛我，我會配合，我會付出、付出、付出，再付出，直到我受傷為止。事情也的確這樣發展，我受傷了。」

她沒有多少自我意識，總是受到那些愛控制她的男人吸引——那些男人顯然無法控制生活中的其他事情。她曾經有個分分合合多年的交往對象，跟她一樣認為她是個一文不值的人。「我跟那傢伙在一起，會讓我覺得自己寧願消失在牆壁裡，」她說：「請不要再讓他跟我講什麼了。」

如果她穿上毛衣，他會說：「妳又不用穿那個，脫掉。」如果她離開家，他會大吼道：「妳要去哪？」

「我得偷偷溜出去，到街上才能打電話。如果我想擺脫他，他會一直跟在我後面。」她說：「回想起來，我到底是怎麼落到這個地步的呢？我能怎麼辦？『不要坐在這裡，不要坐在那裡』……：每任男友都沒有把我當一回事，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起碼我是個好人吧？好吧，也許我不是個好人，你也知道，或許我有什麼不對勁。好吧，我有問題，大家都這麼說，說我瘋了。」

桃子被男人搶劫又被毆打，但是她卻渴望這個男人的愛。「看看這些照片，我還留著幾張，看得出來我不是難看的女人，」她說道：「有段時間，我算是個很好看的女人——身材不錯、長髮披肩，但是我從來沒有那麼覺得過，因為如果有人注意到我的外表，他們就只是想要得到我的身體，如果我不給，那好吧，我就沒用了。」

但是用完之後，雇主還是把她棄如敝屣。「我真的沒辦法跟別人合作，這點讓我無法前進。」她解釋道：「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跟別人合作的那些眉眉角角。」她的時薪比最低工資多一、兩美元，她覺得她在羅德與泰勒百貨公司 (Lord & Taylor) 賣女裝的工作做得還不錯；不過在冬天清晨和夜裡長時間等公車，讓她的氣喘變嚴重，耽誤了工作，害她被開除，這又是另一個不相干問題卻產生深遠影響的例子：糟糕的大眾運輸系統導致健康惡化，造成失業。

「我喝酒，抽大麻——感謝上帝沒別的了。」她說：「我從周日到周六都在狂歡，中間沒剩多少時間。」到最後她流落在這個國家的首都的街頭，鄰居從窗戶裡看著她。「他們什麼也沒說。他們看到我走在街上，渾身髒兮兮、亂糟糟，不會問一句：『妳怎麼了？要不要吃個三明治？』明明那些人都認識我。就算是不認識的人好了，『借過一下，』彷彿我只是個隱形人。」

她溜進一個還沒有蓋好的地下室去住，接著又去了一間可怕的收容中心。「我拿到的床單有血跡，而且把床單抖一抖，還會抖出老鼠屎來……：他們發放食物的時候，只給一個盤子，連餐具都沒有，不過我一整天都沒吃東西，餓得快瘋了，所以我就坐在那裡用手抓著吃。後來我看了看四周的環境，對自己說：『這樣我沒辦法接受。』所以我又回到那個沒蓋好的小地下室，那裡到處都是灰塵。我花了僅有的錢買了一條毯子，因為我很冷。」再之後，她暫時回到一個對她惡言惡語的男人身邊。「因為我需要有地方可以好好洗個澡，我偷偷靠近牆邊，祈禱他不要碰我……：最後他把我扔回街上。我在街上四處遊蕩，能吃的都吃了，買到什麼就吃什麼。我的意思是，流落街頭的時候，錢花得很快。」

她靠偷竊維生，但是她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因此不配拿什麼奢侈品，只偷一些符合她自我輕視心態的小東西。「我偷過食物，偷過衣服，沒什麼刺激的，」她承認。「你瞧瞧，我從來都沒有走進很高級的商店過。」她輕輕笑了一下，「如果我是個又黑又醜的小人，兩條腿跟枯枝一樣，那種店就不會給我去的，我不可能去那裡；不過你看，我可以去麥布萊德商店 (McBride's)，去凱馬特超市偷幾件衣服……：我不偷牛排，我偷波隆那香腸。」她盡情地嘲笑自己，「我這個人不夠好，連偷東西都不配偷好東西。」她越笑越大聲，笑到連話都說不清楚，「如果我要偷東西的話，起碼可以偷塊牛排，而不是偷波隆那香腸。見鬼了，我花九十九分錢就可以買到波隆那香腸了！」

父親與母親的罪行形式很多，不是只有性侵。施加在子女身上的虐待，可能會導致自虐；原本該有的自我價值成了一片空白，酒精與毒品迅速填補進去，很快就毀了一個正常的家庭。童年階段也會影響到成年階段，反覆迴盪，重新上演一樣的主題，年輕人受到忽視與殘酷對待的經驗，最終會形成

她養育自己孩子的方式，傷害可能會一代接一代地傳遞下去。

事情是怎麼發生在瑪奎塔·巴恩斯身上的，她並不確定，不過眼看著自己的家庭生活從祖父母那一代就開始崩離析，她很擔心這種失敗會延續到她的孩子身上。

她的祖父母與外祖父母在華盛頓的藍領階級區都擁有自家的獨棟房屋，那裡許多非裔美國人都擁有穩定的公職。但是二十年後，瑪奎塔住在公營社會住宅裡，那裡有個年輕母親前不久才被歹徒飛車開槍射殺。瑪奎塔像是怕外面的事情闖進來似的，總是拉下窗簾，窗戶關得緊緊的，沒有新鮮的陽光或清新的空氣能進來驅散陳腐的黑暗。她不自在地坐在一張金屬摺疊椅上，廚房裡的腳踏車上掛著衣服，洗好的衣服則疊放在她客廳裡的棕色沙發上。她有一隻灰貓、一個魚缸，紙板相框裡有孩子的照片，還有永遠響個不停的電話，通常是找她那十幾歲的女兒。她女兒步上她的後塵，跟她一樣高中就輟學了，這個板著臉的女孩回答她母親的問題就跟回答其他人一樣，都是用簡略的單音節來回答。

三代以來，這個家族顛覆了美國夢，如今到了第四代，這個家族經歷了成就與幸福的衰落，違抗了美國對於階級向上流動的樂觀精神。「我一直認為我的祖父母很有錢。」瑪奎塔說：「我們每次拜訪他們，都是想要什麼就有什麼，你知道的，有很多吃的。我祖母有八個小孩，但還是很富足。」她的外祖父母，「也一直過得很好。」她記得，自己最喜歡的地方就是外祖父在車庫的工作室，「他自己弄的，裝滿了可以在裡面亂玩的東西。」這段回憶讓她笑了，充滿懷念的溫暖，但在後來的日子裡，她喚不回這種溫暖。

據瑪奎塔回憶，她的祖母是護理師助理，祖父則在水務局工作。他們的兒子，也就是瑪奎塔的父母親追隨他們的腳步，不過安定的工作與家庭生活在此卻到了盡頭。她父親從來沒有跟她母親住在一起

過，而她母親靠打零工維生——在政府的印刷局打工，還幫人家洗衣服——因此她和孩子有時候得靠社會救助金過日子。「我媽是個酒鬼，」瑪奎塔直截了當地說。

身為三個孩子中的長女，瑪奎塔承擔了與年紀不相符的責任，還有不必要的窘迫。她母親喝醉不做家務時，瑪奎塔得帶著大弟跟小妹去雜貨店買東西，她去鄰居家找尋母親的下落，挨家挨戶敲門，威脅著說要報警，希望她能在爛醉之前回家。「我不想讓任何朋友看到她那副樣子。」瑪奎塔說。背負成年人擔子的小孩成功不了，這常常是他們人生中的第一次失敗，也是缺陷的根源。

「我逃家很多次。」她回憶道：「有幾次搬去跟我爸住，但是一跟我爸住在一起，我又不想跟他住了……我跑去跟我祖母住，但後來還是回去跟我媽住。到最後，我只好去跟一些朋友住。有一陣子我住在一個好朋友那裡，結果她姪子晚上想溜到我床上。我把事情告訴她，她就說：『為什麼小男孩會想睡到妳床上呢？』所以好吧，我只好離開了。你知道的，那很掙扎，我跟我媽，我們從來就處不來，我猜那其實是因為我只想要一個正常的家庭。」

但沒有正常的家庭，只有苦難的記憶和徒然的設想。「有時候我會為了缺頂帽子之類的覺得很丟臉。」她回想到：「我總是發誓等我可以獨立，就要帶著弟弟妹妹離開，他們可以跟我住，一切都會好得多。」漸漸地，年長的親戚過世了，還在世的也日漸疏遠，瑪奎塔被遺棄在地獄中。「基本上只能自謀生路，」她如是說道。

自謀生路是個嚇人的要求，會讓孩子感到力不從心，瑪奎塔做得不是很好，反而往墮落又靠近了一步：第一次發生性行為，她就懷孕了。二年級那年的十月，她從高中輟學，生下孩子，這是她四個孩子中的第一個，這四個孩子的父親是三個不同的人。她從沒想過要墮胎，她的理由呼應了那些青少

年的說法，把小孩當做是成熟自主的標記。「我可以對我媽說：『現在我是大人了，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做這個做那個，我有一點收入，我現在有份量了。』我猜事情就是這樣吧。」

瑪奎塔靠社會救助金度日，貧窮迫使她必須住在布倫特伍德，那是華盛頓一個毒品氾濫的糟糕地區，她稱之為「陷阱」，因為那裡局限了她，吞噬了她的夢想。社區的影響相當深遠，因為它決定了你的鄰居、朋友、娛樂、誘惑，而這一區對她造成的傷害，是沒有工作可做。瑪奎塔整天都泡在毒販跟吸毒者的圈子裡，他們聚集在一條烏煙瘴氣的商店街上，然後全擠在她住處的走廊。「我想我那時候大概是二十七歲吧，」她說：「我最後還是吸了，整個人陷了進去……吸古柯鹼、大麻菸卷之類的。」第一次吸食快克興奮起來的經驗太棒了，難以形容，從那之後她就不斷在尋找最初的感覺。「你會不停地追逐，因為你永遠也得不到最初那種嗨起來的感受了……你試圖找回那種興奮感，但永遠也找不到……我願意為了弄到毒品做任何事情，像是賣掉孩子的物品、聖誕節禮物、我所擁有的任何東西，就為了從別人那裡拿到錢。」

有毒癮的人說，快克就連最強大的母性也能抹殺，在瑪奎塔身上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她遺忘了孩子，被逐出公寓，還被街上一名男人給騙了。雖然小孩都跟她住在一起，但他們的狀況讓瑪奎塔的妹妹跟一名女性友人非常擔心，於是她們打電話給華盛頓特區的兒童與家庭服務機構。「我那時還在吸毒，」瑪奎塔說。調查員來的時候，她已經有兩、三天不在家，出門買快克去了。她回來的時候發現孩子不見了，老大跟姨媽住，其中一個兒子送去他父親那裡，最小的兩個則被送到寄養家庭去了。這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但還不足以打醒她的毒癮，那是後來的事情。也只有到了那時候，她才會想，怎麼有人能夠忍受「我所做的事情，還有我讓孩子經歷的事情。」她這麼跟自己說：「我怎麼能夠做

出這種事情來？」

戒毒或戒酒後恢復過來的人，往往會把自己的經歷說成一則勸世故事，帶有宗教寓言的元素：誘惑、墮落、坦承、懺悔、救贖。舉例來說，有個名叫約書亞的高個子男人，步上父親的後塵酗酒，常常無家可歸、神志不清。某年平安夜裡，他跟哥兒們在白宮對面的拉法葉公園狂飲，他昏了過去，鞋子跟大部分的衣物都被脫掉了。聖誕節時，他在醫院醒來，醫生正在奮力搶救他凍傷的雙腳，最後一雙腳截除了一半，而這足以激發他復活重生，他在醫院也同時接受強制戒癮，他戒了酒，找了一份維修工作。

所以瑪奎塔也一樣，要跌到谷底才能重新站起來，在谷底閃現清醒的神智與常識。兩個體驗令她清醒了過來：第一，她的毒癮讓她失去了父親的愛。「開始吸毒後，我們的關係就完了。」她傷心地說道：「這讓我很受傷，因為我一直是我爸爸的小女孩，他會為我做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第二，她最後淪落到醫院裡，這洗淨了她的身體，也洗淨了她的心。

「某天晚上我跟一個傢伙出去，」她說：「他買了一些東西給我，接著我們去他家，我跟他做了我得做的事情，然後他去睡覺了……我拿了她的鑰匙，開走他的車去給自己買一點，也打算要把他的車子開回來。」但是等她到了販毒的那區，找人幫她停車，那人卻把車子開走了，還打開後車廂偷了她朋友的工具。她氣炸了，一拳打穿一扇車窗，一腳踢壞了另一扇車窗，她喘得太嗨，沒有感覺到疼痛。「我的手在流血，腳也在流血，但我還是想吸毒，不想去醫院，少來那些廢話。」

然後車子的主人出現了，她以為會被他狠狠揍一頓，但是他卻送她去醫院，好心得令人驚訝。這份力量也強大得足以切穿她的痲繭，軟化了她，讓她開始反省。「那就像是觸動了我的心，你知道

嗎，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會想把我打得屁滾尿流。」她告訴自己，「我不需要更多的跡象來告訴我該怎麼做——我不想死，就是這麼回事。」

尋求治療的成癮者遠遠超過病床的數量，因此治療中心很挑剔，他們會收那些很嚴重的病患，所以瑪奎塔打算讓自己看起來如此。她找到一個還不錯的治療方案，不收費，每天都打電話去，直到她的決心打動了治療中心為止。等到終於有空床，她入院參加了一個為期五天的戒斷療程，接著是二十八天的恢復治療，然後在過度之家待了一年。相較之下，有錢人通常可以花錢請人幫他們治療。

瑪奎塔的治疗中心離她的吸毒朋友出沒的那一區很遠，這提供了關鍵的隔離，讓她遠離那些損友網絡。對於那些想要戒毒的人來說，遠離用毒人群是很重要的。不過隔絕令人感到痛苦，瑪奎塔一個人孤孤單單的，她沒有完整的家庭，多年來依靠的是一個「人造家庭」，也就是每周聚會的戒毒者互助小組。隨著她的進展，她一心一意要把孩子帶回來。在寄養家庭的那兩個，很幸運地逃過了溫蒂、桃子和其他人所受過的傷害。瑪奎塔最小的兩個孩子之一，受到一位養母的細心照料，這位養母也成為瑪奎塔的恩人、朋友與知己，「認識她是我的福氣，」瑪奎塔宣稱，「她說：『我跟妳說，妳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來我家，替我照顧孩子。』照顧我自己的小孩跟她收養的其他小孩！」她很慷慨，每兩周付兩百美元給瑪奎塔，這讓她受寵若驚。「她就像是我的第二個母親，人很好。」瑪奎塔在四年後這麼說。「我們一起去過很多地方，一起做了很多事情，我永遠愛她。」從這位養母身上，瑪奎塔學到了何謂母愛。

但是她也需要錢，她沒有高中文憑，甚至連高中同等學歷也沒有，工作前景黯淡。離開戒毒治療以後，她在馬里蘭州貝塞斯達一間老人安養院裡，找到洗衣服和掃廁所的工作。她在公共住宅得

到一間公寓，四個孩子都要回來了，孩子再度回到她的照顧之下。她沒有車，長時間通勤到貝塞斯達成了負擔，六、七個月以後，她換工作到赫克特百貨公司，時薪七到八美元，替商品貼標籤、從拖車上卸貨，但她每天還是得花一小時換車去上班，工作時間也不固定——上一、兩天班，然後到周末才有班，隔周又是七天的全天班。低工資和零散的工作時間賺不到多少錢，不值得動不動就不在家，她算了一下，領社會救助金還好一點，所以她回去領取「PA」了，她是這麼簡稱公共援助（Public Assistance）的。

如果不是因為一九九六年的福利改革法案要求她得找份工作的話，她大概會這樣維持好幾年。如果這項法案也要求她去讀書，取得高中同等學歷或是學點有出路的技术，改革的影響也許會更顯著。她又參加了一次高中同等學歷測驗，數學沒考過，她怕得花二十美元再考一次，同一門科目令她既痛苦又害怕。「我跟數學就是合不來，」她說道：「說到數學，我在這個領域一向都是文盲，我會算一些題目，但是算到分數跟乘法，我就卡住了。」不過她有計畫，「我可以弄到二十美元去考高中同等學歷測驗，」她說：「所以其實沒有什麼事情能阻止我，除非我害怕不敢去做。」什麼時候去呢？「我不知道，大概是這個月，或者是下個月，比較有可能是下個月吧。」如今四年多過去了，她還是不敢再去考一次。

福利改革逼著她走進職場。她能找到最好的工作，是在大都會男孩女孩俱樂部的接待處，負責傳真、歸檔、收發郵件、影印，一天四個小時、時薪六點一五美元，一份看一眼就知道沒有升遷希望的工作。事實上，這像是個沒有窗子的接待處，沒有出路。

家裡的生活也不好過，她的妹妹——曾經救了瑪奎塔的孩子——如今染上了毒癮，流落街頭，住

在破房子裡。瑪奎塔救了妹妹十幾歲的兒子，帶他住進自己的小公寓裡。他們在那裡等著有朝一日，她妹妹跌到谷底後能再度清醒過來。

更糟糕的是，瑪奎塔的女兒琪歐娜開始步上她的某些後塵。這名女孩痛恨學校，上學沒多久就退學去做清潔工。瑪奎塔眼見自己的錯誤重演，又傷心又生氣，她懇求琪歐娜回學校去，女孩固執地拒絕了。至少她沒有懷孕，瑪奎塔說道。不過這個安慰沒有持續多久，幾年之內，琪歐娜就未婚生子，兩年後又生了一個。她領起社會救助金，因此延續了三代以來的連續症狀。「這樣不好，」瑪奎塔黯然觀察道：「這樣真的不好。」

然而，最新的一代也在岔路口分道揚鑣，那些通往錯誤決定與失敗的快車道，偶爾會出現明智抉擇與小小成功所打開的出口，琪歐娜似乎加速衝向一輩子貧困，她十幾歲的弟弟蓋瑞則踏上了不同的道路，這多虧了瑪奎塔與蓋瑞父親的明智之舉。她四個孩子的三名父親之中，只有這個能幫得上忙，琪歐娜的父親「已亡故」，而瑪奎塔正式宣布另一個「被監禁」，不過第三個、也就是蓋瑞的父親，很關心他們，願意提供自己在馬里蘭郊區的住址，好讓他兒子可以念好高中，擺脫華盛頓特區的市內體系。瑪奎塔高興地接受了這個機會——不只為了更好的教育，也為了把他從這個毒品橫行的社區漩渦中拉出去。這麼做奏效了，蓋瑞從高中畢業，去內布拉斯加州念大學，開始考慮要成為一名教師。

接著瑪奎塔自己也找到了出口，她努力讀書以考取商用駕照，在第三次嘗試時終於通過了測驗。她去郵局工作，儘管無止境的超時工作對她與孩子來說很艱苦。她也不喜歡分類信件與送信的吃力工作，所以她開始替華盛頓的公立學校開校車，時薪很不錯，一小時十五美元，還有福利，一切都順

利。直到有天早上，她送孩子到學校去以後，出了個錯，她忘記檢查是不是全部的孩子都下車了。有個小男孩在後座睡著了，她把車子開回停車場才發現他在那裡，安靜地在座位上打瞌睡。她立刻把他送回學校，但是來不及了，她已經違反了一項重要規定，因此被開除了。也許在別的時候，她會這麼靜靜地回到社會救助金的名單上，但是在現行法律之下，她別無選擇，所以她去一間私立學校找到一份工作，她稱為開「一輛貴賓公車、一輛載著三十五名乘客的豪華公車」。她每天載著孩子往返學校，每小時賺十三美元，但是沒有福利，這些享有特權的孩子也看不見她的傷疤。

瑪奎塔的母亲在她童年造成關鍵的空虛，並且在五十九歲時去世，死於腎臟病；然而她的死亡並沒有抹掉過去。「看看聖經，」瑪奎塔說道：「你是我父，犯下可怕的罪行之類的，你有罪，而罪孽會傳下去，如果這個家族不走正道，就會這麼延續下去。有時候就這麼一直傳遞，或許會跳過幾代，傳到另一代身上。」她苦澀地笑了，就這麼繼續著。

那些能夠幫助孩子面對性侵犯或身體虐待的心理技巧，等到孩子自己為人父母以後，就沒用了。疏離反應、情緒封閉，都會干擾長大成人的倖存者對自己孩子的回應，她可能防禦心很重，過度保護，或者在情感上很冷淡，也沒有能力保持同理心，日常生活的壓力會導致創傷後症狀重新出現。

再次強調，這種作用方式會因社會經濟水準而改變，享有特權的孩子也許會因為父母缺乏管教能力而受傷，但是他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特殊服務、治療等等，能夠幫助他度過難關。比較起來，生活在貧窮或貧困邊緣的孩子，沒有富裕家庭的緩衝，沒有成就與抱負，孩子就這麼暴露在危險之中。

這並不表示貧窮的父母不如沒有錢的父母，這只表示失職的父母在貧窮的狀況下，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家庭就像房屋一樣，只能承受構造與維修可以禁得起的風雨，在窮人周遭肆虐的暴風雨，考驗著

任何結構的韌性，從這個國家的高離婚率就可以知道，家庭實在是脆弱東西。

關於貧窮的討論已經不再讓人容易心情激動了，貧窮家庭長久以來一直被污名化為不正常，爸爸是酒鬼或吸毒的廢物（如果他真的有出現的話），媽媽不是憤怒的潑婦就是唯唯諾諾的無能者，做父母的不念書給孩子聽，不重視教育、不教道德，也不做孩子的榜樣，他們的形象就是如此，眾人想像的這幅畫面中缺少了全心全意的祖母和熱忱關愛的父母。然而，明智的成人在有限的辦法中，能夠做出聰明的選擇，再加上親戚的援助網絡，以及如果社會能夠提供更多幫助的話，他們就能克服一切。

在爭論的兩個極端裡，自由派不想管不正常的家庭，保守派除了不正常的家庭以外什麼也不管。根據這種意識型態，有危害的養育之道不是貧窮的原因，要不然就是貧窮唯一的原因，而兩種成見都不對。在我對於貧窮邊緣者所做的研究中，沒見過幾個童年沒問題的成人，我把這些過往歷史看作原因也看作結果，這此問題與其他無數問題如金錢、住處、就學、健康、工作、社區交織，彼此又互相強化。

羅伯特·尼德爾曼（Robert Needleman）醫生描述過這種交互作用，他是克里夫蘭一位行為兒科醫師，他看過來自各種社會經濟水準家庭的孩子。「糟糕的養育方式會導致嚴重的行為問題，比如難以集中注意力。要心理很健康才能去上學，並且把注意力集中在老師身上。」他說道：「如果在乎老師的話，就會做功課，這樣的孩子是健康的；而糟糕的養育方式會讓孩子做不到這些。」怎樣才能避免糟糕的養育方式呢？「如果你能充分的休息，當個好父母會容易得多。你請得起保姆，可以找人打掃房子。而那些心理資源足夠當好父母的人，常常也是財力資源相對足夠的人。」

有些父母從來沒有跟孩子玩過，所以等到這些孩子自己當了父母，也無法做好跟孩子玩的工作。這種缺陷非常顯著，甚至可以在錄影中看見，即使做父母的知道有攝影機在拍也一樣。巴爾的摩的營養不良門診，會拍攝低收入家庭與他們孩子的互動，目的在於讓父母看到自己的錯誤。

在某段錄影中，一個小男孩坐在高腳椅上玩食物，但是不肯吃，他的母親看了一會兒，然後抽出一本雜誌看了起來，他什麼也沒吃下去，但是她沒有注意。

在第二段中，同樣是這名男孩坐在地上，把積木放進一個塑膠桶裡，他的母親看著他，打了一個哈欠，低下頭來閉上眼睛，她和她兒子之間沒有任何互動。

在第三段裡，母親跟小孩都坐在一張矮桌旁，兩個人自顧自地玩著塑膠積木。工作人員已經告訴她，「要跟妳的小孩一起玩。」但是她顯然認為這句話的意思是要當成孩子不存在，或者是把自己當成孩子一樣在玩。小男孩蓋好了一疊積木，驕傲地說：「媽咪，妳看。」她嘲笑了他，用諷刺的語氣重覆著：「看看我做的，媽咪。」接著她不管兒子，自己試著把積木堆成桶子上標示的示意圖。小男孩伸手想拿她面前的一塊積木，她便搶走那塊積木，怒氣沖沖地說：「不行！」甚至拆掉了他蓋好的那疊積木，拿幾塊來蓋在她自己的東西上。整個過程中不斷出現：「媽咪妳看！媽咪妳看！」

在第四段中，他們又坐在矮桌旁，各自拼著一個拼圖。這名母親把拼圖擺在自己的大腿上，斜斜的不讓她兒子看到。小男孩撿起他的拼圖，本來是一整塊的，接著翻過來嘩拉一聲，拼圖碎片散得滿桌都是。「你要把這些全部都撿起來！」她嚴厲地說道：「你搞得亂七八糟！」

男孩靜靜地在一旁好好玩著，小心翼翼地吧碎片拼在一起，而這個母親也繼續拼自己的拼圖，除了責罵以外，完全不理她兒子。

我們能做些什麼嗎？這些本身極度缺乏的父母，能夠學會怎麼養育孩子嗎？潔姬·卡茲覺得可以。五月的某天，早上九點半以前，她大步走進德拉瓦州的韋伯教養所，這是一棟老舊的磚造建築物，就在紐華克與威明頓市之間一家保齡球館的轉角附近，周圍環繞著鏈狀帶刺鐵絲網。她按了一個按鈕，裡面的人開門讓她進入一間小接待室，在她對面是一堵鐵絲網牆、和一扇用四分之三寸的鐵欄杆加強的沉重大門。警衛乾淨的臉龐出現在一扇小窗戶後面，他認出潔姬，轉動鑰匙，替她把門打開。到了裡面，她交出鑰匙和駕照，接受手持金屬探测器的掃描，然後在訪客紀錄表上簽名，在「來訪事由」那個欄位下面，她寫的是「教育」。

潔姬又高又瘦，棕色的長直髮披肩，她的成長過程很窮困，十一歲時父親死在監獄裡，她自己沒有得到什麼很好的養育，她把這種剝奪化為一系列的課程，現在回饋給其他人。在樓上一間大型牢房中，天色透過許多被柵欄擋住的大窗戶透進來，有七名身穿白淨連身服的男人站著，他們高呼「早安，潔姬！」接著他們在雙層床鋪上坐下來，床鋪整潔得就像在軍隊裡一樣。他們就快講完販賣快克、偽造支票、持有致命武器和其他非暴力犯罪的事情，不過一切的苦難都將煙消雲散，只要一講到孩子，他們都非常想念自己的孩子，迫切期待「玩耍日」的到來。潔姬跟其他輔導員教導他們，如何給予孩子真摯而有建設性的關注——他們大部分人從來沒有在監獄以外的地方這麼做過，現在他們單獨與潔姬會面，沒有孩子在場。這是第十二堂、也是最後一堂的每周養育課程，該是總結他們所學的時候了。

這些父親之中的許多人，在孩童時期從來沒有跟成年人玩過，潔姬說，他們只跟其他小孩玩過。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許多領取社會救助金的母親身上，德拉瓦州要求她們在領取支票的同時，也必須

接受養育指導。他們的成長過程讓他們許多人都沒有榜樣可以仿效，沒有逐年累積的知識，不知道該如何陪伴孩子，尊重孩子，也不懂大人陪小孩玩耍能夠提升孩子的能力；孩童玩耍的經驗對於培養認知發展和解決問題的技能很重要，也夠藉此與重要的大人建立起合作的關係。

潔姬解釋道，在玩耍日的時候，小孩會被告知他們的父親或母親「會很注意你想要玩什麼」，而父親則會被敦促不要把自己的意願強加在孩子身上，而是要「讓孩子主導活動」。透過遊戲，小孩會試著解決某些事情，她告訴他們，就讓孩子們去，多給孩子鼓勵。「我們要他們找出過程中喜歡孩子哪些地方。」潔姬說：「要當孩子們的啦啦隊，他們也許只是踏上一個彈簧高蹺，也許只是打籃球，你照他們的水準跟他們玩，但是要讓他們贏。」她建議家長對於孩子正在做的事情，要給予正面積極的評價：「你可以說：『哇，你會這個好棒。』」

她也建議家長，偶爾要對孩子全神貫注，這對孩子來說是種很重要的資源，就像食物跟住所一樣。重要的是，每天在家裡抽出十五或三十分鐘，甚至是六十分鐘當作「特別時間」，「這段時間內你不要清潔窗簾或是接聽電話，也不要收拾他們房間裡的玩具。」德拉瓦大學的教育學教授關·布朗叮嚀。她同時也是「父母就是輔導員與老師」(Parents As Counselors and Teachers) 這個家庭支持網絡機構的主任。這個組織經營潔姬所帶領的課程。「你只能注意他們，」關·布朗堅持，「這個約定完全是為了他們。」但是她也承認，當家裡有很多小孩時很難做到這點。「父母會抱怨說：『他們只是想吸引注意，』那是因為他們需要的就是注意。等他們長大之後，父母會願意付出一小時一百美金，只為了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注意。」

如果這些坐在床鋪上的犯人，能夠遵守潔姬最後一天回顧課程時給予的建議，他們大概就可以成

為模範父親了。不過他們光是在電話裡這樣提醒太太，可能就已經碰上麻煩，畢竟他們還在監獄裡，遠離了日常家庭生活的漩渦。安德魯是個因為偽造支票而入獄的賭鬼，他在電話裡責備太太，因為他聽見太太對著孩子怒吼：「給我滾開！你一整天都黏著我！」他跟班上的其他人說：「這讓我很生氣，因為我寧願她馬上不理我，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

潔姬告訴犯人們，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第一個輔導員和第一個紀律訓導者，在「照顧孩子的情緒需求」上，她建議「聆聽」很關鍵。「有時候我們得花很多時間去聆聽，」她說道：「你得聽他們說很多亂糟糟的感受，不過到最後你可以聽出事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如果我們不聽他們說一根斷掉的棒棒糖、『有人不喜歡我』這種小事，未來我們就一定聽不到更大的問題。」因此身為父親，他們出獄後要陪在孩子身邊，聆聽他們。身邊有父親陪伴的孩子表現得比較好，她如此告訴他們。「你不一定要跟孩子的母親在一起，只要陪在孩子們身邊就可以了。」她敦促著：「確定他們有去上學，確定他們睡眠充足，確定他們吃得飽、夠營養。」

這番話引起了一陣內疚，「也許我在家沒有跟她一起讀夠多的書。」李歐坦承。他因為販賣快克而入獄，「我不應該把所有事情都怪在老師身上。」潔姬發了一份講義給他們，名為「七件能幫助孩子做功課的事」。

「我太太把她的成績單寄來給我。」艾迪說道：「我女兒在電話裡迫不及待要念書給我聽，她才七歲，已經會寫草寫了。我好驚喜，她比我長進多了！」他的聲音帶著一股輕快的自豪。

「他們在家需要有個安全的地方，來練習說話技巧。」潔姬說：「沒人會笑他們，也沒人會插話回答。」

她的小建議激起一連串的問題，這些人問潔姬如何獎勵小孩的好成績（可以給獎勵，不過「你每周都要有點進展，不要讓獎勵消失了」），問該如何鼓勵孩子寫字（「讓他們拼錯字沒關係，孩子如果太糾結，就會忘記創造力」），還有該怎麼支持孩子（「如果做父母的會去參與學校活動，小孩就會知道你在乎，老師也會知道你在乎」）。麥可因為持有毒品而被定罪，他說到他的太太，「兩個星期以前，我試著跟她強調聆聽的重要性，如果四、五歲的小孩只會哭，你會以為他是要操控你，但也許他是真的受傷了。」他認為父母雙方都應該要一起參與課程。

從監獄不受干擾的角度來看，在這裡很容易發表出看似明智的評論，問題是這些看法在外面嚴酷的世界裡究竟能撐多久？在幾個月之內，這些人全部都會被釋放，要面對複雜的家庭，把他們新學會的養育技巧付諸實踐，看來只有幾個人能講得出他們要怎麼樣有所不同——有一個保證要給每個孩子個別的時間，另一個承諾要注意他們的學習。如果他們能重新回到孩子生活裡的話，每個人都渴望深度參與。

「在這裡，你會珍惜失去的時間，」尼克說。他因為危害他人安全和其他罪行而入獄。「但是——出獄，你似乎就失焦了。」

我們大部分人從來就沒有很明確地上過怎麼當父母的課程，我們所知道的都是耳濡目染學來的，在無意之中從自己的父母身上吸收而來，有時候會重覆他們的錯誤，有時候會為了反抗，把錯誤往反方向轉去——比如從疏於管教變成嚴格教養。「我們所接受的養育方式，會影響到我們教養子女各個方面。」潔姬說。不論在哪個社經階級都一樣，行為不當可不是低收入家庭的專利。

儘管如此，經濟底層者在養育孩子方面還是很容易遭到許多困難力量的阻礙，貧窮的各項要素結

合在一起，足以把人給拖垮，需要非凡的養育技巧，才能把孩子拉出泥沼。因此全國各地零星出現一些計畫，要幫助低收入的父母做到這一點。如果涵蓋的範圍能夠更廣泛些，也許就能產生更大的影響。

有些計畫根據一九六〇年後長期觀察許多母親而得出結果，這些研究顯示出，出生後的最初幾年相當關鍵。哈佛學前教育計畫發現父母的養育技巧與孩童一年級時的表現能力有關^[4]；較近期的研究也顯示，「敏銳、有回應的照顧方式」能促成更好的在校表現，讓孩子行為問題較少，比較不需要特殊教育，青少年時期吸毒與酗酒的問題也比較少，並且從學齡前開始，就有更強的能力可以與同儕建立關係。^[5]

介入那些被判定可能導致風險的母親，也證明有效果。在密爾瓦基，訓練輕度智能障礙母親所產下的新生兒，可以在三年內把孩子的智商從平均八十提高到一百^[6]；在北卡羅萊納州，啟蒙計畫提供日托服務，從六周到十二周大的孩子都可以參加，直到孩子四歲半大，這也提高了來自貧窮家庭孩子的智商，全組四十一個孩子當中，除了一個以外，全部人的智商都高於總人口的智商中間值，並且比沒有參與計畫的對照組的四十五個孩子，高出八到二十分之多。^[7]還有一百一十一個孩子被追蹤了二十一年，這些孩子的輟學率跟不上格率都比較低，也比較不容易未婚生子，他們就讀四年制大學的比率，是對照組的兩倍。^[8]

李斯本·肖爾 (Lisbeth B. Schour) 在《能力所及》(Within Our Reach) 中所描述的最佳做法，是在耶魯大學的一所中心裡面。「小兒科醫生、護士、發展專家、早期兒童教育家、社工，與父母和孩子會面，為孩子提供健康照護與階段發展評估，指導父母、提供諮詢和其他支援，並且每個家庭也都可以把孩子帶到日托中心或幼兒園去。」員工也會進行家庭訪問，該計畫結束十年之後，「幾乎所有受

介入的家庭都不再領取社會救助金，能夠自力更生，」她回報道。「而對照組裡只有一半的家庭能做到。」得到這些服務的母親受教育的時間較長，生的孩子較少，孩子在學校的表現也好得多。^[9]

今日，一個名為「父母即老師」(Parents As Teachers) 的私立計畫，在美國國內許多地方進行每個月的家訪，指導家長如何針對孩童的腦部發展，適當地陪孩子玩耍、談話、互動。根據計畫中的研究指出^[10]，孩童從出生到三歲大參與此一計畫，對往後他們入學幼兒園會有更好的準備。真正的困難之處在於該如何接觸到那些家庭，他們擔心被指控虐待兒童，所以家訪也許沒辦法接觸到最有需要的父母。

良好的養育就像硬幣一樣有兩面：首先是可以學習到的養育技巧，再來是個人的幸福感受，這兩者能夠讓父母的始終如一地教養孩子。當富裕的家庭碰上養兒育女的問題，想要獲得技巧和自信的話，可以花錢請人個別諮詢，或是參加育兒課程；而窮人就只能靠零散的建議和政府不定期出資舉辦的訓練課程。

這枚硬幣的情緒面較難解決，許多窮人都是單親媽媽，患有憂鬱症卻沒有得到治療；許多人沒有對象可以傾訴他們的問題，因此反省與改變的能力成了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對於那些生活在貧窮邊緣的拮据父母而言，如果你本身在不良的養育方式下成長，教育程度很低，身邊也沒什麼親友，夜班工作時間很長，又沒有積蓄，那麼你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錢，更沒有必要的情緒資源可以替自己充電，或是評估自己的教養方式。「如果你是個中產階級的家長，你可以比較容易擺脫掉你的小孩——花錢請保姆、去看場電影或是做個水療。」德拉瓦大學的關·布朗教授說道：「如果能休息一下，你就可以神清氣爽地回去，」也不會那麼常面臨危機，「車子不會在送小孩去哪裡的路路上突然故障。」

她說：「中產階級的家庭裡，平均每三個月遇到一次危機；而貧窮的家庭裡，每個星期就有一次。危機會影響你能付出的注意力。」

關和潔姬所看到的父母親——那些犯人和接受社會福利的人——沒什麼情緒能量可用，就像銀行戶頭一樣空空如也。「如果你自己沒有得到注意，你就沒多少注意力可以放在他人身上；如果你沒有得到愛的話，你也沒多少愛可以分享，」關說道：「這就是我們在那些家暴的父母身上所看到的，那是倦怠。他們從小就精疲力竭，生而為人，他們想要與他人建立起良好的關係和聯繫，但卻都沒有得到良好的回應，內心形成了情緒上的疏離……而當人心裡有太多壓力的時候就沒辦法好好思考。」此外，據她觀察，在這個金錢等同於力量的社會裡，經濟匱乏會讓人覺得就像是個人本身的不足，所以貧窮的父母往往需要肯定。「你內心所擁有的，要比你能花費的多更多。」

因為關和潔姬都在貧窮中長大，因此她們很關心這些父母的心理缺陷，她們的課程設計也會提供某種治療。「在我還是青少年時，我媽媽跑來我床上跟我躺在一起，她說：『我好害怕。』」潔姬回憶道：「我媽沒人可以講話，所以這對我來說很重要，這些人要有對象可以聊聊。」又或者她認為他們需要談話，才可以因此得到引導。「為人父母時需要有人傾聽，只要聽就好了，因為我們一直在照顧別人，很少會輪到我們自己被照顧。」這些父母聚集成小組，互相幫助、聆聽彼此，發覺他們並不孤單。

課程設計成安全的避風港，父母們可以在這裡吐露痛苦。「大家可以依照他們想要的程度來分享，也許他們想要談談自己最深處、最黑暗的童年傷痛。」關解釋道：「我們的目標在於幫助大家觸及能夠釋放的情緒——放聲大哭、多方角色扮演、對那些虐待他們的父母大叫——你可以在這裡這麼做，但不要發洩在你的孩子身上。只因為你童年時遇到的人都很可恨、消極、充滿敵意，不代表你的

小男孩會做出什麼可怕的事情。」

這種方法似乎幫到了一個母親，她不太注意她八歲大的兒子和兩歲大的女兒。「我覺得自己心裡壓抑了太多事情，從來沒有想過要花時間在他們身上，」她說道。「現在我把很多事情講出來了，不像以前壓力那麼大，我有時間了，我不再擔心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我把時間用來陪伴他們，有休假的話，我們就去公園，去吃冰淇淋。以前我不會這樣做，你知道的，我兒子從學校回來以後，寫完作業就自己出去玩。但是現在他會說：『媽，我們今天要去公園嗎？』以前他從來沒有這樣要求，所以我會說：『好啊，我們去公園。』他打棒球，所以我更常參加他的比賽了；他去練習的時候，我也不會只有帶他去之後就走人，我會留下來陪他一起練習。」

治療不一定表示淨化宣洩，不過養育課程可能需要某種形式的治療，才能幫助某些成年人。虐待、毒品和精神疾病的危害如此嚴重，造成長期影響和其他的殘缺。「就算他們很想愛自己的孩子，想培養孩子，他們也做不到。」貝琪·詹特斯說。她是一名有執照的護理師，負責一項家訪計畫，幫助高風險的年輕母親。這些女人接受養育指導和貼身輔導，還有如何餵食、管教、玩耍，甚至如何去愛，不過對那些傷口依舊潰爛的人來說，成效不彰。

有些服務對象「會讓我們覺得計畫產生了效果，」她說道：「我們看過非常窮的家庭，一分錢也沒有，但是上帝仍舊讓這些孩子受到照顧，他們去學校時會帶一片水果、一罐飲料和一個三明治，沒有無用的東西，也沒有垃圾食物。他們不會擁有設計師款牛仔褲，也不會頂著最新流行的髮型，不過他們有人照顧。你很窮，但你還是可以照顧好孩子。」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真的把我們打敗了，讓人覺得一切都徒勞無功。」在那些最崩壞的家庭中，

她衡量計畫成功與否的方式，是看有沒有發生什麼糟糕的事。「我們做的是危機管理，只是盡量確保那些孩子安全……」她說道：「在某些案例中，很明顯是因為我們到場才沒有出事，如果我們明天就退出，是不會有什麼長期改變的，他們大部分人都會立刻回到從前的模式，恢復到一年前剛開始時的模樣。」她和她的同事都是中產階級的中年婦女，她們常常會墜入絕望之中。「我們會質疑自己到底在做什麼，這樣做真的有意義嗎？」某天她說道：「我們很努力地工作，但是成果在哪？」

年輕的懷孕服務對象來到谷區醫院的產前門診中心，他們最早就是在這裡相遇的。這家醫院位於新罕布夏州的克萊蒙特，貝琪是母子健康服務部門的主任，他們會經常家訪，直到小孩滿兩歲為止。有些人還藉由「在截止服務的日期前再度懷孕」，來延長自己參加的時間。

「不斷懷孕顯然是為了得到我們的關注，這讓我感到害怕。」貝琪堅稱：「她們來產前門診，是她們這輩子第一次有人關心。她們有營養師、護士、醫生，每個人都說著『嗨』歡迎她們進來，『讓我們照顧妳』、『妳今天覺得怎麼樣』，我們會聊天、碰面，還要她們再回來，因此她們樂此不疲。這很令人難過，因為對她們某些人來說，這真的是她們這一生中唯一出現會關心她們的人，所以她們當然有動機再度懷孕。」

家訪員成了某種代理母親，可以在電話中回答疑問，回應呼救。莎拉·古德爾有次曾經打電話給她的指導員布蘭達·聖羅倫斯，問她：「如果他罵髒話，我可不可以把胡椒放在他的舌頭上？可不可以打他？」她似乎非常急需建議，但是得到建議之後卻又置之不理。她的家庭被視為非常危險，訪視計畫通知州政府，鬧上了法院，但沒能成功帶走孩子。這項計畫中有四十位母親，其中有四位在法院命令下失去了她們的孩子，另外還有兩、三個應該也要的。貝琪說，其他人大部分都處於微妙地帶，

雖然養育的方式很糟，但實際的危險還在法律容忍的最低限度之內。

在最糟糕的情況中，新生兒的安全從醫院被帶回家中的那一刻就開始警鈴大作。貝琪與她的同事試圖幫助這些對象找到一般人會有的驚奇與興奮感，那種突然要為這麼小的人兒負起責任的感受，「但是你知道嗎？我們看不到我們服務的家庭中有這些，這讓我們大開眼界……」貝琪發現，「他們的反應是：『噢老天啊，這表示我得在幾點起床？噢上帝啊，我老公要去工作，我得跟這個寶寶在家？我又不換尿布。』沒有那種瞬間產生的連結感。」也不會對孩子的安全或健康感到焦慮。「那幾乎是危險信號了，當第一次探視都沒人問問題，也沒有人睜大眼睛的時候，你就該擔心了。」

所以她們為什麼要懷孕、要留住寶寶？有些專業人士認為，這是因為拿到社會救助金的支票會引起一種獨立的假象，這也符合她們想要自主的渴望。「這跟控制有關，」貝琪認為，「『老天在上，我有個孩子了，沒人能說我不行。』你知道的，她們這輩子都被剝奪了自己生活的控制權，那種整個扭曲的感受。『我這輩子會有人愛我，有人需要我。』」然而許多年輕媽媽自己就很匱乏，被照顧的需要遠遠超過照顧人的需要，小孩常常因此被怨恨，因為他們偷走了青少年媽媽自己的童年。

「我現在負責的家庭處於一個更艱難的階段，因為小孩開始學走路了，」布蘭達說：「他們不能把小孩放在嬰兒床裡，讓他整天都待在那裡，小孩只想走路，東摸西摸。噢，他們跟這些學步小孩說的話很可怕，像是我負責的一個媽媽，說她女兒『很邪惡』。」

「前幾天還有一個連呼喚小孩的名字都不願意。」貝琪引用那個媽媽的話補充道：「這傢伙只會找麻煩。」

家訪員也擔心孩子目睹暴力的影響，他們這麼建議一個經常毆打丈夫的媽媽，「我試著說：『蹲

到地上，從他們的高度假裝妳是透過他們的眼睛來看，」布蘭達問道：「妳會看到什麼？」

貝琪看到的是有些家庭裡有著「難以置信的風險」，有個家庭裡最大的孩子在十五歲時已經當了媽媽。「你會看到濫用藥物的人在家裡進進出出、快要死於末期肝功能衰竭的母親、在三十六歲就因為類似症狀死掉的繼父、髒話滿天飛、不尊重權威。還有就安全來說，這棟房屋也很危險，到處都是蛇、狗、老鼠（都是寵物），WIC營養補給計畫的票券不知道有沒有去領，家中充滿髒盤子，違法的事情不斷上演著，怒氣沖沖的媽媽對著小孩尖叫，那名十五歲的媽媽可能會把小孩隨便丟給什麼人，那人可能剛出獄、也可能是她根本就不認識的鄰居。我去過那戶人家，進去十五分鐘之後我的感官就吃不消了，而有個十二歲的孩子每天放學以後都要回到那裡。我不會把我的孩子放在這種地方，更不用說讓他住在這裡了。」

貝琪、布蘭達與其他從事這類工作的人，被這些衝突場面搞得精疲力竭。一想到這對下一代所造成的影響，他們常覺得自己毫無用處，非常挫敗；但有時候，在一片陰雲中還是會有一絲光明的好消息，證明他們終究有發揮作用，雖然成果很難衡量。

事情發生在布蘭達身上，她輔導一名來自悲慘破碎家庭的八年級孩子，每天都花上好幾個小時聽他說話，催促他完成學業，但是他不理她，輟學消失了；幾年後，他忽然出現了，從維吉尼亞州打電話來，告訴她「他做到了」。那時他十九歲，取得了高中同等學歷，在軍隊裡開直升機，也已經訂婚準備要結婚了。總是有些火花能夠燃成熊熊火焰。

梅麗莎也是如此，她遭到父親毆打和性侵。「她老是在說謊，」布蘭達感嘆道：「她防備心很強，誰也不相信。」二十二歲時，她靠社會救助金過日子，跟男友和他們兩歲大的女兒住在凌亂的公

寓裡。她的男友在十六歲的時候被指控性騷擾，所以他連替自己的女兒換尿布都怕。

「走進那個地方你會怯懦不安，那裡超髒，」布蘭達說道：「但從我開始跟她合作以來，她一直做得很好，因為她知道我哪幾天會來，她會下樓去，把碗盤洗乾淨，會打掃。她覺得很驕傲，因為有人注意到她打掃過了。原本屋裡屋外都是垃圾、髒尿布，看到床墊你會想昏倒……每次我踏進那個地方都是那麼糟糕……因為太糟了，房東拍了照片把他們告上法院，一間好公寓也就這麼毀了。」

然而梅麗莎竭盡全力想要當個好母親。「她不讓那個小女孩離開她的視線，就連跟我在一起也不行。」布蘭達說，她就像是沿著危險的刀鋒行走。梅麗莎非常害怕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可能發生在女兒身上，至少到目前為止，這種焦慮對這個小女孩所產生的效果還是好的。「我舉個例子吧，」布蘭達承認：「她會讀書給她女兒聽，那差別多大啊，那個小女孩有百分之九十的時間看起來都像是一個髒兮兮的小淘氣，不過她很聰明……她很愛這個小女孩，花很多時間陪她。」

梅麗莎找到陪伴小孩時間的方法，並不會得到福利改革的肯定：她辭掉在油漆工廠時薪六美元的工作。「你沒錢的時候，事情就會很複雜，」她嘲弄地說道：「我可以出去找份工作，但是我覺得小孩這個年紀，我在家裡陪她比較有益。」她對女兒有什麼期望呢？「我希望她想做什麼就去什麼，」梅麗莎勇敢地說道：「她會念完高中，因為那是我犯過最大的錯誤……如果她想當個芭蕾舞者，她就會是個芭蕾舞者。」或者是當醫生。梅麗莎補充道：「有時候我會看著她說：『妳想做什麼都可以。』而且她會做到的。」

第七章 親情

Chapter 7

就算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還是擁有彼此。

——卡拉·金，三個孩子的母親

湯姆·金與卡拉·金脆弱的生活碎成片片，直到只剩愛與忠誠為止。他們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健康，看著他們微薄的存款融化消失，有如二月的解凍期侵蝕著冬天的雪。曾經很深的新鮮積雪，如今化為一灘泥濘的小溪，就在他們租來的破房子後面。他們唯一僅存的資產是感情，這成了他們的寄託，感情的支持網包圍著他們跟三個孩子、少數幾名好友，甚至還有一名某天晚上遇見的陌生人。

好幾個禮拜以來，湯姆與卡拉一直在攢錢，想存夠錢讓他們跟孩子可以去餐廳吃一頓——不是為了慶祝，只是要稍微緩和一下他們的焦慮。卡拉得知自己需要進行骨髓移植，所以這家人到新罕布夏州萊巴嫩的一間公路小餐館吃飯，那裡的餐點份量很大，兩個男孩比賽看誰能吃得比較多，一家人開懷大笑。他們聊到自己的艱辛，談話的片段被吧台的一名陌生人無意間聽到了，他是一個路過的卡車司機，沒什麼時間可以與家人相處。

「我跟小姐要帳單，」卡拉回憶道：「她說：『沒有帳單，吧台那裡有位先生幫你們付了。』我很生氣，我想跟那位小姐解釋，我不接受施捨。」卡拉覺得最大的侮辱就是同情她。貧窮和疾病激怒了她，他們開車回到位於紐波特的家，就在一個破爛不堪的汽車修理廠旁。一路上，卡拉激動不已、垂頭喪氣，她已經在化療中失去了她的栗色長髮，又因為沒錢看牙醫而失去她的牙齒，還失去了她的精力與歡樂。她打算連尊嚴也失去，所以她打電話給那家公路小餐館，要求知道捐助者的姓名。他還在那裡，服務生說著便把電話遞給了他，卡拉冷冰冰地問他為何要付錢，他告訴她：「我從來沒有聽過哪個家庭這樣開誠布公地討論問題，像你們這般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她說道：「他是個常常在路上跑的卡車司機，只是想為我們做點什麼，他很感動。這個人不相信我們可以這樣笑著過日子。」

她記得他告訴她：「我算過，妳的小孩說了二十次他們愛妳。」

她的憤怒突然間瓦解了。「我克制不住，哭了起來。」

這名司機如此推崇的家庭，是卡拉小時候沒遇見過。她受到母親冷落，遭到父親性騷擾。她的父親也是一名卡車司機。「我還記得我小時候吃過狗食跟兔子飼料，」她說道：「如果我讓我的孩子再經歷那種事情，我就會遭到詛咒——我去上學還要老師幫我洗澡、拿衣服給我，我爸媽根本不在乎。我爸是個酒鬼，我媽也是個酒鬼。」儘管如此，她父親罹癌臨終之際，她還是滿足了他的心願，從貓洞山頂取石頭來做成他的墓碑。他總會在獵鹿季的第一天出現在那裡，手裡拿著槍。「我們去弄了這塊巨大的白色大理石，它有一面是平的。」湯姆回憶著，「我們聚在一起，買了這塊銅匾擺在石頭上。」卡拉沒有輕易斷絕家族關係。

她重複了家族的模式，一連嫁了兩個酒鬼。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她兩個兒子柴克與馬特的父親，「他以前把我打得暈頭轉向，牙齒都斷了。」卡拉說道。她的第二任丈夫湯姆·金闖入她的生命，是因為他太太把他趕出來，而他向卡拉和她先生租了一個房間。有一天，卡拉的先生「渾身亂糟糟的回到家裡，開始揍她。」湯姆回想道：「我說：『不，我不希望發生這種事。』接下來我們就全都在街上……走出門時，我聽到他講的最後一句話是：『你想要那個婊子？那你帶她走啊。』」所以這兩個遊魂找了一間公寓，接納了彼此。「有四年半的時間吧，四年又五個月，我們以純粹柏拉圖式的關係生活在一起，我們分攤公寓租金：她付她那一半，我付我這一半。然後我們就有點像是墜入愛河了，從那之後一直如此。」四年後，他們的女兒凱特出生了，於是他們結婚。

湯姆喜歡喝傑克丹尼爾威士忌，就連在早餐的時候也會配咖啡喝上一、兩杯，卡拉一直深情而堅定地試著說服他，最後終於讓他參加了匿名戒酒協會。「我從來沒有曠過一天工，但到了晚上總是感

覺很糟，」他堅持道。直到「有天晚上我們坐了下來，她說：『你從那當中可以得到什麼？』她說：『如果你仔細想想，你就會覺得厭倦，厭倦每天醒來都想吐又好累。』」

湯姆四十六歲，卡拉三十二歲，他們看起來都比實際年齡蒼老。他抽萬寶路，有時候會戴一條黑色的頭巾，上面印滿骷髏頭或是美國國旗，緊緊綁住，讓他一頭像繩子一樣細長的頭髮可以垂攏在衣領下。他身材瘦削、肌肉發達，手臂上滿是刺青。有一個刺著「愛」，另一個刺著「湯姆 & 卡拉」。他的笑容溫柔，能夠從容應對，你問他事情如何，他總是說「很好」，即使事情並不好。他會用手搓揉整張臉，就像是要抹去憂慮；不過他也願意承認他會害怕，甚至會哭。他與卡拉在一起，找到了交融的脆弱與堅強。

他們都在CITIC租車公司工作，她坐辦公室，時薪六美元；而他當技工，時薪七美元。「我們做得不錯。」她堅定地說道，彷彿想再度重申他們的小小勝利，雖然勝利感已經從他們的身邊溜走了。「我們沒有信用卡，不欠任何人錢。」他們過得很節儉，但能付清帳單，每個月還想辦法存一點錢。在工作上，卡拉有信心可以做一個幾乎過度誠實正直的人。「我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她宣稱：「他們說你得淘汰開回來時輪胎壞掉的車子，所以我就這麼做了，結果後來看到他們還是把那輛車子租出去了。」她的經理有一次指示她把一輛車頭燈壞掉的卡車「在白天」租出去，她拒絕了。「他們對我很不滿，」她吹噓道。她沒有加過薪，申請擔任經理也遭到忽略；後來她獲准休假一個禮拜，好讓她陪兒子接受顎裂手術，回來的時候卻發現已經有人取代了她。

因為患有癲癇症，卡拉想找其他工作很難，她不應該開車，雖然她還是常常開，不然她會覺得自己被困在沒有多少大眾運輸工具的鄉下。最後她設法取得了領取社會保險殘障補助的資格，每個月可

領四百八十四美元，足以支付他們那棟將近五百美元的老房子租金。但是向下的惡性循環還在繼續，湯姆跟J.H.H.A公司也處不來，那些有問題的出租卡車讓他頭痛，半夜常有電話打來要緊急維修，經理全是些二十幾歲的「小屁孩」，沒有實際操作的能力。他抱怨整整三年沒有加薪，他受夠了，於是辭職去開卡車，往返麻薩諸塞州，替新罕布夏州克萊蒙特的一個菜農工作。

下一個打擊來了：卡拉被診斷出患有惡性淋巴瘤，疾病預後很差。沒有經濟來源，她最好的治療希望就是參加實驗，「就像一隻天竺鼠，」她說道。她開始在達特茅斯希區考克醫學中心接受免費化療，如果光憑決心就能戰勝疾病，她知道她的鋼鐵意志一定會贏。「我要撐過這一切。」她固執地宣布：「這會是一場漫長的艱苦路途，我要走完，去幫助別人；我要告訴那些有小孩的年輕女性，妳不一定會被打敗。」

他們租來的房子有種平凡的愉悅感，淺藍綠色的木頭鑲著紅色的邊，因為時間和磨難失去了光澤。踏進擁擠的後陽台，任誰都會感受到一股發膩的空氣，那兒瀰漫著廚房中間地板上一個圓形大煤油爐傳出來的氣味。卡拉坐在桌邊，用一條青綠色的圍巾包住光頭，她的樣子讓她兒子覺得丟臉，不希望她出現在他們的學校裡。她和他們一樣尷尬，那其中還參雜著一股可怕的憤怒。為了合理化自己的羞愧和憤怒，她在牆上掛了一幅自己的照片，照片中的她長髮飄揚，相機捕捉到當時她眼中的一抹笑意；如今那雙眼睛狠狠地發亮，渴求而驕傲，映照著她憔悴的臉龐。

她已經開始感受到機運的嘲弄，不由得一邊苦笑，一邊講述她在康沃爾市集贏得獎品的苦澀故事。在新英格蘭這裡，那些古樸的鄉村市集仍然很受歡迎，而彷如諾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畫作中的臉孔來自四面八方，聚集在此，看看誰烤的派最棒，誰能一隻手放在背後又最快

吃掉一個派，誰能贏得消防隊的彩票，誰可以丟球擊中目標，讓本地最受歡迎的男生掉進池子裡去。在康沃爾市集，卡拉花一美元買了一張彩票，在她三十一年的人生中，她從來沒有贏過任何東西，但這一回奇蹟似地，她的名字被抽中了，得到一隻名叫艾瑪的胖小豬。「我好驚訝！」她說。

但是對於一個命運乖舛的家庭來說，就連一個令人開心的獎品也能帶來不幸。湯姆跟卡拉把艾瑪養在朋友家的畜欄裡，有天朋友養的狗跑進去咬了艾瑪一口，於是湯姆心想，他得在自己的地方蓋一座畜欄才行。他打電話給他母親，借了他母親的蓬頂貨卡去載艾瑪。他把小豬放在車子後座，接著發生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一頭馴鹿跑到路中間（新罕布夏州的人對這種事都很熟悉，路標警告過駕駛者會有這樣的危險），前面一台車子緊急煞車，湯姆的母親撞上那輛車子，湯姆就像顆爆米花一樣在貨卡後面撞來撞去。當地急診室替他檢查後讓他回家了，但一個星期後複診時，骨科醫生發現他的背骨摔斷了。

湯姆·金靠雙手做活——那是他唯一會的工作方式。他從小就幫忙家裡的木材生意，他母親開著推土機在樹林裡來去；十年級時，他穿越康乃狄克河到佛蒙特州去，跟著一個農夫工作，並且繼續升學。「然後佛蒙特州的學校發現我是來自其他州的學生，決定要收我學費，」他回憶道。「我說：『反正我覺得我在農場學到的比你們這些人能教我的更多。』所以我就離開學校去農場工作。」後來在軍隊服役的時候，他取得了高中同等學歷，被派到越南去——他認為這段經歷是他酗酒的開始。

他想不出高中同等學歷能幫他找到什麼工作，他把他的學習方式說得很浪漫：他說，從做中學，而不是靠讀書來學，那個他也讀不好。「我光是站著聽引擎運轉，就差不多可以告訴你哪裡出了問題。」他說道：「很多都是在老人家身邊學來的，當年我在農場的時候，你看不到這種帶著電動之類

設備的人；但你把東西遞過去，那些老人家就可以告訴你為什麼發不動、或者為什麼不會運轉，光聽聲音就知道。我差不多就是從這裡學起的。」

換句話說，湯姆是個適合在外討生活的人，他的技能跟個性都不適合坐辦公室。他待過三、四家工廠，「過一陣子這些工廠通常都會縮減規模，」他觀察道：「你往往得被迫調整步調。」因此他沒有多少工作可選擇。他常常感到身體疼痛，現在他只能待在昏暗的自家客廳裡的沙發上，盯著沒完沒了的愚蠢日間電視節目。就像許多背部受傷的人一樣，他也受到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的誘惑，幻想著能得到社會安全局的殘障補助。那筆錢幫助了許多人，也戲弄著許多想要符合領取資格的人。他的太太正在領，如今他也是殘障了，他提出申請。「我不是要拿到全部的錢，」他說：「只要一部分就好了，我不想不勞而獲。我申請的不是永久補助，只是要幫我重新站起來。」如果他找到一個輕鬆又能坐著的工作，他擔心這會破壞自己沒辦法工作的說法，不過隨著他的背痛漸漸治癒，他還是找了一下工作，儘管全都沒有下文。社會安全局花了整整一年才拒絕發給他社會救助金，理由是他舉得起十磅重的東西，還能站立二十分鐘之久——但是這不足以讓他找到技工職位，只會讓他失去得到幫助的資格。

他們沒錢，存款帳戶裡原有的幾千美元，已經用光了。卡拉欠律師六百元的離婚手續費，她的前夫在坐牢，她希望湯姆能夠收養柴克和馬特，但是她需要一百美元來提出申請。東湊西湊後，「我花了一年才存到一百美元，」她悲傷地說道：「今天我連五塊錢都沒有，沒辦法加油了，但我得開卡車去看醫生。」更痛苦的是，她沒有能力給孩子更好的生活。「我有三個世界上最棒的孩子，身為父母，你總想要獎勵他們，但當你走進店裡，看到一個一點九九美元的小東西卻買不起時，那會讓你痛

不欲生。去年聖誕節是我這輩子最糟糕的聖誕節，我的孩子只拿到三樣禮物，那天早上我根本就不想起床……幸好他們還滿開心的。」她沒有送東西給湯姆，湯姆也沒有送東西給她，但他們給了對方最重要的東西。「就算我們一無所有，」卡拉說：「我們還是擁有彼此。」

親情可以讓經濟困境不再那麼尖銳，比如祖母幫忙在放學時接送孩子、朋友出借車子、教堂提供日托服務和社群聯繫感；這樣一來，做父母的就可以去工作，存活下來並且對抗孤寂。某年的十二月，克萊蒙特沃爾瑪超市的經理馬克·布朗在一次員工會議中，提到有名員工需要幫助。「我沒告訴他們那人是誰，」他說道：「我只說有人跟他們的孩子沒辦法好好過聖誕節。」他們發起募款，掏出自己口袋裡的錢，這些工資過低的工人湊出一堆美元鈔票，加起來總共有三、四百美元，要給這位不知名的同事——其中一個拿出幾塊錢來的，就是那個需要幫助的人。

那是最廣義的親情，超越血緣與種族，成為更廣大的親緣與共通之處。就是這張安全網提升了生活的物質層面。那些人擁有這張連結網、擁有來自家庭內外的關愛，貧窮的邊緣就不再是那麼危險的地方。讓經濟生活邁向成功的要素裡，所有的硬技能（比如閱讀、數學、打字、操作工具、推理）和軟技能（比如守時、勤奮、情緒管理），都不如親情重要。缺乏親情會加速生活崩毀，有了親情則可以減緩衰敗，金一家人就發現了這一點。他們可以被稱為「值得幫助的窮人」，這種居高臨下的標籤，有時候會被用來和那些右翼人士幻想出來的「福利女王」做對比。湯姆和卡拉一點也不懶惰，他們不要別人施捨，他們勤奮工作，誠實正直，認為自身的福祉操之在己，而不在于福利系統；他們循規蹈矩，除非沒念過多少書也算是他們的缺點，否則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根本不是他們的錯。挫折卻接二連三地發生，他們毫無招架之力。

在絕望之中，他們違背了自己引以為豪的原則，終究申請了福利補助，找到安全網中重要的幾方面：醫療補助會支付他們的醫療帳單，每個月有兩百六十九美元的食物券，還有第八類房屋條款補助可以付清他們全部的房租。他們在司徒南西的帶領下通過了大部分的官方審查制度，司徒南西是一名專案經理，本身也在貧窮的環境中成長，並以此自豪；她在卡拉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透過她工作的私人機構「健康夥伴」，她替卡拉找到一些免費的癲癇藥（由藥廠捐贈的即期藥品），而卡拉也勉強接受了WIC發給女兒的補助券——這是個由聯邦政府資助的營養補給計畫，補助對象為婦女、嬰兒和孩童，可以在超市領取牛奶、雞蛋、果汁、穀片、花生。

金一家人也進入了以物易物的經濟模式，這很常見於窮人之間，藉以取代金錢。湯姆從他幫忙的農夫那裡拿取的最終報酬不是現金，而是蔬菜。「現在蔬菜對我來說比錢好用，」湯姆告訴他：「因為我可以拿回家，可以裝罐，可以冷凍起來，他說：『沒問題，告訴我你需要什麼，來拿就是了。』」以物易物成為一種施予和友誼的撫慰，有個在路邊擺攤的朋友拿玉米跟番茄來給他們，卡拉問他要多少錢，他說：「噢，不用錢，我知道你們住哪兒，需要幫忙就會來找你們。」而他不用開口，卡拉就會主動幫忙。治療和越來越嚴重的癌症症狀令她疲憊不堪，但她還是撐著去他的攤位工作。

「他給我一袋五十磅重的番茄和玉米，我替他做裝罐的工作。」她解釋道：「我們之間從來沒有現金交易。」

1 譯註：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s），指那些不工作卻靠領取政府福利補助舒服度日的人。帶有貶義。

他們那間會透風的房子主要是靠地下室柴火爐加熱，進入深秋後，夜晚變冷了，湯姆和卡拉感到恐懼不已。新罕布夏州的冬天令他們害怕，他們沒錢買木柴，房間裡瀰漫著煤油暖爐令人作嘔的氣味。後來湯姆有個叫做寇特·米尼奇的朋友，這人有間小伐木公司，他把一卡車的木柴倒在他們院子裡，什麼回報也不要；湯姆的背痛好轉之後，他提議替寇特維修卡車，會盡他所能小心翼翼地進行，寇特接受了。禮尚往來，這一家子度過了冬天。

金一家子的困境傳開來了，這個社區的慷慨大方也因此顯露出來。康科德婦女輔助會替卡拉募集了四百五十美元，讓她裝假牙，隔年的聖誕節，「來家訪的護士、學校、消防部門，全都捐了各式各樣的東西給我們。」湯姆說：「你從來沒想過這些人會有這份心——聖誕節的時候，帶著一盒又一盒的禮物前來。」

這些情感流露溫暖了卡拉，但是也讓她的資產負債表傾斜了，她覺得這讓她背負了數不清的債務。「我會接受，但是我覺得一定要做點什麼來報答他們。」她宣布，「比如去年聖誕節，我們得到一個食物籃，同時送出超過七十五個。為了有所得，你必須要做點事情。我不能就這麼拿人家的東西，我得要心安理得才行，要覺得我配得到這些東西。」

因此，多次造訪谷區醫院時，他們注意到等候室設備缺乏，沒有東西給小孩玩，於是湯姆跟卡拉要凱特從她為數不多的玩具中，挑出幾個娃娃跟其他玩具捐出去，湯姆還替等候室做了一個木製玩具箱。「我們在上面烙上記號，上了顏色，還把所有的娃娃都洗乾淨。」卡拉說道：「我的小孩去那裡時，他們就有點事情可做。我們就用這種方式來彌補他們。」

寇特成為他們主要往來的朋友，提供他們從工作到諮詢等各種幫助。「他會在早上來這裡，」湯

姆回憶道：「然後問：『你今天要幹嘛？』『沒幹嘛。』『喔，那來吧，上車去兜兜風。』我們就會到偏僻的小路繞一繞，找木柴堆。他就只是為了把我從屋子裡弄出去。」當湯姆的背比較好一點，稍微能開車了，寇特雇用他每周幾天巡邏森林，標記邊界，好讓伐木工可以進來砍樹。之後他用一本學習指導手冊來培訓湯姆，讓他可以取得伐木卡車的駕駛執照。後來，湯姆跟卡拉租的房子要賣掉了，他們不得不搬走，寇特以優厚的條件賣給他們十一英畝的地和一間淺綠色的舊金屬活動式房屋：頭期款三萬美元，用湯姆剛拿到的三萬六千美元傷害保險理賠支付；剩下的五萬美元，由湯姆慢慢以現金或勞動在接下來的幾年償還給寇特。擁有所有權的感受提振了湯姆與卡拉的精神，他們去工作，為這部份所有權打下基礎，還弄了一個菜園。他為她種了一叢玫瑰花，讓她從臥房的窗戶就能看到；他雄心勃勃，還計畫要擴展拖車屋，向寇特借了一個手提式鋸木機，安裝在後面的小樹林裡，跟兒子一起砍樹，製作出各種不同寬度的木板，用粗糙的木工技術釘在一起，加蓋了一個後廊和其他笨拙的附加物。卡拉的病情惡化了，她需要去波士頓接受治療，但是湯姆沒有可靠的方法可以送她去那裡。他買的那輛一九八六年出廠的野馬汽車(Bronco)已經開了二十三萬英里，他很確定根本沒辦法撐過那趟路，所以寇特「啾」的一聲把自己的信用卡擺到他面前，幫他租了一輛卡車。「卡拉每次去醫院，」湯姆說道：「寇特都會打電話給我：『你知道，要是你今天不能來上班也別擔心，先照顧好家裡的事情。』」

陪伴的情誼填補了沉默，「寇特是那種如果我晚上睡不著，需要與人講話之類的，」湯姆說：「都可以拿起電話打給他說：『寇特，我需要找人聊聊。』他是那種會坐在那邊聽，也許兩、三個小時都不講話的人，就讓我瞎扯我的事情、我的生活。」

在危難時刻，湯姆跟卡拉也比較常聊天。壓力和損失會扭曲破壞某些家庭，但也會把某些家庭鍛造得更加堅強。金一家人變得更親近，對彼此敞開心胸，透露出他們的恐懼。「小孩上床後，大概八點半、九點吧，」湯姆說：「我們會坐在那裡聊好幾個小時……以前我從來不跟任何人聊天，你知道的，我把每件事情都放在心裡，讓事情啃噬著我。但是跟卡拉在一起……我現在不怕把情緒表現出來，如果有人看到我哭也沒差，因為我的感覺就是那樣，這就是我。如果你不能接受我本來的樣子，那你最好還是假裝沒看見吧，因為事情已經如此了。我有感覺，而且我要表現出來，毫不猶豫。噢，我們現在的關係很棒。」湯姆用手搓揉整張臉，從額頭開始到下巴為止。

湯姆和卡拉養動物：不只是那頭重達四百磅的寵物豬艾瑪，還有三隻本來被一個親戚養在隣兮兮的地方的雪貂，和幾隻狗跟兔子。湯姆後來又多養了幾隻山羊和兩頭小公牛，他和兩個男孩蓋了畜欄和工具棚。

卡拉一頭鑽進有關癌症的書籍和小冊子中，但是每次上醫院湯姆只覺得自己是個傻子。那些醫生「講的字有這麼長」，他發著牢騷，雙手打開將近兩呎寬。這種抱怨很常見，往往阻礙了沒受過多少教育的人及時就醫。「我回家來以後說：『好吧，妳知道他在說什麼嗎？』」她說：『嗯，大部分吧。』『好吧，我想我們大概得坐下來，讓妳解釋給我聽，因為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大多時候，他因為自卑而產生的憤怒感只能悶在心裡，但終究還是爆發出來了。那是卡拉需要一個骨髓捐贈者好讓她移植的時候，她的病情幾乎沒有希望了，但是醫生還是很努力想治療。湯姆自願當捐贈者，因為他不明白為何只有血親的細胞才有配對成功的機會，可是醫院只是輕蔑地告訴他，讓他做測試也沒有用。為什麼？湯姆氣憤地問道。因為他只有百萬分之一的可能性會配對成功，醫生

回答道。「等一下！」湯姆記得自己是這麼說的：「我們談的可是我太太的命啊！就算我跟她沒辦法配對，某時某地總會有人可以，如果我可以救別人的命，那也好啊……如果她從骨髓銀行中找到捐贈者，我也可以回報。」他命令那個醫生，「用我聽得懂的話解釋給我聽。」

「這種情況讓你抓狂嗎？」醫生問道。

「沒有，我只是很懊惱。」湯姆反駁道。

「我想我明白你的立場。」醫生讓步了，「也許我們應該替你測試，讓你安心也好。」他們確實這樣做了，沒有配對成功，後來卡拉的姐姐克莉絲當了捐贈者。

「多麼美好的一天啊，」卡拉在日記中寫道：「我去買東西，精神還不錯。」日期是一九九八年二月八日，這是她的線圈筆記本裡的第一則紀錄，本子裡全是胡亂拼湊的想法，幾乎全部都是用鉛筆寫的，很多是寫給上帝的信——感激、請求，以絕望的口吻懇求能活下來。「上帝啊，」她第一天晚上上的結論是，「請保佑湯姆、柴克、馬特、凱特和我自己——長命百歲，有愛、幸福、歡笑，永遠彼此緊緊相依，謝謝祢今天為我做的一切，阿們。卡拉。」

她的快樂很簡單，只要那天「很美好」，因為「湯姆、比爾和維吉妮亞去幫我挑了一個兩段式的爐子，才五十塊錢，很划算——左前方的爐頭不能用，不過總比只有兩個爐頭跟一個烤箱好。」或者是因為「湯姆替學前先鋒教育計畫做了布朗尼跟蘋果肉桂馬芬蛋糕，柴克做了棗子蛋糕——全都賣出去了。我買了一台鬆餅機給湯姆當情人節禮物，他買了一件很漂亮的性感睡衣給我，我們給孩子每個人五美元。」

但是隨著癌症的疼痛擴散，錢的問題更加嚴峻。她記錄了自己還有多少天就會離開湯姆，認為她

死了會讓他比較好過日子。她對孩子發脾氣，開始喝很多的加拿大威士忌和薑汁汽水。二月十九日她寫道：「嗯，我過了超棒的一天，我熱愛生活，感謝上帝在所有日子裡為我做的一切，我很清楚，這段時間我一直沉溺在酒精裡，那真的有幫助。我不該找藉口，但是我真的覺得我需要酒精。」當晚她一次又一次的起床，最後到了凌晨四點半，她拖了地板，因為她睡不著。二月二十日，「嗯，又是個美好的一天，因為我還活著……我對柴克動手，只因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推他撞牆又抓住他，罰他禁足。他不喜歡我們買的那種冰淇淋，所以他弄亂冰箱，又對馬特很兇，為此我兇了他。我用力親了凱特的嘴唇，因為她牙牙學語的樣子好可愛。」二月二十三日，「我不知道我最近怎麼這麼愛喝酒，不過嘿嘿，我忍不住啊，我猜我需要調整一下了。」二月二十六日她寫到寇特積欠湯姆工資，「我是一個酒鬼——天啊，明天我一定後悔的，我會暈頭轉向，我會有罪惡感——不過就是暈頭轉向的感覺吸引我。像湯姆說的一樣，有效就好。」到了隔天那則紀錄的結尾處，她因為邊喝邊寫，字跡已經無法辨認了。三月五日，「柴克和馬特都拿了好成績，所以我們要給他們一人十美元。我最近真的覺得很沮喪……我要跟湯姆多聊聊。我喜歡他在我身邊，他是我的生命。」

因為已經安排了要接受骨髓移植，她擔心自己會錯過「春天所有的色彩，鮮豔的黃色、翠綠色，綠到讓你停止呼吸。」移植延後了，但是春天也隨著她不太寫日記而過去了。在五月底，已經快要兩個月沒有寫任何東西，她草草寫下，「上帝對不起，我很久很久沒寫了。」隔天從醫院回來以後，「我很震驚，不想面對現實，我不想死，我經歷了這麼多，走了這麼遠，我不能現在死。」兩天後，五月三十日，「醫生都要我準備死亡了，我想沒事的，起碼不用再痛苦了……媽今天來了，我叫她走。」六月三日，「今天是湯姆的生日——他過得很糟，他很恐慌。昨天晚上我很氣他，因為他在停

車場當著一堆人面前，把柴克手上的球一把打掉……我全身到處都有腫塊，子宮，裡面有惡性腫瘤，很棒吧……我不想死，我想活著，上帝，拜託請讓我活下去好嗎？」

湯姆用租來的卡車，送她去波士頓的布萊根婦女醫院進行移植手術，然後盡量找時間開兩個小時的車去看她。這些都由寇特的信用卡支付，他幫助湯姆就像呼吸一樣自然。「他絕對是個心眼正直的人，只不過有點跟不上社會……」寇特說道：「你不會介意幫助他這樣一個好人。」某天，寇特的幫助由達特茅斯汽車行一名經銷商輕巧且不著痕跡地傳了下去。

「我記得那是她去波士頓的第一個周日。」湯姆回憶道：「我跟寇特講了，寇特告訴我『去達特茅斯汽車行』。」寇特又打算替湯姆租一輛卡車，但是經銷商的最後一台車子也已經租出去了，所以那名業務員「去整理了一下他自己的雪佛蘭開拓者 (Blazer)」，湯姆說。

「來，開這台吧。」那個業務員說道：「寇特和我已經安排好了，你回來的時候再開過來就好，油已經加滿了。」

「我說：『好，等我回來也會把油加滿。』」湯姆說：「後來也的確是這樣。」

七月三日，卡拉接受移植後的那天，她寫下，「上帝請保佑湯姆、柴克、馬特、凱特，請特別保佑我，並謝謝祢昨天為我做的一切。還有上帝啊，請保佑克莉絲，她為我做了這一切，阿們。卡拉。」三天後，她用虛弱的筆跡寫道：「嗯，我馬上去床上休息了，請上帝保佑湯姆、柴克、馬

特、凱特，還有特別是我自己。謝謝上帝今天為我做的一切，求上帝垂憐我、治癒我，祈求祢。謝謝祢今天為我做的一切，阿們。卡拉。」這是她最後一則日記，五天後，湯姆收養柴克和馬特的事情成為定局。

七月十二日下午，這天是卡拉的三十三歲生日，醫生打電話給湯姆，要他盡快趕去波士頓。明天一大早可以嗎？湯姆問道。「好，」醫生說：「越早越好。」湯姆打電話給寇特，「他打了幾通電話，然後達特茅斯汽車行那個業務員跟我說：『你什麼時候要車？』我說：『明天早上六點以前。』他說：『那來吧，我在那裡等你，我會五點半到那裡。』他五點半開了門，給我一串鑰匙，我問：『我要在哪裡簽名？』他說：『不用簽，快出去，走吧。』」

湯姆在八點整走進卡拉的病房。「他們正在那裡照顧她，醫生出來說：『她想見你。』我說：『好，現在情況怎麼樣了？』他搖搖頭，所以我踏進病房。她伸手想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就像這樣，於是我伸手握住了她。她的脖子上掛著十字架，手上拿著她的耳環跟戒指，她把這些都放在我手裡。」他的聲音沙啞了，長長的沉默伴隨著眼淚滑落。「我說：『卡拉，不管今天發生什麼事情，我會永遠愛妳。』她點點頭，把所有東西都放在我手裡，捏了捏我的手，然後她就走了。」

他開著那輛借來的全新雪佛蘭開拓者回家，當面把事情告訴孩子們。他把她的結婚戒指串起來掛在脖子上，繼續戴著自己的婚戒。她永遠也看不到那些他為她栽種、在臥房外盛開的玫瑰花花了。

湯姆跟男孩們一起做了一個牌子，漆成紅色，掛在花園裡的三根杆子上：

給我親愛的妻子、母親和我們最好的朋友，卡拉。

又：我們愛妳。

這個牌子隔年夏天還在，不過花園長滿雜草，一片荒蕪。玫瑰花叢需要修剪，四周地上擺滿廢物，全是生鏽的機器。柴克和馬特都覺得校車停在家門前很丟臉，好像他們曾有過的東西全都擺在院子裡了：四台草坪牽引機，其中一台要拿著剪刀和電磁圈接觸才能使用，其他幾台只能拆掉，弄點有用的零件出來。還有兩、三台旋轉鬆土機，幾台割草機和一部手持除草機，旁邊擺著一罐丙烷；一張野餐桌被埋在垃圾堆裡，還有一架老舊的木頭手推車，其中一邊的輪子不見了；一艘迷彩顏色的金屬獨木舟倒放著，擺在一艘鋁製划艇中，裡面全是釣竿和釣具箱。一個橘色的交通安全錐擺在拖車後面的樹林邊緣，樹上掛滿各式各樣的廢棄金屬物件：金屬槽、金屬罐、塑膠袋碎片，還有一堆舊輪胎；晾衣繩被許多件牛仔褲和工作褲的重量壓得垂下來，還有一堆裁好的鐵絲網，準備用來作籬笆。

湯姆和男孩們蓋了一座工具棚，還有一間小屋給艾波跟席維亞那兩隻山羊。兔子肉桂、辣椒、甘草和米妮，天竺鼠威廉，以及小公牛傑西跟傑克，他們都替牠們搭了小畜棚。他們用鋸木機切出來的板子沒有兩塊是相同的，看起來不一樣寬，長度也不對。籬笆蓋得很隨意：一條通電的帶刺鐵絲網擋住了巨大的寵物豬艾瑪，另一排圍欄由不完整的木板組成，看起來就像是沒用的麵包皮。山羊被圍在鐵絲網裡面，圍欄門是用一扇廢棄門板鋸成一半做成，斜靠在一根裂開的柱子上。那根柱子插入地面時插得不夠深，沒辦法直立。柴克和馬特輪流，每天花半小時餵這些動物。

沿著一條泥土路往他們的後院走去，是一個舊貨寶庫，大部分的東西在他們買下那裡的時候就在：一堆鐵路枕木、三輛雪地摩托車、一台後半節不見了的校車（湯姆打算在校車後面裝一個乾

燥窯，用來烘乾木板）、五輛卡車、好幾輛舊車，還有一台叫做法蘭基的大型黃色牽引機，上面配有推土機大小的鏟子，卡著一堆樹根和泥土。柴克說「只要油箱裡面有東西卡住」，這台牽引機就得上場。

也許這裡看起來像個廢物堆積場，但其實更像是置身於成年人的遊樂場中，東西看似不能用，不過你可以從修理東西中找到許多樂趣，這就是孩子學習的方式——湯姆就是這麼學的，把手弄髒、修好東西、照顧動物、負起責任。兩個男孩在四健會（4-H），中很活躍，還得過獎。柴克做了一個雕塑品，用的工具是他在庭院拍賣中花五美元買來的鏈鋸。他豎起一塊木頭，畫出輪廓，然後雕刻出一隻長鼻子的熊，還有兩個尖尖的耳朵。為了好玩，他說他們去蘭德池釣鯰魚，還去獵兔子和鷓鴣。有個朋友獵鹿但是不吃鹿肉，秋天的時候送了野鹿肉給他們。為了好玩他還做些什麼？「玩除草機！」他喊道。

拖車屋裡面已經陷入一團混亂，柴克和兩個表兄弟瘋狂地洗著水槽裡的一大堆髒碗盤，大概堆了好幾天了。沿著後走廊的一排臥房，裡面全塞滿了衣服，床上、地上到處都是。但是洗衣服不是優先事項：湯姆跟男孩們要去替一個農夫割乾草，作為交換，他們可以拿一些乾草回來餵動物。

男孩各是七年級跟八年級，在磨損的橢圓型餐桌上做功課。餐桌上散置著各種東西，擺在這個家庭的漩渦當中。又小又亂的臥房是娛樂聖地，對年紀比較小的馬特來說尤其如此。他喜歡聽收音機，到處閒晃，他們的電話因為湯姆沒付電話費而被切斷了，馬特的老師沒辦法打電話來，所以她寄了一封信到家裡，在馬特的房間裡擺了好幾個月，湯姆都沒看見。等他一看到馬特淒慘的成績單，他大發雷霆：英文 E、科學 E、數學 D、社會科學 D。接著湯姆跑去學校問班導師：「為什麼之前沒人告

訴過我這件事情？」

馬特討厭上學，柴克喜歡上學，事實證明柴克是一名優秀的藝術家，念高中的時候，他開始考慮要念建築。高中一年級快結束的時候，我問湯姆，是否認為柴克會去讀大學？「我想他已經申請了吧，」湯姆說。「柴克，」他喊道：「你申請了哪間大學啊？」柴克當然還沒有申請，因為那時還太早了，他不太知道該怎麼做，而湯姆儘管願意愛他、支持他，也沒辦法給他任何幫助。

卡拉過世之後的那些年，湯姆陷入了長期憂鬱，沒有工作，甚至酗酒。那年夏天，他沒辦法替寇特開伐木卡車，因為他找不到保姆照顧凱特。九月開學時，他在原木場找到一份時薪六美元的工作，負責測量卡車司機載來販賣和銑削的木頭板材數量。有一天，他發現伐木場把他測量的數據去尾數算低了，還低價買進高品質的紅橡木跟白蠟木，賣木頭時又以高價賣出去做鑲飾貼皮。他們「對伐木工施加壓力，而這裡有四分之三的伐木工都是我的朋友。」他說：「他們犯的最大錯誤就是讓我知道事情的發生過程，我跟管理人員對這些事的看法不同。」於是他去跟領班對質。

「那是我們的事。」那人說道：「你做好你的工作就好，我們會付錢的。」

「不行。」湯姆說：「因為有陣子我也幹過他們做的事，我知道那是什麼感覺。」他想了一整個晚上，隔天中午，他辭職了。「事情就是這樣，我不喜歡這種事情，我不在詐欺顧客的地方工作，」他說自己這麼告訴他老闆。「我盡量說話算話，賭上我的名譽，做一個說話算話的人。如果你覺得這

3 譯註：四健會是美国農業部所管理的非營利青年組織，早期主要對象為農村青少年，旨在實踐動手學習。

樣有什麼問題，那就是我們該說再見的時候了。」

很少美國人有餘裕能夠信守這樣的原則。後來湯姆去寇特那裡兼差維修設備，但是賺的錢幾乎只夠付清帳單。當時舉國上下都籠罩在柯林頓總統的彈劾案中，而湯姆不為所動，這一切就像遠在天邊的暴風雨，與他無關。「我不太懂政治，」他簡單地說道。到了二月，他在另一個伐木場找到全職工作，每周賺三百到三百五十美元。他喜歡整天都待在荒涼的樹林裡。「現在我們砍了一些硬木。」他說。「大部分是糖楓樹，也有些櫻桃木，還有很多白樺樹。另外我們還會砍松木，所以我們平均每個星期會裝幾卡車硬木，兩、三卡車的松木。我八點去他家，八點半開始清空樹林，通常會在三點半或四點回家。不過我們也不會把自己累死，工作嘛。」他再度進入伐木業的另一端，而且他仔細盯著板材測量，這家沒問題。

「我們還過得去。」湯姆用手搓揉臉。「是啊，對，嗯，不過也沒發財。如果我能在銀行裡存上一千或一千五，那我就知道萬一發生什麼事情，至少還可以撐上一個月。」但是後來伐木工沒有木柴可砍了，湯姆又失業了四個月。他開始喝酒，任憑友誼荒廢；他整天開著電視，用以填補空虛。

此時瑪麗走進了他的生命裡。她是一個衣著俗麗、有話直說的女人，年紀與他相仿，個子又高又壯，自詡為救星。「這地方一團糟，」她說：「到處都是書，到處都是髒衣服。他只剩下空殼，不去工作，不關心任何事。現在我們一起聊天、一起哭泣。」她黃色的頭髮糾結在一起，臉上的表情愉快、老練，甚至有點強硬。不過她對孩子們既親切又堅定，嚴格又溫暖，就像慈母一樣要求他們。她用她自己的名字換掉了被切斷的電話。另外，湯姆遲繳的電費紀錄沒有顯示在電腦上，當技術人員要來切斷電力時，她堅持要他們再確認，後來電力只停了兩個半小時。

不過這也夠久的了。「到了明年秋天我要自給自足，」湯姆鄭重地宣布。他和男孩們開始替兩頭小公牛修繕年久失修的「牲口棚」。「我要自己養豬，自己養牛，瑪麗想放幾隻雞進來。我在一台柴油發電機。有幾台從紐澤西州迪克斯堡來的緊急發電機，只要一千元，但需要重新接電線。」他聳聳肩，彷彿在說那是件簡單的差事。他把計畫講出來的時候，語調短促，聲音裡有種虛假的信心，好像他知道他說的只是自己的希望，而不是真正會發生的事情。三年後，他還在裝接電力網。

瑪麗了解憂鬱症，她在服藥。湯姆也有吃什麼藥來治療自己的憂鬱症嗎？「這個嘛，傑克丹尼爾威士忌。」她說：「不是醫生開的處方，是他自己的藥方……那天是他生日，我替他籌畫了一個很棒的生日野炊宴會，他決定從九點半就開始喝酒，所以中午就已經喝醉了。」不過現在他已經四個月沒喝酒了。「他很守規矩，」她繼續講著：「上次他喝醉的時候，我把他的酒瓶丟進水槽裡去，之後他就沒有再買酒了……說到當個混蛋，我可遇到對手了，我不怕他。」

要不要去治療看看？「世界上拿起來最重的東西就是電話，」湯姆說道。也許瑪麗就是他最好的治療，因為她把他從憂鬱症典型的癱瘓中拉了出來。他開始求職，在戴維樹木專家公司(Davey Tree Company)找到一份工作，依據合約負責修剪電線附近的樹枝。「這讓我覺得很好，可以出去走走，一天在樹上晃蕩九個小時，然後晚上走路回家……我現在能做這些事情，但是一年前根本不會想到要做，因為我不認為我有那個體力可做；但現在把鞍架繫在屁股上，爬到樹上待八、九個小時我也不覺得困難。爬上樹，修剪一下，再爬下來。」他也教馬特做這個，他們正在修剪自家的樹木。在這段期間，瑪麗搬回自己家裡住，他們繼續見面，不過沒那麼密集了。

隔年冬天，湯姆被解雇了，因為雪下得太大，整整八周沒有工作可做。他找到一份焊接油箱的工

作，時薪十點五美元，後來也被解雇了。到了夏天，他幫一個農夫種了六十五英畝的甜玉米，還幫忙種了番茄跟南瓜，每周拿三百美元，還有他想要的蔬菜。農耕季節結束以後，他回到戴維維樹木專家公司，但是他一滿五十歲他們就不讓他爬樹了，因為保險公司不會受理。所以他在冬天除了兼差砍柴火販賣之外，沒有工作。他做了一段時間的楓糖，然後在拉寇斯 (LaCrosse) 這家靴子製造公司找到維修機器的工作，時薪十點五美元。那是一份室內工作，他知道自己很快又要開始待不住。

「最後，」他用那種帶著虛假信心的語調輕快地說道：「我要在拖車這裡裝個滑動門，把這裡當作大門。可能得慢慢來，不過一定會的。你也知道，這裡一直都是間房子，夠久了，該是變成一個家的時候了。」

不過一年多後，他把整輛拖車都換成了另一台二手拖車，用兩千五百美元跟一個朋友買的，那台拖車是朋友幫人造景得到的報酬。在拉寇斯的工作很好，他捨不得辭掉，唯一可抱怨的就是他沒辦法在樹林裡工作。他享有全部的福利，包括醫療保險，每周只要三十八點一五美元，還有很多加班費；即使在二〇〇一到二〇〇三年經濟衰退的時候，他每周還是能夠賺到大約五百五十美元。「其實過得滿好的。」他說。

他家的男孩們喜歡工作，馬特替鄰居的車庫安裝隔熱板，柴克替他的高中教練做木工，他們都會替父親分擔家用。馬特仍舊在四健會中贏得藍帶，柴克則因為靦腆的笑容，在高中最後一年的秋天被選為校慶國王⁴。他在學術能力測驗 (SAT) 中，數學和語文總共只拿到九百五十分，也沒辦法參加卡普蘭或普林斯頓的補習複習課程。有錢人家的小孩會利用這些課程來提高成績，但他的家庭與社區網絡只能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幫他，而沒辦法在大學這個陌生的領域中幫上他的忙。他申請去波士頓

的溫特沃斯理工學院念建築，但是卻不寫有利於升學的小論文。他沒有意識到他在貧窮邊緣的經歷，對於想招收努力克服困境年輕人的招生委員來說，會有多大的吸引力。最後溫特沃斯拒絕了他。

那是一個艱難的冬天，氣候嚴寒，雪下個不停，寂寞降臨在湯姆的身上，有如冰冷的沉默。為了溫暖自己，他又找上老朋友——傑克丹尼爾威士忌。他那輛堆滿雜物的拖車裡的生存機制開始瓦解了，首先，聖誕節過後突然就沒水了，雪的重量壓得一條水管脫落，也壓壞了他井底幫浦的電線；接著是污水處理系統結冰堵住；最後是加熱系統風扇裡的一個軸承卡住。他回家時發現整輛拖車裡都是煙霧，那是火爐過熱所造成的。「我失去了拖車，」他說道。他把柴克跟凱特送去跟瑪麗一起住，把馬特送到他跟前妻生的大女兒那裡去。湯姆帶著他的狗——他唯一僅存的寵物——搬進一個朋友的露營車裡，以丙烷取暖，停在一個樹木繁茂的營地。

他整個冬天跟春天都在工作跟喝酒，每一天，他越來越渴望自己的下班時間趕快到來，他會跟幾個工廠裡的人一起去酒吧喝啤酒，接著他會多買一些啤酒帶回家，就這麼夜復一夜，一周又一周，日光漸漸延伸到夜晚，積雪融化成泥，新罕布夏州的棕色山丘染上了新生的嫩綠。

某個六月的夜裡，湯姆一如往常去了酒吧，然後買了一打啤酒，接下來他只記得自己躺在自家那輛貨卡旁邊的車道上。車子引擎關了，不過車上的收音機還開著。他聽到女人的聲音在報時，凌晨三點半，只剩三罐啤酒，卡車裡也沒有空罐了。他突然一震，想要振作起來，跟工作上的一個好兄弟一

4 譯註：美國的高中與大學有所謂的「校友返校節」(homecoming week)，會邀請校友返校與在校師生一同狂歡，並選出校慶國王和皇后 (Homecoming King and Queen)。

起報名了匿名戒酒協會，每日都有課程。某周六我在他的拖車裡跟他碰面時，他已經四天沒喝酒了，正在挖他的污水處理系統。

柴克的高中畢業典禮就在下周，為此湯姆決定要保持良好的狀態。他隱約記得柴克拿了一些表格給他，是康乃狄克州哈特福某間大學的，好像跟助學金有關，不過湯姆不知道該怎麼填寫這些表格，他以為柴克再過幾個月就會去念大學了。他不確定。

柴克被哈特福大學錄取了，不過他沒有去。那些助學金表格一直沒有寄回去，最後他決定加入空軍，空軍承諾會培養他維修飛機，他滿心期待，湯姆也覺得很驕傲。到了十月，事情開始比較順利了：凱特和馬特搬回來跟湯姆一起住，湯姆加蓋了拖車，也開始上夜班，從晚上六點工作到早上六點，時薪十三美元。從六月以後他就沒再喝過酒了。

安·布拉許選擇了貧窮。她堅信，另一種選擇得犧牲她與孩子之間的連結，日日夜夜甚至周末都得做好幾份工作，也只能勉強求得溫飽，但卻得犧牲孩子的安全感。「我決定要陪在他們身邊，而不是一周工作五十或六十個小時，好讓他們過著中產階級的生活，」她解釋道。因此她打零工，靠教會跟朋友的幫助，設法不領社會救助金。除了助學貸款以外，她堅定地避免接受政府援助：她不要食物券、住房補助或是醫療補助，過了十幾年她所說的「走在懸崖邊上」的生活。她看著自己的兒子桑迪從達特茅斯學院畢業，成為一名電腦專家；她女兒莎莉則在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學聲樂。桑迪有全額獎助學金，莎莉則有就學貸款、獎學金和私人贊助。

不過安還是很窮——不是統計數字上的那種窮（她找到一份工作，年薪兩萬三千六百美元），而是根據她的焦慮來衡量的。龐大的債務、沒有存款，以及生活中種種痛苦的局限，就像許多近乎赤貧的人一樣。她的壓力並非來自於艱苦求生的當下，而是來自無依無靠的未來。然而她說，她的「文化資本」可以擊敗貧窮最讓人衰弱無力的特性：無助感。她竭力想擴大孩子的生活視野，讓他們超越經濟環境的限制，而她也成功了。「我的兩個孩子都說，他們從來不覺得自己窮，」安滿意地宣布道。「在某些方面來說，這讓他們兩個都更確定自己是怎麼樣的人。」

「我知道真的很窮是長什麼樣子。」十六歲的莎莉說：「我知道拚命賺錢才能買下個星期的食物是什麼感覺，但是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窮。」她覺得自己跟公立學校裡其他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很不一樣，「他們身上有一股絕望，好像他們沒辦法想像生活還有其他的模樣。」她的結論是，貧窮不只是錢的問題，也是一種心灰意冷的孤寂。「如果我認識一個很棒的人，就算我無家可歸又一無所有，還餓著肚子，那樣我也不窮。」莎莉堅持道：「只要我認識一個能夠讓我去愛的人，我就不窮。」她一直面帶微笑，笑容照亮了她整個臉龐，包括眼睛。這雙眼睛歡快地凝視著這個苦難的世界。

父母離婚讓他們陷入貧窮的那一年，莎莉五歲，她的哥哥七歲。她年紀太小，沒有注意到那些突如其來的不確定性。而她母親最困擾的事情——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地方可住——變成了莎莉習以為常的事，只不過是「要擔心的事情之一，就像早晨上學要準時一樣。」

但是對她母親來說，跌出從小享有的中產階級安逸穩當的生活，令人迷惑又痛苦。安開始跟桑迪坐下來談，把需求清單分為「想要」跟「需要」。她展開了她所謂的「今天的問題今天解決」，意思就是活在當下，弄清楚該怎麼付清眼前的房租、暖氣和食物。「活在當下的意思就是你只能花錢在你『需要』的東西上，你要一直去區分『想要』跟『需要』。」她觀察道。

等到她終於在那片新土地上站穩腳步之後，安完全想不起從前的富裕世界。「離婚之前，我們會去買書，就跟買雜貨一樣頻繁。」而現在，她補充道：「我已經想不起有洗碗機、跟有人來打掃家裡的生活是怎麼樣了，我再也不想起來了，不過我記得那給了我很多空閒時間。」對抗貧窮讓她很忙，但也調整了她的焦點，讓她發現健康生活所需的不仅是基本的食物、住所和衣服，還有一些無形的東西。「如果沒有同時滿足我們對藝術、音樂、目標或是某些超出眼前物質環境的需求，我們可能連撐都撐不下去，」她說。「我們不去愛或被愛也沒辦法撐下去，所以大部分人都找了替代品，就是那些我們手邊能接觸到的東西——酒精、電視、毒品、去沃爾瑪超市購物。」她發現，「我們變窮、變得很窮的時候，就得以有錢的時候更仔細地去思考，究竟什麼對我們的人生健康有益。」而那意味著，「親密而健康的關係，覺得不孤單，新鮮蔬菜，糖分不過多，每天運動三十分鐘。這些全都能讓我們保持健康，或者至少在我們不清楚下個月或明年自己會落腳何處之前，暫且先撐下去。」

安·布拉許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多少是因為漫無目的所致，使她空有才華，卻無技能。如果她的婚姻能夠維持下去的話，她的財務狀況本來還會不錯。她喜歡閱讀文學名著，聽巴哈的賦格曲；她陶醉於思考中，談話中帶著有條有理的智慧。身為白人，她沒遭遇過種族歧視，但是身為一名一六四年高中畢業的女性，即使有養尊處優的社經地位，家庭也不會自動提供權利意識或是職業目標給她。她的父母沒能克服美國社會的這一點失敗，也沒灌輸她工作是為了自給自足的價值觀。她父親是一名化學工程顧問，在康乃狄克州和麻薩諸塞州工作養活一家人，對女兒沒有太高的期望。

安念了一年大學就休學了。「我討厭大學，」她說。她做過一陣子百貨公司的採購助理。「我不是喜歡那份工作。」接著她在京都住了五年，教日本人英文，「那時我常常上髮廊、做美甲。」回

到美國以後，她在波士頓一家工程公司擔任旅遊顧問，並且嘗試想要回到大學校園。「但我沒有方向，」她坦承道。後來她嫁給一個自行創業的製圖員。

離婚後，每年她拿到約一萬美元的子女撫養費，還有兼差工作的收入——代課老師一天約賺五十美元，每周在大學做二十個小時的文書工作、登記遊艇、編輯醫學教科書和其他書籍，按件計酬，照頁數算錢。編輯工作很棒，她說：「不過去年我想我只賺了三千還是四千元吧。」自始至終，「我選擇以孩子為重，也就是說，我拒絕做任何會讓他們找不到我的工作。這讓很多人都很生氣，或者認為我很懶惰又不切實際；但子女撫養費足夠我養活孩子，我要不是得找房租很低的地方住，就是得把自己塞給我那個心不甘情不願的母親。」

安和她的孩子在她母親的房子裡住了將近四年，直到她母親從法國旅行回來，突然間決定要把房子賣掉，給安一個月的時間搬出去。「我的生活就這麼被粉碎了，」安說：「我被診斷出憂鬱症，去某個婦女中心尋求協助。」她母親提議要在一年半之內，每個月給她一點津貼，安算了一下，拒絕了這個餽贈。「我說：『請不要這麼做，因為那不會改變我們的長期財務狀況，只會讓桑迪那一年拿不到去念寄宿學校的獎學金，所以到頭來那不會真的幫到我們，只會害了桑迪。』」她擔心那筆小錢會把她推到邊陲地帶，讓她既付不起學費，又沒辦法完全擁有獲得援助的資格。

「寄宿學校」聽起來像是有錢人家的奢侈品，事實上也是如此；但是對安來說，那是一種逃避的手段，能避開她所居住的貧窮市鎮社區裡的劣等公立學校。她自身的成長經歷讓她明白，什麼是可能的、可以實現的、可以期望的，她遠比那些世世代代都貧窮的母親更有抱負。那些貧窮母親只繼承了弄懂什麼是不可能的、不可實現的、不可期望的能力。安的孩子很聰明，也很窮——這是要獲

得助學金的完美組合——而孩子的教育是安如此固執的核心原因。她試過送莎莉去當地的學校，接著又讓她退學、在家自學，就這樣過了好幾年，直到莎莉獲得聖保羅的全額獎學金為止，那是一家位於新罕布夏州的寄宿學校。桑迪念的也是私立學校，這對安的親戚來說很不合邏輯，他們批評她不負責任。「我姐說桑迪沒有權利去念私立學校，我也沒有權利做這種選擇，我們應該人家給什麼就接受什麼。」安回憶道：「所以那是一段很艱難的時期。」

安通過了大學水平考試計畫（College-Level Examination Program），取得了自己大學學位所需剩下的學分數，不過她缺錢的情況並沒有好轉，反而有操不完的心：焦慮該去哪裡找住的地方。除了空虛的飢餓感以外，大概沒有什麼比迫在眉睫的居住問題更令人覺得可怕了。冷冰冰的空虛感占據了原本應該溫暖的安心感，那些年裡，在安過得最糟糕的時候，她令人愉快的特質被焦慮勒緊，落入絕望的魔掌（總是對任何事都感到抱歉），她會緊握雙手說：「事情看起來真的很可怕。」或者說：「我不知道我們要住哪裡。」或者是更糟的：「我真的不想活了，我完全沒有希望，我覺得好累，我做不到。」

被她母親趕出門後的那一年，她和孩子借住在慷慨的朋友家裡，對朋友造成很多不方便，到最後安不願意再麻煩人家，開始找其他的地方住，然後變得越來越絕望。新罕布夏州在她所住的那一區的租金，就算找便宜點的，她還是付不起。然而她有一股傲氣，一種值得幫忙的氣質，讓人家想要幫她——經濟條件優渥的人肯定是受到她的博學所吸引，她的自省，還有她對孩子的全心奉獻。她的態度和興趣沒有辜負她落難前的社經階級，她的孩子說，他們很少被當作窮人。相反地，專業人士會把安當作同路人，某個可能與他們角色對換的人，只因為機運造化弄人才淪落至此，所以她的境遇與都市貧民窟裡的單身黑人女性非常不一樣。「我們無家可歸，不過我們總是可以得到某種方式的照

顧，」安說道。在她就讀的社區大學裡，一名教授跟他的妻子很照顧安，先是帶莎莉進入他們的俄羅斯東正教會，後來安也加入；最後提供了他們在佛蒙特州樹林裡一間空著的小屋給她，所以安找到了住處，也找到了社交團體，身體與心靈都有了避難所。

住在小屋中的生活艱難而純淨，屋子離主要道路有一英哩遠，還要沿著泥土路往上走約五分之一英哩。屋裡有個小廚房跟一間小浴室，屋內用水全靠重力加壓的幫浦，把水抽到二樓的一個水槽裡。屋外有間廁所，裡面有隻蜘蛛，他們恰如其分地將牠命名為夏綠蒂。冬天裡唯一能加溫的是一座柴火爐，夏天裡唯一能降溫的是一個老舊的木製冰櫃，裡面裝滿冰塊。他們每周的生活費支出是十二美元——以安的標準來說，這很貴。唯一的光源來自丙烷燈和教堂裡用剩的蜂蠟蠟燭，閱讀變得很傷安的眼力。另外，只要灰暗寂靜的冬天把水管給凍住了，她和莎莉就得使勁拉著五加侖的水桶，從井邊走五分之一英哩的路回來。「幸運的是很快就開始下雪了，」安說道。當時十三歲的莎莉，可以用雪橇來拉水桶。

他們在那裡接受了即時教育。「第一年冬天的時候，我們差點沒有木柴，」安說道：「我們不知道會用到多少木柴、也不知道要準備……後來桑迪把這事情寫在大學論文裡……他在寄宿學校過了第一年以後回來，我們度過了一個很棒的聖誕假期。我們看了一下，知道大概還剩兩周份量的木柴，

5 譯註：《夏綠蒂的網》（Charlotte's Web）是一本美國兒童文學作品，內容講述了一隻名叫夏綠蒂的蜘蛛和一隻豬之間的友誼。

桑迪要回學校了，莎莉跟我會待在那裡。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劈過柴，也不擅長這個，所以桑迪跟莎莉決定他們要劈柴。就在離小屋半英里遠的地方，在山丘下，有一大堆砍斷的木柴……於是桑迪跟莎莉就去把那些木柴從雪裡挖出來，桑迪劈柴，莎莉和我用雪橇把木柴拉上山丘，那夠我們一直用到三月。」後來教會有人給了他們另一堆木柴，「所以我們可以過完冬天了。」缺食物的時候，教會的會眾幫了他們。隔年的冬天，他們的事前準備就比較充分了。

在小屋裡，他們更常聊天，也更常閱讀。「不過在那裡很容易生病，我們都生病了。」所以將近兩年之後，他們設法找了一間有暖氣、有電力的公寓，只是租金太貴，一個月要五百到六百元。然後教會再度拯救了他們，在新罕布夏州的克萊蒙特有間廢棄的修道院，教會正想把一間格局很不方正的公寓作為訪客留宿處，他們告訴安，他們很歡迎她住在那裡，只要安替他們照顧訪客就可以了。這真是意外的驚喜，有熱的自來水可用，又暖又亮，還有定期訪客的陪伴。莎莉在上歌唱課程，也在一蔬果店打工，用來支付鋼琴伴奏的費用；桑迪也受吸引加入了教會，與斯特凡·索忍尼辛（也就是俄國作家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兒子成為朋友，並且變得對電腦很著迷（雖然安並沒有錢可以買那麼先進的東西培養他的興趣）。

安繼續從事兼職編輯工作，也替達特茅斯學院一個教授改考卷，賺點小錢。除了一萬八千美元的助學貸款以外，她還背負著卡債。後來教會決定放棄那間公寓，她只好搬走。隨著搬家日期逼近，她還找不到地方住，陷入恐慌之中。這一次，伸出援手的是教會的教區居民，這位教友問自己擁有一棟雙併屋的阿姨，願不願意把樓上以實惠的價格出租給安，那位阿姨同意每月收四百美元租金，於是安再一次找到了棲身之處。這種以教會為基礎的中產階級網絡，是大部分貧窮的美國人無法接觸

到的。安不喜歡新住處的花俏壁紙，也不喜歡風格混雜不一的家具，那些大多都是人家不要或是用過的，不過其中有幾件物品有其意義。「那張小凳子其實是我們的，上面有亂針刺繡面料，」她說道。「抽屜裡的銀器是我的。」那是家傳銀器，是她僅存的、與如今已經枯萎的根源的一點連結。

安在新英格蘭大學出版社找到一份全職工作，擔任文字編輯，這是一家小型學術出版社，給她的年薪是兩萬三千六百美元，含健康保險。她熱愛這份工作，但這並沒有替她開闢財務安全之道，龐大的債務令她手頭拮据。桑迪的子女扶養費在他滿十八歲之後也會終止，她的新牙醫給付每年最高限額是一千美元，不夠支付她需要的大整修，那是多年拖延就醫的結果。

不過她在孩子身上的投資開始有了回報，他們兩個人都很努力，整個夏天都在教堂工作，在各自有興趣的領域發揮才華：寫電腦程式和演唱歌劇。桑迪是個身材高瘦且省話的年輕人，在學術能力測驗中，數學拿了八百分，語文七百多分，他申請的達特茅斯學院、安默斯特學院、威廉姆斯學院、卡爾頓大學，每間學校都給了他全額助學金。兩個孩子都能從容地應付缺錢的狀況，優雅地作出犧牲。桑迪在達特茅斯學院的時候沒錢去聽爵士音樂會或看電影，他也盡量不訂外賣，雖然他的信用卡確實已經欠了不少錢。莎莉在預科學校的時候，會跟朋友去買衣服，她自己不買，只在試衣間裡變裝——假扮、演戲。聖保羅學校給她的那一點零用錢，她用來買比薩給自己和其他人吃，又或者她會在樹林裡散步，摘下一束束的野花送給朋友。「他們給我的是我買不起的東西，」她說：「而我給他們的是他們不會給自己的東西。」

桑迪在大學裡交到了好朋友，他克服了害羞，和達特茅斯院校友會裡的企業老闆搭上線，在舊金山一家軟體公司找到一份暑期打工，薪水高得令人難以置信，每個月有三千七百五十美元。他即將

動身去上班，這個六月的午後，他與母親和妹妹坐在漢諾威酒店的露台上，俯瞰著達特茅斯的綠意。這也許是安的滿足時刻，她正看著她的孩子開始踏入她希望的那種成年，而且是她奮力讓這一切變成可能；但是當時她並沒有特別替自己感到驕傲，因為她才剛違背自己的道德原則，宣布破產。她的卡債一筆勾銷了，不過助學貸款還是要還，按照法律不可免除。對安來說，這筆債務如此沉重，所以她很擔心她的孩子到最後也會被他們自己的助學貸款弄到一樣的下場。她一直這麼擔憂而絕望，她的孩子看起來也真的很擔心。「我已經沒感覺了，」她說道：「我什麼也不在乎了。」

「我會有工作的。」桑迪主動說道。

「妳以前照顧我們，」莎莉說：「現在是時候換我們照顧妳了——等我去了大都會歌劇院！」大家笑了起來，安說：「等妳打掃好妳的房間以後吧！」

畢業之後，桑迪原本可以回到矽谷工作，領取豐厚的薪水；但是他跟家人、朋友和教會的親近關係，讓他留在新罕布夏州，與母親同住，在佛蒙特州諾威奇一間旅行社擔任系統管理員。他的起薪是一年四萬美元，比他母親收入最好的時候還多了一倍半，他也開始償還他從達特茅斯學院畢業時跟文憑一起拿到的債務：高利率的信用卡債大約一萬到一萬兩千美元，還有低利率的助學貸款兩萬美元。

莎莉進入新英格蘭音樂學院的時候，她獲得了獎學金跟助學貸款，不過這還不夠付學費，差額是當地一對夫妻貢獻的。某年夏天，他們看到報紙報導莎莉正在籌錢好去壇格場音樂節（Tanglewood）學習，大受鼓舞，於是他們幫忙送她去了壇格場，後來又幫她進了音樂學院，還替安墊錢，讓她還清了學生貸款，安一家是大家喜歡幫助的那種人。

安不欣賞親戚的價值觀，他們也不欣賞她的價值觀。安整天都想著錢，因為她沒錢；他們也整天

都想著錢，因為他們錢多。她看到自己努力遵守的道德指南針有多麼容易偏離方向，所以她很失望地看著母親到了晚年，被那些負責照顧她的人送進比較便宜、品質低落的老人安養院。那裡的看護只叫她「親愛的」和「甜心」，因為他們從來不記得她的名字。安花了很多時間去看她母親，跟她重新建立關係，為了母親必須留在那裡而覺得悲傷困惑。「我回頭檢視我自己，我一定有什麼問題，才會跟別人不一樣。」安說道：「我確實不一樣，我不重視他們看重的事情。我很害怕那些我不明白卻實際發生的事，比如拿別人的福祉去交換金錢是不對的，尤其是那些你對他們有責任的人。」

儘管對自己有所懷疑，安依然真心相信她所選擇的路。「我們已經過了十幾年沒錢的日子，有段時間連房子也沒有，」她說道：「雖然這聽起來很可怕，也似乎是個很奇怪的選擇，但我還是做了決定。我們都做了決定，而且是以健康的方式，更因為這些抉擇讓我們自己成為了更好的人。如果我忽略孩子，每周工作七十個小時好付房租，然後住在貧窮的社區裡，生活會更糟。我知道沒錢是怎麼一回事，知道無法擁有物質生活是怎麼一回事；但那都不比有一點錢，卻沒有時間陪你生命中重要的人來得糟糕。」

第八章 身體與心靈

Chapter8

大部分的時間，我都以社工的身分工作，
與社會福利制度奮戰，讓大家可以有房子可住。

——葛蘭·弗洛勒斯，小兒科醫生

在預算緊縮時，食物是少數幾項有彈性的項目。房租是固定數目，車貸不能不繳，電費跟基本的電話費也不能削減；但是一個家庭花在食物上的金額是有彈性的，可以減少或增加，以符合付完前述那些帳單之後所剩下的金額，結果就是，美國出現了一堆營養不良的兒童。

黛博拉·法蘭克醫生看過一些兒童，嬰兒骨瘦如柴，看起來就像個乾癟的老頭；無精打采的學步小孩，體重只有正常值的三分之二；瘦巴巴的男孩，抵抗不了感染。他們會到波士頓醫療中心五樓的門診治療中心去，醫生每星期兩次在這裡看發展遲緩門診。

這些皮包骨的面孔並不是饑荒所導致，但他們是一扇扇絕望的窗戶，讓人看到摧殘著美國窮人的種種苦難。因為食物的花費是不固定的，很容易就會屈服在其他沒得商量的開支之下，尤其房屋的花費往往會占掉貧窮家庭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五。「如果能有更多的住宅補貼，挨餓的人就會比較少，」法蘭克醫生說道。如果可以多發一點食物券，如果高營養的嬰兒處方奶粉可以便宜一點，如果市內的商店多進一些新鮮水果和蔬菜，如果幼兒園提供像樣的餐飲和點心，如果家庭可以負擔得起過敏兒的多樣化食物，如果新移民不會受到垃圾食物廣告的誘惑，如果母親可以親自哺乳而不必去工作，如果雙親都得工作的孩子不會一直被換保姆照顧，如果做父母的知道該怎麼讓孩子安靜坐下來吃飯，如果生活在底層的人們不要那麼憂鬱，那麼，挨餓的人就會少得多了。治療營養不良的門診面臨著種種衝突，而大部分都不是醫生能夠解決的。這就是為什麼法蘭克醫生和其他治療兒童「發育遲緩」的人，想把營養師、社工、心理學家和小兒科醫生組成團隊的原因。他們可以帶來改變，不過一次只能看一名病患。

星期三早上，候診室裡擠滿了家長和孩子，黛博拉·法蘭克大步走進來。她背著紅色背包，身穿

彩色工作服，看起來就像個幼兒園老師。她戴眼鏡，灰色頭髮剪得短短的，不打官腔，也不講廢話，很快進入工作，以嚴肅而溫和的能力指揮她的員工。她有些苦惱又非常專注，對病患坦率而友善，但對於造成孩子來看病的那些情況，則顯得快要生起氣來。

她名單上的第一位病患胡安·莫拉雷斯，瘦得令人怵目驚心，出生時五點五磅重，七個月以來不斷消瘦，他現在的體重只有十二磅，一吃就吐。他的右手沒辦法完全張開，畸形的右手臂需要動手術。不過，他營養不良的虛弱身體禁不起手術，他的家庭也沒有能力幫他。他父親在監獄裡，未來將會被驅逐出境，他母親沒了丈夫工作賺錢，付不起房租，被趕到不供餐的收容中心去了。

「這是個病懨懨的小蘿蔔頭，」法蘭克醫生說道。她安排了許多實驗室測試，營養師給他母親昂貴的配方奶粉——紐康特（Nutrena），一盎司有二十六卡路里的熱量（一般奶粉只有二十卡路里）。社工開始著手尋找政府援助，胡安在美國出生，身為美國公民，他有資格接受援助。除了緊急醫療津貼以外，所有對非法移民的援助都終止了，所以儘管龐大的社會、經濟、身體疾病問題讓胡安來到波士頓醫療中心，這些專業人士卻只能處理他的病症。

接著是杰奎安·奧里佛——畢格比，這個嬰兒看起來就像個小老頭，連臉頰都凹下去了，這個警訊讓家人趕緊把他帶來看醫生。「臉上的脂肪是最後才會消失的，」法蘭克醫生解釋道：「這就是為什麼大家常常沒注意到小孩營養不良，因為他們把孩子包得緊緊的，只看到圓圓的臉蛋，沒看到瘦巴巴的身體。所以只有在孩子臉上的脂肪開始消失時，大家才會開始憂慮。」

杰奎安和其他小孩接受門診的重症治療，模式是先看營養師，再看小兒科醫生，最後是社工，整個過程從走廊裡端開始，杰奎安由個案社工測量體重身高，然後把這些令人沮喪的數據輸入筆記型電

腦，他瘦了六盎司，只剩九磅四盎司重，同年齡男孩的正常體重是十四磅十盎司，他只有人家的百分之六十三。他和他的父母親接著被帶進一間診療室裡，由營養師瑪麗·席爾瓦招呼他們。她已經在兩天前去過他們家裡，仔細詢問他的餵養問題，試著按描述的時間順序，拼湊出他服用了多少高卡路里配方奶粉；他母親講得很含糊，就像許多不確定孩子吃了多少東西的父母一樣。

「星期二有吐嗎？」席爾瓦問道。

「一點點。」他母親嘉瑰塔·奧里佛說道。席爾瓦問他上床之前幾點餵他配方奶粉？奧里佛支支吾吾，最後給了一個不確定的答案。席爾瓦接著又問，那之前呢？還有再之前呢？以及再之前的之前是什麼時候？奧里佛只能用猜的。營養師看到公寓裡擺著還剩一半的奶瓶，所以她建議每次少餵一點，但多餵幾次。「這或許可以幫助他安靜下來。」

接著席爾瓦碰巧問了那個關鍵的問題，一個治療營養不良的慣例問題：「妳有過敏嗎？」奧里佛說沒有。如果做父親的沒有坐在檢查室角落裡的話，原本這個話題也許會到此結束，他是個笑容可掬的男人，名叫傑佛瑞·畢格比，是名卡車司機，一小時賺六美元多。他跟奧里佛沒有結婚，不過很關心自己的兒子。過敏通常是家族遺傳，畢格比提供了線索，他說他對香蕉、蘋果、橘子過敏，還有花粉、貓毛、狗毛。「我還是嬰兒的時候有支氣管氣喘。」席爾瓦很憤怒的做筆記——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雙親都要參與有多麼重要。

接著是小兒科醫生，法蘭克醫生憂心忡忡地帶著這名嬰兒的數據圖表走進來。「他的體重真的很危險，」她告訴他的父母：「我覺得他可能得待在醫院比較好。你們幾乎每天都在跑門診，他可能很快就會生病了。」她檢查了男孩的反射能力，讓他趴著，看看他能不能把自己撐起來。他可以，不過

很勉強；她也讓他站起來，看看雙腿能不能支撐身體。「他不太強壯，對吧？」她問道。他的父母什麼話也沒有說。

所以小杰奎安被留在醫院裡，檢驗結果顯示，他對美強生 (Ertanil) 的奶粉有不耐症，而這是這個家庭從 W I C，也就是聯邦政府提供給婦女、嬰兒和孩童的營養補給計畫中，唯一能夠取得的配方奶粉。在住院的六天裡，他增重了整整一磅。「這個孩子要是沒有食物過敏，也許就不會發育遲緩，」醫生下結論道。「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他的家境比較好，就算有過敏，他也不必靠 W I C 提供的唯一配方奶粉。現在，透過寫信之類的，我們讓 W I C 提供其他種類的配方奶粉了。」更貴的哺力美 (Pegastanil) 「是一種高水解配方奶粉，」她說道：「蛋白質都分解了，所以比較不會引起過敏。」依規定，發展遲緩門診可以免費提供每個家庭一些高卡路里配方奶粉以及其他的食物，再加上十美元的超市禮券和往返醫療中心的計程車券。除此之外，杰奎安和其他孩子每次檢查的總費用（包括花費的時間、精力以及員工薪水和設備），每名病患應支付醫院數百美元，但杰奎安父親的保險只支付四十美元。醫院貢獻設備，而醫院六十萬美元的龐大年度預算中，許多是由募款而來：個人捐款、私立基金會捐款，還有麻薩諸塞州公共衛生部每年撥款。

波士頓是個頗為富裕的城市，但是也有很多窮人。麻薩諸塞州相對於其他地區而言，是很開明的一個州。營養不良的孩子在這個國家比較沒那麼富裕的地方，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協作良好的專業執行團隊也愛莫能助；即使在波士頓，如果父母不能或不願意跟發展遲緩門診完全配合，那就跟在密西西比鄉下沒有兩樣。

比如唐納德就無法得到全面的幫助，因為他的母親沒辦法遵守門診的指示，仔細監督餵食這個男孩。她那不講理的老闆不讓她下班，所以她不得不把兒子送到一個姨婆那裡去，而這個姨婆似乎聽不進醫護人員的建議。唐納德很瘦小，看起來只有實際年齡的一半大，體重也增加得很慢，醫護人員悲觀的預測，他會是一個「終身囚犯」(Herb)，也就是一輩子都趕不上同齡應有水準的孩子。在這個案例中，小兒科醫生如果能打通電話給雇主，或許會有幫助，但是沒有人想到要這麼做。

很少有醫生會想到要這麼做，不過約書亞·沙弗斯是個例外。在他短短的職業生涯中，這名年輕的小兒科醫生已經打過電話給十幾名雇主。某天他看到一個嚴重起疹子的嬰兒，「我跟她母親說，她星期一需要來複診，」他說：「那個媽媽哭了起來，說她再請假就要沒工作了。」隔天早上，約書亞打電話給她老闆，也是個醫生，「跟他談論那名女孩需要後續治療的事情，談了很久。」他不必提到保住工作的需要，「我一提到治療的情況，他就說他完全了解到醫院的後續治療對她來說有多重要。」約書亞說：「我覺得他不會懲罰她，事實也的確如此，那個媽媽很感激地打電話給我，說她不會沒工作了。」

小孩會發育遲緩，常是因為父母沒辦法遵守醫囑。有個剛從越南來的母親，被廣告嚴重誤導，醫生開的雅培小安素(PediaSure)營養配方奶粉喝完後，她用可口可樂跟百事可樂替代。「我跟她說可口可樂跟百事可樂是騙人的東西，那些氣泡會讓他們沒胃口，」法蘭克醫生說。「如果勸她不要買會怎麼樣呢？她說她不一定買，反正家裡沒有別的小孩。那就加一罐小安素吧。這就是本周的介入成果。」

「介入」是個關鍵詞，在緊要關頭，這些專業人士只能推薦、敦促、介入，把一個家庭的行為逐步推向不同的方向。這種介入對於剛到美國、一頭栽進不熟悉垃圾食物環境的人來說，結果格外不確定，英文能力不足也可能導致他們漏掉好建議。「我有個經典故事，有個移民家庭，營養師花了大概整整半個小時吧，跟他們解釋不應該餵嬰兒吃洋芋片，因為嬰兒可能會噎到，也會變得沒胃口，洋芋片沒什麼營養價值。」醫生說道：「我們以為他們聽懂了，結果下一次他們回來的時候，很驕傲地拿起一包東西說，看，不餵洋芋片了，但他們拿的是起司餅乾……這些人如果在自己的家鄉，大概能在市場裡好好購物，購買自己家鄉的傳統食物，但是他們在這個國家裡毫無頭緒。」

有些美國人也是如此，他們也會犯錯，用汽水、洋芋片和果汁餵飽孩子。這些東西沒什麼營養，而且會讓孩子覺得很飽，沒有胃口吃好的食物。法蘭克醫生和她的團隊一直在對抗這個問題，通常是「年輕的媽媽、跟自己的母親和許多其他年紀比較小的兄弟姐妹同住，」她說：「小嬰兒會崇拜大孩子，大孩子在喝汽水，小嬰兒湊過去看，他們就把汽水給小嬰兒喝，大家會笑著拍手說：『看看這個，就像大人一樣呢。』」這種症狀也許不是收入不足直接造成的，但是在破碎的家庭和缺乏知識的家庭中卻很常見，而這往往也是低收入家庭的標誌。

有一位年輕的美國白人母親出現在巴爾的摩的門診部，她不知道該怎麼炒蛋，營養師只好教她。貝琪·詹特斯和布蘭達·聖羅倫斯在新罕布夏州固定家訪的那些家庭，似乎對於怎麼製作基本的健康食物很不熟悉，這兩位照顧者的對話說明了這一點：

貝琪：「詢問過後我發現，有些小孩不知道什麼是水果。」

布蘭達：「他們沒有吃水果跟蔬菜。我照顧的這些孩子都沒有蔬果可吃。」

貝琪：「他們吃很多熱狗。」

布蘭達：「對，熱狗，還有波隆那香腸。」

貝琪：「我們觀察到他們圖得是方便。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從哪裡學來這些的。他們不知道怎麼削蘿蔔，也不會煮。」

布蘭達：「他們也不想知道。」

貝琪：「對，他們不想，因為那實在太麻煩了。」

布蘭達：「我給某一家人社會救助提供的五十磅馬鈴薯，只要填他們的名字就能免費取得。但妳知道嗎，那些馬鈴薯都放到腐爛了，他們不想削皮，因為太麻煩了。」

很明顯的，這不只是錢的問題，因為新鮮蔬果比熱狗和其他的加工食物便宜。財務狀況在家長沒有能力提供足夠營養的問題上，只扮演潛伏的角色。有些惡房東不肯更換故障的冰箱，冰箱溫度不夠低，不能冰牛奶；有些家庭擠在共用公寓裡，只有一個冰箱，住戶還會偷別人的食物；另外，有需要的人往往會被政府的官僚制度給嚇到，那些不再領取社會救助金的人，常常誤以為他們沒資格再領食物券，儘管在某些州這些家庭還是可以領取，而且就算他們的收入達到官方貧窮線的兩倍也一樣。

許多合法移民遲遲不願接受食物券或醫療補助，也不接受兒童健康保險計畫的幫忙，即使他們有資格接受，因為他們擔心會被認為是「花政府錢的人」，還可能因此得不到永久居留權，也無法取得公民身分。根據柯林頓所發布的行政命令，只有現金救濟，像是社會救助金支票或是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才會對移民造成這方面的不利，食物券跟健康保險都不包括在內。但是這其中的差別，不論是

移民或移民官都不太了解。

福利改革也對食物預算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尤其是「家庭福利封頂政策」(family cap)，禁止母親在領取社會救助金期間、或是在之後一段時間內生下的小孩領取福利。法蘭克醫生的發展遲緩門診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營養不良的小孩(與他們的兄弟姐妹)出自於家庭福利封頂政策。此外，儘管醫生認為母乳最健康，要工作的母親卻沒辦法全天候供應母乳，那得用吸乳器；但是除非小孩住院了，醫療補助通常不會支付這筆費用。

成為營養不良的孩子的父母親，是貧窮最痛苦的代價。餵養孩子是最親密的責任，最貼近為人父母的心理義務，其他的必需品感覺比較無法控制，比如即使是最節儉的母親也沒辦法降低房租，不過要是她沒錢買足夠的食物，她常會怪自己管理不當。因此，在一長串屢次的失敗之後——學校、工作、人際關係——無力養育孩子似乎是個關鍵的最終失敗。

許多父母因為孩子所面臨的困境，感到尷尬、丟臉，成了營養不良門診的敏感客戶，防備心強，很容易被惹惱，多莉絲的父母就是如此。她是波士頓門診中心當大唯一的白人小孩，他們很年輕，兩個人都在一家三明治店兼職。他們不讓家訪員去家裡，也不肯記錄多莉絲的食物攝取狀況，醫護人員發現他們排斥建議。營養師瑪麗·席爾瓦認為，這名小女孩在這種狀況下體重還能增加，唯一的原因就是她從門診中心食物儲藏室裡免費得到的「燃料配方奶粉」(jet fuel formula)。

多莉絲六個月大，體重是同年齡孩子平均體重的百分之八十九，算是恢復得很好，她被轉介來這個門診中心時，只有平均體重的百分之七十三；而她的發展測驗顯示出嚴重的發展遲緩。「她沒有按照應有的進度發展，」席爾瓦說道：「她不會坐著，沒有做到她現階段年齡應該做到的認知。」負責

她的心理學家葛蘭特說，有個補救方法是給她各種好玩具，不過她懷疑那對父母沒辦法也沒興趣買這種玩具，那個母親說發展測驗是「一堆胡說八道」。

但這對父母還是在乎的，一次又一次地帶多莉絲來看病。這個母親把淺棕色的頭髮縮成一個簡單的髮髻，手上有九根手指頭戴著戒指；父親的左耳有個耳扣，兩隻手臂都有刺青：一邊是一條纏繞在刀上的蛇，上面寫著「戰俘」，左手四根手指頭上的字母，拼在一起是「HATE」（恨）。

席爾瓦要看這位母親做的食物紀錄，但她不願意；席爾瓦問孩子一天喝幾瓶奶，母親不知道，父親猜是八或九瓶；席爾瓦懷疑孩子吸吮不協調，有些嬰兒身上會出現這種神經系統問題，所以她仔細詢問了多莉絲的餵食和嘔吐的情況，但她得到的答案都很模糊，好像這對父母不願意透露任何會暗示他們失敗的資訊。

因此席爾瓦試著找方法讚美他們，「她一個月體重就增加了兩磅，」這名營養師問：「你們開心嗎？」

「開心啊。」母親說。

「你們覺不覺得，泡了這麼多瓶奶粉，做了這麼多事情，總算有回報了？」

「是啊。」

「我們繼續用同樣的配方奶粉，」席爾瓦說：「繼續餵麥片，一天兩次就好，如果她想吃三次也可以。你們想餵她一點水果嗎？」

「好啊。」

「你們想要哪一種？只能拿一種嗜，所以得想清楚再選。」

「蘋果泥？」

「沒問題，好的。」如果多莉絲出現起疹子的反應，就停一天再試其他的水果，席爾瓦建議道。

接著她問這對父母有沒有什麼問題，這位陰鬱的母親搖搖頭。「有沒有什麼讓你們擔心的事情？」她又搖搖頭。「確定嗎？」她點點頭。

席爾瓦離開房間之後，這名母親讀起心理學家針對多莉絲發展遲緩所寫的兩頁報告，讀到懷孕期間「僅攝取少量酒精」的字眼，她憤怒地把報告「啪」地一聲扔下。這些資訊來自於她的就醫紀錄。

「他們搞錯了，」她怒氣沖沖地說著：「懷孕的時候我根本連一滴酒都沒碰。」

階級、文化和語言，在病患與醫生之間形成障礙，沒錢也沒受過多少教育的窮忙族向上仰望，看到的是冷淡機構裡的白袍和閃閃發亮的器具、聽不懂的詞彙和高高在上的態度。這種焦慮反應在黑人身上更加強烈：聯邦政府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七二年間，為了進行塔斯基吉（Tuskegee）梅毒試驗，曾經拒絕為三百九十九名感染梅毒的貧窮黑人男性提供治療。

二〇〇一年，這種疑慮再度加深了。有兩個裝有炭疽桿菌的信封透過布倫特伍德的郵政系統寄出，而政府卻拖延、不為華盛頓特區一千七百名郵局員工提供治療，在那裡工作的大多數是黑人。信件抵達國會山莊時，公共衛生官員迅速動了起來，疏散國會辦公室，對員工進行檢驗，並且給予抗生素；但是郵局卻沒有立刻關閉，那裡的工人也沒有接受檢驗或治療，直到有兩人死亡。其中一名死者還曾經被他所屬的健康維護組織拒絕，不願意給他抗生素。

現實的不公平會讓人產生許多幻想，在非裔美國人的傳說中，充斥著醫生拿黑人做實驗的故事：

綁架他們、取走器官，抽乾他們的血來入藥。即使這類故事不會有人當真，還是替不信任和憎恨的背景做了鋪陳，而且被用來教訓孩子。發展遲緩門診裡有個非裔美國男孩沒有玩具可玩，他想替圖畫上色，但是他的母親沒有帶蠟筆，所以他開始拿檢查室裡的東西來當作玩具。他在桌子上爬上爬下，撥弄著一個大型垃圾桶的蓋子。「你想被抓去打針嗎？」他的母親恐嚇道：「要醫生給你打針嗎？壞東西！放下來！」於是那個男孩跑到窗戶旁邊的窗簾那裡，把窗簾拉過來躲在後面。「醫生會給你打針！要你給你打針嗎？」

就算不打針，醫生也可能給人難堪。「對於拉美人來說，他們很強調 *respeto*，意思是『尊重』；還有 *familismo*，意思是『宿命論』。」葛蘭·弗洛雷斯醫生說道。他是波士頓醫療中心拉美裔小兒科門診的共同主任。在拉美裔家長和「美國這些不堪其擾、匆匆忙忙的醫護人員」之間，很容易產生文化衝突。他說：「如果你覺得你受到輕視，你就不會配合治療，也不會回來複診，而那會影響你的健康。」宿命論則是認為：「一項研究顯示，拉美裔容易罹患癌症是上帝的旨意，人無能為力。」他說道。「他們大概不會那麼常做篩檢，也不會遵守治療指導，來就醫的時候都已經是末期了。」

語言也會產生分歧，有時候那很危險。透過口譯員錄下醫生與病患之間的對話，弗洛雷斯醫生從中發現了嚴重的錯誤。「尤其當你只是帶著兄弟姐妹來翻譯，或者是從候診室裡隨便抓一個人，或是找監護人來翻譯的話。」有位小兒科醫生在治療一個小孩的耳朵感染時，指示母親口服液體抗生素，但沒受過訓練的口譯卻告訴她要把藥滴進耳朵裡。幸好這麼做不會產生負面影響，但也不會有療效。受過訓練的譯者可以把握誤解降到最低，「是時候該透過醫療補助來報銷口譯服務費用了。」弗洛雷斯醫生這麼認為。他和其他醫生相信，如果語言、文化、飢餓和照顧的問題能夠解決的話，許多住院治

療，尤其是氣喘、糖尿病和某些腎臟感染，其實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病患能夠負擔醫藥費，按照醫囑服用，並且回來複診的話。

在營養不良的案例中，貧窮並非總是唯一的原因，不過卻會讓痛苦加劇。營養師認為學步中的小孩一天應該要吃六餐——三頓正餐、三頓零食——但是破碎的家庭做不到：多名照顧者沒辦法記清楚時間、家裡可能沒有健康的零食、年長的兄弟姐妹可能會獨占家裡能吃的東西、單親媽媽的工作時間不規律，到處籌錢，還得面對社區裡的毒品與犯罪危險，可能沒有耐心或精力去創造出一個有利營養的氛圍。波士頓一名瘦巴巴的小孩就吃了苦頭，因為家裡有五個兄弟姐妹，「其他小孩搶得飛快，」營養師蜜雪兒·特克特說道：「吃飯時間到了，他們把食物都吃光了，什麼都不剩……在有點混亂的家庭中，有時候你要教導母親必須留意那些長不高的小孩。」瑪麗·席爾瓦治療過兩名孩子，他們抱怨肚子餓，可是他們的母親卻沒有在聽。她是一名超市員工，患有憂鬱症，導致她沒有注意到孩子的需求。

「每個家庭都有壓力來源，但是壓力不會讓經濟無虞的家庭出現發育遲緩的問題，」法蘭克醫生說道：「當然假如是嚴重的壓力來源，比如精神憂鬱的父母，或者是孩子有很嚴重的健康問題，即便經濟無虞，孩子也可能會發育遲緩。但倘若持續下去，這些問題不見得會壓垮經濟無虞的家庭，卻有可能會壓垮貧窮的家庭，成為一場災難。」

「營養師去家訪，發現找不到地方給小孩坐著吃飯，」醫生繼續說：「小孩站在大人的椅子上，靠著牆壁，想從大人的桌上吃東西；或者根本沒有半張桌子，小孩坐在地板中間鋪的一張報紙上；又或者媽媽用同一支湯匙餵三個孩子。」發展遲緩門診有時候會發放高腳椅給買不起的家庭。

在巴爾的摩這個極度貧窮的城市，馬里蘭大學的發展遲緩門診，已經沒有足夠的人手去家訪，每年兩萬美元的兼職社工費用從預算裡消失了，所以病患家中的情況只能由醫師透過仔細詢問來了解。

這就是莫林·布萊克問診的目標。她是一名心理學家，負責管理馬里蘭大學兒童醫院一樓的門診。她跟一名十九歲大的女性坐在檢查室裡，這名女性已經有三個孩子，其中一名三歲又四個月大的男孩體重只有二十二點五磅。他在過去的一個月裡，體重也只增加了兩盎司。

由於門診中心預算被削減，唯一能進行家訪的只有兒童保護服務局，但是他們只看基本狀況，不會留意細節。個案社工的報告在門診檔案裡：房屋骯髒但食物充足，但沒有提到餵養技巧。小孩剛從寄養家庭回到家中，他們因為母親吸毒而被安置，現在她在麥當勞工作，賺的只比最低工資多一點，加上每個月七十二美元的食物券。她工作的時候，她的母親會照顧孩子，男朋友也會幫忙，他看起來大約十六歲，頭上綁著一條藍色的印花頭巾，穿著鬆垮的牛仔褲，鼻子上打了鼻環，還穿了一件迷彩夾克。對話是這樣進行的：

心理學家：「巴瑞吃飯的時候坐在哪裡？」

母親：「他坐在地板上。」

男友：「我會跟他一起坐在那裡。」

心理學家：「他會在那裡坐很久嗎？」

母親：「有時候會。」

心理學家：「巴瑞的年紀應該要可以自己吃飯了，妳女兒在哪裡吃飯？」

母親：「在地板上。」

心理學家：「那妳吃飯的時候坐在哪裡？」

母親：「坐在床邊，邊看電視。」

心理學家：「你們有桌子嗎？」

母親：「有。」

心理學家：「要怎麼樣你們吃飯的時候才能不看電視？你覺得為什麼我們不希望小孩吃飯的時候電視開著？」

母親：「因為他們就會光看電視，不吃飯。」

心理學家是白人，這名母親是黑人，很難判斷這位母親會怎麼看待這個帶點批判意味的訓話。心理學家力勸她讓小孩在用餐時間更有規矩一點，提議門診中心或許可以買一張兒童增高座椅給她兒子。不過她自己家裡的椅子也遠遠不夠，所以她得多買幾張，才能讓全家人坐在一起。

「如果他專心看電視，就不會專心吃飯了。」布萊克醫生解釋道：「我不希望他在那裡坐上兩個小時。吃飯的時候不要看電視，家裡其他人會怎麼樣？」

這個母親笑了，她看了一眼男友，他正在跟巴瑞玩可愛的手部遊戲，他說其他小孩大概會鬧脾氣。

「在你們家裡誰比較大？」布萊克醫生問道。

「我比較大。」這位母親說道。

「那妳可以作主，說要吃完飯才能繼續看電視。」心理學家哄著她，「妳可以立下規矩，妳覺得有可能試試看嗎？」

「我會試試看。」這名母親順從地回答道。

「告訴我妳要怎麼試。」

於是就像在教室裡面背書一樣，這名母親給出了所需的答案：她會下樓吃晚餐，之後再上樓看電視。布萊克醫生不只是在指導，她也在試著讓一位可能感到無助的年輕女性擁有力量。「第一次聽到時他們一定會抱怨，」她問這個母親：「妳要怎麼辦？」

男友回答：「就讓他們抱怨啊。」

「妳會大吼大叫嗎？」心理學家問道。

「不行啦，」男友說：「他們會嚇到。」

「妳覺得你們可以試試看嗎？」

「我們會試試看的。」這個母親承諾道。那樣很不錯，讓孩子「在餐桌吃飯，不要大吼大叫，」她說。但她有點悲傷地補了這麼一句，「我又得去學校從頭學起了。」或許她的意思只是說她又得再受教育，這一次得學著怎麼當父母；又或許是她想起不受老師認可的糟糕感覺。

莫林·布萊克的門診花了不少精力在父母與營養不良的孩子的互動上。孩子吃得不夠時，做父母的會變得焦慮、生氣，產生防禦心理；用餐時間在孩子心中就變得只剩痛苦，向下的惡性循環衝突發生得又猛又急。正如錄影帶裡所看到的，在每個家庭第一次門診時，房間裡會架起攝影機、端進食物，只留下這家人餵小孩。「你會看到各種驚人的行為，」布萊克醫生說道：「有的母親會打孩子巴

掌，咒罵孩子、不理孩子、懇求孩子，或者對孩子的需求無微不至。」接著會播放錄影帶給他們看，醫護人員會從中找一些事情來稱讚他們。但是心理學家發現，許多父母會被自己的行為嚇到。「我遇過看到哭出來的人。」

有段錄到一位母親毀掉本來可以吃得很成功的一餐，她的小女兒凱西坐在高度到下巴的餐桌旁，這位母親坐在那裡邊吃比薩邊下指令：「快吃噎。」凱西伸手拿了一塊比薩，好好地吃了起來，接著掉了一小塊。「不行！」她母親責罵道：「搞得亂七八糟！好好吃！」但是凱西是在吃沒錯，右手拿著空空如也的湯匙，另一手拿著比薩，但她沒得到讚美，只有斥責。她伸手去拿一盒巧克力牛奶，而那本來應該在飯後喝，所以她母親怒氣沖沖地說：「不行！要吃東西！」於是她伸手又拿了另一塊比薩。第一塊還沒吃完，所以她母親吼道：「不行！吃另外一塊！」

從頭到尾，凱西一直安安靜靜、開開心心地吃東西。不過一再責備終究還是太過頭了，現在她哭了起來。這名母親試圖想要挽回局面，又遞給她女兒兩塊比薩。但是太遲了，這番摩擦已經使得用餐時間變成一種痛苦。凱西處於混亂狀態，她母親只能夠說：「凱西，噓！噓！安靜！」凱西跑出鏡頭外，她的母親跟了上去，接著是一個巴掌聲，然後是小女孩的尖叫聲。那名母親大吼著：「凱西！別哭了，安靜！」

在後面一段裡，這位母親採取了不同的策略：袖手旁觀。凱西用湯匙舀起司通心粉，吹一吹，然後用左手吃掉大部分的東西。實際上，因為一邊吃一邊拿著湯匙，她嘴裡沒吃到多少通心粉。湯匙也很難握，裡面空空的，變成像是玩具而非餐具。她舔了舔湯匙，然後咬了起來，她母親只會說「吃妳的食物」。凱西又在湯匙上堆了很多食物，但她的嘴巴吃不了那麼多，於是她用左手拿起一塊通心

粉，其他的全都掉回碗裡。如果她母親能注意到發生的一切，奮力的小女孩應該能得到母親的協助，但顯然她母親只是坐在那裡看，卻沒有留心。到最後凱西伸手去拿一盒巧克力牛奶，她母親幫她把吸管插進去。

另一名母親出現在鏡頭裡，門診中心把她標記為「威權專制」，她一邊用令人不快的聲音跟她的中小孩說話，一邊用湯匙戳向他，「吃你的食物！現在！馬上吃掉！」她把湯匙遞給小孩，而他只顧拿著玩。她粗魯地搶走湯匙，小男孩扭動身體離開了椅子，她抓住他的雙手手腕，用力拽著他的手臂、高舉過頭，把他拉回椅子上。她打他的手，他哭了起來，接著她想把一湯匙的食物硬塞進他嘴裡，害他哀嚎，哭聲令人毛骨悚然。

「我才不管你喜不喜歡！給我吃下去！」這名母親嚴厲地說著。她打了他的臉頰，一次又一次地拚命把湯匙塞進他嘴裡；每一次他都把頭轉開，於是她一手抓住他的頭扭過來，另一手把食物塞進去。小男孩扭動身體從椅子上溜走了，他爬到桌子底下，他母親用力扯他的手臂，拉他出來。他嚎啕大哭，她粗魯地抹了抹他的臉。

巴爾的摩門診中心已經替這名男孩看診好幾年了，他是這名單親媽媽的第六個孩子。這個媽媽念到九年級就輟學了，領取社會救助金過日子，而且顯然被壓得喘不過氣來。醫療紀錄顯示，他從六個月大時就開始體重下降，直到八歲為止，體重一直都只排在第五百分位。檢測顯示，他的認知能力低於正常值；到了二年級的時候，他的數學與閱讀能力大約落後一年。

營養不良對於腦部發展和身體健康的傷害是悄悄發生的，因為傷害發生在發育遲緩之前，但通常要到了發育遲緩的地步，大家才會有所警覺。「要讓小孩子長不大，你得要少餵很多、很多、很多餐

才有可能。」黛博拉·法蘭克說道：「但是挨餓、非自願缺乏食物等，對於健康和行為的影響，會在『長不大』之前就展現出來。」不僅如此，就算沒有影響到成長，也有足夠的蛋白質和卡路里來維持體型，孩子還是有可能因為缺乏「好食物中的微量元素，例如鐵、鋅等，因而影響到免疫功能、學習等等」。

光是飢餓的空虛感就會干擾童年學習，這點任何一位一連幾天都吃不飽的人都可以作證，飢餓會讓人專注時間變短、昏昏欲睡、頭暈眼花，變得強烈執著於食物。飢餓的人會把不相干的事情都拋開，我自己就有過這樣的經歷。當時海軍把我送到海軍陸戰隊舉辦的生存學校去，在樹林中覓食幾天之後，我開始慢了下來，無法思考任何事——不想政治、不想文學，甚至想不起班上隊員的有趣特質，我唯一關心的是，他們會幫忙我還是妨礙我取得食物，我當然也沒興趣看書。教師在課堂上就會看到這種情況，吃不飽的學生沒辦法集中注意力。在華盛頓特區的鄧巴高中，有位英文老師會在手邊放些穀物棒，可以丟給肚子餓的學生。「學習關乎個人意願，」法蘭克醫生說：「你要吃飽穿暖，覺得安全以後才會想要學習。」

營養不良造成的這些症狀並不容易消除，「營養不良會損害免疫系統裡很重要的部分，」醫生解釋道：「除了讓你的保護屏障（像是黏膜組織和皮膚）變得更容易被穿透以外，也會干擾所謂的細胞免疫（用來抵抗病毒的免疫系統）以及你的分泌……包括那些覆蓋呼吸道和腸胃道的免疫球蛋白等。整個過程如下：任何家庭裡，無論哪個孩子病了，那個小小孩子的體重會減輕，他們會覺得噁心、想吐、拉肚子、發燒，而發燒會提高新陳代謝的速度，讓你用掉更多卡路里；任何小孩得了普通的小兒科疾病，像是耳朵感染、鬧肚子，或者隨便什麼病，體重都會掉個一、兩磅。但是在我家或是你家，

小孩從常見的肚子痛或是耳朵疾病之類的復原後，他們會變得很餓，吃得特別多，你什麼都得多餵他們兩、三次。過幾天他們的體重就會回到基準線，免疫作用也會回到基準線。

「在我們幫助的那些家庭裡，一旦小孩有了任何缺陷（不一定是罕見疾病造成的，可能只是一般常見的疾病）……往往沒有多餘的食物可以給他們吃。」尤其是月底買食物的錢花完以後，或是在放假時沒有學校營養午餐可以吃。「缺陷就這麼發生了。無論是嬰兒或是小孩，只要他們吃不飽，身體就會變得更差，下一次就更容易受到感染。第三世界營養不良的孩子常見的死因就是感染，麻疹之類的疾病對於營養不良的孩子來說，絕對是致命的。」

在美國，營養不良的發生率很難評估，人口統計局替農業部進行年度「糧食不安全」電話調查，但這項調查依據的是主觀報告，忽略了那些窮到家裡根本沒有電話的家庭。法蘭克醫生認為這項調查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二〇一〇年時，以五萬個家庭作為樣本來推斷，這項研究發現美國有百分之五點四、或者可說是六百四十萬個家庭，至少有一個成員有時會餓肚子。而這些家庭是更大的人口，也就是一千七百二十萬個家庭中的一部分（占全國百分之十四點五），這些家庭被視為「糧食不安全」，因為他們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足夠的錢吃飯。^[1]但是，調查食物的不足量而非食物的品質，可能會漏掉很多家庭。他們不會認為自己「糧食不安全」，但家中卻有孩子缺乏營養素，而那對於大腦的健康發展至為關鍵。日益惡化的肥胖問題就說明了這一點，大量品質不良的食物一點幫助也沒有。

隨著腦部科學研究在近十多年來有所進展，營養不良所造成的傷害紀錄也隨之完備。鐵質不足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那些發人省思的研究發現，嬰兒時期嚴重缺乏鐵質的孩子，腦部功能會落後，就算後來已經不再缺乏鐵質也一樣；到了青春期的他們「在算術能力、寫作表達、運動功能和某些特定認

知過程，如空間記憶和選擇性記憶上」得分依舊偏低；教師也發現他們表現出「更多焦慮或憂鬱，有社交問題和注意力的問題」。根據一份篇幅很長的美國國家科學院報告《從神經細胞到社區》(From *Neurons to Neighborhoods*)，裡面匯集了有關兒童發展的研究，鐵質對於腦部許多方面的發展都是必要的，包括腦部體積的增長以及髓鞘的生成（就是包覆神經纖維的脂肪絕緣外殼），還能夠促進神經細胞之間脈動傳導，也就是腦部的脈動傳導細胞。腦部成長最敏感的時期是孕期的最後三個月和出生後的頭兩年，缺乏營養的時間會決定哪些大腦機能受到損害；更早期的營養不足，像是懷孕四到六個月之時，會減少神經細胞的生成；懷孕七到九個月時的營養不良，則會妨礙神經細胞成熟，並且抑制一種叫做「神經膠質細胞」的分支細胞產生。^[2]

早產會對腦部造成「生物上的損傷」，對於黑人和貧窮的母親與小孩會造成不成比例的重大影響。有些科學家發現早產與遺傳有關，有些科學家則指出，母體健康有種族上的差異——包括醫療照顧較差、營養缺乏、未經治療的陰道感染等原因，導致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性早產發生率更高。而隨之發生的新生兒死亡率，黑人是白人的二點四倍。^[3]雖然新生兒加護病房的進步增加了早產兒的存活率，但仍可能有其他嚴重的後果會導致終身殘疾，包括失明、聾啞、認知障礙。這類新生兒所面臨的危險還有腦出血、低血糖，以及無法吸收子宮內有助腦部成長的重要養分和酸性物質。^[4]「出生時體重非常低的新生兒大約占患有腦性麻痺嬰兒的三分之一，占智能障礙嬰兒的百分之十。」巴瑞·祖克曼醫生和羅伯特·卡恩醫生寫道。^[5]即使是不會造成遲緩的輕微腦出血，也會讓孩子處於「輕度障礙（例如行為問題、注意力問題、記憶減退）的高風險中。」《從神經細胞到社區》這份報告中指出，「有越來越多的數據強烈顯示，人類腦部會持續以獨特的方式在子宮內發展，直到孕期結束為止；而

提早結束孕期會中斷這樣的發展，造成後續的行為後果。」有些研究人員發現，早產兒在學步階段，「跟足月生產的同齡幼童相比，未必會在各方面都有同樣的認知發展。」^[6]

我的主日學老師也是一名哲學教授，有次他指著一盞燈，問全班說，我們覺得那盞燈最不可能做到哪些事情？我們想了一些很明顯的答案：走路、講話，自己換燈泡。不過他要的是別的答案。他告訴我們，這盞燈不可能了解自己是怎麼運作的。他讓我們思考了一會兒，然後繼續說：我們人類也不了解自己是怎麼運作的，不完全了解，大腦和人體的種種奇蹟超出我們理解的範圍。他說，而且大概永遠都會如此。

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遠在用核磁共振 (MRI) 和正子斷層掃描 (PET) 等高科技儀器觀察腦部以前。這些工具跟其他許多的工具，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讓神經生物學和行為學研究都有了重大的發現。藉由測試人類的大腦與用猴子與老鼠的大腦做實驗，可知我的主日學老師基本上還是對的：人類的腦部仍是一個廣闊的領域，大多仍處於未知狀態。但是新發現的知識也創造了新的討論，其中一項嚴肅討論涉及窮人：低收入戶的生活條件艱困，容易受到疾病和壓力影響，如今被認為會影響到大腦本身。許多科學家和其他學科的研究人員，都不再認為生理與經驗、基因與環境之間有著嚴格的分野，二分法大部分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整體的概念，思想與情感發展由「先天與後天」的互動所引導。傑克·修恩科夫是一位小兒科醫生，也是布蘭迪斯大學 (Brandeis) 赫勒社會政策與管理學院的院長，他認為「有些行為學家會說經驗和環境會對結果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他說道：「但是現在分子生物學家會說：基因的影響與環境的影響息息相關……基因並非永恆不變，而是一種傾向，必須再跟環境相互作用才行。」

據此看來，生活中的各個要素連成了一張錯綜複雜的網，不管看似多麼不相干，沒有遠遠拽動某一絲一縷，就不可能造成戲劇化的改變：飲食與學習、住房與健康、母親的養育和小孩後來的腦部功能，都是有關聯的。把研究推展到兒童智力與行為發展科學，就是在繪製這張網，有時候要借助實驗室來微觀細節，有時候則借助系統化觀察中的大膽嘗試。我們對很多研究結果要保持警醒，因為以研究倫理來說，人類不能接受會造成創傷或剝奪的實驗，「許多我們宣稱從腦部研究中所知道的，都是來自於非人類動物的研究——來自啮齒類動物和靈長類動物。」修恩科夫醫生指出：「我們可以推斷，但是我們不能說那跟研究人類腦部發展是一樣的。人腦跟鼠腦不一樣，跟彌猴的大腦也不一樣。」儘管如此，如今人類腦部的生理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被認為與早期學習的經驗學習相關。突觸（神經脈動傳導的接頭）的數目從出生時的五十兆個，增加到三歲時的一千萬億個，然後到十五歲時減為一半。這種「精簡」是自然過程的第一部分，有些科學家稱這是「用進廢退」，意思大概就是沒有執行的任務或功能會被視為不必要，腦部會據此進行調整。比如說在最初的幾年，大腦可以辨識任何語言裡的任何聲音；接觸某個語言幾年之後，大腦就失去了理解沒聽過或沒用過的聲音的能力。「因此，孩子的經歷就像雕刻家在一塊巨大的石頭上刻出的複雜雕像，」祖克曼醫生和卡恩醫生寫道：「但是神經網絡的這種『可塑性』不會永遠存在。」^[7]這個比喻不算完美，因為大腦不是石頭雕刻成的，而且大腦的能力在過了青春後還是會繼續發展，不過早期的互動可以讓人終身受益。

比如有一個在凌晨三點哭泣的兩個月大的嬰兒，祖克曼醫生和卡恩醫生提供了兩種情景：約翰的母親把他抱起來，「輕輕抱在身邊，然後跟他講話，問他是不是餓了。約翰大概吃了半個小時的奶，偶爾會停下來望著他母親的眼睛，母親則會溫柔地對兒子說話回應……她把約翰放進搖籃裡，親親

他，在他開始沉沉睡去時，替他蓋上被子。」這個嬰兒「學到了因果關係，」醫生指出：「他知道他生命中的大人值得信任，如果他遇到挫折或者有需要的話，可以靠他們幫助。」

另一個兩個月大的嬰兒西恩得到了不一樣的待遇，他的母親「跟先生吵完架，才剛睡著，她爬不太起來，嚷著：『等一下，再等一下，馬上就來……』」然後她突然把他抱起來，把他擺到她胸口，她雙眼定定地盯著前方，還回想著方才跟先生的爭吵……西恩對母親的緊張做出回應，不安地蠕動著，身體緊繃，最後弓起身子掙脫她的乳頭哭了起來。這個母親的回應是：「你不想吃，好啊，那就不要吃。」她把還有點餓的寶寶放回搖籃裡，回到床上大吼大叫：「閉嘴，給我閉嘴！」照祖克曼醫生和卡恩醫生的觀察，西恩學到的是「被觸摸和被抱著令人不舒服又痛苦，飢餓和哭泣只會引來尖刻的口氣、粗暴的碰觸，還有需求只能得到部分滿足。他學到對他人保持警戒、不信任他人。因為這種負面情感，就連西恩所學到的因果關係也受到影響；相較之下，約翰可能會發展出對於學習的熱愛，因為他的大腦迴路把因果關係和愉悅連結在一起。」^[8]

這當中有種相互作用：母親發現她的寶寶不可愛又不聽話，結果她就變得越來越冷淡。孩子的行為和父母的管教方式會互相影響，擁有「安全依附感」的孩子能夠誘發更好的管教方式。根據《從神經細胞到社區》這項研究的總結：「事實上，孩子會更樂於接受父母的指示、引導和教導，而這會強化父母的敏銳管教，多半能夠進一步讓他們的安全依附更為緊密。」^[9]產後憂鬱症也是相同循環的一部分：母親不餵養，孩子不回應，讓母親的憂鬱更加惡化。「憂鬱的母親自發性比較低，心情更容易不好、更不出聲，跟她們四個月大的孩子的身體接觸也減少了。」史蒂芬·派克醫生和他的同事在一篇一九八八年發表的論文中寫道：「這些嬰兒越來越少發出聲音，也不會露出快樂的表情回應母親

了。」^[10]孩子的認知成果也會受到影響，根據某些研究發現，一些閱讀技巧下降的八歲小孩，他們的母親大多在他們三歲時曾經罹患憂鬱症。^[11]

有關這種機制具體的生理作用方式仍然所知甚少，不過逐漸有了概貌，大部分是基於研究動物恐懼和焦慮所引起的神經化學變化而來。其中一條調查項目著重在皮質醇，那是一種類固醇激素，會因為危險或壓力而升高，那也是眾多「化學傳訊者」之一，會透過神經細胞和其他地方的受器影響腦部功能，皮質醇「能幫助分解儲存的蛋白質，釋放能量供身體使用。」《神經元》(Neurons) 期刊解释道：「會抑制免疫系統，抑制身體的成長……影響腦部許多方面的功能，包括情緒和記憶。」

有些證據顯示，在極端的壓力下——或是功能相似的化學物質作用之下——就算壓力消失了，皮質醇濃度還是很高。長期給予猴子和老鼠高劑量的皮質醇，牠們會變得對壓力更敏感，表現出更多憤怒和焦慮的跡象，即使在威脅移除以後，也不會完全減輕。出生後不久就遭到忽略會提高壓力反應，相反地，妥善養育則會減低焦慮，並且「塑造」出一種恐懼—壓力系統，等到成年之後，一旦威脅消失，焦慮很快就能解除。^[12]

少數幾個以人類為對象的研究之中，有項研究發現，「在羅馬尼亞某間孤兒院裡，一群極度貧窮的孩子在經歷輕微的壓力之後，皮質醇含量始終無法降低，這與孩子智力及體力的表現不佳，還有身體發育不良均高度相關。」^[13]其他的研究則顯示，人類嬰兒處於困境時，如果能有溫暖而反應敏捷的照顧者陪同，嬰兒的壓力荷爾蒙就不會大幅度升高，「相反地，在有潛在威脅的情況下，不安全依附的關係與較高的皮質醇有關。」^[14]這也許是那些有創傷的父母行為背後的生物因素成分，他們沒辦法調節自己對壓力的反應。

即使不去追蹤生理圖譜，壓力對認知作用的負面影響也早已為人所知。根據一項一九八〇年代的研究摘要指出，「來自高壓力環境的孩子，有更高的風險會發生種種發展與行為的問題，包括八個月大時在發展測驗上表現不佳、四歲時出現較低的智商得分和語言發展受損。」階級也是一項因素：「到了就學年齡，來自低社經地位且高壓家庭的孩子，比起那些來自高收入家庭但一樣處於高壓之下的孩子，會表現出『較差的情緒調整能力、較多的在校問題』。」^[15]

因果關係很難追查，而且有些研究人員認為智商是原因而非結果，尤其是理察·赫恩斯坦 (Richard Herrnstein) 和查爾斯·默里 (Charles Murray) 在一九九四年所出版的《鐘形曲線：美國社會中的智力與階層結構》(The Bell Curve) 一書中，提出智商幾乎完全是由遺傳而來。依他們的觀點，低智商的人在生活中的表現自然欠佳，趨向較低的社經水準，也容易生出智商較低的孩子，然後重複同樣的模式；其他的研究者則發現，分開養育一對雙胞胎，在不同的社經背景下成長的兩個孩子，卻會展現出類似的能力和性格。不過這些研究不夠精確，沒有記錄各個家庭在不同時期的狀況改變，也沒有明確指出早期童年發展關鍵時期的家庭情況。雙胞胎可能一起體驗過某些重要的經歷——比如他們在嬰兒時期都待在同一個家庭裡，後來才被分開。

相反的觀點則認為「先天與後天」，也就是基因與環境之間有協同作用，強調貧窮有強大的相互作用力，具有種種令人失去能力的因素與認知障礙。無論智商有多少是由遺傳而來——毫無疑問地，大部分都是——一般都認為基因素質必須跟個人經驗相互作用後，才有可能增進或減少生理健康和智力成就。

這種相互作用的方式可以在被領養的孩子身上觀察到，許多孩子的智商都與養父母較為相近：

而不像自己的親生父母。根據一九九九年的一項研究指出，智商介於六十到八十六的低智商兒童，在四到六歲之間被領養後，智商有顯著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增加的程度隨著收養家庭的社經地位而改變。這可以從父親的職業看出來，十一歲到十八歲之間的孩子，由社經地位最高的家庭收養的，智商增加最多，平均接近一百；由社經地位中等的家庭收養的，智商增加次之，大概是九十三；由低社經地位的家庭收養的，智商增加最少，為八十五。^[16]

在這項分析中，生理疾病成了智力與行為困難的模式與隱喻：就像種種導致身體感染疾病的弱點一樣，貧窮也會造成認知與情緒上的缺陷；就像生理上的弱點會妨礙復原，經濟能力上的缺陷也會阻礙兒童發展。在過去二十幾年之間，生理與環境曾被視為二分的兩面，如今已被視為是整體的兩部分。一系列複雜的「風險因子和保護因子」，不只包括傳染病、營養素、染色體，也包括愛、養育和情緒上的安全感。「生活在貧窮中的孩子，」修恩科夫醫生說道：「特別容易累積社會壓力，生理上也比較弱，這與高風險因子盛行有關，像是產期前後併發症和缺乏營養。」

風險與保護因子同時存在於孩子身上與環境之中，「孩子身上的風險因子可能是某種慢性疾病、某個潛在的腦部問題、某種生理上或體質上的缺陷，又或者是在暴躁的脾氣。脾氣暴躁會讓你暴露在風險中，因為除非你的家庭相處非常融洽又能適應，否則你就有被虐待或是被忽視的風險。這有些是沒得商量的生理學，有些則是個人的個性風格。另一種風險因子是單親媽媽的小男孩，這個媽媽痛恨那個害她懷孕的混蛋，而這個小孩會讓她想起那個爸爸，這是另一種風險因子。保護因子則是另一種能夠增加正面結果的因子，與風險因子兩者通常互為鏡像。所以孩子身上可能有的保護因子是：健康狀況良好、隨和的好脾氣、長得好看，或者是能讓你想起所愛的至親。」

「在環境方面，」修恩科夫醫生繼續說道：「風險因子有貧窮、經濟不景氣、有暴力的環境、鉛污染空氣等。風險因子可以是心理方面的，像是家庭壓力；也可以是比較具體的，像是環境中的有毒物質，這些是環境中的風險因子……缺乏經驗、有點不知所措的單親媽媽，是一個很強烈的危險因子，不過一個同住又懂得怎麼養育小孩的祖母，就是一個非常有利的保護因子，能夠緩衝沒經驗的母親造成的風險因子……環境中的保護因子是：經濟安全穩定的家庭、至少一個深愛你的成年人，願意全心全意為你付出、住在能支持協助有小孩的家庭的社區。」

修恩科夫醫生指出，貧窮家庭的孩子比有錢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受到各種疾病的侵擾，其中包括了輕微的智力障礙。有不容質疑的證據在此：雖然嚴重的智力障礙在各個經濟階層的發生率都差不多，但是研究顯示，輕微智力障礙在低收入的家庭裡更為普遍，其中的原因則沒有那麼明顯。

「談到貧窮和智力障礙，我們並沒有弄清全部的機制，」他解釋道：「我們不知道哪個基因在作用，也不知道環境裡的誘發因素是什麼。」不過他相信確實有某些環境誘發因素。容易致病的基因並不一定都會導致疾病，常常需要外在的誘發才會致病。而因為窮人比較容易發生輕微智力障礙，他推論，某些貧窮因素一定扮演了吃重的角色。

修恩科夫醫生說，已知會造成智力遲緩的因素有營養不良、染色體異常、出生前或出生後感染、胎內鉛中毒、酒精中毒、古柯鹼中毒或是菸草中毒，還有「嬰兒與照顧者互動不佳」以及「貧窮和家庭混亂」。性侵也可能是這個方程式中的一部分，「我們在發展和行為研究中的證據顯示，性侵會影響腦部。」長期遭受極端的性侵會影響大腦，他觀察道：「我們知道那些孩子有嚴重的情緒問題。如果他們有情緒問題，那表示腦部受過某種影響，因為腦部是產生所有情緒的地方。你的行為、思想、

感覺，全都在你的腦子裡。」

這一番分析也許可以用在卡洛琳·佩恩輕度智障的女兒安柏身上。她曾經遭到性侵，這樣的創傷可能奪走了這名女孩培養出來的安全感，專家認為那會影響腦部發展，但並不清楚那會不會、或是會如何影響她的智能障礙。「長期侵犯和各種虐待，對可能因為其他原因而暴露在風險之下的孩子來說，是造成智能障礙的主要決定性因素。」修恩科夫醫生說道：「我們知道所有這類事情累積起來，會危害到能力的發展。」而處於貧窮與壓力環境之下的孩子，比較常見到智能障礙的情況。「我們推測壓力是一項重要的因素。」

安柏腦部受損的原因並沒有經過醫生的詳細調查，所以並不一定與她父母的貧窮有必然的關連。卡洛琳懷孕期間的飲食很差，她的工資微薄，先生又沒有工作，食物的預算很拮据——即使後來的幾年，她還是深陷在垃圾食物配咖啡的習慣中；卡洛琳懷孕時也會抽菸，而抽菸與未出生的小孩的腦部損傷有關；另外，在她住的舊房子裡，老舊的油漆剝落，粉塵可能使空氣中混入了鉛。

貧窮與健康之間錯綜複雜的關聯影響重大：如果不降低超出醫療管轄權限的風險因子的話，醫生就沒辦法成功地治療某些疾病。他們沒辦法解決孩子營養不良的問題，除非讓這個家庭領到食物券和社會救助金的支票；他們也沒辦法治癒孩子的氣喘問題，除非他們能改善孩子的居住條件。那就是為什麼巴瑞·祖克曼醫生要雇用律師在波士頓醫療中心的小兒科部門工作。他的看法是，律師做的是「預防醫學」。

祖克曼醫生是個看來有些疲憊的人，但他很有新意，不願意只解決一部分的問題。幾年前，眼看閱讀技巧不佳的貧窮孩子擠爆了他的門診，於是他和同事在候診室裡擺滿了舊書，都是從他們自己

孩子的書架上拿來的。但是很快地這些書開始消失，被小孩偷走帶回家了。有個同事很生氣地抱怨，說他再也不要捐書給候診室了，祖克曼醫生對於這種偷竊行為卻只是一笑置之。「嗯，也許那是好事，」他記得自己是這麼說的，「他們會在家裡看書。」然後他開了一個小玩笑，「我們應該直接把書給這些小孩就好了。」這個玩笑後來變成了一個全國性的計畫「展臂閱讀」(Reach Our and Read)，召集全國各地六百個門診中心，送書給每一個來看病的小孩。「其實，」祖克曼醫生宣稱：「我們送書給孩子時所看到的笑容——我向上帝發誓——比送孩子棒棒糖時看到的還要燦爛。」

在他的門診裡，他的病患受貧窮和波士頓衰敗的貧民窟造成的影響。「我覺得開抗生素給那些耳朵感染的孩子我很挫敗，他們會生病是因為被趕出房子，或者是在冬天裡燃油被切斷。」他說道：「我唯一能做到的方法就是勸說對方，但是如果你手上沒有對的電話號碼，那你的勸說就只是讓你自己心安而已。」

你可能会以為，當房東的被小兒科醫生相勸，會覺得受到感動，願意採取行動，但是在門診中心的經驗裡並非如此；不過如果電話是律師打來的，那就另當別論了。「我們有個氣喘的孩子，正在服用類固醇，連去上學都沒辦法。」祖克曼醫生說道。他們派了一個護士去那家人住的公寓，「那位母親盡其所能打掃灰塵，把窗簾拿下來，但是房間裡鋪滿了地毯，而且因為漏水還很潮濕。我們的醫生無計可施，不過我們的律師跟房東談了兩次，第二次談話之後，那個房東就解決了漏水問題，也把地板上的地毯拿掉了。四、五個星期以後，這個孩子不必服用類固醇，回學校去了。」換句話說，「與其拿錢請醫生，我把錢拿來雇律師，」他說道：「因為我是真的想好好照顧病患，在這種情況下，我需要律師來照顧他們……說來可悲，那個部門是我這裡成長速度最快的，一開始我只請了一個人，現

在有三個人了，而且我還找了一群法律系的學生。」不用說，醫療保險不會支付這些成本，大部分的資金都來自於基金會補助和其他私人捐款。

住家環境不良是產生疾病的溫床，在一九七八年法律禁止使用含鉛塗料之前，已經粉刷上去的老式油漆剝落成粉塵，吸進肺裡毒害孩子；裸露的電線會造成傷害；家用的爐子壞了，住戶只好點火爐或使用獨立式煤油暖爐，但可能會引起火災；過分擁擠的環境會引起爭吵和壓力，而「壓力已經被證實是誘發氣喘的原因，」梅根·桑德爾醫生說道。她是波士頓大學醫學院小兒科的一員，研究住房與健康之間的關聯。房子通風不良，街上又危險，孩子就會困在空氣對身體有害的公寓裡。

如今氣喘影響了百分之九的美國兒童，遍及所有的社會經濟階層，住在市內的黑人孩子有百分之十二到十五受到影響^[1]，在某些貧窮的社區比例還更高。對於帶有氣喘遺傳因子的孩子來說，「家裡有很多過敏誘發因子。」桑德爾醫生說道。接觸這些抗原，像是黴菌、塵蟎或是蟑螂外殼掉落的粉末，都會引發身體極端的防禦功能。「你吸入這些抗原，肺部會受到刺激，這種刺激會導致兩種情況，」桑德爾醫生解釋道：「第一，這確實會導致肺部本身的肌肉收縮，引起腫脹，就好像如果你摸到有毒的常春藤，皮膚會有點紅腫發癢之類的情形，肺部也是一樣。」這種氣喘的症狀會影響呼吸，儘管大多可以透過吸入器給藥來控制，不過還是會讓孩子住院，錯過好幾天學。

很多有氣喘孩子的家長並不了解引發氣喘的誘因，因為醫生根本懶得告訴他們。巴爾塔薩一家就遇到這種狀況。這戶努力奮鬥的墨西哥農場工人，住在北卡羅萊納州的艾文霍，雖然他們住的木造房屋裡蟑螂肆虐，但治療父親奧古斯丁跟兩個孩子的氣喘專科醫生，卻從來沒有問過房屋的狀況，也沒提過蟑螂可能會是原因。醫生有次打電話邀請他們去一個氣喘研討會，奧古斯丁說：「他們會給我

某種可以治療氣喘的儀器，但是我沒辦法去，因為你得付十五美元才能參加。」

大部分的醫生不會去探究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而這種狹隘的觀點，已經被波士頓醫療中心拋棄了。在那裡，律師和社工可以幫忙，小兒科醫生和急診室員工可以關注更大的問題。「許多轉介過來的孩子，他們居住的房子狀況往往很糟糕。」珍·佐特說道，她是小兒科部的律師之一。「有個小孩在氣喘病發的時候來這裡就醫，他們開始問他房屋的細節，結果發現牆上長了黴菌。他們拒絕讓小孩回家，想要讓他留在這裡，向健康保險公司提出讓他留下來，因為回家只會接觸到讓他再度生病的東西。」如果知道是因為房屋導致孩子必須住院，保險公司就不會支付住院費用了。

佐特說，律師的一通電話，通常可以讓房屋管理委員會把房客從發霉的公寓搬到公共住宅去。私有房屋的房東也會在堅定的勸說下做出回應，但有時候需要多花點工夫：比如寄給房東一封律師函，或者找一個城市督察員威脅要採取法律行動，甚至說要起訴他。這樣的案例就發生在一名九個月大的男孩身上，這名男孩患有肺動脈瓣狹窄，限制了他肺部裡的血液流量，他動了手術，但是回到家裡還是病危，因為火爐把毒煙和黑灰吹到空氣中。房東家境小康，住在同一個社區裡，「甚至連來看看那個火爐都不願意。」佐特說。

她利用波士頓強大的承租人保護法，找來督察員，列出房東許多違規行為。舉行聽證會時，那名房東沒有到場，他有十四天的時間更換或修理熱風火爐，但他什麼也沒有做。佐特接著告上法院，該房東宣稱他可以自己修理那個爐子。法官不顧她的反對，給房東兩星期的時間去處理；之後她又再度上法庭，這次換了一個法官，這個法官命令房東要把爐子換掉，他終於遵守了。「但是整個過程花了一個半月，」她說：「在這期間，這名九個月大的嬰兒整天在醫院進進出出。」五個月後，這名男孩

死於感染，如果他的免疫系統沒有變得那麼差的話，他本來可以撐過去的。雖然佐特考慮過要控告房東傷害，但是很難證明爐子與男孩的死亡有明確的關聯。那位母親既崩潰又憤怒，最後搬走了。

惡劣的住屋環境和糟糕的健康狀況之間並非總是直線關聯，梅根·桑德爾記得，加護病房有個小女孩對貓咪嚴重過敏，但這家人養了一隻貓。「我們說：『噢，你們得把貓送走才行，這孩子對貓嚴重過敏，我們覺得這是她這次氣喘發作這麼嚴重的原因之一。』」桑德爾醫生回憶道。「那對父母死死盯著我說：『但是貓會吃老鼠。』顯然房子有問題，然後解決方法又成了問題之一。」

她和另一名小兒科醫生約書亞·沙弗斯做了一項研究，問那些得到住房補助的父母，認為他們先前的房屋對孩子的健康造成了什麼影響。「情緒上」和「精神上」這些詞彙一再被提到：「情緒上無處發洩，屋子裡太多噪音，沒辦法寫功課。」有次訪談的筆記寫道：「情緒上感覺很差，容易有家庭暴力，還有公寓很冷。」另一名家長提到：「情感上，這讓我們不能一直待在一起。」「就精神方面來說，不能出去玩或是做其他事情（因為街頭犯罪）。」「就精神方面來說，他需要有自己的房間，卻還是只能跟我一起睡。」「精神上有影響，因為爺爺是酒鬼，會大吼大叫。搬家比較好，小孩才會怕爺爺。姐妹都有精神疾病。」

對孩子造成心理傷害是父母們最常提到的憂慮，沙弗斯醫生說道：「很多家庭與朋友或親戚同住，而對方並不希望他們住在那裡。父母得跟小孩共用臥房，小孩沒有自己的空間，有些父母說他們沒辦法寫作業，因為家裡沒有一刻是安靜的，有人一直在哭，或者是『他們討厭我嬌嬌』，大家在屋子裡吵了起來。我聽過一些可怕的故事，小孩被同住的人虐待。」

還有老鼠，「小孩很怕老鼠，」他說：「有個小孩醒來發現身上有老鼠，再也不肯睡了，在學校

也有問題。」這名男孩困在無法打破的循環中：貧窮導致健康與居住問題，惡劣的健康和居住環境導致認知缺陷和就學問題，失敗的教育又導致貧窮。

在供不應求的房產市場上，房租高、收入低、政府協助不足，改善的目標往往就得是要幫助窮忙家庭取得他們遭到非法剝奪的補助。這讓小兒科部門的律師和社工非常忙碌。這些接受治療的孩子原本都應該受益於食物券、福利補助和第八類房屋條款補助券，這些補助券是由聯邦政府所資助的，至少能夠支付部分私人房屋和公寓的租金，但是這項計畫的錢不夠，住房也不夠，大部分地區的候補名單都很長，不斷增加的財富哄抬了住房成本，窮忙族幾乎束手無策，聯邦政府與州政府資金不足的住房計畫也沒有幫上忙。

這個制度也深受福利詐欺之苦，不單是有人違法取得社會救助金，更具傷害力的，是個案社工和其他官員巧妙地合謀，阻攔或拒絕完全符合資格的家庭。就算法律規定任何人隨時都可以申請，這些人在服務台會敷衍地問窮忙母親幾個問題，接著違法地拒絕給她申請表格。律師說，這招很聰明，因為他們不能代表沒有提出申請的客戶干預任何事。

那些設計出卡夫卡式迷宮般文書流程的官員，逼得領取食物券或醫療補助的人得保留詳細的文件，無法工作，還得耗時間去政府部門接受嚴厲的批評。「我有些服務對象的日程表排得比我的還滿。」艾倫·勞頓說道，她是門診中心的一位律師。

如果你想繼續領社會救助金，你就得有文件，證明你的孩子已經有免疫接種，也有去上學；如果你想領食物券，你就要提供薪資單和報稅單；如果你想去工作，你就得替孩子找幼兒園。如果你負擔不起，你得要有日托補助券；如果你想領日托補助券，你就得證明你在工作。而且要領到補助券，

你得去很多不同的辦公室跑很多趟，當然得在上班時間去囉。有一名母親陷在這樣的進退兩難之中，在全市的每家幼兒園都報名等候補，同時她的個案社工告訴她，她得要找份工作，政府才會支付日托的錢。勞頓引用那名社工的話：「如果你在候補名單上，你得找人幫你看孩子。」

每要求一份文件，就可能讓一份申請中斷，因為不管領取福利的人有多一絲不苟，文件似乎都有可能在政府機構中弄丟。「我上禮拜才遇到這樣的服務對象，」勞頓說道：「她收到三份不同的通知（而且以三種不同的方式），告知她的申請要中止了，原因是她沒有提供她參加的就業培訓計畫的文件。她說她有，但是他們搞丟了。好吧，我們又提供了一次。結果，她又收到另一份通知說她要被中止了，嗯，那是另一個電腦系統產生的通知，所以她必須向就業培訓計畫請假，去拿另外一份文件，送去另外一個辦公室裡……當窮人是一份全職工作，真的是這樣。」

這還會促成其他荒謬的事情，有個母親急著想讓患有氣喘的孩子搬出有害的公寓，她從小兒科醫生那邊拿到一封信，說明房屋讓她的孩子生病，依規定，她因此有資格得到緊急救助；但是福利部門的接待員拒絕了她三次，告訴她說，她已經有房子住了，除非她無家可歸，不然她甚至不能申請臨時的收容中心。這名母親於是認真考慮要搬出去，好讓自己無家可歸，以符合申請資格。最後，當律師還在嚴詞跟個案社工解釋福利部門這樣做已經違法時，「她放棄了，搬去亞特蘭大，因為她說，她不覺得這個體制會幫她。」

佐特估計，律師可以用一通電話來解決的案例，大概不到一半。其中一件是一名病患的母親，她申請緊急食物券遭到拒絕。「如果你的收入真的很低，你可以在二十四小時到四十八小時內拿到食物券，然後他們會驗證你是不是真的符合資格。」佐特說道：「但他們不讓她提出申請，所以我只好打

第九章 懷抱夢想

Chapter 9

但是我很窮，只剩夢想；
我把夢想鋪展在你的腳下；
請輕輕踩啊，因為你踩的是我的夢。

——威廉·巴特勒·葉慈 William Butler Yeats

電話去給他們，說明她的收入，而且她符合申請資格，你得給她食物券，他們就照辦了。」
有律師撐腰的窮人真幸運。

「等我長大以後，」十一歲的莎米卡說道：「我想當律師，這樣就可以幫助別人了。」我問她，幫哪些人？「無家可歸的人。」她回答道：「小朋友最需要幫忙，所以我想幫他們。」她這樣宣布著，帶著六年級生的明朗肯定。她的雙眼依舊閃耀，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她住在阿那卡斯提亞一個令人絕望的社區裡，隔著一條受到污染的河流，對面就是華盛頓那些大理石紀念碑。童年清澈的眼神很少能夠延續到高中時期，孩提時期的願景總會變得黯淡——或是扭曲成為空想的念頭，例如想在橄欖球場上或是籃框下成名發財。

幾乎所有跟我聊過的貧窮中學生都想讀大學，有些人的父母沒有工作，有些人的父母靠搬家具、整理圖書館書籍、打掃政府的大樓維生；很多人在超市、工廠、老人安養院、車庫、醫院、髮廊工作，只有少數從事技術工作，像是技工、木工、電工、電腦操作員。要實現他們的希望，大部分的孩子都必須大幅提升社會階層，在教育、工作和收入各方面都是如此，他們必須實現美國夢。

莎米卡那群六年級的孩子中，五個裡面有三個想像自己未來要當律師，一個想當驗光師，剩下的那位羅伯特認為自己會「在辦公室裡工作，像個企業總裁之類的，或是醫生。」他的目標是要有做好事的能力，「像是我的家人受傷的話，我可以趕去現場，甚至還可以幫助他們，」他說道。至於經營的公司類型，「我會去幫忙無家可歸的人，給他們錢、做善事那類的。」

在阿克倫一個叫做「機會公園」的貧窮社區裡，一群六年級生想當歌手、小兒科醫生、警察、護士、饒舌歌手、技工，年輕的生命滿溢著抱負。多米妮克是營建工人和美髮師的女兒，她渴望成為「考古學家和小兒科醫生。」同時嗎？我問道。「不是，老一點再當考古學家，年輕的時候要當小兒科醫生，大概二十、三十幾歲的時候吧。」

阿克倫學校裡的七年級黑人學生，列出了最明顯的黑人典範：橄欖球員、籃球員、饒舌歌手；白人學生則提到藝術家、獸醫、修車技工。唐是白人，他解釋了為什麼他想做市政府的鋪路工作：「薪水很高。」在華盛頓特區兩個低收入社區的學校裡，七年級生幾乎全是黑人，他們提到律師、攝影師、橄欖球員、籃球員、聯邦調查局探員、女警、業務員、醫生、舞蹈家、電腦專家、建築師和藝術家。阿克倫的八年級生提到的職業則是：海洋生物學家、電腦工程師、科學家、建築工人、律師、小兒科醫生。這些職業是他們湊巧見過或讀到的，又或者是在電視上看過，變成了他們的盼望；有時候是滿懷熱情，更多時候則是一時的心血來潮。有些人還是會實現自己的願望，但是大部分都不會。很多人會在高中就輟學，只有少數會去唸大學，所以絕大多數人都會困在低薪工作中。

他們的抱負引來C太太的一聲冷笑，她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老手，在莎米卡的學校裡教了十五年的歷史，這所學校是位於華盛頓的派翠夏哈里斯教育中心（Patricia R. Harris Educational Center）。「他們每天都遲到，隔兩天又曠課，」這位教師嘲笑道。她是黑人，她的學生也幾乎全部都是黑人，所以她可以坦白地說狠話，不會被指責有種族歧視。「我問他們：『十年後你們要做什麼？』他們想當醫生，想當籃球員，當律師，當橄欖球員。我說：『有多少橄欖球隊？每隊有多少球員？你做到的機會有多大？而且你知道嗎？要當律師的話，你需要閱讀技巧；要當醫生的話，你需要數學技巧跟閱讀技巧。你可以做得到，但是你要去做啊。』」表面上她看似重重的踐踏了學生的夢想，但她只是想事實告訴他們。「我希望他們有夢想，但是築夢的過程要踏實。」

對於C太太和許多其他的教師來說，現實令人發怒。「他們很懶，」她說道：「他們不想讀書，不想寫作業，叫他們寫作業好像要拔他們的牙一樣。許多人在家裡沒人關心，所以他們希望在學校引

起注意。」她可以用什麼來獎勵或懲罰學生嗎？她搖搖頭，「他們就算一堆科目不及格也很開心。」她宣稱：「他們不在乎，是我們在乎。」

莎米卡已經陷入了互相憎恨的循環中。她很可愛，非常健談，頭上綁著兩條迷人的辮子，垂在耳朵旁邊，這證明了她母親很細心呵護她。她的話滔滔不絕，老師打電話給家長抱怨她在班上講太多話，莎米卡堅持老師把她跟另一個也叫莎米卡的同學搞混了，所以她的父母不喜歡這名老師。她津津有味地講著，而且她盡量不去管老師的評語。「最近發回來一張考卷，她在那張考卷上有夠自作聰明的，」莎米卡酸溜溜地說著：「我漏掉一個字，她就自作聰明地跟我說：『妳該唸書了，小女牛。』」她寫成『女牛』。成績單發下來的時候，她給我D，但是她連『女生』都不會寫耶！」

孩子可能會困在家長與學校的不良關係之間，有些父母沒受過多少教育，或是忙著工作，沒辦法指導孩子寫作業，也沒有時間去跟老師碰面，不知道該怎麼用有建設性的方式來支持孩子。有些父母在學生時代有過不愉快的經驗，甚至就跟他的小孩讀同一間學校，現在當了母親，也把學校看成是一個不友善的地方，要盡量避開。也因為從老師那裡接到的消息很少是好事（大部分老師打電話來都是要講孩子有問題，而不是要讚美孩子），所以對話可能會讓人覺得丟臉，因此而充滿敵意。

各個社經階級的父母在處理學校的事情時，會採取不同的姿態：對立、和解、合作、放任、疏忽。然而在這光譜的底層，做父母的會面臨特殊的問題。對於許多貧窮的父母來說，對孩子的愛很類似焦慮，他們處於危險和失敗的背景中，一輩子沒什麼成就，養兒育女提供了另一個成功的機會；但是這個目標在一條漫漫長路的盡頭，路上滿是地雷，有毒品、幫派、輟學和衰微的家庭，所以對某些家長來說，咄咄逼人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要在亂糟糟的家庭和社區中生存下來，這種互動技巧才

受青睞。他們能在家裡跟街上用這種方法有效地捍衛自己，於是也將這種對立的態度帶進了孩子的學校，那是一種粗魯的支持孩子的方式，有些孩子也會模仿這種作風。

「我第一天來教書的時候，被一個小孩叫白人婊子，那孩子好像才二年級吧。」V小姐說道。她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在華盛頓的肯沃茨小學（Kenilworth Elementary）教二年級。「我有好幾次被孩子打，就是用拳頭揍那樣。」不過更可怕的是父母的敵意，很多人在生小孩的時候，自己都還是個孩子，在這些「非常年輕的母親、有時候是父親」之間，她觀察道：「如果你說『你的孩子在課堂裡這樣那樣』，他們會非常戒備，因為他們覺得這反映出他們的管教方式……有時候他們會說：『喔，我兒子或我女兒說妳在課堂上怎樣怎樣，還有妳對他們做了什麼，因為他們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問題。』我們還聽過很多像是，『我要來把妳們這群白人婊子打得屁滾尿流。』」

一般的教學工作變得充滿風險，就算是一些毫無惡意的舉動也一樣。比如V小姐曾經寄信到學生家裡，問一名女孩為什麼很久都沒來上課。這名女孩的母親兩年前曾經攻擊過一位老師。「她寫了一封恐嚇信回我：『如果我要我女兒離開學校，她就會離開。』」隔壁班則被一群地痞流氓入侵，另有一名家長帶頭來恐嚇老師，那位老師也是個年輕的白人女性。「我很擔心我的生命安全，」V小姐說道。她和她同事在年底都轉到其他學校去了。

在另一個極端，非裔美國家長對白人常有一種成見，認為他們管教孩子太過消極、過分寬鬆。這樣的印象在訪談中不斷反覆出現，談到關於跨種族的態度，V小姐在某些家長眼中就是這樣。他們試著爭取她為盟友，允許她打自家的小孩。「就把他們帶去廁所打，」她引用一名家長的話。「我會給妳一封信，說妳可以打他。」

「呃，我不能這樣做，」V小姐回答道。「有很多老師會用這種方法，」她承認，但這是違法的。

橫跨種族與階級的鴻溝，讓父母和教師雙方都很困惑。V小姐很疑惑地發現，大部分學生的父母都「非常、非常關心他們的孩子，雖然孩子的狀況一塌糊塗。據我所知，有些父母的壓力很大。」她不太能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很愛自己的孩子，孩子對他們來說很珍貴。」她既驚訝又欽佩地說著。如果這些好鬥的父母是個極端，缺席的父母就是另一個極端。這種家長可多了，懇親會的低出席率已經成為低收入學區的長期問題。「他們住的地方可能離學校只有一個街區，但是他們永遠不會來學校看看。」西奧多·辛頓抱怨道，他是華盛頓哈里斯教育中心的校長，這裡的孩子從學前班到八年級都有。「我有七十個學生，」華盛頓鄧巴高中的數學老師I先生說道：「但上一次懇親會時，我只見到八名家長。」即使學校敞開大門，配合低工資家長的不規律工時，或者是在懇親會時提供日托服務，又或是試圖要求家長親自來領孩子的成績單，吸引他們來開會，但都不是很成功。在華盛頓的貝爾多元文化高中(Bell Multicultural High School)，家長必須去服務台領取成績單，然後四處走走，跟老師碰面。阮素嫻在那裡教書，六十幾個學生的父母當中，她通常會看到大約十位。

家長缺席定下了不好的基調，學校教職員往往會因此產生誤解。在阿克倫的梅布爾瑞丁格中學，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貧窮孩子符合營養午餐免費或減免的資格，這裡的學生大部分都是黑人、拉美人或亞洲人。我問了好幾位教師用餐室裡的白人教職員，這些孩子有什麼問題，得到的答案很冷酷。「他們不重視學習，但這些價值觀應該是家裡要教的，」一名圖書館員抱怨道。「他們不在乎被停課，」同桌其他的老師也贊同這番輕蔑的評價。這已成為一種慣例，學生怪老師，老師怪學生，家長怪學校，錯誤都在別人身上。

哈里斯教育中心的校長西奧多·辛頓試圖要打破這個循環，要透過父母的眼睛來看事情，盡可能地進入他們的內心。「來學校會讓他們覺得不舒服，」他觀察道：「他們覺得學校的態度高高在上，沒有尊重他們，也沒有表現出關愛、或者『我們是一夥』的態度。」解決之道？「你要跟他們溝通，要友善，主動跟他們講話，歡迎他們。要釋出歡迎的訊息，不是只有在孩子做錯事時，做了好事也可以。你要不斷用資訊轟炸他們，告訴他們孩子做了什麼好事情（比如小孩贏了市長徵文比賽），把一切都擺出來，讓他們看到這是一種開放的氛圍……昨天早上，我第一次參加父子早餐會，那是黑人歷史月的活動，我猜我們大概有三十、四十五個監護人跟著兒子一起來參加吧。就是這類事情，你必須一直嘗試各種策略，好讓家長來學校。或者邀家長在課堂上當志工，開一個管教訓練的輔助計畫。我們想盡一切辦法要讓他們來學校，不管是二十分鐘、三十分鐘、一小時或是一整天都好，拿出你所有的辦法，讓他們來學校。」

我不科學的抽樣顯示，教師在家長出席率跟孩子表現是否相關一事上沒有共識。有些教師認為有，有些教師則認為隨便都可以舉出相反的例子。N先生是梅布爾瑞丁格中學的黑人數學老師，他形容自己是「市內（貧民區）的產物」，堅稱自己可以預測哪個孩子的家長會參與。「那些拿了一排零分的孩子，他們的家長不會來。」他斬釘截鐵地說道。相較之下，阮素嫻的觀察是，十個來參加懇親會的家長中，有好幾個是孩子在班上表現不佳的，她覺得很奇怪；而從肯沃茨小學調到韋伯小學的V小姐說：「就算是最有問題的孩子，他們的家長還是很投入。」鄧巴高中的數學老師I先生發現，雖然出席率很低，「但成績最差的學生的父母來了。」保羅國中有個三名教師組成的團隊，他們見過一百五十名學生中將近一半人的家長。起初他們告訴我，家長出席率和功課好壞有高度相關，接著他

們突然想到一個例外，然後又一個。到最後，其中一名教師下結論說：「也有一些例子，父母已經很努力了，但孩子的表現就是不好。」

老師應該試著去了解學生的家庭，根據「為美國而教」(Teach for America)這項計畫指出(這項計畫招收熱情且聰明的一流大學畢業生參加暑期培訓，接著去貧窮學校任教兩年)，這些初出茅廬的教師受到鼓勵，要跟學生的家人一起去教堂，去參加生日派對，並且把家裡的電話給學生。「兩年內我大概跟超過一百名學生吃過飯，」莉安弗·雷利說道。她在路易斯安那州萊克阿瑟一個小農鎮上教法文。都市貧民窟的教師覺得這項任務很艱鉅，不過很多人還是在努力。

在華盛頓保羅國中教七年級英文的L先生這麼說：「我對我學生的家庭相當了解，有些家庭我從沒見過，有些家庭常常和我溝通，一星期打電話到我家一次。我會開車送孩子回家，周末跟孩子一起出去，全看那個家庭怎麼決定。我把我的電話號碼給他們，讓他們掌握主動權。」在他的一百五十個學生當中，大約有二十五到三十個會常常打電話給他。

了解學生的家庭生活可以幫助教師理解學生的缺點，體諒他們，給予幫助。「通常家長不會檢查他們有沒有寫作業，」M太太說。她是阿克倫的一名數學教師。「家長大多是低收入工作者，他們要上夜班，學生獨自在家，往往還得照顧更小的兄弟姐妹。等到父母回家的時候，小孩都已經上床睡覺了，所以他們差不多都是靠自己。」她盡可能的出手幫忙，「就說我手邊成績冊上面的第一個孩子吧，」她邊說邊指，「他來自一個非常貧窮的家庭，每個老師幾乎多說他有行為問題。」她從他弟弟口中得知他們家很窮，有次戶外教學的時候，她給了這個學生的弟弟一些餅乾和杯子蛋糕，隔天這個弟弟感激地告訴她，剩下的一點點東西夠讓全家人一個星期都有甜點吃了，她這才深刻了解到這個家

庭有多窮困。她開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這名學生。「我覺得他大部分不規矩的行為都是為了要引起別人的注意，所以我盡量多注意他，」她說道：「他沒有能力上代數課，但是他想來，所以我說好吧，讓他進來吧，他就進了這個班，拿了C；他還參加了我們這裡的輔導課，輔導課有成年志工會來幫忙，所以他也可以從那裡得到額外的注意力。後來他來我班上參加自習，在電腦上算數學，他每天午餐時間都來這裡，後來又放棄了，因為這樣他才能去參加輔導課。我一天會替他上三堂課，從來沒有紀律方面的問題。去年他每隔幾個星期就會被停課一次，而今年他幾乎沒有惹上任何麻煩。」學生想要得到注意，是因為他們需要被注意，就像食物、水或氧氣。

曾經任教於富裕學區學校的M太太，一直將表現出興趣和尊重這種簡單的技巧奉為信條。「我試著在教每個學生的時候這樣想：如果這是市長的小孩呢？或者如果這是議員的小孩呢？而不是這個孩子可能連個家或父母都沒有。」她說道：「如果你認為他們很特別，且讓他們也自認為特別，他們就可以感受到你對他們的尊重……只要多花幾分鐘聽他們講話就好了。」

不過這麼做不一定每次都足夠，教師的救援行動也不一定都可行。有些小孩餓肚子，有些常常鬧牙痛，蛀牙膿腫沒有得到治療^①，還有一些需要配眼鏡，否則會看不清楚教室前面的投影或板書。其他像是華盛頓的小拉塔莎，常常沒辦法來上學。「她母親晚上要工作，」哈里斯教育中心三年級的教師說道：「早上可能很累。」沒辦法準時送女兒出門。這讓老師很頭痛，因為在拉塔莎能力不足的外表下，她看出她有聰明的一面。「她的寫作技巧上有很多缺點，」這位教師說道：「但是她的想法很棒，她很受教。」她抽出一頁拉塔莎的日記，是一篇問與答，「如果你可以給無家可歸的人一份禮物，那會是什麼？」

拉塔莎寫道：「我會給他們一間一夫，可以川的一夫，因未他們什麻都沒有，要從垃圾桶裡面找一夫。」

在阿克倫，L太太把潘蜜拉踢出英文班，送進辦公室，因為她「頂嘴」。梅布爾瑞丁格中學的副校長不知道該通知哪個大人。「誰是妳的監護人？」他問這名七年級的學生。她聳了聳肩，她真的不知道。

「我們有一項得花三個星期來寫的作業，星期一要交。」L太太說：「她沒交，只寫了一張很長的便條跟我解釋……她周末不在家，因為她媽媽的男朋友老是打她媽媽，她們只好離開那間房子。去別人家之後，她說『我一直纏著我媽要回去拿作業，但是媽媽不敢回去，因為她怕他會打她。』」來自白人中產階級的L太太跟潘蜜拉一樣覺得無助。「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孩子會失敗，他們連基本的東西都沒有。」她說道：「你知道嗎，如果你沒有房子可以遮風避雨，不知道要跟誰住在一起，是我的話也不會管什麼英文課了。」

「我的學生大約有一半需要輔導員，」茱蒂絲·雅各說道。她教移民青少年讀寫，這些孩子在家鄉幾乎都沒有受過任何教育。有一名十六歲的男孩，剛到華盛頓的貝爾多元文化高中時，不知道該怎麼握筆，既坐不住，也不知道要準時上課。她說這些孩子因為個人問題都有些散漫。有個女孩的父親在宏都拉斯被謀殺了，「她六神無主，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件事情。」其他學生無心向學的原因則有吸毒、懷孕、家庭暴力以及難以融入美國文化。「如果他們在班上的表現不好，他們會覺得很灰心，」她觀察道。「和他們同年齡的人都在工作賺錢，他們很多人會跟我說：『老師，我不想念書了，我為什麼要浪費時間，我十六歲、我十八歲了，應該要去工作，我有我的未來。』他們只看到

明天，沒有看到如果接受教育，長遠來看他們會更好。他們看不到這一點，他們家裡也沒有人是這樣的，都是只想生存下去而已。」

他們所接受的教育沒能替他們打開視野，沒能讓他們看見寬廣無盡的可能性，除非他們剛好在一個非比尋常的天才教師班上，或者是家中有個非常有遠見的大人，否則他們受的學校教育只會限制他們，讓他們變得狹隘、封閉，就算提供了一條脫離困境的路，他們也看不見；就算將來會有回報，他們也算不出來。隨著教育機構年復一年地對他們加工，推著他們沿輪送帶走向畢業或沒有畢業的結局，他們也失去了想像力，不知道自己能夠做些什麼。

參觀學校的時候，我說我在寫一本關於窮忙的書，教師往往會苦笑回應：「噢，那你可以寫寫我。」因為美國主要是以地方財產稅來支應學校經費，社區之間的差異很大，最貧窮、最需要幫助的學校，往往沒有經費，薪資少、地位低，教師這一行吸引不到夠資格的人才，教師群良莠不齊。

「如果你教那些總是能拿A和B的學生，工作就很容易，」阿克倫一名教師說道：「他們的家裡有紀律，家人對他們有期望。但我還是認為需要大師級的教師，要真正關心學生的老師——我覺得要有某些特別的東西，才能教那些沒人要的學生。」

在貧窮的社區裡，許多夢想遭到踐踏，因為教師自己也壓力沉重：大班教學、學生又不聽話、教材也不夠。在鄧巴高中，某個星期四，I先生正在幫他的九年級學生準備隔天的數學考試。他說，他總是在對抗「常見的失調與混亂」。「我從來沒有放鬆過，這裡從來就不是可以安心教書的地方，我總是很緊張，擔心會發生什麼事：學生彼此會起衝突，我跟學生也會起衝突。」那個星期四，他教的五年級學生「活蹦亂跳坐不住」，I先生不知道原因，於是問了他們：「你們今天過得怎麼樣呢？」

都做了些什麼？」最後我把問題的範圍縮小了：「你們第四節是什麼課？前一節上什麼課？」

「他們說：『我們不能跟你講。』」

「為什麼不能跟我講？」

「你會抓狂。」

「你們做了什麼？」

「我們上一節在打任天堂。」

那一節是科學課，那位教師已經放棄了，讓一個帶任天堂遊戲機來的學生，把電玩接到教室的電視上。「如果有全面性的有秩序的環境，這種事情就不會發生了。」I先生感嘆道。「如此，他們來我班上時會準備好要上課，因為第四節的老師也期望他們認真上課，第二節時他們也認真上課，第一節時他們也認真上課。」

前一天，I先生在跟一個沒寫作業的男孩談話，I先生問其他堂課的作業如何，這名學生說其他堂課都沒有指派作業。「我簡直不敢相信，」I先生說。教師也深受夢碎之苦。

長久以來，大家了解期望會影響成就。當教師跟家長相信孩子能做好，孩子會比被認為沒能力時做得更好。而教師的評價有時候是基於種族或階級成見，長久以來，美國人心目中的黑人形象就是比較不聰明、能力比較差，那樣的觀念根深柢固，可能會讓一個常春藤名校的白人教授，在警告學生「這份作業很難」的時候，直盯著教室裡唯一的黑人學生。許多非裔美國學生都反映過這類事情。

但是期望降低也可能是因為在貧窮學校中所碰上的艱辛經歷，那裡的教師和孩子都陷在低預期和低表現的漩渦當中。「我對聰明的定義已經改變了，」在貝爾多元文化高中教了一年書以後，阮素嫻

承認。「我會走過去跟某個學生說：『噢，老天，你看，你可以做到這個！』我知道如果他們是我的大學同學，我絕對不會認為他們能夠到那樣的事情是很聰明的。」

灰心的孩子加上不能勝任的教師組合，讓事情越來越糟，即使是在非常努力的華盛頓哈里斯教育中心，教師也顯露出疲憊和能力不足的跡象。哈里斯教育中心是一棟相當現代的建築物，沒有窗戶，荒涼得只要再加上高高的電網和守衛塔，看起來就像是監獄了。校內只有一扇通往金屬探測門的門沒有上鎖，由警衛看守——那是兩名身穿海軍藍制服的年輕黑人女性。不過進到門內，那種像是懲教場所的感覺就消失了。這間學校幾乎沒有內牆，興建當時是七〇年代，流行開放的教室，所以用不完全的隔間畫分出「教室」。嘈雜的噪音在教室之間流竄，學生到處蹣跚，很難掌握他們的行動。

從學前班到八年級的孩子，都來自於華盛頓最貧窮的社區之一，那裡充滿毒品和暴力。學校前面的利文斯頓路上有個醒目的標誌，是由這個城市的虛構部門¹所設立的，上面寫著「禁毒區」。某個三月的下午，就在學校放學之前，一台紅色跑車開過來停在那個標誌前面，有兩個人坐在前座。恰好就在這個時候，有個男人從對街的公寓裡拖著腳步走下來，透過車窗跟開車的人講話，接著大步繞過車子，坐進後座裡去。五分鐘後，他離開了，一名年輕女子走進這台車子，簡短交談後坐進後座待了幾分鐘。看不到那裡有警察。

孩子把社區和家庭裡的缺陷帶進學校，有些教師也有自己的缺陷。一份三年級作業的題目是「描

¹ 譯註：此處原文為 fiction department，可能是借用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 《1984》 (Nineteen

Eighty-Four) 裡面的「小說司」一詞。原文中這段有政府形同虛設之意，故譯為「虛構部門」。

述暴風雪的三個影響」。有個學生寫道：「暴風雪的三個影響是停電、大家會滑倒、車子很難川約雪地。」教師用紅筆在「川約」下面改成「川越」。

七年級的數學老師D小姐，被自己的思考與推理技巧課程的問題給弄糊塗了，她努力思索著投影在螢幕上的問題，「狡猾的傑克花了五十元買一匹小馬，一星期後，他以六十元賣出小馬；兩星期後，他以七十元買回小馬；又一星期後，他以八十元賣出小馬，請問他賺或賠了多少錢？」

她正確地列出了正數和負數的總值：

$$-50 + 60 - 70 + 80$$

總計是賺二十元。要上這堂課，學生必須有相對較好的測驗成績，但仍然並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跟上她，不是每個人都能集中注意力。有一位穿黃色衣服的女孩專心在聽，她舉起手來，走到投影機旁邊寫下另一種解答方法。她在投影片上的六十旁邊寫下「賺十元」，在七十旁邊寫下「賠十元」，然後在八十旁邊寫下「賺十元」。這個靠不住的邏輯足以讓全班跟D小姐一籌莫展，怎麼會有兩種不同的答案呢？D小姐無法用另一個想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最初三筆交易總共花了狡猾傑克六十元，最後他賺回八十元。沒人能夠解開困惑。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們很快就不再嘗試了，在這堂問題解決課的班上，不管是學生或教師似乎都沒有打算用心解決問題。他們放棄了這道問題，繼續去做別的了。

在阿克倫的梅布爾瑞丁格中學，六年級文法課上的失敗比較沒那麼明顯。年輕又靈敏的B小姐像隻老鷹一樣盯著她的二十二名學生，絕不漏掉任何一個亂動或是眼神亂飄的傢伙。她謹慎地瞄了一眼座位表，一個個喊著學生的名字。這時是開學的第一個月，她已經完全掌握了班上的行為，但是

卻幾乎無法掌握他們的智力。前一天她已經教過他們句子的簡單主詞，今天要講完整主詞——名詞加上所有的修飾語。她要他們打開課本的第三百四十五頁。她解釋道：在「一隻鮮紅色的紅雀坐在窗台上」這個句子中，「紅雀」是簡單主詞，「一隻鮮紅色的紅雀」是完整主詞。這些孩子看過紅雀嗎？為什麼不說「一輛大型的藍色警車」或是「一棟紅色的磚樓」呢？如果學校功課能與孩子的經驗相關，就不會被經驗所限制了。十幾年來教育界一直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市區的黑人小孩終於可以不必看著課本裡只有郊區白人小孩的身影，但是仍然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在同一所學校裡，數學老師出了一道題目，要學生計算百分之十五的小費是多少，她很震驚的發現，她教的八年級生裡面，幾乎沒有人知道什麼叫小費。就算他們有機會外食，也只去過快餐店。

「如果我說：『一隻大紅色坐在窗台上。』這個句子有意義嗎？」B小姐開玩笑地問道。
「沒——有！」全班回答。就算她想過要讓練習變得更有意思一點，她也成功地克制住了這樣的想法，例句一個比一個還乏味，很多學生都搞混了直接受詞跟簡單主詞。「你聽過葛洛麗雅·伊斯特芬 (Gloria Estfan) 的新專輯嗎？」她問這個句子裡哪個單字是簡單主詞。

「專輯？」有個小孩問道。

「不對，他們在跟誰講話？」

「你。」

「沒錯。」

這種辨認句子主詞的方式很令人困惑，為什麼不去解釋主詞就代表做動作的人事物呢？

「那些記者整天都在採訪市長。」

「那些記者。」

「沒錯。戴米恩，你可以告訴我們簡單主詞是哪一個嗎？」

「市長。」

「不對。史丹？」

「記者。」

「因為我們關注的是記者。」解釋得這麼糟糕，難怪大部分的小孩都沒聽懂。但是B小姐輕快地繼續講下去，留下一堆困惑。

教室內讓人困惑的測量方法之一就是標準化測驗，這已經成為一項非常重要的成功指標，能證明校長的職涯有進展（或是脫軌了），能替學校增加（或減少）資金。依照這個衡量標準，華盛頓的哈里斯教育中心狀況很糟，不過還是有進步。校長西奧多·辛頓說起話來不愠不火，卻很有決心想實現改革，也有所進展。他實施了大量的課前和課後計畫，讓許多孩子從早上七點到晚上六點半都有事可做；他爭取到很多電腦設備，雖然大部分教師不知道該如何物盡其用。測驗分數還是很低，不過開始有提升了：成績低於初級的學生百分比（就是「幾乎或完全無法掌握基本知識與技能」的意思），在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一年之間，數學從百分之四十三點一降低為百分之三十一點八，閱讀從百分之二十五降低為百分之二十一點八；至於「精通」的比例（「學業表現紮實」的意思），數學從百分之十六點六提升到十九點三，閱讀從百分之十九點三提升到百分之二十四點六。這些數據不包括英文程度有限的移民孩童，或是那些有學習障礙的特教生。

這些數字能代表多少真正的學習進步，教師之間意見分歧，因為他們需要用大量的上課時間來

為學生準備考試。考試貫穿了整個學年，並在每年春季考前幾星期達到高峰，例如在貝爾多元文化高中，從秋天開始，每堂五十分鐘的課會有二十分鐘在準備考試，每星期三次；接著到了一月，變成每兩天三十分鐘；最後是每天三十分鐘。有些教師覺得這些考試對數學和閱讀技巧有幫助，但是數學老師阮素嫻並不這麼認為。「一點關係也沒有，只是讓他們更熟悉考試的形式，」她斷然地宣稱。「我覺得那比較像是在建立自尊，我不認為那真的能夠幫助他們學習。」

有些教師發現考試題目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來說相當不利，因為他們的生活經驗有限，某些說法像是「注意力的中心（the center of attention）」，意為「關注的焦點」，或者是「留在空氣中（leave up in the air）」，意為「懸而未決」，讓孩子百思不得其解，因為他們只會從字面上來理解這些詞語，他們只能試著憑空想像。有一題數學題用「法蘭克福」來表示「熱狗」，造成了一陣混亂。「誰還會叫熱狗『法蘭克福』啊！」哈里斯教育中心的老師不耐煩地問抱怨。

「我的學生讀到關於露營的故事，」在華盛頓韋伯小學教二年級的V小姐說道：「他們得去猜故事裡的小孩在做什麼，故事裡的他們帶著睡袋去搭公車，但我的學生從來沒有露營過……甚至連營地都沒去過，他們不會知道在那裡就是這樣。」而且他們的注意力很短暫，她補充道。那些還不會閱讀的孩子沒辦法專心聽教師念數學測驗題目。「他們只會因此頭昏腦脹，」她說道。

此外，學校如果執著於考試的結果（因為那會決定下個學年度的預算），遠遠落後的孩子就更不可能得到關注。有些教師承認，「瀕臨及格邊緣的小孩會得到幫助，」來自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的一名教師說道：「但墊底的小孩就算進步一點點，也不會讓學校的考試分數有什麼差別。」

自發性幫助孩子的欲望被消耗殆盡，我在考試前幾個月觀察到，老師們似乎既匆忙又嚴苛，他們

像奔馳的火車般飛快帶過練習，把慢半拍的孩子扔在一旁，彷彿他們是被風吹落軌道的垃圾。教室裡很容易就能看見迷失的孩子，那些在聊天、打瞌睡，或是讀著跟那堂課無關的書籍的孩子，這些失敗了而被壓得粉碎的粗野孩子，他們不了解教材，也不想再嘗試。環顧教室，你就能夠把他們找出來，而且似乎數不勝數。

華盛頓的哈里斯教育中心在考試前的一個星期，二十名就讀四年級的小孩，大部分時間似乎都在放空，沒花多少力氣做練習。教師急急忙忙地灌輸答案給他們，也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大部分的學生都不知道「 $1/2 \times 8$ 」的答案是什麼，也看不懂柱狀圖提示的哪兩種水果能湊出一百份水果盤（答案很明顯是八十份蘋果和二十份葡萄）。後排有兩個女生幾乎每一題都答錯，但卻不去弄清楚為什麼錯了，老師也不管。這個班級不大，但是老師從來不走動，不去找出個別學生的障礙和問題。

梅布爾瑞丁格中學的N先生，就是那個能夠預測哪些家長不會來參加懇親會的數學老師，有天正在教導學生做試算表。他用電腦把方格投影到螢幕上，帶著學生進行計算。「大家專心的跟我一起算，」他對這二十五名六年級學生這麼說，接著飛快地把課給講完了，似乎沒有幾個孩子聽懂。試算表的儲存格可以用來計算收入，只要輸入工作開始的時間、結束的時間和時薪。N先生試圖要學生寫出適合的公式插入儲存格，但全班只有茱莉一個人做到。她是班上的六個白人之一，也是少數家裡有電腦的學生。她一次又一次地舉手，手舉得高到她幾乎都要離開座位了。她說道：儲存格D2裡的工作時數，應該是 $=(C2 - B2)$ ；時薪六美元的總工資應該是 $=(D2 \times C)$ 。N先生點名其他的孩子給他們機會，但是他們從來都沒有答對。茱莉則一直答對，每次他請她來電腦前按下輸入鍵，她都很高興。變！正確答案出現在儲存格裡——即時滿足、正增強，她笑得像個小精靈般。

其他的孩子大多悶悶不樂、漫不經心，後排有個男孩開始哼歌，其他人則竊竊私語、交頭接耳。

N先生把那名男孩叫去辦公室，然後要一名女孩到旁邊罰站幾分鐘，接著他前後走了幾趟，查看學生的操作情況，一邊說：「做得不錯，做得不錯，但是你選錯儲存格了。」在這個人數還算合理的班上，他盡可能留意各個學生，但是他的課讓很多孩子都跟不上。

坐在那邊卻不能理解一定很痛苦，看到成串遙不可及的數字和字母，腦子肯定會當機，思緒便遊蕩到更有趣的事情上，遠離令人抽痛的無力感。那一天，讓電腦顯示出正確答案的樂趣、解決小小難題的樂趣、學習的樂趣，全都遠離了大部分的孩子。

講台上的人的狀態看起來也不甚理想。「我用電燈開關來做比喻，」阿克倫一名職業學校的教師說道：「開關關著的時候，電無法進入，也無法輸出。就像某些學生學會走進教室，不管老師是誰，就把腦袋的開關關上……而我試著想讓開關開著，那很難啊。」

在幾間學校裡，我問學生上課時聽不懂老師教什麼的時間，大約占了多少百分比，答案令人心寒。華盛頓保羅中學七年級學生的評語很典型：

「一半吧。」

「不是一半，大概是百分之二十五。有些老師講話太快了。」

「有些老師字寫得好難看。」

「大部分時間我都不懂，不過反正我就不聽了，因為他們還是會一直講下去。」

「他們不想讓學習變得有趣吧。」

聽不懂的時候，你會做什麼？

「裝得好像有聽懂啊。」

「點頭微笑。」

「因為如果你表現出聽不懂的樣子，其他小孩就會笑你。」

有請老師解釋過嗎？

「有啊，有時候會，但是……他們會生氣……『別問了，我們要趕課。』」

「有時候，老師如果你看到你在講話，然後你發問，他們就不會回答了，因為那是你的錯，你被抓到上課在講話。」

如果你不懂老師指派的回家作業，你會怎麼做？

「就不做啊。」

「我會打電話找我最聰明的朋友。」

「我還是會做，只是照我的方法來做。如果我做錯了，那也不是我的錯，因為他們沒有解釋清楚。」

在每間學校裡，學生至少都可以指出一、兩名傑出的教師，因為他們會回答學生的問題，並且表現出對孩子的尊重，雖然更常見的狀況是孩子根本不敢發問。「他們會對你講一些很難懂的話，或是給你一個無理的回答。」阿克倫一名八年級的男孩說道。他的同學補充說，老師的語氣和肢體語言，讓他們覺得自己很笨。

「他們回答你的樣子，就像是你應該要知道答案一樣。」一名女孩抱怨道。

「他們不肯給答案，然後等你去問朋友，但他們又不准你在課堂上講話。」一名男孩說：「你只

是想知道答案而已，可是他們就是不告訴你。無論如何，你都得不到答案。」

「有時候，」一名七年級的男孩說道：「去問老師很可怕。」

當然你不用是窮人也會有這種經歷。不稱職又不細心的教師，在富裕學區裡也會有，就像貧窮孩子的教室裡也會出現優秀的教學；但是來自富裕、高教育水準家庭的孩子有張安全網，如果他們聽不懂，可以在家裡得到幫助；如果他們有學習障礙，父母可以請家教和輔導老師，甚至找律師向學校施壓。有錢的家長可以想方設法去處理學校的問題，但是對於一個沒受過多少教育、沒時間、沒錢也不知道該怎麼應付體制的母親來說，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比如說，一個患有注意力缺失症的孩子，生在貧窮家庭而有成就的機會，遠比生在富裕家庭裡來得低。根據羅伯特·尼德曼爾這位行為兒科醫生的經驗，在那些於克里夫蘭的醫院和門診中心來去去的病患中，他看到了鮮明的對比。這種名為注意力缺失症(ADD)的病症，特徵是無法集中注意力與容易衝動，「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裡並沒有比較普遍。」他說道：「但我常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身上看到，家長、尤其是單親的家長，能幫助他們應付注意力缺失症的資源更加匱乏……你很窮的時候，就得出優先順序，你不能什麼都做，你不能又去學校接孩子，又去購物，又去兌現支票，同時還去看醫生。」

一個有辦法的家庭，「可以把孩子送去托兒所，或者送去很好的學校。」家長可以從壓力中喘口氣，把孩子交給保姆。「然後等我換了職務，去到門診中心，我看見有同樣生理狀況的孩子，家長卻沒有半毛錢。這些孩子待在擁擠的教室裡，總是被大聲喝斥，其他有類似問題的孩子也在大叫。但如

果家長請假，他們就會面臨失業的威脅……現實中，每個人能夠解決問題的資源不同：可能第一個孩

子不會遇到太多困難，他被送去看心理醫生，媽媽會每星期花錢帶他過來；第二個孩子，你把他轉介給心理醫生，但是媽媽沒辦法每星期帶他過來，因為她要工作，也負擔不起。我們的心理醫生是個很有才華的實習醫生，不過她待了一年以後離職了。」

「到最後，」尼德曼爾醫生下了結論，「這兩個孩子之間會有顯著的差異，一個會打架鬧事被停學，只差一步就進了少年感化院，在現實生活中失敗；另一個則會進入有錢人才能讀的私立學校，在考試中拿到B跟C。」

在有錢人讀的私立或公立學校，孩子在課堂上會用與自身相關的教科書，能夠接觸電腦，還有一系列令人眼花撩亂的課外活動，從管弦樂團到西洋棋俱樂部，應有盡有。在城鎮裡的貧窮區域可就不一定了，貝爾多元文化高中沒有管弦樂團，只有一個小小的爵士樂隊；學校裡沒有體育館，只有一座足球場，不但在對街，還得跟另一個中學合用。這間學校裡的某些老師，包括萊蒂絲·雅各和阮素姍，都沒有固定的教室，所以她們把所有的教具都放在一台手推車上，看起來就像是教育界的流浪漢。阮小姐的學生總是取笑她，因為她會在走廊上推著她的雙層推車，上面堆滿書本、檔案夾，還有一個裝滿工程計算機的鞋盒。她的小書桌跟其他兩張桌子一起，擺在狹窄且沒有窗戶的儲藏室裡，旁邊是一整個書架的教科書和紙張耗材。

就連紙張也很難取得，在哈里斯教育中心，有一班三年級學生拿到的龍捲風示意圖，就印在美國新聞總署贈送的紙張背面，上面還蓋著美國印章跟「署長辦公室」的字樣。教師稱這些紙是「變節紙」，並且讚揚校長西奧多·辛頓。「辛頓先生很有辦法，」她說道。在八年級的教室裡，價值三百美元的新地圖取代了一九八〇年代的過時版本，可惜新地圖現在還捲得好好的放在牆邊，因為學校裡

沒有人可以把地圖掛起來，畢竟得要在黑板上方的煤渣磚上鑽洞，才能裝螺絲；另一方面，過時的地理教科書已經被閃閃發光的新版本給取代了，每本要八十美元，書多到夠讓每個學生都帶書回家，還有另一套留在教室裡上課用。

這是貧窮公立學校資源分配不均的證明——一邊什麼都缺，另一邊卻突然湧進供應塞得滿滿的。哈里斯教育中心裡全是電腦：兩間電腦教室和圖書館，再加上幾乎每間教室裡都配有電腦。這是用聯邦政府所撥的款項購買的，三台青綠色和灰色蘋果電腦，就擺在C太太所教授的七年級數學教室的後面；但是她所受的兩天培訓並不足夠，她還沒學會該如何跟學生一起有效地使用這些電腦。此外，電腦沒有磁碟驅動程式，外接驅動也還沒有送來，她沒辦法用電腦列印，所以她從另一個七年級班級那裡找來一個瘦高的男孩，要他把電腦線路接起來，開始運作。這名男孩是課後電腦維修團的一員，有點像是以前那種由對機械有興趣的孩子組成的視聽維修團，可以在校園裡閒逛，擺弄電影放映機。

但是在貝爾多元文化高中，使用電腦僅限於在電腦教室，那裡總是客滿。阮小姐說，她本來可以在課堂上用Excel試算表，來進行「不用動腦的運算，」她說道：「如果可以用那個很快地強調某個重點與學習技巧，那就太好了。」但是她的教室裡沒有電腦。

鄧巴高中替I先生買了十六台繪圖計算機，每台一百美元，兩個學生可以共用一台。他說如果他班上註冊的三十六個學生同時出席的話，就會是個問題，不過出席人數通常是二十人，所以供應還算充足，但是用處有限。「他們花了大概一千六百美元買這些計算機，」他說道：「但應該再買一台附有投影設備的計算機，那樣才能把計算機螢幕投射到白板上。我沒有這種計算機，所以很難讓他們看到我在計算機上做什麼。我曾經有一台，但是壞了，所以沒辦法讓大家都看到老師怎麼操作。」

二十歲出頭的 I 先生是科技世代的優良成員，但是他並不迷戀把電腦當教具，看著同事用電腦遊戲來教數學，他宣稱：「我喜歡孩子用手寫，去思考、去表達。」

卡雅·韓德森 (Kaya Henderson) 也是，她是「為美國而教」這項計畫的督導，在南布朗克斯的 I.S.162 中學教西班牙文。這所學校有很多電腦，可以上網，還可以交日本的筆友。「這些全都很好、很棒，」她說道：「除了一件事情。我有六、七、八年級的學生，他們全都不知道該怎麼寫信給朋友，更別提跟日本的小孩交流了。所以這些電腦有跟沒有一樣，學生根本連基本技巧都還沒掌握。我認為這是城市教育或是資源不足的教育最重大的議題：大家還是用很低的標準來看待學生。要確保他們學會應該掌握的事情，這輩子才有可能成功。」

她自身的背景塑造了她的熱情，和她大部分的學生一樣，她是黑人。雖然她是來自紐約弗農山的中產階級，畢業於喬治城大學。「你知道的，等你去工作後，自然會有人可以教你用電腦。」她觀察道：「你不一定要在成長求學的過程中都有電腦可以用，我就沒有。但是有人教過我怎麼閱讀，所以我可以看電腦書籍弄清楚；有人教過我解決問題的技巧，還有人教過我乘法。但是我的學生每十五分鐘才能敲出三個字給日本的小孩，也寫不出能寄到另一個城鎮的信。」

除此以外，儘管學校悠遊在電腦海中，韓德森小姐卻只有二十二本書能給她的兩百四十名學生讀。「我什麼都得到用影印的。」她說道。

「書不夠，沒有人有書可用，」洛杉磯瓦茲區的葡萄街小學裡，一名數學教師觀察道。「老師把一切都抄到黑板上，或是用影印的。」影印機沒壞的時候，有些學校會控制影印經費，拒絕教師使用或是限制影印張數，在韓德森小姐的學校限額是每星期五十張，少得荒謬；幸運的是，她可以使用「為

美國而教」的紐約辦公室，她花了好幾個小時在那裡影印。在她成為「為美國而教」在華盛頓特區的督導以後，韓德森小姐確保該計畫的辦公室也有一樣的功能。「我們全部的成員都有一個代碼，他們可以進到辦公室來，一天二十四小時，一星期七天都可以使用影印機。」她說道。「我們這台可憐的小機器，每年影印了成千上萬的資料。」另一個選擇是自掏腰包去金華影印連鎖店 (Kinko's)，很多教師自己出了不少錢。看到這些艱困的情形，華盛頓公立學校開始給每位教師每年二百五十美元的材料費，這筆錢提供了部分的援助。

「我花的錢很驚人啊，」茱蒂絲·雅各說道：「我看到什麼都印。」她對他們學校圖書館的評價是「可怕、太可怕了」，所以她花很多時間去找慈善書籍拍賣。「我幫學生找他們可能會喜歡的書，找得都快瞎了。」其他地方也一樣，很多學校的圖書館藏書稀少，也沒什麼人去使用。哈里斯教育中心的圖書館很吸引人，滿屋子都是學生，不過大部分人都坐在電腦前面，藏書乏善可陳。圖書館員潔拉汀·哈特去年收到一整箱的新書，但都擺在她辦公室的門後面，還沒打開，要等到哥倫比亞區的董事會引進新的電腦化編目系統之後才行，她不想把書上架後又得重新編目。

學校裡充滿了自我實現的預言，學校是夢想與失望交會的地方，孩子在此得到信任或是遭遇挫敗，燈火在此點燃或是熄滅。在瓦茲，我問葡萄街小學的數學老師，哪些問題可以用更多的錢來解決，「除了孩子受到的創傷以外，幾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他說道：「有更多錢的話，我們也可以提供幫助，把這些問題處理得更好。」

他的回答中包含了一點很重要的點，貧窮或瀕臨貧窮並不是一個單獨的問題，而是一系列環環相扣

的問題。如果學校有人手跟資金，能夠提供各種服務，就像巴瑞·祖克曼醫生的小兒科部門裡有律師和社工那樣，那麼某些平時難以觸及的困難也許就能被解決，學校本身也能運作得更好。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學校已經做了一些這樣的事情，供應免費或低價的早餐和午餐來改善孩子的營養（也因此改善他們的注意力），提供課後活動讓要工作的家長當作日托。

更重大的角色能帶來的影響則更廣泛，比如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五日那個下雪的早晨，華盛頓特區的官員保羅·萬斯（Paul Vance）想讓學校照常上課，即使周遭郊區的學校都停課了。面對六到八寸深的積雪，萬斯宣布該市的學校照常上課，然後在早上八點前幾分鐘，他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話，關閉學校。政客和評論家都批評他優柔寡斷、不善管理，但是他的目標很崇高，他不想讓父母們的生活複雜化，因為他們面臨要失去工資還是要把孩子扔在家裡沒人管的情況。在他學區裡的大部分孩子都很貧窮，有資格領取早餐跟午餐補助，他很清楚那些批評他的人並不知道，如果學校關閉，很多孩子那天早上就得挨餓。兩個月以後，同樣在這座城市裡，小布希提交了一份預算案，讓全國各地的孩子更難在學校裡吃免費的午餐了。

我常常在想，要了解一個國家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參觀該國的監獄、醫院和學校，在那些機構內，社會的道德和眼光在理想的映襯下，顯露無遺。在《野蠻的不平等》（*Savage Inequalities*）一書中，喬納森·考澤爾（Jonathan Kozol）憤怒地引用了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在十九世紀時寫下的關於美國的話：「在一個沒有階級的國家裡，孩子並非生來就享有父母的社經地位，而是充滿可能性，能獲得一切思想與勞動的成果。美國人不願意見到任何人在童年時就被剝奪競爭能力。」

考澤爾的評論是：「今日讀到這些文字，不免感到諷刺又悲哀，剝奪『競爭能力』也許是大都市

裡唯一讓窮孩子都有得到的教育。」^[2]

任務似乎夠清楚了：讓莎米卡有可能成為律師，讓拉塔莎有能力寫作。但是在不幸的貧民窟聚集區，在這個國家農田旁奮力掙扎的移工營房裡，在中西部和新英格蘭那些城鎮裡，在奄奄一息的工廠中，美國並沒有輕輕地踩在孩子的夢想上。

第十章 工作行得通

Chapter 10

有很多天才都埋沒在多年濫用藥物、酒精，
或者是身體虐待之下。
不一定是哪個，但是當掩蓋的外表開始層層剝落……
噢，底下看起來好像有顆小鑽石。

——莉里·布洛克，前毒癮者

一開始，職業培訓人員注意到，桃子講話的時候只能勉強和人保持目光接觸，大多時候她會看著地板；講話有時候小聲到聽不見，吞吞吐吐，令人費解。如果攝影師跟藝術家想要記錄何為痛苦的話，桃子的臉龐會吸引他們，因為她的臉上還留有童年時期受虐、成年以後無家可歸和賣淫的種種蹂躪傷害。而那種曾經受創產生的冷酷表情，被一個造訪桃子曾經居住過的女性收容中心的藝術家捕捉了，畫在一幅畫中。漸漸地，在幾個月的就業培訓中，桃子抬起目光，找回了自己的聲音，內心有股可勝任和可能性的感覺萌芽、甦醒了，她展開了復甦的旅程。一旦開始好轉，她再度回頭看那幅畫像，那張臉令她震驚。「看到自己曾經的狀況令人吃驚。」她說道：「我看起來負擔好沉重，眼睛下面有黑眼圈，你可以看見我身上的重擔、我真正的靈魂。」

桃子是典型去報名就業培訓中心的那種人。就業培訓中心在賓夕法尼亞州大道附近，距離白宮約三英里遠。這裡的許多人在過往嚴重受創，必須從最基本的學起：守時、與人交談、接聽電話、完成任務、相信自己。要做到這些，培訓人員得找到每個人心中的那道光，讓光發亮，然後在四到八個月的指導過後，每個人都要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

桃子坐在一台電腦前面，挪動滑鼠，點擊、打字，指導員杜恩·哈里斯俯身靠近她的肩膀，溫和地提醒她該怎麼將標題置入文件的圖形框中。「現在，點選這裡的文字框。」他說道：「不對，不是那樣，刪掉整個框框。現在選擇那段文字，不對，不要貼上，妳要把游標移到框框裡面。」他輕柔地善地糾正她、教導她，她有點沮喪，輕輕地拍了一下桌子，最後他終於接手游標，替她製作出框框，然後向她講解其他的步驟。「妳上一次存檔是什麼時候？」他問道。

這些學員，或是「團隊成員」，全都是成年人，不過他們尊重老式的階級制度，都叫他們的指導

員「哈里斯先生」。哈里斯在中士退役後開始做這份工作，他之前在美國海軍陸戰隊待了二十一年，在那裡學到了可以應用在此的經驗。「我帶領過所有人都放棄的年輕海軍陸戰隊隊員，」他說道：「那是一項挑戰。」那是他樂在其中的挑戰。他是黑人，就像他全部的學員一樣，所以他們關係密切融洽。他很沉穩，要求很高，熱心助人，在大教室裡營造出真正辦公室的商務氣氛：大家期待你準時來上班、穿著合宜、勤奮努力、做出績效。他也會隨機進行毒物抽檢，驗到一次你就出局了。

就業培訓計畫一開始只是個簡單的慈善廚房。一九七〇年時，賀瑞斯·麥肯納(Horace McKenna)這位天主教的神父，開始在北國會大廈街上的一間餐廳提供食物給無家可歸的人，「人人有飯吃」(SOME, So Others Might Eat)這個組織的構想出現了。隨著層層問題的揭露，SOME增加了一些計畫：因為許多來領取食物的都是有毒癮的人，所以一九七五年時增加了一個治療計畫；但即使在經過治療之後，很多人還是很難找到像樣的住房，無法展開新生活，所以在一九八八年，中途之家誕生了，恢復中的毒癮者可以在井然有序的環境中住九十天，一邊找工作，一邊從工作人員和同伴那裡獲得支持。房子依然是個問題，因為生活在過去的誘惑之中，許多毒癮者很難戒除惡習，所以隔年又替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增加了一棟單人房公寓大樓。一九九一年，SOME加強了毒癮治療，在一個占地四十五英畝的休養之地，開設為期九十天的療程，成立了位於維吉尼亞州的「脫離之家」。此外，因為大部分人還是缺乏進入職場的技能，所以在一九九八年，SOME把一所閒置不用的天主教學校改成了就業培訓中心，他們提供的課程有辦公室技能、大樓維護和護理課程，學員也會學到如何撰寫履歷、如何進行面試，還有如何在同事面前說話。

「每名團隊成員每天都要體驗一次成功。」該中心的副主任史考特·佛斯迪克宣布。因為他意

識到是失敗的模式讓學員們淪落至此。「這是激勵技巧的一部分。有些人從來沒碰過電腦，打開電腦進入程式就等於是一次成功；大樓維護指導員要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準備一個工具箱，那滿簡單的，但卻是他們成功的具體象徵。接著他們就開始做比較困難的事情，像是焊接水管和連接電源插座。他們有很多恐懼，那是最主要的障礙，就像是『我從來都沒有成功過，所以我怎麼可能做到？沒人期望我成功，沒人想要我成功，沒人在乎我成不成功。』他們對於嘗試新事物和打破內向孤僻，是有很多恐懼的。」

打破內向孤僻的方法之一，是在早上與團隊成員進行例行性的簡短談話，有時候是要他們事先準備主題，有時候是即興發揮。在這樣的練習中，他們有很大的進步。起初這種經驗很折磨人，尷尬、羞澀、焦慮、陌生人凝視的目光、房間裡等待的沉默，學員暗自相信，他要講的事情根本不值得一聽；不過漸漸地，團隊裡產生一種社群意識，因為每個人所吐露出來的問題與負擔，在其他人身上也都有。他們的目光不再盯著地板，話語變得清晰，聲音越來越穩，這些一再失敗的成年人建立起了信心，影響他們人生的關鍵要素成功了：與他人溝通。

桃子還記得關於「自尊」這個主題的幾場小演說，「不管男女老少，屋子裡的每個人都在哭，有一個人說，『我知道你們從哪裡來。』……這裡讓你可以吐露心聲，讓你在一個沒有恐懼的地方釋放情緒……一人暗自哭泣並沒有辦法打開心結。」

某天早上，哈里斯先生要他的學員到會議桌前，即席報告與私生活比較無關的辦公室相關主題。

「即席」是什麼意思？」他問他們。

「一時心血來潮。」有人說道。

他要團隊想個主題。「雇主與員工之間的溝通，」有人提議道。哈里斯先生花一分鐘的時間說明了良好溝通的作用，可以避免壓力、消除障礙等等。接著他點名一個身穿紫色與乳白色褲裝的年輕女子黛拉，她選了「服裝規定」當主題。

她緊張地講了起來，「在工作場合服裝規定的重要性，」她說了一句，然後就停住了。

「別急著講，」哈里斯先生指導著，「妳可以花一分鐘想想看。」

「工作場合的服裝規定，是為了看起來得體，」她繼續說道：「上班的時候不要穿得隨便便。」她陷入了長長的停頓，手支著臉頰和下巴，拚命想挖出更多想法，這次哈里斯先生沒有救她。

「我覺得，」她終於說道：「當我看起來不錯時，我盡量維持這樣。」她坐了下來，掌聲零零落落。

「我們得加強一下，」哈里斯說道：「事情沒那麼簡單。」

這個房間裡沒有虛假的讚揚，不過桃子這輩子從來沒有得到過這麼多的支持，她剛來的時候，「又黑又髒，頭髮纏成一團，很愛跟人爭辯。」她用小時候別人講她的那些貶義詞來形容自己。「剛來這裡時我不吃午餐，因為我沒錢，所以我老是餓肚子。然後支援顧問雪莉扛起了這件事情，她說：『慢著，如果妳肚子餓，妳就什麼也做不了。』她拿了一些花生醬、果凍和麵包回來，我們做了一個三明治，那當中的意義不同一般……還有哈里斯先生，會陪妳散步，跟妳說話，他會說：『妳有心事嗎？』……離開這裡以後，我可以打電話說『雪莉，我碰到這個麻煩。』或者是『哈里斯先生，我碰到這個麻煩。』『佛斯迪克先生，我該怎麼辦？我想換個類似的工作，我想去上學，我要怎麼做？我怎麼處理這個問題？』我總是有人可以問。這裡是個家，是我從來沒有過的東西，是很多人從來都沒有過的東西。」

所以這既是一個療癒過程，也是一個訓練的過程。「我心裡還是有些惡魔，」桃子說道：「不過我已經覺得好多了。」她拿起 SOME 最新一期的通訊刊物，「其實這份是我做的，」她聲明，「而且這份刊物會發給五百個人，你看，我能做點事情，我創造了這份東西。」

製作這份文宣在她的履歷上看起來很有分量，而她之所以能順利學到這個技巧，多虧擅長文字的凱西·托特曼開設了履歷寫作的課程。凱西是中產階級的白人，不過如果學員覺得有障礙，她會很快放下身段，透露她是個單親媽媽，大學時就輟學了。「我不建議你們不去讀大學，」她說道：「不過你總得生存下去。」桌旁的人都在點頭，他們都站在她這邊。

他們在回溯自己的生活經歷時，她會給他們建議，想想這些事在履歷上看起來會如何。「這很重要，」她說道：「做社區服務，而不是做蠢事，不是在麥當勞打工四年。那你要怎麼寫在履歷上？你學到企業規範、服務、公共衛生——很好，這只要花一年就能做到了，不需要花四年。」為了把每一點教育和經歷都變得有血有肉，她鞭策著他們，「要寫出 SOME 就業培訓中心的證書和計畫名稱，」她口述道：「你要描述計畫、時數：九百六十六小時大樓維護與建造、八百一十小時辦公室技能，寫出課堂和實作訓練的時數。」她教他們行話，把平淡化為特別；建議他們閱讀招聘廣告，挑選正確的字彙。「當你從這些行業裡找到越多關鍵字來用，你看起來就越了解那個行業，越像是那個行業的一份子。」她說道。比如說，打字變成「鍵盤輸入技法」，輔導課變成「商務溝通與人際互動技巧」。

隨著凱西梳理出他們的培訓細節，列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他們全都開始挺直身子了。得知大樓維護班打算整修培訓中心之後，她非常興奮。「這是一份重大的工作，」她宣稱：「你們得把它寫下來，」興建教室，擴建租屋，拆除舊牆，砌起新牆，支援辦公室技術電力工程。辦公資訊教室大翻

修，以特殊電力與照明工程支援電腦科技。」你們得學會把你們做的事情寫下來。」聽到製作刊物的事情以後，她說：「『圖像、出版』，就寫成是『設計排版』吧。後面用括號加上『使用微軟相關軟體』，因為那表示你是個能夠巧妙運用程式的人，不是只會輸入數據。」

後來有人說了那個具有魔力的字眼「團隊」，凱西很高興。「我們一定要把『團隊』放進去才行。」她宣布，「『團隊』在現實世界中超熱門的，所以你們是以團隊成員的身分完成各項計畫。這個好、這個好，你們在面試的時候可以講這個，他們會折服的。」

面試就像惡夢般逼近。學員聚集在另外一堂課程中，一位名叫派特的顧問想知道他們有誰參加過工作面試。有一半的人舉手，但是另一半的人沒舉手。她問大家會把哪些字眼跟面試的經歷連在一起，他們說：恐懼、欺騙、擔憂、困惑、緊張、不足、問題、難以招架。有一個人加上：自信，懷疑的目光朝他投射而去。

「坐直一點，」她告訴他們：「挺直腰桿。」他們照做了。她說，要了解那份工作，準時參加面試，服裝整齊，詢問公司的職涯可能性，還有工作的職責。回答問題時要緊扣那份工作。他們擔心領社會救助金、吸毒或是坐牢，讓履歷產生空白時期。「誠實也會替求職之路加分，」她建議道，並且傳授他們一些訣竅：著重於他們能替這份工作做什麼，而不是去想他們過去做錯了什麼。接著她帶領他們用那些讓他們擔心的問題做練習。

「我為什麼要雇用你？」一名學員問道。

「我擅長與人相處。」派特回答道：「我過去經常跟團隊合作……別擔心犯罪前科，只要專注在適用的工作背景上就好。」

「你跟上司在相處上有困難嗎？」另一名學員提問道。

「沒有。」這是一個有自信的回答，你在位子上坐直身子，要說：『不，我沒有。』」

「談談你自己。」

「他們其實並不知道你的生命歷程，所以你可以這樣回答：『嗯，我希望你們明白，我是一個很棒的員工，會以負責的態度來做這份工作。』你不用花二十五分鐘冗長的訴說。」

「你認為你自己兩年後會在哪裡？」

這次回答的是一個學員。「我計畫讓自己在這個領域裡往上爬，可能的話，在這家公司裡得到晉升。」

「噢！」派特驚嘆道：「雇主最愛聽這個了。」

如果他們被問到上一份工作為什麼離職？或者是為什麼他們一直在換工作？

「你得想出一些說法。」她告訴他們：「讓我給點建議：『是的，幾年前我常被解雇，不過我已經徹底改變我的生活了。我參加了這項計畫，基本上我是個負責任的人，工作也很努力。』我再強調一次，你必須要誠實——而且我保證你雇用我不會後悔的。』不過你看到你該做什麼了吧？你心裡要有信心。」

這些全都奏效了。全錄公司(Xerox)需要積極向上的員工到收發室和影印中心工作，替政治說客、法律公司和政府機構做事。他們簽署了以工代賑計畫，每年獲得一百萬美元的減稅優惠，他們從這批學員中雇用了四個人，桃子就是其中一個，溫蒂·韋斯勒也是，就是前文提到那個女兒患有腦性麻痺的單親媽媽。公司訓練他們操作、維修機器，這些機器可以列印、分類、裝訂全彩報告書。他

們的起薪是每小時八美元，很快就調到十美元，包括健康保險和其他的福利。他們的轉變如此戲劇化，全錄公司在許多典禮上表揚過他們（還有公司本身），包括有一次在芝加哥，溫蒂發表演說時，當時的總統柯林頓也在場。「他向我恭喜我的一切，」她滔滔不絕地說著：「他告訴我他有多喜歡我的演講，還給我一個擁抱，叫我對著鏡頭笑一個。」她像個女學生一樣咯咯笑個不停。「照片傳遍了全錄，還登在全錄報紙上，也登在《尊翔》(Jet)雜誌上。」她後來接受邀請，帶著女兒，在柯林頓的陪同之下，參觀了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幾年之後，她女兒的病情惡化，溫蒂必須辭職照顧這名女孩。她六歲了，但體重卻只有二十五磅。溫蒂又回頭領取社會救助金，但是那不會太久，她很確定，因為她的訓練和良好的表現紀錄，讓她進入一間培養電腦技術人員和網頁設計師的學校，學費由社會救助金支付，她有信心她很快就能擁有真正的賺錢本領。

桃子對自己也很有滿意，即使她還是覺得自己很窮。「我是一個領著社會救助金的職業婦女，」她宣稱。「沒錯，我有工作，但我賺的錢跟這個靠在椅背上什麼也不做的女人差不多。我沒有錢，哪裡都不能去，什麼也做不了……而她坐在家裡看肥皂劇，又能上髮廊做頭髮，又能去修指甲。」桃子大笑起來。「而我忙來忙去的，簡直不知道是為了什麼。我是個領社會救助金的女人。」

工作上的花費，對於女人來說不只是交通費，通常還包括托兒費用和治裝費，這些都增加了過渡時期的經濟壓力，然而桃子還是想辦法穿得不錯，花了二十五美元在二手商店治裝，儘管款式有些過時。她存夠了公寓的錢，兼職做起用人造花裝飾禮物籃的小生意。她開始感受到自由的清風拂面，也敢讓自己做一點夢了。「如果我想的話，我可以去紐約旅遊。」她微笑道：「我們可以去那個——那個地方叫什麼？噢，我的老天，我連想都想不起來——甘迺迪中心？去吃午餐跟晚餐。我還打算去

巴哈馬，還有紐奧良……自己去或跟別人一起去都可以，不會覺得不好，我能這麼做，而且很確定自己可以得到……我可以盡情享受，做真正的自己，聊一些真正的話題，而不是誰搞了誰，誰開槍打了誰，誰跟誰又死掉了。」

很多擺脫社會救助金、脫離沉悶窮困循環的人都說，能認識新面孔、接觸一些成功人士，是去工作的一項好處。遇見有成就的同事可以讓人感到精神一振，眼界拓寬，獲益匪淺。例如萬姐·朗崔在堪薩斯市的某間公司裡當祕書，年薪兩萬兩千美元，出乎意料地從她老闆那裡得到育兒的建議。「她說：『萬姐，試試這方法。』萬姐，試試那個，不要打他們，而是這樣做。』我不再打他們，開始做一些她建議的事情，真的有用。我會想：『哇噢！這個好耶！』她的建議大概是『給他們一些東西』。比如小淘氣 (Rugrat) 的書、雜誌，還有《運動畫刊》(Sports Illustrated)。」

有些雇主也意識到令人驚奇的可能性。全錄公司發現，曾經吸毒和曾經接受社會救助金的人，從SOME的培訓中心結訓以後，遠比不請自來的應徵者更加可靠，貝芙莉·史密斯這麼說道。她是該公司的本地人資經理，所以她決定不再雇用沒有受過這種培訓的人。「因為受過培訓的人把準備工作都做好了，」她說道：「所以會比較容易適應過渡期……早起的生活習慣能激發他們的動力。」在她的經驗裡，如果培訓課程中沒有包含「軟技能」的話，結訓的工人在工作中會被育兒、交通和財務管理不善所擊倒。「星期五領薪水，星期二就沒有交通費了。」她觀察道。透過良好培訓計畫雇用領取社會福利的人，「讓我們有更大的人才庫，並且也減輕了我們培訓工作的負擔。」

這是讓人從福利補助走向工作的關鍵：讓這個過程對企業有利。在這個國家的許多地區，福利改革刺激了私人企業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合作。企業主管在堪薩斯市的努力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融合政府與私人資金，結合企業、反貧窮組織和市政府，培訓職場人才；在克里夫蘭，為了確保教學指導內容能利用在工作上，克里夫蘭就業培訓中心的董事會，都是本地企業的負責人，他們捐贈設備，也雇用許多學員。換句話說，就業培訓與勞動市場需求緊密切合。這聽起來可能是常識，但並非每項政府出資的計畫都具有這樣的特點。

成功意味著營利世界與非營利世界的共生合作，是種互惠互利的關係，有時候看起來很像是對私人企業的合理補貼。有個例子是在肯塔基州鄉村邊陲的減稅工業區，那裡有個非營利就業培訓企業——傑克森郡康復實業。他們簽了約，替幾百碼以外的中南電力公司製造電器纜線。來自阿帕拉契地區的貧窮白人女性，坐在切電線的機器前面，把端子固定在兩頭，其他的男男女女則坐在大型的傾斜板前，這些板子上面繞著整卷的電線與錯綜複雜的電信電纜，用牙線般粗細的塑膠線將它們捆在一起。有一間懸掛著透明塑膠布簾的「無塵室」，建造的目的是希望能和朗訊科技公司 (Lucent) 及惠普 (Hewlett-Packard) 簽約。這類完成配線的工作在墨西哥製作會比較便宜，畢竟大部分的美國製造商收費較高，但是康復實業只需要支付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成本花費，其餘會由政府補助。學員會在那裡待九十天，領取最低工資，那裡的福利可能比不上私人企業的類似工作，所以最後大部分的學員都會去私人企業。

這種微型公司有時候被稱為工作坊，且無需假裝他們不是要求苛刻的工作場所，因為他們確實不是。因為不擔心盈利，還有政府補助讓學員能置身真實的工作情境中，他們往往可以用低價跟那些以利潤為導向的同業競爭，那些公司在裝配及包裝產品時，必須考量的事情更多。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似乎都是贏家——除了小型的競爭對手以外。大型製造商省了錢，學員能在實際的環境裡受訓，也

可以在其他地方成為理想的員工。

當然這也有缺點。學員沒有工會組織，有時候會被送去私人工廠裡，以低工資承包代工，而這些工廠不必負擔醫療保險、休假時間、或是其他福利，這增加了接到外包工作的機率，但卻損害了學員的福利，還壓低了工資。好處是企業能獲得廉價勞力，學員能獲得寶貴的工作經驗。在芝加哥，美國龜牌公司 (Turtle Wax) 的兩百五十名員工中，大約有四十人是來自「百姓的選擇」(Options for People) 就業培訓計畫，執行委員主席丹尼斯·赫利同時也是美國龜牌公司的董事長。按照合約，「百姓的選擇」甚至會派主管去工廠，讓美國龜牌公司省去了監督工人的麻煩。學員們負責堆放箱子，執行一些不需要技術的勞動，這對美國龜牌公司來說，是一項占盡便宜的私下交易；不過對來自「百姓的選擇」的學員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他們許多人成為正職員工，還有升遷的機會。從「百姓的選擇」結業的學員占了該工廠一半以上的全職職缺，還有幾個人升到了中階主管的職位。

但是這類就業培訓很少提到勞工權利，所有的重擔都落在學員身上，他們要讓自己夠好才能得到工作，而不是雇主要夠好，提供像樣的工資和工作條件。整個過程並沒有真正賦予員工權力，雇用過程本身也妨礙了員工享受自己具有影響力的感覺，就連一瞬間也沒有。芭芭拉·艾倫瑞克在沃爾瑪超市的雇用過程中就看到許多這類情形。「你先是申請人，然後突然變成了試用員工，」她寫道：「人家把申請表格發給你，幾天後，你拿到制服，被警告不許打鼻環、不准偷東西，過程毫無協商空間，你不會見到未來的雇主，但他有權可以自行削減協議。」^[1]

緊挨著第五十九街鐵路調車場以北的軌道和岔路，「百姓的選擇」把一間閒置的大倉庫改成了喧鬧的工廠。挺著大肚臍的培訓主任李察·布萊克蒙正忙著宣揚自己的熱忱與職業道德。「這裡是我們

的代工包裝部門，」他一邊解釋，一邊在成堆的紙箱和桶子之間穿梭著。「這部分的设计，是希望讓大家做好時間安排，習慣全日的工作；要找好保姆，弄清楚交通路線，然後來賺點錢。他們在這個部門真的可以賺到錢：五點一五美元，那是我們的培訓津貼。」

在一張工作台旁，男男女女都在給罐子貼標籤。空氣清新劑、澱粉、烤箱清潔劑，全是一家叫做柏詩克萊 (personal care) 公司的產品，這些商品會擺在一元商店裡販售。「基本上，我們就是把標籤貼上去，因為製造商不想做這個。」布萊克蒙解釋道：「他們會做出罐子，但是他們不願把標籤貼上去。」他停在另一個工作台旁，「這是我們替食品連鎖店『多明尼克』做的一項計畫，我們的董事會主席是多明尼克的前總裁兼執行長，所以我們跟它們的關係不錯。它們店裡常舉辦促銷活動，等促銷期結束以後……它們就把全部用來促銷的東西送回來給我們，我們會幫它們盤點，然後重新包裝，再送回去讓它們販售。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過期的促銷品還沒重新包裝，像是這個碗跟盤子之類的。」

「這是我們剛替一家叫做歐文—布羅克維 (Owens Brockway) 的公司所完成的檢查工作。它們做好這些花俏的瓶子，但是這些瓶子的問題是，上面有些字的位置歪了，而且你拿起這些瓶子的時候，有一部分墨水會脫落，所以我們用膠帶來測試這些瓶子。基本上就是把很黏的 3M 膠帶貼上去，然後撕下來，重複個幾次，看看墨水會不會脫落，如果墨水脫落或是糊掉，或者是瓶子壞了，我們就把蓋子拿起來，瓶子丟掉，最後把好的瓶子和蓋子送回去給它們……」

「後面這個角落是我們處理油漆的地方，我們跟宣偉油漆公司 (Sherwin-Williams) 有長期合作關係，幫它們回收油漆。如果它們有那種在架上放了兩三年、固體和液體都已經分離的油漆，那麼它們

就把這些油漆運送來我們這裡，倒進那些五十五加侖的大桶子裡，然後再加工重新利用。所以你在這裡看到的，全都是我們幫宣偉公司倒出來的油漆……」

「這個計畫是我們幫一家肯德爾包裝公司（Kendall Packaging）做的，它們主要是做文件檔案箱，但問題是，它們忘了替這些箱子加上扣子跟圓孔眼。所以我們就把扣子裝好，放在箱內的角落，然後用繩子把箱子合上。以前它們會自己做，不過現在決定要外包給我們了，因為我們跟它們建立了很不錯的關係……目前我們有十五萬個箱子可以做。」

布萊克蒙靠著社會救助金，在芝加哥的卡布里尼格林公營社會住宅長大，這裡因毒品和暴力惡名昭彰。他克服萬難念了法學院，學習公司法，然後受吸引到少年法庭實踐法律，做的大部分是公益無償服務。之後他放棄這份工作，到「百姓的選擇」做培訓工作，他似乎是在追溯，從症狀往回走，想找出原因，找到根源所在。「你沒辦法不去領社會救助金，」他以個人經驗說道：「我是說，你得要奮力掙扎，才能從社會救助金裡跳出來。」

他從紙箱、桶子和工作台之間，走進旁邊一間小教室裡去，他站在那裡，一個出身公營社會住宅的成功黑人，面對著十七名失敗的黑人男女，他們都想報名參加他的九十天培訓課程。他確保他們都知道他的來歷，向他們道早安，然後以像教堂領唱和應答的方式帶領他們：

「大家都準備好要工作了嗎？」

一陣低語傳來：「準備好了。」

「大家跟我一起說：我可以做出改變。」

團隊有氣無力地回答：「我可以做出改變。」

「哎唷，你們可以做得更好的，要真心地講：我可以做出改變。」

「我可以做出改變。」

「我也可以找藉口。」

「我也不能兩樣都要。」

「但是我不能兩樣都要。」

「但是我不能兩樣都要。」

布萊克蒙這些教練技巧，是在南伊利諾州大學打後衛時學到的。他拿了橄欖球的全額獎學金，在攔截對方攻球時會給自己激勵談話，彷彿無論中場時落後多少，他真的相信他們一定會贏。「這項計畫是要幫助你學會自助。」他說道：「我們給不了什麼……這項計畫是要喚醒你內心本來就有的東西，讓你自己看看，沒有什麼事情是你做不到的，別人也無法取代你。」接著他讓他們知道，他們已經運用過自己的潛力了。「如果你可以在世界上最艱困的城市生存下來，你怎麼會告訴我說你很笨呢？不管你是三十歲或四十歲，還是二十歲或五十歲，你能在芝加哥生存下來，相信我，你是有腦子的。」

他們能拿到的最低工資沒有像他們鄙視的價格那樣不起眼，他堅持道：「最低工資有其力量，那是一個起點，一小時五點一五美元，一星期四十個小時，一個月就有八百二十四美元。你們有誰可以從社會福利那裡拿到一個月八百二十四美元？沒人舉手，對吧？所以這個最低工資也不算太糟吧？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都能賺到最低工資，那一個月就有一千六百四十八美元，你們有誰一個月可以賺一千六百四十八美元？所以我們比較了解彼此的立場了，不要批評最低工資，那是一個起點。」

「這個房間裡，有誰的銀行帳戶裡現在有五百美元？我看到有一、兩個人舉手了。但是，當你在芝加哥有了孩子，還要背負那些責任的話，你還能舉手說你有五百美元嗎？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你要在這個計畫中學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存錢很重要。我要告訴你每個星期怎麼存十美元，這樣到了年底，你就會有五百美元。我們會談談這個，你得存點錢，好嗎？存錢的關鍵不是一次存一大堆，而是每次都存一點點，而且存很長的一段時間。」

他希望他們為了自己的目標而振作起來。「這個計畫就是關於改變，讓你的生活變得更好。如果你不想要這樣，那麼這個計畫就不適合你，我們幫不了你，因為我們什麼也不能給你。其實，你需要的一切你都已經有了，我們只是幫你認清這一點。」

只要花幾分鐘跟瑞奇·德雷克相處，就可以發現他有多聰明。他翻動他那本厚厚的黑色活頁筆記簿，解釋那些數學和幾何工程圖表，接著帶著我走過金屬地板，參觀克里夫蘭就業培訓中心。這是一座舊工廠，裡面擺滿了製造商所捐贈的設備。他會操作每一部草綠色的車床，每一台鑽床和精密磨床，也能靈巧地操作測微器和測徑規，這是剛踏入機械師這一行的人都要會用的工具。為期六個月的課程，他已經完成了三分之二，這樣一個身壯如牛、充滿動力的人，加上剛學會的專業技術，很難想像他有不出色的過去。

但是他的確有。他的人生長話短說是這樣的，「我來自一個父親很嚴格的家庭，他用木條管教我們男生，一條長的、一條短的，最後這影響了我。軍隊服役的事情也影響了我。我必須倚靠上帝，以靈性思考，解決這些問題。我開始對自己說：『好，我可以做得比這更好，可以把握住這一切。』」

身為貧窮的黑人，他在成長過程中能得到的機會並不耀眼。他以前「有點叛逆」，所以在一九六八年，他離家出走加入軍隊。軍隊發現他只有十六歲，於是找來他的父親，讓他簽署了一份同意書，讓他動身去參加越戰了——他還去了兩次。他擔任電纜接線工、戰地線務員、無線電操作員，這為他帶來了莫名的自由和獨立的感受。「我應該要在這個領域開創出一片事業的，」他說道。他與僧侶對話，體驗佛教與瑜珈，也使用大麻和古柯鹼，到最後被送進軍事醫院去戒毒。一九七三年，他回到「人間」，也就是美國大兵對家的稱呼，他發現只剩下一些零零散散的工作，而且等到試用期即將結束之時，工作往往也就消失了。「就在你要做滿九十天以前，你就失業了。」他說道：「你又回到勞動市場上，那裡可能什麼都沒有，然後你可能就得去打零工，去開卡車送貨之類的，或是隔天去的時候，發現他們只需要人做維修電工。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最後當你去找工作時，你有什麼經驗？如果我只是做了兩個月粗活之類的，那不算經驗。」最後他對毒品和酒精的喜愛壓垮了他。

在他帶我參觀就業培訓中心幾個月後，我去他家拜訪他，他家位於克里夫蘭一個沒落的社區裡，這裡以前曾經住著中產階級。他家那棟磚造的兩層樓房子在角落裡，是他跟太太十年前花四萬美元買下的，他們差點因為財務問題失去這棟房子。房子看起來有些破敗，但還算舒適，當我抵達時，瑞奇走到外面來，過街走向兩個在聊天的年輕女人，給她們其中一人十分錢，換了一支香菸——我說這是假裝戒菸的人會有的行為。「你怎麼知道？」他咧著笑著問我。

他的客廳剛粉刷過，裡面很暗，窗簾全拉了下來。他裝了一個吊扇，正在打磨修補地板，他還打算在地下室加裝一間浴室。他把東西都收拾好，控制住自己的情緒，但他還是有點憂慮。他擔心他的兒子，他二十五歲了，沒有工作，是一個饒舌樂團的成員，剛剛製作了一張唱片，不過如今樂團快

解散了；他擔心他的女兒，她十八歲，未婚卻有一個五個月大的孩子，玩具和兒童增高座椅擺在角落裡；他擔心他另一個女兒，她十二歲，能集中注意力的時間很短，在學校有行為問題；他下定決心不要讓自己擔心自己。

「我什麼妖魔鬼怪都試過了，」他說道：「喝酒、酗酒、吸毒、玩女人，你知道的，就是這麼糟糕。我知道再這樣下去，我會死掉——別人殺我，或是我會殺了別人，我不想過那種日子。在長大的過程中，你會嘗試很多東西，會想找樂子，但是你應該要變成成熟，要能往前走；你可能試過啤酒、大麻或是香菸，你知道的，但是等你長大了，那些就只是成長過程中嘗試過的東西，那些是你經歷過的階段，你應該要變成成熟，從錯誤中學到教訓。有些人可能學得比別人快一點……而你是有選擇的。」

他最後做的選擇帶他找到兩個救贖的源頭：上帝與工作。「以前我去過不同的教派：天主教、伊蘭教、路德宗，我還研究過共濟會。」他補充道：「我研究過神學、哲學。」過去幾年中，他在浸信會教堂裡找到了一個位置，不過工作似乎是他投入最多熱情的地方。完成就業培訓之後，他找到一個起薪一小時七美元的工作，在一家製作割草機、除雪機等機械的工廠裡擔任機械師學徒。「他們只能做一個零件，一個扣栓、一根控制桿、一個彈簧。」他說道：「他們把東西送回我的部門，我們就在上面鑽兩、三個孔，讓東西有一定的耐受力，然後也許要做去毛邊或是擴孔這一類的。」一年之後，他每小時賺八點五美元，在一家鋼鐵工廠操作切割金屬線圈的機器。身為一名訓練有素的機械師，他有賺錢的本事。在二〇〇三年經濟最不景氣的時候，他在另一家鋼鐵工廠的工資漲到了九點五美元，該公司還送他去學液壓和工業維修。如果他能堅持下去，到最後他可以賺到現在的兩倍之多。

但不只是因為潛在的報酬讓他的工作行得通，而是一個修復的過程展開了。他現在有了重心，

他去社區大學修課，提升自己的技能。他每天早上四點起床，搭五點四十分的公車去工作，六點半到工廠，這樣他能有一點時間在七點交班以前讀一點書。晚上大部分的時候他都在上課，到九點或十點為止。

他似乎沒有時間好好跟他的太太德洛莉絲說話，至少在我到他家短暫拜訪期間是如此。即使當著陌生人的面，他的語調還是很粗魯、高高在上。德洛莉絲在醫院裡做餐飲服務工作，回家的時候，她頭上綁著紅色的印花頭巾，瘦弱的身子上披著一件黑色皮夾克。她穿著白色休閒褲，坐在堆滿東西的沙發邊緣歇息，說出她對瑞奇改變的看法。在他狀況最糟糕的時候，她緩緩說道，他們分開了兩年，接著他從谷底爬起來了，就業培訓的每一步彷彿是梯子般引領他向上。「像他這種類型的人，發現自己能夠養家時，會比較鎮定，」她解釋道：「也比較能處在更好的位置。培訓計畫是他遇過最好的事情。」她會怎麼解釋他的轉變呢？「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上帝的指引下回歸正軌的。」她說道。「我們跟上帝在一起時，上帝就開始告訴他，他必須為他們的家庭做什麼；然後上帝也開始告訴我，我必須為我的家庭跟先生做些什麼。」她不覺得這是瑞奇的功勞嗎？「我們把全部的功勞都歸於上帝，就連工作跟培訓也不是我們的功勞。因為他找到培訓的方法，完全是神的恩典。上帝帶領我們一起，賜予他工作，又帶他更上一層樓，讓他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照顧自己的家庭，真的是這樣。」她告訴她，瑞奇為我導覽就業培訓中心時，表現有多麼令人印象深刻。

「真的嗎？」她說道，聲調因為驚訝而微微上揚。

瑞奇沒有爭辯。「我有一次花了一整天跟上帝交談，我睡覺的時候跟祂講話，醒來的時候也跟祂講話。我說：『上帝啊，祢知道我的處境，幫幫我，讓我保持在正途上……』接著祂說，祂幫助我對

抗惡魔。如果你不要讓自己陷入那種狀況，就不用那麼努力奮戰了；如果你沒有跟那些毒蟲一起站在角落，你就不會受到誘惑。你知道我的意思嗎？所以我知道那樣會有幫助。一開始我很猶豫，但是我一直堅持下去，我越來越依賴祂，然後我就能讓我的生活有條理。只有我跟祂，一對一的，我不必把信心寄託在一般人或任何人身上。」

莉里·布洛克一直在逃學，她媽媽也知道。然而有那麼一天，她上完最後一堂課之後準時離開阿那卡斯提亞高中，穿過艱苦的黑人區走路回家，就在走到華盛頓特區那條骯髒的阿那卡斯提亞河東南方，距離她父母那棟小房子還不到一英里路時，有個名叫厄爾的男人跟蹤她。

莉里的名字發音念起來像「哩哩」，像隻小小鳥在歌唱，她講話有時候聽起來就像是詩的節奏一般。她的眼神熱烈，膚色很淺，就像她媽媽一樣。跟社區裡大部分的非裔美國人不同，她坐立不安，受不了學校、家庭、社區的束縛，她想要反抗、找尋、遊蕩，所以她穿越了疆界。「我曾經想讓她對讀法律產生興趣，」她媽媽笑著說道：「我之所以說她會是個好律師，是因為她很會說謊。」

厄爾當時二十幾快三十歲，常在學校外面閒晃，他盯上了莉里。這一天，他開車靠近她身邊，跳下車來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將她的手臂扭到背後，把她推進車裡，揍了她一頓，接著將她載到華盛頓第十四街的紅燈區去，逼她進入一間骯髒的出租公寓。「我記得有個腦滿腸肥的大塊頭、看起來像義大利人，讓他登記住宿後給他鑰匙。」多年之後她說道：「他把我的雙手綁在床頭，告訴我儘管大叫，沒人會幫我。」她大叫，而他說的是對的。他強暴她的時候，她還聽見笑聲。如果她告訴任何人，他保證他會殺了她跟她的父母，而她相信了他的話。「我幾乎像是壞掉了一樣。」接著他還載她

回家。

莉里沒有告訴任何人，當時沒有。她既擔心父母的安危，又怕被父母罵，她很確定她會被媽媽維爾瑪罵。她媽媽知道她曠課，懷疑她在吸毒，她們之間豎起了一道牆，三十多年以後，殘餘的垣壁仍舊使她們的回憶有所分歧。「她大概在吸毒吧，才會有那樣的舉動，」維爾瑪推測道：「那時她開始跟一個白人男孩鬼混，有時候他們從早上就開始吸毒了，我想情況就是那樣。」

「才不是。」莉里聲明。

「她那天一定不是從學校回來，要不然她會告訴我的。」維爾瑪很堅持，「她知道我會不高興，因為她去了不該去的地方。」沒有，莉里反駁道。雖然她曠課過很多次，但是那天她沒有。要是當時她把被強暴的事情告訴她媽媽呢？「噢，現在很難說我當時會有什麼反應了。」維爾瑪承認，「我可能會很氣她沒有待在應該待的地方，我不知道，這是真的。」

「我以為那是我的錯，當然了，你知道情況是怎麼一回事。」莉里說道：「我因為那次強暴而流產的時候，她連來看我都沒有。」不過她爸爸有去，他寵壞她了，維爾瑪帶著微笑抱怨道。

莉里後來下定決心，這個決定就像許多青少年做的決定一樣，當下看似不起眼，後來卻發現事關重大。她沒有把書唸完，就搬到紐約去了。「我完全有機會用另外一種方式處理，而我卻選擇逃跑。」多年之後，她觀察道：「我在逃離我媽媽的鄙視。」

在曼哈頓，她挨家挨戶地賣雜誌。「我遇到某些人，邀我去跟他們一起住，因為他們知道我會走上什麼路，做這種事情會有什麼下場……那家人帶我進入一個我從前不知道的世界……這些人在服用很猛的東西，他們在吸粉。在那個年代，你把一個年輕女孩帶到下班後的玩樂聚會去，每個人都坐在

紫外線燈下——你還記得六〇年代那些紫外線燈吧——然後只要一張二十美元的鈔票，就會有人帶毒品給你。當時我想，這是什麼啊？我看到大家打扮得多麼光鮮亮麗，在那個年紀當然不知道這不叫光鮮亮麗，但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那是我第一次吸毒，在那個俱樂部裡，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我從吸毒開始，接著皮下注射，再從皮下注射到靜脈注射，起碼吸兩年或三年的海洛因吧。」這些毒品幫助她「逃離鬼魂」。

她的父母去紐約，試圖想要搶救她，但是直到她懷孕了，她才想要人家救她。她懷孕的時候不吸毒。「我一下子把毒品都戒了，」她說道：「那時候我二十歲，我回家了，努力洗心革面，做對的事情。」她如釋重負地聽說，厄爾已經傷害不了她了，他的太太殺了他。「而且她不用坐牢。」

莉里昔日在華盛頓住的社區不是個擺脫惡習的好地方。「不知怎麼地，我開始回到同一群人當中，因為你知道一旦處在那樣的生活方式中，很快就成了一種習慣。」她說道：「那些是你應該從生活中剔除的人。如果你不想吃熱狗，你就不要在熱狗攤旁邊閒逛，因為那個香味一定會吸引你，不然就是會遇到願意買熱狗給你的人。我當時的生活就是那樣：斷斷續續、反反覆覆，我戒了好幾年，一回到以這種方式生活的人身邊，馬上又開始吸毒。」她回到華盛頓那個圈子裡之後，發現了一種新的樂趣：快克古柯鹼。

介紹快克給她的是一名同事，她們一起在身心殘障人士學校工作，莉里在那裡教餐飲服務技巧。那份工作不錯，而且她認為自己很擅長跟年輕人打交道；但是她的前途有限，因為她沒有高中學歷，工作紀錄也因為反覆吸毒狂歡而顯得支離破碎。不過她在這裡做得挺好的——直到有個同事邀她周末去家裡坐坐，那個同事的先生是個古柯鹼粉毒販。「我們坐在那裡邊喝東西邊閒聊，」莉里回憶道：

「然後電視新聞講到快克古柯鹼，我就說：『為什麼大家要吸那個啊？』好奇心會害死貓，她說：『對啊，紐約真的很流行，我試過一、兩次。』然後她說：『妳要來一點嗎？』我說：『不用了，我不敢碰那個。』她說：『那又沒什麼。』接著去後面拿東西又回來。那天晚上還沒過完，她已經吸完她丈夫一千兩百美元的古柯鹼粉，想做出強效的快克來，弄到最後我們得去街上買。我很清楚那就是開始，然後每個周末都這樣。有陣子我整個星期都躲著那個魔鬼，但是到了周末，我就得去她家，你知道的，因為我開始有了這種渴望，我的腦子想要。」她三十幾歲了，沒有結婚，帶著四個孩子，孩子的父親是四個不同的男人。

「我稱呼快克古柯鹼為終結者，因為那不會控制你的身體，而是控制你的心理，一種精神與習慣上的控制。你的身體並不需要，但那個東西會喚醒腦子裡從來沒體驗過這種感受的區域。一旦被喚醒，你就沒辦法再讓它沉睡了，我是認真的，那是連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能擁有的能力，現在的你可以敏捷地思考，動力滿滿的想做這個、做那個，還有其他的事情；但這只是一種誘惑，因為腦子並沒有辦法在那個層次上發揮作用，只是受到刺激，在十五或二十分鐘之內達到了那個層次，接著就崩潰了。噢，不、不、不、不，腦子想要回去那裡好嗎？想要再次體驗那種感受，讓你廢寢忘食，連衣服都忘了穿，所有你平常會做的事情都忘了，它就这么砰地一聲把門關上。你得去那裡！這比身體的癮頭還糟……完全剝奪了我的自我，束縛了我的靈魂，拘留了我生命的每一個部分，然後開始終結我的生命，我再也不存在了，真的會這樣。」

她開始上班遲到，接著缺席。「他們看到我變了，知道問題出在哪裡。『讓她走吧。』」她說道：「我很高興他們在我犯罪之前讓我離開了。」

她確實犯罪過，好幾次。「我跟一名義大利人賣過一陣子毒品。」她說道：「然後我去了賓夕法尼亞州，信不信由你，在那裡我整整五年都沒吸毒，因為住在附近的阿米什人可以給我一些草藥，那些東西很能撫慰我的生活。」她做兩份工作，覺得自己很安全地脫離了快克的世界。「但是我卻不知道，那東西無所不在。」她說道：「我是認真的，老兄，我告訴你，毒品可能就在你身邊——我確定在梵蒂岡附近就有。它抬起醜陋的頭，我跟義大利人的頭也湊過去，我們開車去紐約，到一百四十三號街和百老匯買了一包，做起我們的生意來。」

莉里在毒品和工作之間不斷切換，常常把兩者混在一起。「周末開始跟周一重疊，然後周一開始跟周二重疊。」她回想道：「等到我回過神來，已經是星期四了，而我都沒有去工作……我趕緊回去我爸媽家。」她用她從阿米什人那裡學到的關於馬的知識，在馬里蘭的一個賽馬場找到了美容師的工作，她認為該州嚴格的毒品管制能夠隔絕吸毒者。「但是我卻不知道，毒品無所不在。」她說：「我還以為自己逃離了。」

她弄錢買毒品的的方式，成了她墮落程度的指標。「一開始我銀行裡有錢，我還有朋友。」她解釋道：「噢，我過得可高格調了，我不知道什麼叫街頭生活，那是很久以後的事情了，當時總是有人迎合我，給我東西，我就坐在那裡，旁邊全是東西，你知道的，在這裡跟佛羅里達州之間來來去去。我常常東奔西跑，過得快活，又過著那種光鮮亮麗的生活——那種我年輕時見過的生活，現在又出現了。那是個陷阱，魔鬼太聰明了好嗎？偽裝成這些光鮮亮麗的東西。有這麼多事情同時發生，你看不到那些悄悄逼近的危機……等到錢花光了，朋友也跑掉了，我就得靠自己。因為我有交際能力，我可以跟那些想要隱姓埋名的吸毒者打交道……我是他們的中間人，那是我得到供應的方法之一，他們會

給我錢，因為他們不能自己出去買，我就替他們買；我會從毒販那裡拿到一些，也從他們那裡拿到一些。我相信因為我沒有起過偷東西的念頭，所以我還能活到現在。」她有一次僥倖逃脫的經驗，有個毒販衝進仇家的公寓裡時，她剛好在那兒。一陣亂槍掃射之下，她的背部中彈。到最後，她開始賣淫籌錢買毒品。

大多時候，維爾瑪照顧莉里的孩子，就像許多這類家庭中的祖母一樣，等到維爾瑪的孫子有了小孩，她也會照顧這些曾孫。維爾瑪疲倦極了，有時候也會很氣這些把擔子丟給她的後代，不過她有一副鐵打的脊柱。她崇尚固執的牛脾氣，那是她艱困的南方童年生活所留下來的記憶，她的祖母以及祖母的姐妹都生在奴隸之家，她們以前常會緬懷她們的阿姨，也就是莉里的曾曾姨婆鋼鐵般的抵抗意志。「奴隸主叫她做某件事情，她說她不要，奴隸主會打她，一直打個不停。她說她還是不做，於是他就把她推進蓄水池裡，」維爾瑪敘述道：「她不願意做的事情絕對不會去做，她就是這麼固執，就讓奴隸主打吧。」

維爾瑪的生活就跟莉里一樣大膽，以一種屬於自己的方式，她走出熟悉，踏進冒險，雖然兩人的後果截然不同。身為阿拉巴馬州佃農的八個孩子之一，她在一九四〇年離開家鄉，當年她二十幾歲，隻身一人從田納西州來到華盛頓，在那裡找到一個好丈夫、一份在農業部印刷司的好工作，還在霍華德大學註冊（雖然她沒有唸完）。她的先生何洛斯是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的電工，莉里即使到了五十歲，還會想像他曾經在白宫裡工作過這件事。

莉里斷斷續續吸毒，出現復又消失，每一次現身似乎都比上一次的狀況更糟糕。「到了我甚至不讓她進家門的地步，」維爾瑪說：「然後她會想辦法闖進來。我報了警，跟他們解釋這是什麼情

況……：她會跑進屋子裡睡覺，所以警察告訴她，她必須離開，因為我不希望她在這裡……：我會說：『如果妳還在搞那些玩意，妳就不能待在這裡。』看著警察帶走她什麼的，很難做到，也很難開口，這讓我很難受。」

莉里記得，她爸爸從來沒有真正放棄過她，她最後一次看到他的時候，她承諾總有一天要讓他替她感到驕傲，而他告訴她，他現在就為她感到驕傲。「彷彿他看到了未來，」她回想道：「他只希望我能夠快樂平安。」莉里說道。「那是很深刻的說法：快樂與平安。如果你不平安，你就不會快樂；如果你不快樂，你就是處於不安全的領域。」

後來某次她在街頭吸毒時，她爸爸去世了，她其中一個女兒跑去找她，告訴她這個消息。

「她聽到他去世了，知道葬禮會在什麼時候舉行，」維爾瑪回憶道：「她在門上留了一張紙條，說她會過來跟我們一起去，但你知道出殯的靈車是不等人的，所以時間到我們就走了。讓我驚訝的是，教堂的人告訴我她有去……：只不過她待在後排，在我們出去之前就離開了。」

「我的脾氣就是那樣，」莉里反駁道：「我沒辦法去……：丟臉與罪惡感讓我痛苦。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必須用我知道的方式來應付自己的悲傷，那是我轉變的起點。」你必須到了谷底才能夠再往上。

幾個月後，她在嗑藥嗑得迷迷糊糊的狀態之下，看見臥底警察在某輛沒警徽標示的車裡。她走到駕駛座的窗戶旁邊說：「在你的電腦裡查查莉里·布洛克。」

「妳是莉里·布洛克嗎？」他問道。

「看你的電腦。」

他看了，找到兩筆尚未解決的逮捕令：被控教唆與持有毒品的重罪，未出席審判。

「妳是莉里·布洛克嗎？」

她回答說是，於是他找了一名女警來支援。「復活節的時候我在坐牢。」莉里說道。

一步入司法系統的無底洞裡，莉里就讓自己身陷極度的危險之中。她請不起律師，反正她也無法申辯，因為那些指控都是真的。她是黑人、有毒癮又無家可歸，沒有朋友或人際關係，甚至不知道該如何逃避刑責或精明地認罪協商。踏進法庭時，她很確定自己要遠離這種不正當的「救贖」，離開毒品氾濫的街道。

她得到了另一種救贖，也許是偶發的機運，也許是因為她終於準備好要接受另一種不同的結果。哥倫比亞特區開始一項實驗，他們不監禁初次涉毒的罪犯（指那些第一次被逮捕的人），並把法官認為還有希望的人判處治療，以不預先通知的尿液篩檢來嚴密監控，再加上互助小組和就業培訓的幫助來矯正。莉里的法扶律師推薦了她，法官也同意將她送去馬丁路德金恩大道上的一間中心，她成為該計畫的第一批受惠者。她對此感激不盡，一直記得一路上幫助過她的所有人——律師、法官、輔導員、中心裡的每一位員工，她把他們都寫進她創作的小傳記裡，讓他們永垂不朽。「毒品法庭是我人生的轉捩點，」她寫道：「懷特小姐是第一位歡迎我們的輔導員，她的聲音和語調既平和又包容，和我預期的不一樣。」真實的莉里從「長久以來一直待著的不真實世界中」浮現了，莉里如此描述。

「真實的自我出現了，她渴望著生命與生活，即使到現在我仍舊渴求。」

一旦復原了，她便看清自己有多麼缺乏技能，無法找到一份好工作。她參加了一門課程，成為一名有證照的護理師助理。在醫療領域工作了一小段時間以後，她卻發現自己進入一個以鍵盤、螢幕和

機械小玩意為主的電腦世界，每個人似乎都覺得很自在，除了她以外。

所以那個莉里·布洛克從她媽媽家走過幾個街區，走進哈里斯先生在SOME就業培訓中心的班級。她把手擺在電腦上，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說話，懷疑自己、為自己感到驕傲，每天做到一點點成功，也遇到許多的挫折。從未出現過的事情在她內心發生了，某種勝任感與熱忱逐漸增加，她稱之為「我的蛻變」。

她潤飾了她的履歷，接受面試培訓後寄出了她的申請表。面試安排好了，她坐在教室裡的電腦前面，努力克制自己的焦慮，讓那種感覺聽從自己的指揮。「我很害怕，傻瓜才不怕，」她說道：「我從一堂研討課上學到，外面是個狗咬狗的世界，他們讓我們知道，你的面試官不是你的朋友好嗎？所以不要把他們當朋友，不要放下你的防備……但是你不能因此感到氣餒，每個人都應該有點恐懼感，那會讓你做得更好，那會讓你更有決心，才能面對恐懼。」

關鍵的面試是在全錄公司位於維吉尼亞州阿靈頓的辦公室裡進行的。「很漂亮的大樓！」莉里驚嘆道：「從人行道一直走上去，每一步都踩在大理石上耶。你知道嗎？進去之後裡面超豪華的。說真的，我也去過不少很豪華的洗手間，但從來沒有哪個像他們一樣有雕花玻璃瓶裝的漱口水、髮型噴霧，還有一大罐的阿爾法（Alpha Ker）乳液——你洗完手之後可以滋潤一下雙手。那個地方非常豪華，表示他們在乎員工的工作環境，他們會留意小細節，讓你感到舒適。就像漱口水，已經遠遠超過工作上的需求了，但是大家有需要，所以他們就確保員工們可以用得到！只要去洗手間就好了，你懂嗎？幫自己提提神！」

全錄公司要雇用人手到收發室和影印中心工作，替華盛頓的公司印文件和彩色報表，SOME中心的學員對他們來說很有吸引力。「面試很平和，讓人很舒服，」莉里驚訝地說道：「我在談話中很強調團隊合作，還有自己對於這家公司能提供的機會有多興奮，因為我已經研究過了，我看到他們很積極參與社區，做了這個又做了那個。」面試官似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說我們跟從其他培訓計畫來的人天差地別，因為那些人只對工時有興趣，『時薪是多少？』你知道，我完全沒有講到那個，你懂嗎？我完全沒有問過那樣的問題，我讓她知道，我最感興趣的是要成為全錄公司的一員，然後不管全錄公司會開出什麼條件，我都會很感激地願意接受，因為我了解這家公司。」

全錄公司雇用了莉里，還有桃子和溫蒂·韋斯勒。這份工作的一切似乎都讓莉里感到很高興：操作機器的課程、退休金制度、認股權（她不是很了解這個），還有同事在她到職那天，送給她的點點盆栽。她首先被分配到一間影印室裡，替一個保險業的政治說客影印，一個月後，她跟SOME同期結業的學員聚會，他們全都非常有活力，興高采烈就像剛剛參觀過消防隊的孩子一樣。他們全都自負，擺出高人一等的姿態，趾高氣昂，吹噓著自己的職責、弄到內部消息的門路，還有客戶的規模和影響力。莉里像一陣風似的來到，手裡抱著一大包文具、檔案夾，還有她替那個說客製作的封面。「他們把這些東西送到每一州去！」她誇耀道：「我用的是DocuTech電腦影印機，還有線上不斷電系統、布萊斯（Bryce）列印機、必能寶（Piney Bowes）郵件收發機；我也會上網，有人會從某個地方寄工作給我。」

溫蒂在幫一家律師事務所服務，規模大到「在莫斯科都有辦公室，」她誇口道：「他們在華盛頓特區就有兩百五十名律師，我負責郵件收發，他們剛升我當主管，他們說我是他們遇過最好的員工之一。」

桃子被指派到另一間律師事務所。「他們有一間傳真室——裡面有八台機器唷！」她宣稱：「我也想要家裡有一台，架子還可以四處滑動！」

莉里吹噓她的辦公室「安全性高」，你得用一把特殊的鑰匙才能到十樓去，溫蒂則驕傲地高舉她脖子上掛著的一把塑膠鑰匙。

「我在市中心的霍根與哈特森律師事務所工作。」大塊頭的理查·艾佛力說道，悅耳的聲音中滿是自豪，「那是國內最大的律師事務所之一——其實就是國內最大的律師事務所啦。我在收發室工作，處理所有的信件，還有UPS隔夜快遞的郵件。」他向眾人解釋道。這個職位的責任重大，因為必須留意所寄出的郵件的重要性，還有寄發所需的準確性。「我必須留意信件的寄發方式，而我也已經在主管辦公室接受三次工作表揚了。現在我要調到傳真室去了，我覺得我非常潛力。」

莉里幾乎被自己新發現的價值給弄得眼花撩亂，她的起薪是一年一萬七千美元，後來升到兩萬初，接著一直維持在這個水準，因為後來的幾年，全錄公司都籠罩在財務問題之中。不過世界已經向她敞開了大門，她告訴昔日的同窗學員說，前一晚她帶媽媽和一個朋友去賓夕法尼亞大道上的約翰哈佛自釀啤酒屋(John Harvard's Brew House)吃晚餐，然後再去隔壁的華納劇院(Warner Theatre)看福音音樂劇，她朋友問：「誰付錢？」莉里說：「我付。」她朋友看到票價時驚訝道：「什麼？」於是莉里決定把票根留下來，當作她擴展視野的紀念品。

她從受害者變成了勝利者，得到主管的讚揚。其中一名主管說，她學東西很快，讓工作看起來就像吃麥片一樣簡單，還有一名主管以書面表揚她，「不管我那一天過得有多糟糕，我派工作給布洛克小姐時，她的態度和微笑總會提醒我，我可以花點時間喘口氣，放鬆一下，任務都會完成的。」莉

里穩定地升遷，從保險業政治說客那裡調到另一個職位，監管華盛頓特區綜合醫院裡將近五十台的機器，她曾經在那裡戒毒失敗過；接著她又調到能源部去，被任命為服務協調員和技術服務經理。這一路上，她得到了公眾的認可，她的故事是每個人都想相信的，一則關於救贖的故事。華盛頓一家電視台做了她的專題節目，她也成為「穿出改變」(Suited for Change)的知名客戶。這個非營利組織是由華盛頓一群講究穿著的職業女性所組成的，由她們捐贈衣物和提供建議給貧窮的女性，因為她們需要上相的服裝好走進職場。有一年她獲選在這個組織的募款活動上說幾句話，那是一個很時髦的活動，由蘿拉·布希(Laura Bush)擔任榮譽主席。

二〇〇〇年，莉里獲邀到美國最高法院議事廳演講，因為華盛頓特區最高法院的毒品介入計畫獲頒波特·斯圖爾特法官獎(The Justice Potter Stewart Award)。「表彰該法院成功改造依賴毒品的非暴力罪犯」，莉里獲選成為代表。

她簡直不敢相信，忐忑不安地打電話給我，問我可不可以幫她準備演講。我說，當然了，但其實她自己就可以講得很優美，只要站上去，用她的話說出她自己的故事就可以了。我把前兩年訪談她的逐字稿寄給她，鼓勵她不要寫演講稿，用談話的方式來說就好了，她照做了。結束之後，她陶醉在菲力牛排晚餐裡，許多有權威的法官出席，餐具擺設也很莊嚴，她告訴我，放眼看去，法院裡所有人都落在落淚。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走上前來，告訴她說，她的話令他潸然淚下。那是我做的嗎？她暗自想著。

另一名法官仔細聽她講完後，給了她一個比較冷靜的回應：妳一定贏回家人的心了。他是對的，原本她跟孩子的相處情況很糟。「我的孩子不尊重我，也不愛我，因為我毀了他們的生活。」她感嘆

道。現在她試著跟孫兒相處，帶他們去史密森尼學會的博物館（the Smithsonian）、唸書給他們聽，填補她與孩子之前的空白。這也是失敗與救贖模式中的一部分——有失敗母親的孩子往往成為失敗的家長，而這給了她第二次機會，成為稱職的祖母。

布洛克家的家譜，是有天晚上我坐在他們家的餐桌前，跟莉里和維爾瑪一起畫出來的，看起來就像是亞歷山大·考爾德（Alexander Calder）最狂野的動態雕塑。一開始很簡單，從維爾瑪的雙親開始，他們結了婚，生了八個孩子；再來是維爾瑪和何洛斯，也結了婚，生了兩個孩子。再往下就開始一團亂了起來，莉里的子女是跟好幾個不同人生下的，再下一代到了莉里的子女，他們所生的孩子也是如此。圖表複雜到如果做成一串風鈴，鈴聲會永無休止、雜亂無章。

莉里對待孩子很暴力，她承認。在她復原的第一年，她以為她能馬上恢復家長的角色，但是她對其中一名女兒太兇狠，兒子有時還得拉開她。如今她們之間有時候還是有摩擦，她的語調還是很兇。

她興高采烈地沉浸在工作中，似乎沒有多餘的精力去重建她與成年子女之間破損的關係。某天下午，她坐在陰暗的客廳裡看電視，瞧見她女兒提著一個皮箱從前門走進來，莉里打招呼的方式就像指控一樣尖銳：「妳是要搬回來這裡嗎？」

「沒有。」然後這名年輕女子就躲進後面的房間裡去了，我問了她的狀況。

「我不知道，」莉里怒氣沖沖地說道：「我聽說她要搬去北卡羅萊納州，我不知道她是怎麼了。」

莉里恢復之後，和自己的媽媽修補了關係，開始能夠互相尊重。她們一起住在她媽媽的房子裡，那房子還在付貸款，靠著維爾瑪三萬美元的退休金支撐著。莉里的孩子大多能夠自給自足：一個兒子在賓夕法尼亞州蓋屋頂，另一個在能源部當警衛，一個女兒在全錄公司，另一個在中央情報局總部當

清潔工。維爾瑪家裡總有莉里的女兒和她們的孩子輪番來去，維爾瑪這個曾祖母則是這個瘋狂轉動的滾輪的核心。

「我喜歡賣賣，」維爾瑪說道：「但是有點太多了，一個就夠了，無論從什麼方面來說都是。」

她八十六歲了，身體虛弱，對孫女（莉里的女兒）很嚴格。最後，她終於在白天把孩子託給保姆。「我們跟她大吵一架，終於讓她這麼做了。」維爾瑪說道：「她沒有意識到我不像帶她的時候那麼年輕了，你知道嗎？我覺得我可以做跟當年一樣的事情，但是我沒辦法。」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孫子，現在又要帶曾孫，她有什麼感覺呢？「很累。」她虛弱地微笑著說道：「我不覺得這有什麼特別的，只是一件做完的工作而已，然後我總是在等還會發生些什麼。」

不管是因為維爾瑪太累，或這是一貫的育兒方法，但維爾瑪對曾孫有時候太嚴厲了。有天晚上，他們在替一位名叫莎拉的學校朋友慶生，大人之間的對話很親密融洽，但是不時會被責備孩子的話語給打斷，彷彿房間裡緊繃著一觸即發的焦慮，只要有一點小錯就會爆發。維爾瑪打破了愉快的氣氛，不時發火，像是要先發制人似的，沒對孩子說過一句慈愛的話。或許不這麼做的話，這些孩子就會變成壞胚子，但是現在很難看出這一點。她的曾孫除了一對三個月大的雙胞胎之外，有兩個分別是五歲和七歲大的女孩，還有一個三歲大的男孩狄安德。

甜點送上來了，是一盒已經打開的一加侖冰淇淋，一半巧克力、一半香草，就擺在狄安德面前。一般的三歲小孩會怎麼做？當然是把手指頭插進去，狄安德就這麼做了。把手指插進香草的那一邊，他的曾祖母維爾瑪拍了一下他的手，威脅要把他送去床上。他哭了起來，幾乎是沉默地哭泣，就好像他怕哭出聲來。「你哭什麼哭！」維爾瑪厲聲道，再次威脅要趕他上床睡覺。「不准哭！」

除了那兩個女孩以外，大家都聚在一起替莎拉唱生日快樂歌，接著用同樣的調子唱了「上帝保佑你」，維爾瑪留了一點被手指戳了洞的香草冰淇淋給狄安德，說得好像是懲罰一樣：他必須把他摸過的那一份吃掉。他又哭了起來。

「你哭什麼哭？」莉里就像她媽媽一樣厲聲說：「不准哭！」

接著莎拉溫柔地介入了，她告訴狄安德，她會吃掉他戳了洞的那份香草冰淇淋，然後她接手分配冰淇淋，她問這名男孩想要巧克力還是香草口味——這是第一次有人問他想要什麼。結果他想要巧克力，而那就是他哭泣的原因。莎拉在他面前擺了一盤巧克力冰淇淋，他馬上就不哭了。

但是不管有多少壓力和緊張傳到下一代身上，家族關係都幫莉里撐了下來，讓她不至於向後倒下。一年多之後，在莉里的五十歲生日，維爾瑪準備了一桌莉里小時候愛吃的食物，莉里的四個孩子中有三個出席，當時只有一個孩子跟她疏遠。

「我強求不來。」莉里說著，自己給自己建議道：「讓他們來找你吧，只要讓他們看到你已經是個不一樣的人就好了。」

美國夢是個嚴苛的標準，美國神話是個崇高的目標，一個男人、一個女人或是一個家庭實現了所有的可能時，這個國家的美德就得以印證，因此這個國家應該會覺得來自西貢（胡志明市）的陳氏一家非常好。如今他們住在加州的聖塔安娜，他們的成就顯示出當幹勁、機會、節儉、教育、健康、人際關係和相互支持完美地組合起來時，力量有多麼強大。

一九九八年，以難民的身分從越南來到美國的四個月內，這個五口之家中有三名成員在工作。

將他們極低的工資湊在一起，一年只有四萬兩千八百四十八美元。抵達這裡五個月後，他們就存夠了錢，可以用現金買兩台二手車；不到一年後，兩個最大的孩子進入了社區大學。

他們的成功證明了在低收入的情況下，假如要讓工作行得通，必須萬事具備：一個有凝聚力的家庭裡要有多人工作賺錢，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有一技之長、知道該怎麼找工作、謹慎管理金錢，並且遇到困難時絕不退縮。如果這聽起來像英雄一樣，是因為這的確是，因為在這之中並沒有犯錯或遭遇不幸的空間——不能吸毒、不能酗酒、不能有家庭暴力、不能缺乏學校教育、不能生病或受傷，除了奮力勤勉以外，什麼都不行。到目前為止，陳家人還算過得去。

這種典範如此罕見，以至於根本就不能算是典範，只能說是一個例外。這個例子突顯了為數眾多的窮忙族的問題：他們沒辦法把每個有利的因素都結合起來。越南人、中國人、韓國人和其他的亞洲人，往往因為刻板印象的影響，被認為是一群出色勤奮的人，成功實現了完美的美國夢；但是也有數以百萬計的亞洲人來到美國卻失敗了，在洛杉磯餐館中的韓國人便是如此。看著陳家人把這些因素拼湊在一起，就可以清楚看到許多人身上所欠缺的。

陳茂（音譯）是個四十幾歲的友善男人，戴著金邊眼鏡，穿著卡其褲和拖鞋。他笑起來的時候缺了幾顆牙齒，說話的時候雙手會在空中比畫。

戰爭期間，他在密西西比受訓，成為南越空軍的電子技師（因此他的英文不錯）。他的軍銜未經任命，所以一九七五年北越取得勝利之後，他在「再教育營」裡待了一年。幾年後，他和兩個孩子加入了成千上萬的越南人的行列，倉皇搭船逃離了越南。他們去到印尼，在一個難民營裡待了七年，他在那裡替聯合國難民署的高級專員工作，但是他自己沒有取得難民身分，他和家人都被遣返回越南。

他堅持不懈，兩年後終於取得難民身分，並且他與妻子跟三個孩子都取得了美國簽證。

陳家人展開了他們的新生活，就像是真正的美國人一樣：負債累累。他們的機票是國際移民組織買的，每個月要還一百二十五美元；他們還跟朋友借了兩千美元，買了幾樣家具。三個孩子如今分別是二十歲、十九歲、十一歲，最大的兩個孩子可說是這個家的主要勞動力，很快就開始工作——兒子陳端（音譯）在腳踏車工廠上班，時薪五點七五美元，是當時加州的最低工資；女兒陳芳（音譯）的時薪多十分錢，負責組裝腳踏車燈；做父親的則是在製藥公司工作，負責藥品包裝，領的也是最低工資。一個月後，陳茂流利的英文讓他找到了一個輔導員的職位，時薪九美元，在一家名叫「柬埔寨之家」的服務機構工作，幫助新移民找工作，這些移民主要來自柬埔寨和越南。債務很快就還清了。

陳茂很清楚，他的孩子要想在美國出人頭地，需要兩張門票：流利的英文和高等教育。在機構上班的日子，讓他看到不會英文對人的限制有多大，那些人由他幫忙填寫申請表格、準備工作面試。因此，每天晚上，他會盡量幫助孩子學英文，讓他們讀書，鼓勵他們看電視，增進理解力。陳芳和陳端都跟其他越南人一起工作，一直沒有機會在工作時講英文，所以他們的進步微乎其微。陳茂毫不掩飾自己的失望。「發音不好，」他這樣說陳芳。她拘謹地彎腰，恭敬地鞠了躬。她的英文精確，但口音很重，是在印尼難民營裡學的。「妳應該多加練習，」她的父親告誡道。他尤其擔心她母親和十九歲的弟弟，兩人都很少開口。很快地，他替每個人都報名了英語班，包括他自己。他也上電腦課，希望有朝一日能夠獲得大學文憑，因為戰爭時他沒能拿到，戰爭結束後也沒辦法。

所以這五個念書的人，正在安排怎麼使用他們的兩張書桌，一張在廚房、一張在客廳。他們家裡有聖母瑪利亞的畫像，書桌上還有一台貝爾電腦和印表機。他們的兩房公寓很擁擠，但一個月的房租

要六百七十五美元，他們沒辦法再負擔更高的價錢。陳茂和他的妻子胡朗睡一間臥房，男孩子睡一間臥房，陳芳睡客廳地板。樓下是一條氣氛輕鬆愉快的街道，亞洲人和拉美人在一間破舊的小商場裡隨意進出，商場裡有許多標誌都是西班牙文，一名女人推著一台紅色的購物車，上頭掛著一個巨大的塑膠袋，裡面裝滿了瓶瓶罐罐。

到了一九九九年秋天，陳芳和陳端都已經辭掉工作，進入了聖塔安娜大學就讀（陳芳念大學課程，陳端要拿高中同等學歷），他們的母親胡朗則填補了空缺，到當地一家工廠組裝筆。她賺的是最低工資，沒有醫療保險或其他福利，而陳茂在柬埔寨之家的薪資升到了每小時十美元。每個周末，全家人會坐下來計畫下個星期的開銷。「我們必須要寫下來，並且一起合作。」陳茂說道：「通常我們一個星期會去購物一次……我們蒐集報紙上的優惠券，只買我們認為對家裡最重要的東西。」但也會有意見分歧的時候。

「有時候我想買鞋子。」陳芳說道：「但是後來我再想想，我沒有錢，現在也不需要鞋子，我可以把錢省下來，替家裡買食物。父親告訴我：『妳不能買那個，妳要做這個或做那個。』」接著她又說：「但是我可以自己決定，我能自我控制。」陳茂說，他們每個月存四百到五百美元，寄錢給在越南的親戚。

到了二〇〇二年春天，經濟不景氣影響到陳茂的服務對象，他們遭到工廠裁員，但因為不太會講英文，所以也無法透過短期工仲介找到工作。不過，陳茂的家庭還是倖免了，他的時薪升到一小時十三美元，他太太的時薪升到七美元，陳芳和陳端繼續念書，一邊兼職貼補家用。「我有一張信用卡，但是很少用，」陳茂說道：「我盡量不用，我不想欠一大筆債務。」

第十一章 能力與決心

Chapter 11

世上沒有比美國更幸福的地方。

——托馬斯·潘恩 Thomas Paine, 1776

一九九八年抵達美國的時候，陳芳有個抱負，「我想當醫生，幫助貧窮的病患。」她宣布道。她的父親笑了，彷彿替女兒愚蠢的夢想感到尷尬；四年後，她仍然有著一樣的目標，他又笑了，彷彿替自己的信心感到尷尬。

從書中這些人的身上可以看見，貧窮是由一系列的困難造成的，各個問題之間彼此互相加劇：不只工資低，教育程度也低；不只工作沒出路，能力也有限；不只存款不夠，消費方式也不明智；不只居住條件差，養育方式也不當；不只沒有健康保險，家人也不健康。

壞人不只是壓榨剝削的雇主，還有無能的員工也是；不只是工作過度的教師，挫敗任性的學生也是；不只有欺騙窮人的官僚，還有自欺欺人的窮人。這些問題在宏觀跟微觀上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既是政治經濟結構中的體制問題，也是個人與家庭生活中的個別問題。

無論用什麼補救方法，所有問題必須一次解決。假若僅解決了一個問題，也許會有幫助，但卻無法根治，除非其他問題也能被解決。發給第八類房屋條款補助券可以幫助一個家庭搬進好一點的公寓，有可能讓一個孩子的氣喘症狀有所緩解，減少缺課天數；但是如果這個孩子受到虐待，或是父母沒有一技之長，工作只能賺到最低工資，要花很大一筆金額在交通和日托上面，也得不到負擔得起的貸款，那這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要是社會在處理危機時只挑一個問題來解決——通常就是這個問題逼著這家人去向某個機構求助——那麼另一場危機很可能就會隨之而來，緊接著又面臨一個危機。如果我們只想找到一個神奇的解決方法，比如說一份好工作，我們就會忽略問題的複雜程度，僅有工作遠遠不夠。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究竟知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哪些問題是我們有能力解決的？我們的能力會在哪裡碰上問題的外部限制？哪些棘手的問題藏在不為人知之處，是我們無法解決的？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決心去施展我們的能力，我們願不願意花錢、犧牲、重建財富階級以減輕底層的疾苦？我們缺乏能力解決某些問題，也缺乏決心去解決其他的問題。而我們現在弄懂了一點：全方位的

解決方法很重要，所以我們需要正確的途徑去解決一個家庭的種種困難，而建立途徑最好的方式，就是站在窮忙家庭可能行經的十字路口上。波士頓醫療中心的巴瑞·祖克曼醫生，讓我們看到社工與律師攜手合作能夠做到些什麼；華盛頓哈里斯教育中心的校長西奧多·辛頓也利用稀少的資源嘗試在晚間開放學校，提供育兒課程，也提供健康保險的資訊；洛杉磯的公營社會住宅計畫介紹住戶去參加英文課和就業培訓。這些都是宏大想法的雛形，如果醫院、學校、房屋管理委員會、警察部門、福利單位和其他重要的機構都能夠放手一搏，而且也有足夠的資金，他們就能超越職責範圍，在服務與服務之間創造連結，讓貧戶進入援助網內。這是個關於能力與決心的問題。

決心是力量的作用，而在貧窮邊緣工作的人沒有多少力量。不過他們所擁有的力量比他們目前發揮出來的大得多，他們在個人生活中有許多未開發的力量，在市場上還沒被任何組織給團結起來，在政治上也有被忽略掉的力量：選票。

只要秉持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批評富人減稅或是窮人扶助計畫遭到刪減，保守主義的共和黨人就會召喚出「階級鬥爭」的可怕幽靈來與之對抗，彷彿他們跟他們在商業界的支持者，沒有透過減稅優惠和薪資架構來擴大階級差異似的。例如在二〇〇三年，布希政府和共和黨的國會領袖排除了數以百萬計收入在一萬零五百美元和兩萬六千六百二十五美元之間的低工資家庭，因為孩童免稅額增加，所以刪減了每個孩子四百美元的補助款項。這是一項大型稅法的一部分，會給富人帶來極大的好處。但是窮人並不會反擊，收入越低，投票率就越低。在二〇〇〇年的總統大選中，全美國有百分之六十的家庭，有百分之六十九投了票。之後便往下遞減，而家庭年收入少於一萬美元的家庭，只有百分之三

十八投了票。〔除了那些自己放棄投票權的家庭，還有將近兩百萬名公民在監獄服刑，再加上許多不具投票資格的前科犯，這些人大部分都來自低收入階級，而十八歲到三十四歲之間的黑人，有百分之十二都在坐牢。〕

因此，雖然窮人與瀕臨貧窮者更需要政府幫助，但他們卻對政府的政策幾乎沒有影響；不管是民主黨或是反貧窮的組織，都無法鼓勵低收入的美國人為自己發聲。他們曾經稍微嘗試過，在一處位於洛杉磯瓦茲區的公營社會住宅「帝國庭院」的辦公室櫃台上擺了一個小標語：

咕噥

嘟囔

抱怨

沉淪

希望

絕望

擔憂

投票吧！

嘿，大家，最後面那個選項能讓事情改變的速度快多了，請撥 1-800-343 登記投票。

這則訊息很巧妙，但是大概沒什麼效果，因為人口統計局的調查顯示，收入和教育水準越低的美國人，越不願意相信投票能夠改變什麼。這種疑慮正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個人生活中的考驗讓他們精疲力竭，對權力體制憤世嫉俗，大部分人會告訴民調機構，他們對選舉沒興趣，政客都不能相信。如果不靠投票引起候選人的注意，低收入的美國人只能依靠那些更富有的人來代表他們的利益，但有錢人在這方面的表態，取決於當權的政黨、經濟的健全程度、還有這個國家是否相信利他主義。說到善行，這是個喜怒無常的社會。

事情原本能有另外一種發展的。國家的優先事項和政治景觀可以改變，只要能夠達成幾項條件：如果年收入在兩萬五千元以下的家庭，投票率跟那些收入在七萬五千元以上的家庭一樣，就會多出約六百八十萬選民參與二〇〇〇年的投票。當年高爾以五十四萬三千八百九十五票略輸小布希，如果低收入選民激增，即使像是佛羅里達州那種有偏見的登記和投票系統也能克服（只要那些選民大部分都投給民主黨的話）。如此就能夠逆轉結局，讓高爾當選。

就算是在壓倒性優勢的選舉中，大部分州的選舉人票也僅以百分之五或更低的差異險勝，所以多出來的六百八十萬低收入選民（占總投票人數的百分之六點五），可以決定選舉結果。無論是國會或是各州的立法機構都一樣，貧窮或瀕臨貧窮的人可以掌握勢力的平衡。如果這些人能根據自己的需求來投票，候選人也許就會突然對他們產生興趣。如果民主黨人能夠加強他們的社會福利立場，同時又不失去對中產階級的支持；如果他們能夠進行密集的選舉登記，動員那些能從反貧窮計畫中受惠的公民去投票；如果選民中有強勢的低收入代表團體，能夠迫使共和黨人採取更為寬厚的政策；如果那些在貧窮邊緣工作的人能夠被看見……。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大部分的美國人並不會按照自身階級的利益來投票，不會去投票的人口也很多，畢竟投票的動力似乎是渴望而非抱怨。《時代》(Time)雜誌在二〇〇〇年的一項調查中發現，有百分之十九的美國人認為他們的工資占全體的前百分之十，另外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認為他們將來會成為那百分之一的一份子。「所以現在有百分之三十九的美國人認為，高爾要是猛烈抨擊有利於金字塔頂端人群的方案，就是直接衝著他們來的。」《旗幟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資深編輯大衛·布魯克(David Brooks)寫道。^[5]

自欺欺人扭曲了投票行為，對於低收入者造成破壞性的後果。投票是民主政府的基石，而政府是處於最有利地位的機構，最能夠影響窮忙族。在這個自由企業體制中，包括企業或慈善事業，都無法避開政府鋪天蓋地行使公權力的影響，尤其是稅收政策、法規、工資要求、補助、撥款等等。

事實上，政府是這個轉輪的核心，但是人們也會懷疑那些對緩解貧窮最有效的政策。自從殖民地脫離英國的君主制之後，這種對於政府權力的矛盾，塑造了美國努力的方式。湯瑪斯·潘恩在《常識》(Common Sense)這本小冊子裡挖苦地定義了這種厭惡感：「『社會』在任何狀態下都受到歡迎，但是『政府』即使是在最佳狀態下，也不過是一種必要之惡。而在最糟糕的狀態下，則讓人難以忍受。」

這種懷疑的態度還有一些根本原因：我們的自由從一開始就源於對政府的不信任，巧妙的三權分立與權力制衡就寫在憲法裡面。在恐怖主義的時代，留意國家變得專制的謹慎戒心，如今已鬆懈到令人感到危險的地步。不過在政治與福利政策辯論上，這種警惕之心仍然有其力量：反對獨大的政府、鼓勵私有企業。保守人士想盡量避免政府侵入自由市場，而這往往會危害到環境、工人和消費者。依

照自由意志派對於保守主義運動最狂熱的論述，政府的功能顯得極其狹隘，「國家的存在僅是為了維護自由。」聯邦主義者協會如是宣稱，也因此成功地讓右派人士入主司法機構。

這樣的觀點是對的，但同時也是一種太狹隘的說法。國家的存在不只是為了維護自由，也是為了保護弱者、替弱者撐腰、給沒有權勢的人力量、促進公義。國家的存在是為了讓人能夠「追求幸福」，它能做出對人民不利的行為，也能夠成為社會各界的發言人；能過度控管、扼殺一切自由，也能培育出探索與創造的能力；國家不應該干涉個人的私生活，而應該匯聚社會資源，作為共同利益之用。政府不只有一種性格，而美國人則嫻熟於如何處理矛盾——打從一開始我們就不停地在實驗這個技巧。

沒有哪種體制能解決這種進退兩難的局面。馬克思主義失敗了，因為它誤解歷史：認為文明的各個階段不可抗拒地會產生各種階級，對於人類的評價過於天真。自稱「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錯把政府當成全體公民，讓國家福祉凌駕於人民福祉之上，產生了國有官僚體制，範圍之廣，幾乎扼殺了所有體制之外的東西，使之皆蕩然無存——只剩下寒酸的餐桌，讓俄羅斯民眾圍坐在桌旁竊竊私語。

美國主義也可能會失敗，美國主義致力於讓政府盡好自己的職責，但職責的掌控範圍是我們得持續討論的議題。少了人們的敏銳警覺，在這個擔憂恐怖主義的年代裡，政府就會變得獨斷專制，或是在這個人與人之間差異極大的年代裡，失去人道關懷。我們既要克制政府，又要利用政府，整個社會需要政府來幫助底層弱勢——向他們伸出援手，幫助他們完成他們無法獨立完成的事情，同時也要協助他們發展能力，讓他們最終能夠自行處理事情。這裡的社會援助與自力救濟並非二分法，政府既不

能袖手旁觀，也不能一手包辦；政府不能不去維護安全網，但也不能避免給予需要的人直接補助；不能無視於自己的角色，必須成為社會的資源，也必須融合自己的力量，以有創意的方式在營利與非營利領域互動，跟私人企業和私人慈善單位相互結合。

最明顯的一點就是薪資架構，企業主管有能力，但是缺乏決心藉由提高薪資、犧牲上層來縮小差距，修訂稅收結構可以誘導這樣的政策出現。政府有能力立法提高最低工資，但是缺乏政治決心，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大部分的低收入美國人不為自己的利益投票，或者是根本不去投票，無法與私人企業複雜的遊說和政治獻金相比。

此外，最低工資是一種粗糙的工具，使用的技巧也還不夠完善。對於該調漲多少薪資，才不至於傷害到企業家的冒險精神，經濟學家們在這點上意見分歧；儘管聯邦政府的最低工資在通貨膨脹之下，實際購買力已經降低了，這使得最低工資有很大的調漲空間，也不會造成傷害。有十八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已經將當地的最低工資從每小時七點四美元，調整為每小時九點零四美元，遠高於聯邦政府規定的七點二五美元。^[4]

一個改善這項工具的辦法是，在不同地區設定不同的最低工資，根據當地的生活成本而定。還有另一個辦法是「生活薪資」(living wage)法案，有一百多個鄉鎮和城市，要求那些與政府簽約的私人企業，必須支付七點五美元到十五點三九美元的時薪，因為經過計算，這樣的水準才足以維持基本的生活開銷。^[5]初步的成果顯示，有些地區的最低預算增加了，政府對於工人家庭的補助減少了，承包商則鬆了一口氣，不必再壓縮員工薪水以爭取低標。然而有些經濟學家懷疑，生活薪資搞錯了目標對

象，因為那些受雇於這類工作的人，工作能力較好，並不像最低工資的階層那麼需要援手。

還有其他辦法能解決市場報酬跟舒適生活之間的差距，有個方法是薪資所得稅抵減，可以獎勵工作。雖然這筆款項看起來像是對員工的補貼，但其實也是對雇主的補貼。他們可以給工人低工資，卻不會造成太大的痛苦；缺點是這項計畫的確讓許多大型企業間接受惠，從沃爾瑪超市到麥當勞都是，幫助他們獲得更多利潤。不過，儘管我們很聰明地發明了這項工具，卻沒有鼓起足夠的決心讓它能夠充分發揮影響力。生活成本年年看漲，這項計畫卻從一九九六年以後就沒有調整增加過。二〇〇三年，小布希向國會要求一億美元，不是要增加補貼，而是要多雇用六百五十名審計師來稽查造假的詐欺申請。^[6]

雇主也得到國家、各郡與市的許多補助，這些地區爭相吸引新產業，創立聯邦政府資助的企業園區，提供免稅額吸引製造商進駐貧困地區。阿拉巴馬州就是一個例子，該州透過減免稅額、停收所得稅和補助工資，來獎勵外國汽車公司，耗費了數億美元——但這裡幾乎沒有工會。

作為補助的交換，私人企業可能會被要求回饋社會更多，但是那種情況很少發生，因為創造就業機會就等同是足夠的回報了。在這一點上，聯邦與地方政府的控管可能會妨礙到國家經濟利益，因為一旦地方政府彼此激烈競爭，競相提供稅收減免，他們也就削減了自身的稅基，扭曲了工作機會的地理分布；在阿拉巴馬州和南方其他地區，幾乎沒有勞工組織，這些誘因提高了國內某些最貧窮地區的居民的收入，但卻也轉移了工作機會，削弱了該地區的工會。美國工人參與工會的比例逐漸下降，一九五〇年到二〇〇九年之間，全國工會的比例從百分之三十五下降到百分之十二點三；在政府部門中，有百分之三十七的人參加了工會，但是在私人企業中，這個數字只有百分之七點二。^[7]

更多人參與工會是有益的，儘管某些有工會的職業還是只能發給最低薪資，比如停車場和清潔服務。這個國家的富強靠的是那些薪資微薄的勞工——這項事實不會改變，所以改善勞工薪資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升遷和向上流動，讓新的勞工流入底層的低薪職位。在理想的情況下，大部分人都最終都可以爬升到像樣的薪資架構中。

我們至少知道兩種有效的方法，能夠幫助起薪每小時五到八美元左右的人，加薪到十五元：一種是透過精密的就業培訓，就是這種計畫拯救了桃子和莉里，讓她們擺脫沒有技能和缺乏自信的蹂躪，有了能力後，便加強決心，讓努力能充分發揮作用；第二種方法是透過加強技職體系，為那些不上大學的人建立起學徒網絡，這也一樣，不是能力的問題，而是決心的問題。

高中畢業生與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差距，從一九八〇年之後就有顯著的增加。許多年輕人陷入了經濟體制的漏洞，因為隨著「人人上大學」的課程推動，他們把更高比率的學生送進大學去（從一九七〇年百分之三十提高到將近百分之六十），但是卻讓許多沒去念大學或是沒畢業的人，沒有從事薪資優渥的職業的能力。「要在職場上做得不錯，比起在高中或大學裡表現良好，需要的是更多不同的能力，」任教於城市研究所及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的經濟學家羅伯特·勒曼（Robert Lemman）寫道。他指出，和大部分工業化的國家不同，美國一直任由職業訓練懈怠，導致了「中等技術領域乏弱」。國外製造商早已以此為由，避免在美國投資。瑞典、挪威、法國、英國、日本、澳洲與德國，都結合了技職中學的課程與企業贊助的學徒制，培養出高素質的人員，但是企業從國外來到美國時，常常必須大費周章地解決美國的缺失。勒曼說，德國車廠BMW就把美國工人送去德國受訓。

集中某些青少年，讓他們進入職業學校的想法，與美國人信奉的平等主義起了摩擦。這種道德標準宣揚機會平等，但卻沒有真正提供機會。許多家長熱切相信夢想，反對子女選擇技職教育，把上大學看作是向上流動的唯一可靠途徑；問題是，如果你的情況就像俄亥俄州的幼教人員克里斯蒂，沒能順利從大學畢業可能會讓你欠缺專門技能，讓你在不講情面的勞動市場上一文不值。如果克里斯蒂能去念技職學校，情況會好得多，而不是讓她唸了大學又輟學。

到處都有成功的職業培訓計畫，在某些企業、工會和州政府的支持之下，「在美國，萬事俱備。」勒曼說道：「總是有人能在某處做好某些事情。」比如威斯康辛州的州政府機構，就與私人公司合作，培訓年輕人參與印刷、金融、生技，還有其他二十個領域。他也相信聯邦政府資助的學前教育「學前先鋒教育計畫」，幫助了貧窮兒童，並成了培養高中學生成為年輕學徒的途徑，在兒童發展領域則提供了資歷證明。^[8]但就全國而言，我們沒有選擇去修補這一個漏洞，沒有全國性地培訓我們的年輕人，讓他們能做高薪的工作。

在更廣泛的教育問題上，能力與決心的衝突更明顯。已經有許多書籍談到需要提升公立學校的教育品質，但卻很少有人注意到不公平的財政撥款方式。教育補助的基本架構漏洞百出，即使少數幾個州想要平衡一下貧富社區的資金差異，也很難產生什麼影響；大部分的學區主要靠的是地方財產稅，而由於大部分美國人居住的地區都照階級和種族來畫分，差異非常嚴重。以紐約州的學區為例，當地的稅基，分配到每個學生身上為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七美元到兩百三十九萬五千三百零四美元之間，因此每位學生的平均年度支出，在最富有的學區裡是一萬三千六百八十美元，在最貧窮的學區裡則是七千一百美元——而這一州可是努力縮小貧富差距，已經提供比較多援助給貧窮學區的地方了。^[9]

這種財政撥款方式延續了不平等：有更多錢的學校能提供優質教育，幫助孩子提升賺錢能力，

所以未來他們能夠住在投注更多資源於公共教育上的社區；而這又反過來加劇了種族分化，因為從一九八〇年代晚期開始，公立學校又重新開始隔離政策，大多都是拜共和黨總統和參議院所任命的保守派法官的判決所賜。這個國家有六分之一的學生是黑人，而這些人所就讀的學校裡，幾乎沒有半個白人，許多人都很貧窮。只有七分之一的白人就讀多種族學校，這指的是那些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學生為少數民族的學校。^[10]

這種提供學校資金的方法，並不能終結種族隔離，但是可以往重新分配資源邁進一步。不過每個解決方法都會引發至少一個新的問題，資金挹注是有附帶條件的，想把納稅人非自願的貢獻全部匯集起來，由更高階的政府部門公平地往下分配，這種理想與每個地區的本地自治有所衝突——跟特權也有衝突。發給私立學校的補助券破壞了政教分離，也拉走了公立學校的資源。

此外，並非所有的問題都能用錢來解決，就算教師的薪資能夠依據他們對社會的真正價值來支付、就算有足夠的教師可以進行小班教學和一定程度的個別指導、就算他們有足夠的書籍、顯微鏡和地圖，但並非所有孩子帶進學校的問題也都能夠被解決。當我們遭遇一連串的困難，我們的能力會變弱，不知道該怎麼多做一點；我們的決心不夠，甚至無法帶領我們靠近能力不足的幽微地帶。窮忙族身上背負的重擔也是如此。我們知道該如何提升自有住房率，要怎麼樣才能讓人人都負擔得起像樣的公寓，但是我們做得不夠；我們很清楚該如何治療酗酒和毒癮，但是我們沒有提供足夠的設備，不能容納所有需要並且渴望得到幫助的人，憂鬱症和其他的精神疾病也是如此。我們很清楚許多在貧窮邊緣工作的人，都卡在健康保險的縫隙之間，他們有收入，以至於沒有資格領取醫療補助，但又賺得太少，負擔不起私人保險。從一九九八年起，政府用美國國家兒童健康保險計畫 (Saree Children's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SCHIP) 填補了大部分的缺口。提供聯邦對等資金給各州，涵蓋貧窮線標準百分之一百到兩百的兒童的州別——或者是比率更高的州，都可以領取。比如紐澤西州就涵蓋到貧窮線標準的百分之三百五十。然而只有少數幾個州選擇為父母們提供保險，而當經濟衰退導致稅收減少，想這樣做就更不可能了（該計畫的年度預算高達五十億，大約等於一艘新的航空母艦的造價）。此外，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孩子沒有醫療保險，也沒有公共保險的資格。這項重大缺失只要聯邦政府慷慨一點，就能夠改變；也有四分之一的貧窮孩子，有資格參加醫療補助卻沒有登記，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父母不想要接受政府幫助，或者因為申請程序太複雜而卻步，又或者就只是不清楚自己的孩子享有資格；我們甚至沒有決心多花一點錢雇用推廣人員，讓所有貧窮孩子都能加入保險。其他的支援計畫也是如此：只有三分之一的貧窮家庭領到食物券和住宅補貼。

這個國家東拼西湊的健康保險制度則引起了更大的爭論：有五千一百萬人沒有保險。這觸及了所有重大的問題，包括政府的角色、私營福利機構的公正性，以及美國的階級結構。以雇主為基礎的政策可能是安排健康保險最糟糕的方式了，這種方法提高了公司的勞力成本，迫使工人加入經營不善的健康保險組織，創造出來的保險資源則少得可憐。在某些公司裡，只要有一名員工罹患癌症，額外的保險費用就會扶搖直上。在高流動率的年代，工人在不同的保險單位中來來去去，常常有幾個月的時間沒有保險。我們不會把汽車保險掛在自己的公司，所以我們也不應該用這種方式來替自己取得醫療保險。

但是我們有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們能不能設計出一套全民保險，而保持原有的效率跟嚴謹度？儘管擔心政府會扼制私營部門，但在研發領域的情況卻正好相反，政府資金增加刺激了私人

投資同步增加。問題是，如果建立起單一保險人給付制度的醫療保險，有沒有可能發生同樣的情況？如果聯邦政府是唯一支付保險費用的人，並透過稅收來資助保險，就像現在由醫療保險（Medicare）為四千萬長者提供保險、以及透過醫療補助（Medicaid）為五千萬窮人提供保險一樣，那麼或許可以無庸收入，平均地提供每個人基本照顧。只可惜這個構想在二〇一〇年的改革中遭到駁回。

大家擔心這麼做會像加拿大與英國一樣，導致某種配給不均衡。比如有些加拿大人在接受乳房手術以後，等了很久才能接受化療。為了把有限的醫療資源更平均地分配給所有人口，「基本醫療」（Basic Care）會不會也剝奪了富人享用無窮盡資源的特權？享用那些醫療專家、高科技檢測和先進的療法の特權？這會不會構成「社會化醫療」，削減了牟利動機，讓研究與人才不願意投入這一門專業？許多醫生痛恨政府管制他們的收費，不願意治療接受醫療補助與醫療保險的病人，因為支付額太低了——或者他們會向年長者收取高額年費，用來填補醫療保險的開銷。

然而這種私人選擇已經讓這個國家的醫療體系大難臨頭，保險公司瘋狂索求，公眾保費急遽攀升，他們沉溺於公司主管高得離譜的獲益，卻拒絕支付疾病治療，因此強化了以階級為基礎的醫療制度，讓資源不足者的健康受到損害。透過醫療保險、醫療補助以及國家兒童健康保險計畫，政府已經逐步踏入保險產業；政府不能退縮，要更進一步地參與，否則就是怠忽職守，不顧一般大眾的福利。在單一保險人給付制度成為政治上可接受的事實之前，透過補助和規範，達成某種形式的聯邦—私人互動是有必要的。

這裡就需要我們運用決心來發展能力，才能達到兩全其美：要保障福利，但不能抑制個人的選擇或是醫療的主動性，對於一個充滿對政府的不信任、在追求社會公義上卻又如此理想化的國家來說，

這會是個相當了不起的成就。當然這是有可能實現的，如果我們讓享有最好的保險方案的國會議員，認識道卡洛琳·佩恩的難題（在失去醫療補助之後不得不停止治療），認識麗莎·布魯克（因為一家健康維護組織不願意支付救護車的費用，而毀了她的信用評等）等人，或者是像波士頓或巴爾的摩門診中心裡那些營養不良的孩子。

我們都知道不健康的童年生活對成長中的人會有什麼影響，神經科學與其他領域的報告告訴我們，在生理與認知之間、早期養育方式與日後表現之間，存在著錯綜複雜的關係。我們對問題的理解超越了我們已經具備的解決能力，而我們的能力又超過了我們行動的決心。在全國各地，我們已經發展出許多早期介入計畫，大多都建立在完善的概念之上，但是那些計畫資金不足、工作人員培訓不夠，成了一種不幸的模式：計畫得到的資源不夠，成效不彰，因而被視為失敗的做法，就這麼被放棄了。父母在養育子女方面的問題程度不同，有些可以糾正，有些則難以控制。在光譜最容易理解的這一端，做父母的可能只是缺乏有系統的養育技巧，可以透過上課或個別輔導學到。許多富有的父母會花錢接受這類培訓，低收入的父母也可以透過社會機構，偶爾得到免費的幫助。家長能從中學到如何鼓勵孩子，而不要著重在他們犯的錯誤上；如何跟孩子一起解決問題，幫助孩子自己做出決定；如何管理憤怒、如何合理管教孩子、如何傾聽並表現出同理心、如何做到相互尊重。

但是在比較遙遠的那一端，嚴重的人格障礙和家庭破碎會影響到養育方式，這時我們的能力與影響就比較弱了。有些父母本身在成長過程中受過很深的刺激，上課或給予建議都沒辦法起到什麼作用。舉例來說，我們還不知道該如何遏止性侵，只能把孩子送去寄養家庭，但是寄養家庭本身未必是模範家庭。這些擔憂是不分階級都存在的問題。

既然早年的經歷如此舉足輕重，為何美國社會不發揮最巧妙的努力，想辦法引導父母、保護孩子呢？那些成功的計畫總會用這些詞來描述：「全面」、「密集」、「高度專業」，但我認為應該還要加上一個詞：「昂貴」。如果你有高度專業的醫療、心理學和兒童發展專家，能讓他們專注在一個家庭的問題身上，帳單肯定相當可觀。

世界上最有錢的國家負擔得起嗎？我們當然可以，假如那些在上層的人願意稍微犧牲一點點的話，甚至可以讓我們省下社會福利預算。聯邦嬰兒健康與發展計畫（the Federal Infant Healt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的成果就證明了這一點。這是針對早產兒的一項臨床實驗，在全國八個地方關注九百八十五名剛出生的早產兒，直到他們三歲為止。由小兒科醫生、社工、家訪員還有其他人監管他們的健康，向這些家庭介紹該往何處尋求幫助、並提供富教育意義的托兒服務等。到了三歲，這些孩子相較於一般孩子，能有更高的智商、字彙量更多，行為問題也更少。^[1]換句話說，我們的做法是對的，這樣是有效的。「我們總是想省一點，總是想走捷徑，結果就是花了錢卻得不到明顯的效果。」加州眾議院議員喬治·米勒（George Miller）說道。他是眾議院兒童青少年家庭事務特別委員會的主席^[2]，他在一九八〇年代提出上述論點，這代表我們老早就知道這些了。

即使做了這麼多努力，我們能幫助的兒童還是不夠多。學前先鋒教育計畫是針對貧窮的孩子所打造的，每年所募得的資金大約等於一艘半的航空母艦的造價，但是根據兒童保護基金（the Children's Defense Fund）的統計，那些有資格登記的孩子裡，只有百分之六十登記了；而且該計畫的教師只有一半被要求具備大學學歷，平均年收入也只有兩萬兩千美元。小布希政府想整頓這項計畫，宣布他們要推動學齡前兒童的閱讀能力，但許多教育家都認為這項有爭議的政策並不明智。學前先鋒教育計畫開

始於一九九五年，目的是要關注從出生到三歲的關鍵時期，早期的研究初步認定有效，但是這項計畫只接觸到符合資格兒童的百分之五；同時，政府的政策又背道而馳，提高了對領取福利的母親的工作要求，但是卻沒有提高育兒補助金。這件事告訴我們，我們甚至連已知的事情都不去做了。

想評價一個社會，就要看看這個社會自我糾正的能力：犯下嚴重的錯誤或是眾人遭受苦難、不公正被揭露或是機會遭到剝奪，這種時候請看看政府、企業和慈善等機構，他們的反應是這個國家健康的指標，也是人民力量的指標。

美國擁有靈活的機制，可以辨別令人不安的真相、調整改革的方向，我們已經這樣做過了，反抗了種族歧視、環境惡化、不當的外交政策、警察暴力執法和國內的貧困，儘管這些問題都還在，但都比半個世紀之前好多了，證明了這既是挑戰也是成就。如果理想夠遠大，那就永遠不可能會完全實現；如果努力夠強烈，那麼就永遠不會結束。充其量，我們只能在這過程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勝利，這就是我們對抗貧窮的任務。

如果我們找出一個原因，也許就能很容易地想出補救辦法，可以巧妙地符合自由派或保守派的處方；如果可以把原因歸咎於剝削的體制或是不負責任的受害者，那麼爭辯的雙方當中，起碼會有一方會滿意；比如如果原因只是企業貪婪、政府漠視或是學校貧窮，那麼自由派的解決方法就夠了；而若原因只是個人的失敗，都在家長、孩子、教師或勞工身上，那麼保守派的觀點就能成立。但正如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所寫的：「壓迫是一襲無縫的衣裳。」這就是一種壓迫，而且沒有明確的界線，無法定義責任的開端與結束。在北卡羅萊納州的農田裡，移民受到墨西哥貧困的驅使，又受到美國承諾的吸引，他們被契約給束縛在人口販子和承包商手下，他們落腳在骯髒的地方，賺取農

夫、批發商、連鎖超市給的微薄工資，還有那些享受移民低價勞動成果的消費者。責任涉及範圍這麼廣，似乎好像快不存在了，但反過來看才是真的，看起來沒有人需要負責任的時候，事實上，每個人都有責任。

自由黨與保守黨之間的分歧不只在於政府的權力該有多大，也牽涉到政府應該做些什麼。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該有某些目的，保守主義主張國家應該有另一些目的，就像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要求增加給窮人的補助和計畫，共和黨中的「社會保守主義者」也希望政府能夠透過發放或削減資金來提倡婚姻、決定地方教育政策、阻止領取福利的母親生兒育女、補助宗教機構透過道德宣傳的方式來打擊貧窮。

窮忙族的問題不會因為這些意識型態上的爭辯而有所緩解，政治辯論對民主來說很重要，但是解決方法終究得超越這些大家司空見慣的分歧；政治上的對手必須踏入對方的領域，從對立面中挑選出解決之道，就像柯林頓踏進保守黨的領域，對那些接受社會福利者提出時間限制和工作要求，保守主義者也可以好好踏進自由主義的競技場，提供政府該給的援助。這個國家中的貧窮和機會，都不能只用美國神話來解釋，說辛勤工作就是萬靈丹；但也沒辦法用反美國神話來解釋，說都是體制禁錮了窮人，解脫終將到來。希望真有那麼一天，我們能整合政府與企業的社會義務、勞動者與家庭的個別義務——還有社會與個人透過教育的共同承諾。

在貧窮邊緣的工作者是美國繁盛的關鍵，然而他們的福祉卻沒有被視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相反地，這些遭到遺忘的窮忙族每天都得苦苦掙扎，好讓自己不至於跌落萬丈深淵。該是我們感到羞愧的時候了。

後記

生活繼續過著，一切似乎無解。自從本書問世以來，書中某些人踏上了比較幸福的方向，某些人則經歷了希望與幻滅，還有許多人停滯不前。以下是其中一些人的近況。

安·布拉許依舊是一名收入微薄的書籍編輯，兒子桑迪會替她減輕一些財務負擔。桑迪住在家裡，在達特茅斯學院擔任資訊人員，總是拿出部分薪水貼補家用。但是安沮喪地看著女兒莎莉從新英格蘭音樂學院輟學去花店工作，時薪僅十三美元。畢竟為了讓桑迪和莎莉有更多的機會，安選擇了貧窮，不身兼多職，以避免犧牲掉好好養育孩子所需的時間。對於一位犧牲奉獻的貧窮家長來說，沒有什麼比看到孩子可能步上自己的後塵更可怕的了。

莎莉輟學是因為她沒辦法成功。「我修的每一堂課幾乎都沒過，」在麻薩諸塞州的布魯克萊恩，莎莉趁服務顧客的空檔告訴我，「我討厭去學校，我一直都不喜歡去上學。」她也受不了登台演唱歌劇前的焦慮，在義大利和奧地利的兩個行程緊湊的夏天裡，「我緊張到肌肉顫抖，」她說道：「影響到我的音高。」她有名拉小提琴的朋友給她乙型阻斷劑，這通常是高血壓和其他心臟疾病的處方藥，她服用了一顆，「然後發現，如果我得這樣才能做我熱愛的事情，那肯定就不對了。」

所以目前她把自己的創造天賦運用在插花上，在花瓶跟籃子裡巧妙地安排，在走道上優雅愉快

地挑選花朵，置身絢麗的色彩之中。她覺得替婚禮和劇場設計擺飾讓她感到開心，不過她也感受到完成大學學位的壓力，有部分壓力當然來自於她的母親，也來自於新罕布夏州那對替莎莉支付學費的夫妻。她解釋著：他們還是會繼續替她付公寓的房租，條件是她要完成學業。她已經在哈佛進修學院修了一門課，不過也輟學了。

「媽媽嚇壞了，」莎莉說道：「她很怕我離開學校，又不回去完成學業。」

安的擔心有一部分很實際。「我怕莎莉沒有健康保險，」安說：「怕她沒取得學位，找不到有健康保險的工作。」至於她自己，則有著擔憂和無法實現的願望，「我希望我能夠年輕三十歲，這樣就可以找一份薪水比較好的工作，比較有挑戰性，不用老是做低收入、沒前途的工作。」

莉里·布洛克在我打電話問候她的時候，語調中有一種輕快的滿足。她在全錄公司繼續慢慢地往上升，擔任全錄公司約聘的能源部技術支援協調員，年薪兩萬七千美元，責任越來越重大。公司繼續在她身上投資，送她去上技工課程；她希望能學會修理複雜的機器，相信這樣能讓她的工資變成三倍。

全錄公司也替她支付鳳凰城大學的線上商務課程，莉里希望最後可以取得大學學位。她在教堂裡上劇本寫作課，她寫的劇本有一部在教堂公演了，「反應不錯。」她自豪地說著。她得益於個人力量與適當幫助的完美結盟，在恰當的時機得到社會機構的幫助——法院、戒毒計畫、就業培訓中心，還有認可她的私人公司。她已經遠離了毒癮者出沒的街道，不會再回頭了。

家裡的生活平靜多了，因為她的子女在不同的工作上做得不錯，孫子也都搬回去跟父母同住。莉里的母親維爾瑪要九十歲了，身體健康狀況還可以，腦子還是跟圖釘一樣銳利，不過未來有個財政隱

憂，一旦維爾瑪走了，用來支付房貸和稅金的退休金跟社會安全金也就跟著沒了，他們所住的房屋會成為莉里的負擔；而且維爾瑪已經成為穩定一切的錨，她的離去將會考驗莉里的能力，看她是否能夠維持現有的平衡狀態。

麗莎·布魯克的兒子的救護車費用逼得她陷入信用危機，不過結婚拯救了她，讓她不用賺那份在州立精神病院照顧成年病患的微薄薪水，該份薪水已經被現任丈夫寬裕的收入給取代了。他為槍枝製造商做打磨工作，每星期可以賺五百到一千元。他的工作按件計酬，賺的夠讓麗莎待在家裡帶六個小孩，他們年紀介於八歲到十三歲之間，是他們兩人各自的孩子。

她先生擁有他們住的房子，信用紀錄良好；他辦了房屋貸款，蓋了一間新廚房，然後又貸款大規模擴建。房屋提供了麗莎的兒子更健康的環境，他的氣喘好多了，不再需要緊急就醫，打破了從住房到健康狀況、到信用紀錄不良以至於高利息的連鎖反應。

不過醫療保險仍然是個問題。麗莎跟孩子的保險都掛在槍枝公司，「但是保險不負擔處方藥，所以你得自費。」她說道。「需要吃藥的時候，我會去買，不過用完就不吃了。」

麗莎想工作，她在家裡經營了一陣子日托中心，替人打掃房屋，還在線上修了一門小型商務管理課程。她希望最後能夠開一家私人公司，服務有特殊需求的人，就像那些她在州立精神病院裡妥善照料的人一樣。「我非常樂在其中，」她說道：「我想念那份工作。」

克里斯蒂賺的錢太少，沒辦法送自己的小孩上自己工作的幼兒園。她辭了工作，又開始領福利

救助過日子。她說她老闆拒絕讓她休假，這害她沒辦法按照要求去辦公室重新申請食物券；她老闆還一直拖著不肯讓她休假，並拒絕支付課程學費，讓她無法成為有證照的兒童發展助理。該中心也分配太多小孩給每名幼保員，一個人得照顧十四名孩子。克里斯蒂說，這種壓力導致她血壓上升。她坦白道：「我是想要工作到死呢？還是好好活著但是沒工作？」

不過她覺得枯坐在家裡領福利救助度日的生活太無聊了，幸好福利改革逼著她去工作，讓她嘗到了職場的滋味；此外，法律規定的時限也快到了——她只能領一年半，再來福利救助就要停止了——因此她急著找工作。

偶爾她會賺些台面下的錢，替公共住宅裡的其他人帶小孩。她也申請了銀行櫃台行員的職位，後來發現唯一的職缺需要通勤一小時，而她沒辦法把兩個小孩留在家裡去上班——孩子在學校的表現不是很好。她申請了電話推銷的工作，但是發現事情不太對勁，因為對方要她花一百二十美元買「用品」，包括她要銷售的煙霧偵測器在內。

她似乎在團團打轉，從這個念頭溜到下個念頭，卻沒有進展。她覺得自己可以改進打字技巧，找一份坐在辦公室裡的工作；或者是從事保險業，也許到收帳部門工作，那對她來說特別有吸引力；她覺得寄出催帳通知給人家，要比收到催帳通知好多了。

凱文·費爾茲這名前科犯在獄中學了屠宰技術，卻找不到工作。他被比爾·奧雷利（Bill O'Reilly）這名好辯的脫口秀主持人惡意中傷，奧雷利在《奧雷利實情》（*The O'Reilly Factor*）這個節目中特意挑選凱文故事中的負面情節，刪去他改過向善的細節。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某些人不願意

改變他們的意識型態。

《窮忙》一書出版之後，奧雷利邀我上節目，也想把凱文找去。凱文搬家了，我聯絡不上他，但是奧雷利堅持要製作人找到他，必要的話利用他的服刑紀錄也可以。

他們沒有告知我這件事，有個製作人打電話更新了他的近況。後來奧雷利沒有讓凱文上節目，大概是因為他會反駁被奧雷利扭曲的事實。

為了強化保守派熟知的觀點，奧雷利指出，「有些人就是無藥可救。」凱文有四個孩子，四個孩子的母親都不是同一個人——比我為了本書採訪他的時候多了兩個。這是真的（大約一個月後，另一個孩子出生了，他總共跟四名女人生了五名孩子）。

但奧雷利接著開始捏造事實、斷章取義。「他因為沒付撫養費，一次又一次的入獄坐牢，」奧雷利宣稱。事實上，節目播出後，我發現他只被關過一個星期，其餘時候都有按時支付。「他就是個完全不負責的人！」奧雷利怒氣沖沖地說著。「有些人骨子裡就是沒辦法，對嗎？沒辦法負責，所以不會有人願意雇用他們。」

但是凱文已經有工作了，奧雷利沒提到這一點。凱文告訴奧雷利的製作人，過去三年半他都在巨人超市做肉品包裝，時薪七點三五美元。

凱文不是模範公民，就像許多相同處境的人一樣，他是個矛盾的案例。他負起責任，保住一份工作；卻也不負責任，跟不同的女人生下許多孩子。他支付撫養費的紀錄並不完美，但是模稜兩可的真實生活過於複雜，無法套用奧雷利簡化的政治觀點。真正的凱文並不能被硬塞進右翼人士對窮人的刻板印象裡：無可救藥、從來不幹好事，社會因此可以毫無罪惡感地將他們棄如敝屣。所以奧雷利捏造

了一個凱文，巧妙地隱藏了凱文有工作的事實，不讓觀眾知道；而且他大部分的工資都拿來支付撫養費了。

與此同時，真正的凱文還是希望能升職，在巨人超市當一名合格的屠夫。

湯姆·金這位帶著三名孩子的鰥夫失業了。拉寇斯公司被迫將三班制改為兩班制。「中國人快把我們逼死了。」湯姆說道，並轉述了他聽到的話，「同樣一雙靴子，他們那裡可以用七十八分錢就做出一雙。」突如其來的空閒時間對他的生活和錢包造成嚴重的打擊。「對我來說，這個打擊很大，本來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現在卻沒事幹，」他說道：「他們只提前一個星期通知我們。」當時是一月隆冬之際，他拖車裡的水又結冰了，他得搬去跟朋友住幾個星期。

隔一個月，新罕布夏州舉辦總統初選，他有沒有去投票呢？「沒啊，我在外面找工作。」這也許可以呼應他早些年曾告訴我的話，說沒有哪個候選人能承諾他會有工作，對他的情況也不會有何改善。到了秋天，他還是不確定要不要去投票、要投給誰。「我根本懶得管了，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忙個不停，沒時間看電視。」

春天融雪之後，他接了一些零星的營建工作，後來開始習慣撿拾廢鐵——生鏽的卡車、汽車、引擎之類的，賣給克萊蒙特的回收場。「大家知道我在收破銅爛鐵，都會拿給我。」他解釋道：「價格不錯，可以賺到錢。」他也在一片兩百英畝的農地上收割乾草，他父親在看管這塊地，他的女兒凱特現在讀小學六年級了，也會幫忙堆疊乾草。

「她跟她媽媽是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湯姆說道：「有夠直腸子，毫不掩飾。」

年紀最大的柴克沒有上大學，在內布拉斯加州接受空軍的技工訓練，他很樂在其中，他告訴他祖母說：「等我服役完，可以去任何一個機場修飛機。」柴克也告訴我這件事，我說：「你媽媽會為你感到非常驕傲的。」他克制不住地哭了起來。後來我告訴湯姆：「我不是故意害他哭的。」

「我還可以。」湯姆在電話那頭勇敢地說著。我可以想像他用手搓揉自己的臉的樣子。「我的狀況好多了，也吃得很營養，每一天都會是好日子。」

卡洛琳·佩恩，這位沒有牙齒的母親正在便利商店的收銀台後面忙得不可開交，長長的排隊人群中，有個男孩要跟她買一包香菸。「通常我會檢查每一個人的身分證，」她說。不過這一次，「我真的忙翻了，」結果這名男孩是州政府的臥底，隨後跟著一名探員回來，開了販售香菸給未成年人的罰單給她。

「我哭了，我很害怕。」卡洛琳回憶道。她可能得上法院，可能會遭到開除，可能得付罰款但是她沒錢。她慌了手腳，店經理替她說話，說她平常都很小心檢查顧客的身分證；探員心軟了，說他會跟上司談談。焦慮地過了幾天之後，那位探員打電話來，告訴卡洛琳她可以把罰單撕掉了，不過店裡還是得繳罰款。

雖然罰單撤銷了，但這次經驗卻讓她受夠了，加上工作時間不佳、工資不好，卡洛琳決定要辭職。「我們要怎樣做妳才願意留下來？」她老闖問道。「我說我要多一點錢跟一些福利，他們說『那我們幫不了妳』，所以我就提前兩個星期通知他們。上班的最後一天，我老闖說：『妳可不可以再多做幾天？』因為那裡有個女孩沒通知他們就辭職了。我幫他們盤點存貨，我就是個心地善良的老好人。」

八個月後，卡洛琳還是沒有工作，有人在《紐約時報》雜誌的書摘中讀到她的故事，打電話來想提供幫助。她很感激，但是她說她真正需要的是一份像樣的工作，不過那卻遲遲沒有出現。「我希望寶僑公司可以打電話給我，讓我去工廠工作。」即使他們在新罕布夏州時那樣對待她嗎？「他們到處都有工廠啊。」她說。

她原本指望某個就業計畫能替她支付學費，取得護理師助理證照，卻發現她沒有參加的資格：她沒有在領社會救助金，還擁有大學學歷。從表面上看來，她好得很，根本不需要幫助。她非常失望，因為她希望能去老人安養院工作。「我具有樂於助人的性格，」她說道：「我替他們覺得遺憾。」

她被拒絕也是因為人家認為她的背痛會妨礙她攙扶老人。的確，她的背痛惡化了，她的脊骨神經治療師堅持她不該拿任何超過十磅重的東西、不能走遠路、不要彎腰、一次不要站或坐超過兩三個小時、或是把手臂高舉過肩，因此她向社會安全局申請生活補助金，遭到拒絕後又申訴，最後終於成功了。

同時她參加了辦公室文書課程，增進自己的打字技巧，並學習電腦軟體，但是她的牙齒缺陷還在，她不習慣新的假牙，沒有在戴。「要不是需要調整一下，就是我得戒菸，要不然就逼著自己戴。」她宣稱。

她患有輕微智能障礙的女兒安柏，認為從新罕布夏州搬到印第安納州是件好事，因為學校有了改善。「新罕布夏州只教我怎麼打掃，可是我已經會幫媽媽打掃了，」安柏說道。在印第安納州，她上的課程有兒童發展、數學、政治學、打字和其他具有挑戰性的課程，明年高中畢業之後，她會報名參加一項職能計畫。

她還是不會閱讀，因此從新罕布夏州的克萊蒙特遷移到印第安納州的曼西，這個折磨人的決定仍舊是好壞參半。「安柏這兩年過得不錯。」卡洛琳說道：「她長大不少，也成熟很多。」不過以七萬九千美元賣掉房子還是令她感到心痛，尤其是她在網路上看到那棟房子又要出售了，這次的售價是十萬美元。「我看了就難受，」卡洛琳說：「因為我什麼也沒賺到。」後來她用溯及既往領到的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在曼西買了一間房子。

「桃子」，這個童年時期飽受虐待、無家可歸的女人，透過「人人有飯吃」的全面就業培訓計畫，似乎復原得不錯。

她現在替全錄的一個客戶管理郵件收發室，這是一間位於華盛頓的私人公司，這表示她的責任加重了，年薪也達到兩萬六千美元。空閒時她會做人造花擺飾，這在送禮聚會中大受歡迎，所以她固定在華盛頓特區東北部一個鬧區擺攤販賣。

她覺得這很好，好到能夠返鄉幫助自己跟過去和解。她回到馬里蘭東岸昔日成長的教堂裡，跟教會眾聊天，送禮物籃給好幾名年長的教友，感謝他們在她痛苦的童年時期幫助她。「他們全都目瞪口呆。」她說道：「有名女士，總是歡迎我去她家，我告訴她我曾經餓著肚子、鼻青臉腫地坐在某個公車亭裡，想到的都是她從烤箱裡拿出來的餅乾。」

桃子記憶中的教堂是真正的避難所，一個莊嚴的地方，井然有序、衣冠整齊，女士細心打扮的樣子成了一種標記。在後來的那些年裡，這讓她知道生活可以美好而撫慰人心。「他們都流淚了。」桃子說道：「他們說『沒想到妳還會想起我。』」

「對啊，你們坐在那裡，手裡拿著帽子，頭抬得高高的。即使在我最低潮時，這都能鼓舞我。」返鄉回到東岸的還有她住在寄養家庭時的兄弟，從費城來與她重聚，場面感人。他的孩子擁抱她，叫她「姑姑」，帶給她一個真正的家庭。她以滿感情的聲音說，她現在有了更大的歸屬。「這真是太棒了，感覺到有人真的關心你。」

後來桃子終於找到一個好男人，「一位年輕善良的紳士，一點也不討人厭。」她說道。他在華盛頓瓦斯公司工作，負責裝設管線和維修漏氣。「我希望能結婚，」她宣布，「我們想買房子。」

我打電話問她住址，要寄一本書給她。我提到她應該可以在書中認出自己，雖然我應她要求在書中叫她「桃子」，沒有用到她的姓名。她用爽朗的聲音回答我，「噢，你現在可以用我的真名了！」她的名字叫做賽莉絲·坦崔佛斯。

註釋

前言 ● foreword

- 1 取自艾瑪·拉撒路 (Emma Lazarus) 銘刻於自由女神像下方的詩。
- 2 Richard A. Oppel Jr., *New York Times*, Dec. 18, 2000, p. A19.
- 3 "Surveying the Aftermath of the Storm: Changes in Family Finances from 2007 to 2009",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March, 2001.
- 4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and "Morality Rate, Infant", *The World Bank*, 2009.
- 5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2nd ed., unabridged (Springfield, Mass.: Merriam, 1956), p. 1935.
- 6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3r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p. 1419.
- 7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Springfield, Mass.: Merriam, 1983), p. 922.
- 8 Michael Harrington, *The Other America* (Baltimore: Penguin, 1963), pp. 173-74.
- 9 人口統計局「計算稅前的收入，不包括資本利得及非現金的福利（例如公共住宅、醫療補助以及食物券）。」貧窮的門檻每年會依照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詳見 <http://www.census.gov/hhes/poverty/povdef.html>
- 10 更多貧窮指數的歷史可見 Gordon M. Fish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shansky Poverty Thresholds and Their Subsequent History as the Official US Poverty Measure," <http://www.census.gov/hhes/poverty/povmeas/papers/orshansky.html>.
- 11 Kathleen Short, John Iceland, and Thesia L. Garner, *Experimental Poverty Measures*, 1998 (Washington, DC.: U.S. Census Bureau), <http://www.census.gov/hhes/poverty/povmeas/expov/expov.html>.
- 12 Kathleen Short, "The Research Supplement Poverty Measure,"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2010, Nov. 2011, <http://census.gov/prod/2011/pubs/>

- 13 *The NewHour with Jim Lehrer*,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Mar. 17, 1997.
 14 *Weekend Edition*, National Public Radio, Jan. 16, 2000.

第一章 ● chapter 1

- 1 Robert Pear, "Aid to Poor Faces Tighter Scrutin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2003, p. A1.
- 2 根據城市研究院的經濟學家羅伯特·勒曼的研究所得。
- 3 根據雪城大學政府檔案交流中心 (Transactional Records Access Clearinghouse - TRAC) David Cay Johnson, *New York Times*, Apr. 16, 2001, p. A1, and Feb. 16, 2001, p. A1, <http://www.trac.syr.edu/tracis/findings/national/ratesfab3.html>
- 4 布洛克稅務公司企業總部在二〇〇二年的報價比較低一點：貸款兩百到五百美元的費用是二十九點九五美元；五百零一到一千美元是三十九點九五美元；一千零一到一千五百美元是五十九點九五美元；一千五百零一到兩千美元是六十九點九五美元；兩千零一到五千美元是八十六點九五美元。
- 5 有關布洛克稅務公司的稅務貸款以及其所導致的訴訟案件，詳載於 David Cay Johnson, *New York Times*, July 2, 2000, Section 3, p. 1. 亦可見報導 February 28, 2001, p. C1.
- 6 Christopher Bowe, *Financial Times*, Feb. 23, 2000, p. 11.
- 7 Peter T. Kilborn, *New York Times*, June 18, 1999, p. A1.
- 8 Tamar Lewin, *New York Times*, Feb. 13, 2001, p. A14.
- 9 Richard A. Oppel, Jr., *New York Times*, Mar. 26, 1999, p. C1.
- 10 *Consumer Reports*, January 2001, pp. 20-24.
- 11 Geraldine Fabrikant, *New York Times*, Dec. 3, 2000, Section 3, p. 17.

- 12 Vivienne Hodges and Stuart Margules, *Sanford 9th Language Arts Coach Grade 4* (New York: Educational Design, 1998).
- 13 Tom Wolfe, *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 (New York: Bantam, 1987), pp. 142-143.

第二章 ● chapter 2

- 1 Alan Weil and Kenneth Finegold, *Welfare Reform: The Next Act*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Press, 2002). Introduction at http://www.urban.org/pubs/welfare_reform/intro.html.
- 2 Robert Lerman, "Single Parents' Earnings Monitor," *Urban Institute*, Oct. 26, 2001, and Dec. 26, 2002, available at www.urban.org
- 3 Jack P. Shonkoff, Chapter 37.2, "Mental Retardation," in Richard E. Behrman, Robert M. Kilgeman, and Ann M. Arvin, eds., *Nelson Textbook of Pediatrics*, 16th ed. (Philadelphia: Saunders, 2000), pp. 126-29.
- 4 Barbara Ehrenreich, "Two-Tiered Morality," *New York Times*, June 30, 2002, Section 4, p. 15. Also, Ehrenreich, *Nickel and Dimed* (New York: Holt, 2001), p. 146.
- 5 *Now with Bill Moyers*, PBS, Nov. 8, 2002.

第三章 ● chapter 3

- 1 「血汗工廠監督聯盟」(Sweatshop Watch) 的成員包括亞太勞工聯盟 (Asian Pacific American Labor Alliance) / 亞太法律中心 (Asian Pacific American Legal Center) / 洛杉磯人道移民權利聯盟 (Coalition for Humane Immigrant Rights of Los Angeles, CHIRLA) / 韓國移民扶助會 (Korean Immigrant Workers Advocate, KIWA) / 泰國社區發展中心 (Thai Community Development Center) / 紡織品貿易及產業雇工聯盟 (Union of Needletrades / Industrial and Textile Employees) / 亞裔法律協會 (Asian Law Caucus) / 亞洲女性移民扶助會 (Asian Immigrant Women Advocates) / 平權扶助會 (Equal Rights Advocates)。

- 2 Julie A. Su, "El Monte Thai Garment Workers: Slave Sweatshops," <http://www.sweatshopwatch.org/sweatch/campaigns/elmonte.html>
- 3 Julie A. Su, "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 The Garment Industry's Dirty Laundry," *The Journal of Gender, Race and Justice*, University of Iowa College of Law, vol. 1, no. 2 (Spring 1998).
- 4 Nancy Cleland, "Garment Makers' Compliance with Labor Laws Slips in L.A.," *Los Angeles Times*, Sept. 21, 2000, p. C1. Federal violators in 2000 encompassed 25 percent of clothing firms in San Francisco and 48 percent in New York City. Victoria Collier, "S.F. Clothing Firms Clean Up Their Act," *Los Angeles Times*, Mar. 29, 2002, p. B1.

第四章 ● chapter 4

- 1 "The US-Mexico Border,"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June 2007,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Feature/display.cfm?ID=407>
- 2 "Humanitarian Crisis: Migrant Deaths at the U.S.-Mexico Border,"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nd Mexico's National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 Oct. 1, 2009, p. 17.
- 3 Farm Subsidy Database,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http://www.ewg.org>
- 4 Margaret Reeves, Kristin Schafer, Kate Hallward, and Anne Karren, "Fields of Poison: California Farmworkers and Pesticides" (San Francisco: 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North America, United Farm Workers of America, California Rural Legal Assistance Foundation, 1999). 新生兒缺陷率資訊來自加州帝國郡。
- 5 同上。
- 6 Anthony DePalma, *New York Times*, Oct. 3, 2000, p. C1.
- 7 Tim Weiner, *New York Times*, Mar. 3, 2001, p. A1. 在墨西哥政府的敦促之下，減低費用的網絡已經建立起來了，可以用電腦轉帳，現金卡，或是由美國的雇主直接把薪水存入墨西哥的帳戶裡。
- 8 *New York Times*, Jan. 1, 2002, p. C1 and Mar. 27, 2003, p. A12.

- 9 Maria Panaritis and Thomas Ginsberg, *Philadelphia Inquirer*, Dec. 12, 2002.

第五章 ● chapter 5

- 1 Philip Moss and Chris Tilly, "Soft Skills, Race, and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Employers," paper presented at Urban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May 6, 1999. 訪談汽車零件製造商，保險業及零售業的雇主發現，有百分之七十四到百分之百提到軟技能是入門基層員工的重要特質，百分之二十二到百分之六十七提到硬技能。
- 2 二〇〇二年五月二十日於華盛頓非國會議院 Parrish Wiggins · SOME 職業培訓中心的職業發展展。

第六章 ● chapter 6

- 1 Judith Lewis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pp. 96, 111.
- 2 S. M. Horwitz, L. V. Klerman, H. S. Kuo, and J. H. Jekel,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chool Age Parenthood,"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24 (1991): 168-77.
- 3 Kevin Fiscella, M.D., MPH; Harriet J. Kitzman, Ph.D.; Robert E. Cole, Ph.D.; Kimberly J. Sidorat, and David Olds, Ph.D., "Does Child Abuse Predict Adolescent Pregnancy?" *Pediatrics* 101 (April 1998): 620-24.
- 4 Maya Pines, "A Child's Mind Is Shaped Before Age 2," *Life*, December 1971.
- 5 Barry Zuckerman and Robert Kahn, "Pathways to Early Child Health and Development," in Sheldon Danziger and Jane Waldfogel, eds., *Securing the Future: Investing in Children from Birth to Colleg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0), pp. 92-93.
- 6 Pines, "A Child's Mind"
- 7 "Educational Day Care Can Reduce Risk of Mild Retardation," *Growing Child Research Review* 8, no. 10 (October 1990), from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0, no. 7, p. 844.

- 8 Alexandra Starr, "Does Universal Preschool Pay?" *Business Week*, Apr. 29, 2002, p. 98.
- 9 Lisbeth B. Schorr, *Within Our Reach* (New York: Anchor/Doubleday, 1988), pp. 163-68.
- 10 "Parents As Teachers: A Research-Based Program," <http://www.patnc.org/researchevaluation.asp>

第八章 ● chapter 8

- 1 美國農業部經濟政策局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 11010 美國農業安全廳網 - http://www.crs.usda.gov/Briefing/FoodSecurity/stats_graphs.htm#food_secure.
- 2 Jack P. Shonkoff and Deborah A. Phillips, eds., *From Neurons to Neighborhoods: The Science of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2000), pp. 204-205.
- 3 Joycelyn Guyer and Cindy Mann, "Employed but Not Insured: A State-by-State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Low-Income Working Parents Who Lack Health Insurance" (Washington, D.C.: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1999). Cited in Barry Zuckerman and Robert Kahn, "Pathways to Early Child Health and Development" in Sheldon Danziger and Jane Waldfogel, eds., *Securing the Future: Investing in Children from Birth to Colleg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0), p. 96.
- 4 Shonkoff and Phillips, *Neurons*, p. 208.
- 5 Zuckerman and Kahn, "Pathways," p. 96, citing Marie C. McCormick, "The Outcomes of Very-Low-Birthweight Infants: Are We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Pediatrics* 99 no. 6: 869-76.
- 6 Shonkoff and Phillips, *Neurons*, pp. 207-209.
- 7 Zuckerman and Kahn, "Pathways," p. 90.
- 8 同前，p. 92.
- 9 Shonkoff and Phillips, *Neurons*, p. 238.
- 10 Steven Parker, Steven Greer, and Barry Zuckerman, "Double Jeopardy: The Impact of Poverty on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The Ped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35, no. 6 (December 1988): 1234.

- 11 Naomi Richman, Jim Stevenson, and Phillip J. Graham, *Preschool to School: A Behavioral Stud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cited in Zuckerman and Kahn, "Pathways," p. 98.
- 12 同前，pp. 213-14.
- 13 Mary Carlson and Felton Earls, "Psychological and Neuroendocrinological Sequelae of Early Social Deprivation in Institutionalized Children in Romania,"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 807 (1997): 409-428, cited in Zuckerman and Kahn, "Pathways," p. 91.
- 14 Shonkoff and Phillips, *Neurons*, p. 237.
- 15 Parker et al., "Double Jeopardy," p. 1232.
- 16 M. Duyme, A.-C. Dumaret, and S. Tomkiewicz, "How Can We Boost IQs of 'Dull' Children?: A Late Adoption Stud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6, no. 15: 8790-8794, cited in Shonkoff and Phillips, *Neurons*, pp. 286-87.
- 17 David Brown, *Washington Post*, Sept. 19, 2002, p. A3; American Lung Association, "Childhood Asthma Overview," Oct. 2007, <http://www.lungusa.org/site/pp.asp?c=dvLUK9O0E&b=22782>

第九章 ● chapter 9

- 1 Jonathan Kozol, *Savage Inequalitie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2), pp. 20-21.
- 2 同前，p. 83.

第十章 ● chapter 10

- 1 Barbara Ehrenreich, *Nickel and Dimed* (New York: Holt, 2001), p. 149.

- 1 “Young and Registration in the Election of November 2000.” U.S. 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February 2002, Table B, pp. 6-7.
- 2 *Los Angeles Times*, Apr. 7, 2003, p. A20 and *New York Times*, Apr. 23, 2008, p. A1. 在二〇〇六年超過四十三萬個犯人之中，有將近十四萬三千人是非公民，超過九萬人未成年。
- 3 David Brooks, “The Triumph of Hope Over Self-Interest,” *New York Times*, Jan. 12, 2003, Section 4, p. 15.
- 4 「美國最低工資法——二〇一二年一月一日」，美國政府網，<http://www.dol.gov/esa/minwage/america.htm>
- 5 Harry J. Holzer, “Living Wage Laws: How Much Do (Can) They Matt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Dec. 2008, Appendix A.
- 6 Robert Pear, “Aid to Poor Faces Tighter Scrutiny,” *New York Times*, Feb. 5, 2003, p. A1.
- 7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Jan. 27, 2005,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union2.nr01.htm>.
- 8 一九九四年的「學校工作機會法案」(School-to-Work Opportunities Act)，試圖打造出技職與學徒計畫，儘管國家資金充裕，但從未付諸實行，柯林頓政府也沒有興趣。Robert I. Lerman, “Promoting Quality Careers with Intensive School-to-Work Activities,” paper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Dallas, Texas, Nov. 7-9, 2002. 該法案與合作並未實施。
- 9 二〇〇四年二〇〇五年財政預算委員會 Citizens Budget Commission, “Local Taxes in New York: Easing the Burden,” Dec. 6, 2007, <http://www.dcnyc.org/Bucker%203%20Powerpoint.pdf> (雜誌：此卷封面雜誌，目錄文件應放在 http://www.dcnyc.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circuit_02042008.pdf)
- 10 Gary Orfield, Eric Frankenberg, and Chungmei Lee, “A Multiracial Society with Segregated Schools: Are We Losing the Dream?” (Cambridge, Mass.: The Civil Rights Project of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6, 2003).
- 11 Jack P. Shonkoff and Deborah A. Phillips, eds., *From Neurons to Neighborhoods: The Science of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2000), p. 211.
- 12 Lisbeth B. Schorr, *Within Our Reach* (New York: Anchor/Doubleday, 1988), p. 293.